樊树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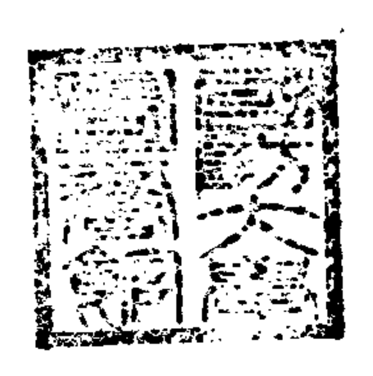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樊树志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樊树志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57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字数431,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309-00355-1/K·16

定价：12.50元

目　　录

下卷 江南市镇的典型分析

绪　　论

市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的。它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影响，以及市镇研究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感兴趣的课题。

在这方面已作出引人注目成就的是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二代学者的佼佼者。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曾研究过东南亚的华侨，后来脱离人类学的正统，致力于明清史与近代史的研究。他不落俗套，别开蹊径，以地理学中区域经济的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商业与市场系统。1964 年到 1965 年，他在《亚洲研究学刊》连载了名著《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①，把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各门学科相结合，开拓新领域，提供新成果，反映了西方历史学的新潮流。他根据四十年代在四川所作的社会调查资料以及大量的文献资料，得出了农村市集、市镇分布的六角型模式。这种试图概括社会现象的模式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作为一种大胆的突破，是有贡献的。他的贡献就在于把中国的基层社会作出一个明晰的模式，使下一代学者清楚地看到自然村、集市、市镇、县城等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后他进一步把这一理论推广到全国，把中国分作九个独特的区域，提倡进行不同区域的研究，批评过去学术界把中国当作单一体系研究

---

① G.W.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Joural of Asian Studies, 24—1.2.3(1964—1965).

的倾向。这一成果发表于1977年出版的《晚清帝国的都市》一书中[1]。

1980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在北京召开“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及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施坚雅教授参加了会议，我本人也应邀参加了这一历史学界的盛会，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他关于市镇及市场经济的理论。他在会上提交的论文是《市场及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着重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运用区域系统研究法来分析中国历史；其二是如何研究中国市场系统及区域经济。他在论文的结论中说：“我们在阐述经济和社会现象时必须有系统地综合探讨这些现象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变化情形。我承认历史事实错综复杂，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不过，我更相信，即使在这无穷之中，历史也有规律可寻。”他特别强调指出：

> “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比较适当的研究单元，既不是府，也不是省，更不用说是整个帝国，而是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区所综合而成的经济区域。”

他在论文中具体地阐发了这一观点，使与会的中国学者感到生疏而难于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种研究方法是近二十年来的新进展，中国同行可能看作‘天书’。”这篇长达一百多页的论文，确实有点像“天书”。这是由于长期来学术交流不畅，使我们对区域系统分析方法，以及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研究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现象感到陌生的结果。他的可取之处，显然在于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打破行政区域结构，而着眼于经济区域的研究；把一个经济区域的各方面看成一个活的整体，把活生生的人类历史恢复到活生生的整体中去，并具体地显示出整体中的局部。

施坚雅把市镇放到都市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他对

---

[1] G.W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1977.

1893年(光绪十九年)的都市化作了一个统计,全国的都市化率为6%,长江下游的都市化率为10.6%,云南、贵州的都市化率是4.5%。他把当时的都市化现象由下表加以显示①:

经济层次＼行政层次	首都	省都	道都	府(州)治	县治	非行政中心	合计
首都	1	3	2				6
地域首府		15	1	3	1		20
地域都市		1	26	20	8	8	63
大都市			19	77	85	19	200
地方都市			12	62	494	101	669
中心市镇				17	581	1,721	2,319
中间市镇					106	7,905	8,011
基层市镇					12	27,700	27,712
合计	1	19	60	179	1,287	37,454	39,000

从首都到县治的都市仅一千五百个左右,而相当于镇和市的约有三万七千五百左右,充分显示了市镇在都市化中的重要性。

最下层的市镇的规模,施坚雅根据1948年的资料作了估算,一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50人,平均人口数7,870人,平均圈域面积52.5平方公里,从境界到市的最远距离4.5公里,市场间隔7.79公里。这个圈域的大小,是各村落居民相互面积的人际关系,即结婚、宗教活动等日常社交活动的交涉圈。市的开市日期或相隔十日或相隔十二日的周期,在这一市的休市日可以到邻近的市去贸易,对于每个农家而言,大抵每天都可以到市上赶集②。

日本学者对市镇的研究也很值得注意。著名的中国经济史权

①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340.

②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ture in Rural China, pp.17—31.

威学者加藤繁教授所写的《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①]，早已闻名遐迩；周藤吉之教授的《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②] 亦堪称脍炙人口的佳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斯波义信教授，他长期致力于此，写出了《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市》[③]、《围绕中国都市史的研究概况》[④]、《中国都市史的新动向和二三个模式》[⑤]、《中国中近世的都市和乡村》[⑥]、以及《宋代湖州镇市的发展》[⑦] 等论著。

斯波教授认为，中国都市、农村构造、都市化过程的历史渊源，应该追溯到十世纪前后的宋代中世经济革命时期（10—13 世纪）。在这里，社会是以商业经济化和半都市、村市发达的市场网为特色的。其后也以一贯的步调发展着，一直延续到清末。

宋代以来，半自给的、半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活，控制了各农家的家计。上至国都下至村落，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行使机能中枢职能的单位，被学者们称为"中心地"，因而提出了中心地层次论，有行政中心地层次和经济中心地层次。以清代为例，行政中心地层次可以划分为：京都、省治、道治、府（州、厅）治、县治、镇、市、村。经济中心地层次可以划分为：首都、地域首府、地域都市、大都市、地方都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原始市镇、村落。而作为"都市化"课题讨论的对象，包括村落以外的八个层次，即第一至第八层次。

在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镇。在政府眼中，都市是止于县治的，县以下的镇、市都无差别地被称为乡村，

---

① 刊载于《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富山房，1933年）。
② 见周藤吉之：《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
③ 刊载于《东洋学报》四十四卷一、二期。
④ 刊载于《法制史研究》二十三期。
⑤ 刊载于《比较都市史研究会会报》三卷五期。
⑥ 刊载于《近世都市的比较史的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
⑦ 刊载于《榎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

这是一种传统的保守观点。他援引施坚雅对1893年的都市化统计，县治以上的都市仅一千五百个左右，而相当于镇、市的非行政中心有三万七千五百个，县治以上的都市犹如大海中的孤岛。另一方面，这样的县城，既是国内商业和地区流通的场所，又是帝国对社会一元化统治的据点。汉代六千万人口，有1587个县；唐代六千万人口，有1573个县；宋代约一亿人口，有1135个县；明代约六千万人口，有1385个县；清代中叶四亿人口，有1300个县。县数在汉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大变动，成了中国社会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常数，这当然是人为的计划性，以及受行政职能的分配意图制约所产生的保守倾向。然而都市化的趋势毕竟是在发展的。都市化的基础是农村。唐末农村出现了无数的村市，宋代大量涌现的市镇，在行政上是乡村，在财政上却是坊郭。市镇是日常交换与社交的场所，它们与邻近的村落构成基层自治场，即自发形成的经济社会空间，在都市化进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①。

我本人通过对江南市镇的研究，深深感到以往历史学界对市镇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估价。事实上，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都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县以上都市的数量变化不大，那么都市化不能不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原有的县以上层次的都市，不断由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化，或者经济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体现在大量市镇的兴起与繁荣，以它突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成为不同于乡村的都市。

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无论就其规模，抑或就其经济地位而

① 斯波义信：《中国中古近古的都市和农村——都市史研究的新视角》，载《近世都市的比较史的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1982年)。

言，都已大大超过管辖它的县城乃至府城。例如：湖州府的南浔镇，全镇南北长七里、东西宽三里，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①]。镇中运河与市河相交，形成十字港，系闹市与商业中心，四周街道密布，有大街、寿星街、爆场街、丝行埭、米廊下、树行埭、西木行等。它从南宋末年兴起，直至清末民初久盛不衰，成为湖州丝业中心，当地有句谚语："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②]。它虽属湖州府乌程县管辖，然而其规模、其地位、其经济文化诸功能，都早已凌驾于湖州府、乌程县之上。嘉兴府的濮院镇，以出产濮绸闻名于明清两代。"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③]。鼎盛时代全镇共有二十七条街、十五条弄、二条巷[④]。而管辖它的桐乡县城是在凤鸣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模之小根本无法与濮院镇相比拟；就是嘉兴府城与濮院镇相比也大为逊色。分属于湖州府、嘉兴府的乌青镇，由乌镇与青镇组成，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实为一镇，规模更为宏大。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二里，有东西南北四门：南昌门、澄江门、朝宗门、通霅门、"以郡城规模称之"[⑤]。全镇周长达十八里，而明代湖州府城、嘉兴府城的周长都只有十二里[⑥]。所以当时人说乌青镇"名为镇而实县郡邑城郭之势"[⑦]。

市镇在乡村的都市化趋势中的显著作用，还体现在一些市镇被作为县的治所，因而使县城与市镇合二而一。例如：宣德四年置平湖县，以当湖镇为县治；宣德四年置嘉善县，以魏塘镇为县治；万

①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②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1938年)，第122页。

③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物产。

④ 民国《濮院志》卷二衢巷。

⑤ 张炎贞：《乌青文献》卷一疆城；卷二门坊。

⑥ 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四建置志。

⑦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历元年置青浦县,以唐行镇为县治;诸如此类的还有凤鸣市——桐乡县治;义和市——崇德县治(后改为石门县治);朱泾镇——金山县治;硖石镇——海宁县治。这些市镇转化为县城,其实只是形式的变换,因为它们是具备县城的规模、功能在先,改成县治在后,而且改变建置后这些市镇的规模依然故我。这就充分表明市镇类似于县城而不同于乡村,是乡村向都市转化的终结。

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乡村向都市化方向转变的产物。南宋时代已兴起了大批市镇,明代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市镇空前繁荣的盛况,清代前期这种盛况还在持续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发展最为迅速,分布密度也最大,因而选择这一地区深入剖析是具有典型价值的。

长江三角洲星罗棋布的市镇互相联系,结成一个市镇网络,沟通全国各地的市场。伴随着这一经济区内农家经营的商品化趋势,大体上区分为棉布业交易中心与丝绸业交易中心两大类型著名市镇系统。

松江府是明代著名的棉纺织业中心,境内各地所产棉布品种丰富,质地精良,号称"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天下第一"[1]。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记载明末清初当地棉布向全国市场销售的情况说:

> "棉花布,吾邑所产……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

[1]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①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巨额的棉布交易主要并不是在府城或府属各县的县城中进行的，而是在一些市镇中进行的。在这些市镇上，牙侩广设布行、布庄，招徕客商，成为商贾云集的交易中心。

例如朱泾镇，明中叶镇上"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成为"走两浙达两京"的要津，以松江棉布集散地闻名于海内：

——"明季多标行(按：即经营标布贸易的牙行)，有小临清之目"②；

——"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按：指元代在此设置大盈务，明初尚存。)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③。

朱泾镇不仅是标布的集散地，而且是尤墩布的集散地。"尤墩布轻细洁白，市肆取以造袜，诸商收鬻，称于四方，号尤墩暑袜"，"万历以来……远方争购之"④。

又如枫泾镇，与朱泾镇并驾齐驱，"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⑤。此镇明初时"户口日繁，市廛日盛"，布号栉比鳞次，生意兴隆。到清初，更趋兴隆，"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把大布、小布加工后出售给各地客商⑥。

再如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洛标客往来不绝"，"商贾贸易甲于他镇"⑦，是与朱泾镇、枫泾镇南北呼应的棉布交易

---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②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卷一疆域志·因革。
③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卷一疆域志·因革。
④ 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风俗。范濂：《云间据目抄》。
⑤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⑥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卷一食货。
⑦ 万历《青浦县志》卷一土产。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重地。镇上“东市明纪场，茶坊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①。康熙以后，“本色布，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青蓝布，估客贩至崇明南北二沙”②。

苏州府的嘉定、常熟、昆山、太仓一带也盛产优质棉布，素有“苏布名重四方”之誉，药斑布、棋花布、斜纹布、缣丝布都很著名，“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③。不少棉布业市镇都面向全国市场，仅嘉定一县就有罗店镇、外冈镇、钱门塘市、南翔镇等繁华的交易中心。

罗店镇在明代万历年间“比闾殷富，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罗店镇的四乡“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镇上牙行收购四乡所产棉布，转售徽商，因此镇上“阛阓喧嚣，日睹贾舶商车之盛”④。

外冈镇在明代万历初年，“民渐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易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⑤。

钱门塘市所产丁娘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远近闻名，称为钱门塘布⑥。

南翔镇四乡盛产浆纱布、刷线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明中叶就远销山东临清，入清后该镇“布商辏集，富甲诸镇”，“多徽商侨寓，从事贩布营生”⑦。

---

① 嘉庆《朱里小志》卷五里巷。

② 嘉庆《朱里小志》卷四物产。

③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④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乾隆《宝山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域志·风俗。

⑤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

⑥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土产。

⑦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物产。

显然，市镇的活跃，是使松江府"绫布二物，衣被天下"的根本因素。

与"绫布二物，衣被天下"相比美的，是"湖丝遍天下"①。

湖州、嘉兴、杭州三府的蚕桑区，遍布着大批丝绸业市镇，各地客商纷至沓来，竞相购买湖丝及丝绸，运往各地市场出售，其繁荣昌盛的时间，比棉布业市镇更长。菱湖镇、乌青镇、濮院镇、盛泽镇、南浔镇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菱湖镇在明代成化、弘治时期，已经"第宅云连，蔚为冠盖"；万历时期"四方舟航所凑"；入清后，"商贾蕃凑，丝业尤甲一邑"；至同治、光绪时期"每岁丝约近万包"② 销往各地。

乌青镇，"蚕毕时各处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本地商人暨嘉湖两属茧商，遵例争设茧行，收买鲜茧，烘成干茧出运"。五口通商后，震泽镇所开设的经行，将此地所产细丝制作成经，"转售上海洋庄，为出口货，名辑里经"③。

濮院镇是濮绸产地，明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造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四乡农家"多作绸绢为生，为都省商贾往来之会"，"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④。

盛泽镇是吴绫产地，"凡邑中所产皆聚于吴江之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镇之丰歉不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客商"⑤。

南浔镇是名闻遐迩的辑里丝的集散地，在全国丝业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镇上牙侩所开丝行鳞次栉比，"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京庄、广

---

① 天启《吴兴备志》卷二十六方物征。
②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舆地略·风俗；卷十一舆地略·物产。
③ 乾隆《乌青镇志》卷七土产。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土产；卷二十一工商。
④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一风俗；卷三织作。
⑤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庄、经庄、划庄、乡庄招徕生意，号称“华集南粤金陵商”。五口通商后，湖丝成为大宗出口货，南浔镇是湖丝“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的重要基地，贸易盛极一时：“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①。

从上述简略的列举中可以看到，市镇一经兴起，迅速繁荣，它作为一个手工业、商业中心，经济力量是巨大的，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县城、府城所望尘莫及的。正因为如此，研究明清时代的经济发展，如果忽略了市镇，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自从著名明清经济史专家傅衣凌教授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② 以来，中国学者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江南市镇者日见增多。较有影响的论文有：陈学文的《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③、《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经济结构之探索》④；王家范的《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⑤；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⑥、《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⑦ 等。

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宏观分析较多，微观分析（个案分析）尚嫌不足，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引向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卷二十四物产。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

② 载《历史教学》1964年5期。

③ 载《温州师专学报》1981年2期。

④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1期。

⑤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1期。

⑥ 载《思与言》16卷2期。

⑦ 载《食货》复刊8卷6—8期。



深入。有鉴于此，笔者撰写了这本专著，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江南市镇的更多关注。促使我选择江南市镇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动因，在于它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具有现实价值。市镇在乡村的都市化趋势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历史的启示对于当代城市与乡村的建设，以及城乡差别的缩小，是有借鉴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代盛极一时的江南市镇，至今仍然存在，有的逐渐复苏而繁荣，有的却徒有虚名，早已残破不堪，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盛况，这是为什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有人能对至今尚存的大大小小的市镇的现状进行调查，并且与它们的历史作比较研究，或许能提供更深一层的历史启示。而对江南市镇的历史考察，也正在这种具有纵深感的背景衬托下，显示其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近几年来，以乡镇经济蓬勃发展而引人注目的吴江县，被誉为"苏南模式"的典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 1983 年 5 月间，对吴江县的松陵镇、盛泽镇、震泽镇、平望镇、同里镇、铜罗镇作了历史与现状的详细调查，写成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在该文中，费教授颇有见地指出，近年来小型工业的兴起，是小城镇复苏和繁荣的原因，但是集体商业活动却没有相应地搞活。因此，应该进一步研究农村经济商品化的问题，特别是要镇清楚小城镇商品流通环节和开拓商品流通渠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此后，费教授在调查了常州、无锡、南通、苏州的乡镇后，写成了《小城镇，再探索》一文；在调查了镇江、扬州、南京的乡镇后，写成了《小城镇，新开拓》[①]。这是费教授继他在 1938 年英国出版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中译本题名为《江村经济》)，对吴江县震泽镇近旁的开弦弓村进行精辟的研究之后，关于乡镇经济研究的新贡献。

正如费孝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乡镇小型工业的发展，

① 分别刊载于《瞭望》杂志1984年第二至第五期；1984年第五十一、五十二期和1985年第一至三期。

刺激了古老市镇的复苏与繁荣。这在吴江县是最为明显的。

古老的丝绸业市镇盛泽镇,1983 年丝绸产量达到 4,216.6 万米,其中外贸出口真丝绸 2,040 万米,真丝绸外贸出口量已达到全国的六分之一,丝绸织造能力开始超过四川、山东等省,产量、质量、水平花色等各个方面都可与苏州、杭州、湖州等大中城市媲美。1984 年以来,盛泽镇签约十四个引进项目,分别从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引进先进丝织、印染设备,丝绸生产飞快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产地和贸易中心。1985 年盛泽镇(包括乡)人口达 6.59 万人,其中市镇在册人口 2.74 万人;工业产值达 55,111 万元,其中丝绸业产值达 48,266 万元;有丝织厂二十七个,印染厂二个,化纤厂二个,丝绸研究所、试样厂、丝绸中专各一所;丝绸业职工 24,850 人,织机 5,239 台,年产丝绸 7,322 万米,出口真丝绸 2,196 万米,创汇约 5,179 万美元①。盛泽镇不但复苏了,而且超过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这在江南市镇的发展史上还是不多见的。盛泽镇的繁荣,显示了这个古老市镇传统的丝绸业经济的强大生命力,也显示了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商品化的威力。把盛泽镇作为一个典型,进行历史的透视,令人信服地看到研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发展史的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古可以鉴今。研究江南市镇的历史,对于当前发展小城镇、繁荣乡镇经济、加速农村的都市化进程,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① 朱云云:《盛泽丝绸的历史和现状》,载《吴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上　　卷

江南市镇的面面观

第一章　市镇的兴起与发展

一、市　的　兴　起

市，古已有之。先秦时代就把商品交易地称为"市"。《说文解字》："市，买卖所也。"《风俗通》："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匮也。古者日中为市，致民而聚货，以其所有者，易其所无者"。这种"以有易无"的原始市场，就是当时农村的商品集散地。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并非每个家庭生产单位都能自给自足，必须以商品经济作为补充，于是乎便有"以其所有者，易其所无者"的"市"的出现。《易·系辞》："庖牺氏设，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言并非虚构，人们约略可从文献中窥知当时"市"的存在状况与功能实态。

根据《考工记·匠人》的记载，城市的规划中，专有一个地方设置"市"：

>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

这当然是理想化了的城市规划，但"前朝后市"的布局大体是事实，这可以从后世城市布局的实态中得到佐证。所谓"前朝后市"，即北面是宫殿与官署建筑群，南面是商业区——市的所在。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不仅证实了《考工记》的描述，而且还表明，"市"不但存在于王城，而且广泛存在于其他城市与乡村之中，因此才有"因井田以为市"的说法。翻检《左传》，关于

市的记载随处可见:

"(楚庄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遂舍于郊。"[1]

"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不能。杀子印·子羽,反军于市。"[2]

这种市,常设于街道两旁,故郑国称为"逵市"。农家用来"以有易无"的市,大多分布于城门外的大道两旁。《诗经》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名篇,就是对农家往市上赶集的实况描述。

市必然成为商人群趋的场所,行商(商旅)们赶到市上经商牟利,故文献中常见"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3] 随着商人介入的增多,市的扩大,自然会引起政府的关注,一方面"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宜律,以时顺修,使宾(商)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市也"[4];另一方面,在市中设置官吏,征收市租——商业税。秦献公二年,城栎阳,自雍丘迁都于此,七年,"初行为市"[5]。首次在沿路的场所设市,在市上设置官吏,收取市租,——这就是"初行为市"的全部含义。齐国的商业中心临淄,有十万户人家,"市租千金"[6],可见从市上收取的商业税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对此,孟子曾多次大发议论:

"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大夫始矣。"[7]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言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生于

---

① 《左传》宣公十四年。
②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③ 《管子·禁藏》。
④ 《荀子·王制》。
⑤ 《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
⑥ 《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⑦ 《孟子·公孙丑下》。

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①

伴随市的发达，一系列相关的俗语流行于世，例如市井、市廛、阛阓之类，从中也透露出市的规模与结构。市井一语，反映了市与井田的密切关系，"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②。市廛之廛，即市中之空地，《周礼·地官廛人》郑玄注："廛谓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货物者也"。于此可知，占地百亩的市，列肆之处不多，而空旷之地不少，用来"畜藏货物"。透过"阛阓"一词，人们还可以想见当日的市是有垣有门的，崔豹《古今注》："阛者市之垣，阓者市之门"。市的这种结构大体仿照里邑规模，有围墙。有市门，入市贸易者均由市门出入。《史记·孟尝君列传》："君不见趋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反映了每天清晨赶市集的人群争先恐后从市门进入的盛况。市中还有"肆"——陈货物之所，"居"——置货物之所。这个肆，也就是后世的摊位，即陈列商品的货摊，也叫做"市列"，或称"市朝"，盖市之行列如朝位，故曰市朝③。

先秦时代的市，大多是原始市场，乡人赶集多在早晨，故而"朝则满，夕则虚"。

> "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④

这种"朝满夕虚"的传统一直沿续了很长的时间，后世之市，亦称为虚市(墟市)，其源盖出于此。战国时此类早市的记载不少，例如：

> "齐有人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⑤

---

① 《孟子·公孙丑上》。

② 《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

③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市朝。

④ 《战国策·齐策》。

⑤ 《吕氏春秋·去宥》。

“(有卖骏马者)比之旦立市,人莫知之。”[1]

这是金市(铜市)、马市于清晨交易的记录。

当时的市虽有垣、门、廛、肆、居等结构,但“朝满夕虚”,还没有形成拥有常居人口的聚落。

汉代的商业较先秦时代发达,市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据《三辅黄图》记载,汉的都城长安,内有九市:“庙记云: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2]。长安城内的市,二百六十步见方,较先秦时占地百亩之市小得多,然而其商业之繁荣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班固《西都赋》如此描写道:

“彼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分,烟云相连。”[3]

张平子《西京赋》所写大同小异,把九市的规模描写得十分清晰:

“徒观其城郭之利,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尔乃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坠。”[4]

市内设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5]。三辅都尉即京兆尹所在京辅、左冯翊所在的左辅、右扶风所在的右辅的三都尉的总称[6]。由三辅都尉来掌管市内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足见市的令署之重要性。

较小的城市,也多设市,且不止一处,例如酒泉的东市、西市,建康的东市、北市、大市等。

---

① 《战国策·燕策》。

② 《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

③ 《文选》卷一赋甲。

④ 《文选》卷二赋乙。

⑤ 《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

⑥ 《三辅黄图》卷十三 三辅沿革。

东汉的都城洛阳，虽只有三市，但规模并不逊于长安。《洛阳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①]。《洛阳伽蓝记》描述的大市，面积达"周回八里"之广，可见当年的盛况。

出土的汉代市井画像砖，形象地显示了当年市的实况。新繁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所绘之市约呈方形，四周有垣墙围绕，三面设门，每面三门，市内有坠。中间如十字形，中央有五脊五檐市楼一座，楼上悬鼓，坠的两侧是列肆，共四个贸易区，每区的肆有三四列。左下、右下、右上的三排列肆之外，靠近市垣处，又有纵横交错的市宅，一方靠市垣，三方为列肆，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宅区，中间有店房两座。右下的长方形区内，又有纵横交错的长廊。右上三排列肆之外，也有纵檐交错的房屋。左边为一方形地区，其中横列一排建筑物。左上侧是四排列肆。这一画像砖所显示的市的实态，完全与文献记载相符合[②]

在城乡间的要道上，由于商业活动的频繁，不断兴起新建的市。《后汉书·张禹传》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

"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

此处所谓"室庐相属，其下成市"之市，便是一个新兴的商业中心。关于这个市，李贤注引《东观汉纪》云："后年邻国贫人来归之者，茅屋草庐千户，屠酤成市"。把"其下成市"注释得清清楚楚，在形成一个千余户的聚落之后，出于商业活动的需要，而"屠酤成市"。类似的事例颇多，不妨再举一例：

"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

---

① 《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一引《洛阳记》。

② 参看刘志远：《汉代市井考》，香港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118页。

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1]。

这种城外的常设市可以看作唐代草市的渊源。两晋南北朝时代，草市已渐次出现。东晋时代关于草市的情况可以从以下三条史料中窥其一斑：

其一，“肥水之西，分为二水。右即肥之故渎，遏为船官湖……肥水左渎，又西迳石桥门北，亦曰草市门……”[2]。此处“草市门”被人们当作一个地名来称呼，足见其地有一草市存在。

其二，“古建康县，初置在宣阳门内。晋咸和三年，苏峻作乱烧尽，遂移入苑城。咸和六年，以苑城为宫，乃徙出宣阳门外御桥西，今建初寺门路东。是时有七部尉……南尉在草市北”[3]。这是东晋江南草市的一个突出事例。

其三，“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4]。可见东晋时淮北草市已遍布各地，成为政府商税的一个重要来源。

南朝也是如此，从南朝史书中关于草市的记载来看，当时草市颇为不少。《南齐书·鄱阳王宝寅传》：“日已欲暗，城门闭，城上人射之，众弃寅逃走，宝寅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尉驰以启帝”。此“草市尉”当是管理草市的官吏，草市而设官管理，可见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也可见草市已非个别的存在。

唐代经济发展水平较前代有大幅度进展，这不仅反映在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内的市中，也反映在城外的草市中。

都城长安有东西二市，其面积比汉代长安九市要大三分之一，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东市，隋曰都会市，南北居二坊之地，东

---

① 《隶释》卷一史晨飨孔庙后碑。

② 《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

③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升州上元县。

④ 《隋书·食货志》。

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一门，各广百步……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西市，隋曰利人市，南北尽两坊之地"。

洛阳的市，也颇具规模，据杜宝《大业杂记》记载，洛阳三市（南市、北市、西市）的周围各为四里、六里、八里。北市是"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①]。北市一带成了洛阳最繁荣的商业区。南市在隋代即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唐代繁荣更盛，修善坊一带车坊、酒肆林立。

这类市，广泛存在于县级以上的城市。唐制规定：

> "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鼓二百下，而众人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②]

这则敕令至少透露了以下两方面的信息：其一作为经济中心地的市，只能设置于州县之所，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二，州县之所的市，其商业活动时间有所限制，即午时至日入前七刻。但是，这则敕令并不适用于新兴的草市。

非州县之所设置的市，称为草市，以区别于州县市。这类作为县治以下的经济中心地的草市，乃是乡村间进行交易的初级市场。对草市最早作出有影响研究的是日本前辈学者加藤繁先生，他的代表作《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唐宋时代的市》[③]，旁证博引地向人们展示了草市的实态。

见于唐代文献的赤壁草市、灉家口草市、长桥行市，可视作当时草市的典型。

赤壁草市——"赤壁草市，在县西八十里，古今地书言曹公败

---

① 《元河南志》卷一。

② 《唐会要》卷八十六景龙元年十一月敕。

③ 分别刊载于《市村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及《支那经济史考证》上卷。

处"[1];

灌家口草市——"开元十三年横海军节度使郑权奏:当道管德州安德县,渡黄河南与齐州临邑县邻接,有灌家口草市一所……伏请于此置为上县,请以归化为名。从之"[2];

长桥行市——"大历七年正月,以长桥行市为县"[3]。

这些草市由于地处交通要道、贸易发达,规模日见扩大,以至陆续被升为县治,灌家口草市升为归化县,长桥行市升为永济县。这些事实表明,草市兴起之后,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其规模、功能都比较接近县治,也就是说草市具备县治的规模与功能在先,而升成县治在后,如果草市不具备县治的规模、功能,那么它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县治的。这是唐代草市值得注意的一个侧面。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是,随着草市的日趋繁荣,吸引越来越多的富商大户在此定居,遂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聚落。晚唐诗人杜牧在述及"江贼虏掠草市"时指出:"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元和)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4]。大江南北的草市之所以成为盗贼劫掠的对象,原因就在于这里的居民十分富庶,是新兴的惹眼的财富渊薮。这种"富室大户多居其间"的草市,已不再是先前那种"朝满夕虚"的交易场所,而成为一个商业性居民点、一个地理实体。上述成为归化县治的灌家口草市、成为永济县的长桥行市,莫不如此,彭州唐昌县的建德草市也是如此,它的规模颇为可观:"百货咸集,蠢类莫遗,旗亭旅舍,翼张鳞次"[5]。

五代至北宋,草市迅猛增多,文献中此类记载俯拾即是,兹举

①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七江南道沔州汉川县。

②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

③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

④ 《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太尉论江贼书》。

⑤ 《文苑英华》卷八十,《彭州新置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记》。

数例于下：

> “周显德二年四月诏曰：……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识七里外。”①

此处所谓“标识”，是指“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表识”之表识。按照上述规定，草市必须在城外——“去标识七里外”的乡村之间兴建。

> “周显德三年十月敕：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场粜盐，今后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不有盐货通商，逐处有咸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兴贩。”②

在这个敕令中，政府明确将城郭、草市、乡村作为三级行政区划加以区别对待，足见其时草市已不同于乡村，在很多场合，把草市与城郭划归一类，实行与乡村不同的政策。

此种情况，北宋亦然。苏轼在一个奏议中透露了当时草市作为州县城外居民点大量涌现的信息：

> “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多，岂可一一展筑外城。”③

显然不断增长的州县城的居民大多散居于城外的草市之中，业已成为当时城市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二、从定期市到经常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作为基层经济中心地的作用日趋明显。市依托它四周的乡村，成为一个商品集散中心，邻近的农家定

---

① 《五代会要》卷二十六城郭。

② 《五代会要》卷二十六盐。

③ 《苏东坡全集》卷六十二、《乞罢宿州修城状》。

期前往赶集，称为“市集”、“市合”、“趁墟”、“墟集”，形成定期集市。集期视各地经济发展状况而异，从十日一集、六日一集、五日一集到三日一集、间日一集等，这类定期市，从宋以迄于清，在各地都广泛存在。

十日一集，是一种集期较为稀疏的定期市，例如光山县，嘉靖《光山县志》载：

大街集——每月凡一日会于此，

南关集——每月凡一日会于此，

孙铁铺集——每月凡二日会于此，

泊陂河集——每月凡二日会于此，

白雀园集——每月凡二日会于此，

寨河店集——每月凡一日会于此，

罗官店集——每月凡一日会于此，

杨幡桥店集——每月凡二日会于此①。

此处所谓“每月凡一日会于此”，“每月凡二日会于此”，是指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或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在此有市集，即十日一市。

例如象山县，嘉靖《宁波府志》记载：

白石市——逢九有市集，

坟头市——逢四有市集，

南堡市——逢五有市集，

泗头市——逢二有市集，

三角市——逢七有市集②。

此处所谓“逢九有市集”，即每月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有市集，其余类推，均属十日一集。这种定期市的集期并非固定不变，象山县

---

① 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里店(集附)。

② 嘉靖《宁波府志》卷九经制志·都鄙。

在清代初期的集期已有了五日一集，雍正《宁波府志》记载：附郭市，一六日有市集；南堡市，五九日有市集；溪口市，三八日有市集；泗洲头市，三日有市集[①]。

台州府宁海县各市的集期均匀地分布在一旬（十日）中的每一天，崇祯《宁海县志》记载：

一市——朱岙市，

二市——桐山市、竹林市，

三市——西店市、仃傍市，

四市——沙柳市、夏奇岙市，

五市——汶溪市、桑洲市，

六市——南门市、朱岙市，

七市——柘浦市、岔路口市，

八市——梅林市、梅枝市、仃傍市，

九市——东岙市、深畈市、胡陈市、北门市，

十市——桑洲市[②]。

从全县看，一旬中从一日到十日（或十一日到二十日。二十一日到三十日），每一天都有集期，其中除朱岙为一六日市。仃傍为三八日市。桑洲为五十日市，属于五日一市外，其余各市均属十日一市。

六日一集：宋代文献中就有此类记载，例如“兴国军道中，值虚市方合，此俗以卯酉日趁墟”[③]；“池州俗喜为向而市井无交易，聚落至有期日虚集处，谓之子午会”[④]。所谓卯酉日趁墟，即在十二天中，逢卯日。酉日有市集，即六日一集；所谓子午会，即在十二天

① 雍正《宁波府志》卷八乡里村市。

② 崇祯《宁海县志》卷二建置志·市集。

③ 项安世：《平庵悔稿后编》卷三佛国市。

④ 《海录碎事》卷五商贾货财部·市廛门。

中逢子日、午日有市集，也是六日一集。这种习俗在后世也常有所见，如处州府丽水县：

石牛市——以子卯日定市，

碧湖市——以丑辰日定市[1]。

五日一集：宋代岭南"呼市为墟，五日一集"[2]。这种习俗在明清时代的广东仍然存在，乾隆《河源县志》所载"五日一聚"即为一例：

"凡粤东贸易之所，多名为墟。各立限期，或三日一聚，或五日一聚。"[3]

此类五日一集的市，各地都有。成化《内乡县志》载：

"西峡口，原不开集，知县沃频以甚离县遥远，商民贸易不便，亦命就彼每月一五日开集，顺民情也；

半川里，先亦不开集，成化甲辰……听居民李谦吾等所告，亦令就彼每月二七日开集生理，亦从民便也。"[4]

这是在原先不开集处新设的集市，所谓一五日开集或二七日开集，即每逢一日、五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或二日、七日、十二日、十七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开集，即一月六集，亦即五日一集。

嘉靖《隆庆志》所载：永宁县"四牌楼，一月六集，三八日为市"[5]，亦属此类。

此外还可举出不少例子。例如滦州各市镇的集期大多是五日一集，除开平镇是五十日大集、二七日小集，榛子镇是一六日大集、四九日小集外，其余均为一六日、二七日、三八日、四九日、五十日

① 雍正《处州府志》卷二建置志。

②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七岭南道容州。

③ 乾隆《河源县志》卷二墟市。

④ 成化《内乡县志》卷二食货略·市集。

⑤ 嘉靖《隆庆志》卷一地理。

有市集，一六日市集的有石佛口、茨榆坨、暗牛淀，二七日市集的有马城堡、安各庄、古冶镇、扒齿港、高各庄、栗园庄、坨里庄，三八日市集的有石佛庄、王家店、柏各庄、曾家湾、稻地镇，四九日市集的有张各庄、连北店，五十日市集的有长宁集、司家庄[①]。

山东长山也是如此：

卫固——二六日有市集，

房镇——一六日有市集，

固悬——三八日有市集，

阎家庄——二六日有市集，

大柳树——一六日有市集，

院上庄——三八日有市集，

周村——三八日小集，四九日大集，

黄家庄——二七日有市集，

北宁——五十日有市集，

吕家庄——三八日有市集，

司家庄——一六日有市集，

盛口——五十日有市集，

董家庄——一六日有市集，

陶家口——三八日有市集，

苑城——五十日有市集，

陈度——二七日有市集，

三元庄——四九日有市集，

焦家桥——一六日有市集，

礼参店——五十日有市集，

东周家庄——一六日有市集，

牛家庄——一六日有市集，

---

① 嘉庆《滦州志》卷二。

周家庄——五十日有市集[1]。

经济较发达的绍兴府的一些市,"旬中一二日,或二八、或三七聚,然只日用常物耳,无珍奇"[2],也是如此,即十日中逢二日、八日或三日、七日有市集。台州府太平县也有五日一集的情况,嘉靖《太平县志》载:

温岭街——五日一为市,

泽库街——五日一为市,

侍郎街——五日一为市[3]。

嘉庆《太平县志》所载更为详备:

南监街——二七日市,

塘下街——一六日市,

温岭街——一六日市,

夹屿街——三八日市,

泽库街——四九日市,

侍郎街——三八日市,

下村街——二七日市,

新河街——五十日市,

箬横街——五十日市,

石头桥街——四八日市,

石粘街——一六日市,

鹭屿街——二七日市,

潘郎桥市——五十日市,

横山头市——四八日市,

神童门——五十日市,

---

① 嘉庆《长山县志》卷一舆地志·市集。

② 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

③ 嘉靖《太平县志》卷二地舆志下坊市。

长屿街——四九日市，
淋头市——三八日市，
石刺街——三八日市，
杉屿塘市——一六日市，
横涧桥市——三九日市，
大路街市——二七日市，
萧家桥市——三八日市，
街弄头市——一七日市①。

三日一集：宋人文献中常有"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谓之趁墟"；"乡落有号为墟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②。清代仍有三日一市的"趁墟"，光绪《上林县志》载：

邹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狮螺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白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青泰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古丹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里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雷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坝头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镇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塘江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公塘墟——同上，
东抚墟——同上，
乔贤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贤按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①嘉庆《太平县志》卷三建置志·坊市。
②《南部新书》辛集。《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八商税。

古蓬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里民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大丰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亭亮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大山新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巷贤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思陇墟——同上，
三里东门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罗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甘谷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周安墟——辰戌丑未日有市集，
思吉墟——寅申巳亥日有市集，
北更墟——同上，
马蹄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
渡口墟——子午卯酉日有市集①。

以上所谓辰戌丑未日、子午卯酉日、寅申巳亥日有市集，均为十二日中四日有市集，即三日一集。

与此相类似的是十日三集，如广东增城县，其集期多为一四七日、二五八日、三六九日，均为十日三集。其中一四七日有市集者有庙潭、二龙、白石、东湖堤钱江、红米地、石头、石湖、人和等墟市，二五八日有市集者有东街、腊圃、小埔、仙村、新墟、米场、大塘、三江、沙塘、碧江、深墟、龙津、坑贝、镇龙等墟市，三六九日有市集者有蹬果、高滩、冈见、大江、石滩、官海、大埔、福和等墟市②。

此外，潮州府也有"军埔墟……三六九日市"、"太平墟……一

① 光绪《上林县志》卷四舆地。
② 嘉庆《增城县志》卷一舆地、卷五方城。

四七日市”[1],“枫口市,一四七墟”、“下乡市……墟期二五八”、“东田乡市……墟期二五八”[2] 之类的十日三集的习俗。

间日一集:宋人常有“村落细民,间日而集,有无相易,苟营朝晡之费”;“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虚市”[3]。这种二日一集或称隔日一集的市集,后世也很常见。例如寿张县的市集,“古以四五日为期,正德乙亥,知县陶杰始更为偶日,迄今益便”[4]。此处所谓偶日为期,即间日一集。河南汲县的集期有单日、双日,也属此类,例如柳毅屯、上乐村为单日有集,李原屯、山彪村、小双为双日有集[5]。民国《鄞县通志》所载集期,逢一、三、五、七、九日有集,或逢二、四、六、八、十日有集,也是间日一集[6]。

必须指出,集期不仅因地而异,而且在同一地区(如一县之中)也常有不同集期的市同时存在。例如保定府雄县的九个市的集期就各不一样,部分是十日一集,部分是五日一集:

瓦济市——南遇三日市,北八日市,

易易市——六日市,

瓦桥市——一日市,桥上常市,

北关市——五日市,

永通市——十日市,

涞河市——四日、九日市,

东赵市——二日、七日市,

下村市——四日、九日市,

---

① 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② 民国《潮州志》(不分卷)实业志·商业。

③ 吕陶:《净德集》卷二十五《著作左郎李府君墓志铭》。《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商税。

④ 康熙《寿张县志》卷一方舆志·市集。

⑤ 乾隆《汲县志》卷二舆地志。

⑥ 民国《鄞县通志》(不分卷)。

留镇市——五日市[①]。

又如保定府易州各市集的集期有一日一市、三日一市、五日一市、十日一市:

易州集——分东西二市,三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

柴厂集——在厂内一日一市,

唐胡集——五日一市,

滦水集——十日一市,

永安坊集——十日一大市,五日一小市,

楼村集——五日一市,

石亭集——五日一市[②]。

随着集市贸易的兴旺,集期渐次频繁,定期市终于转化为经常市。经常市亦称为常市、日日集、每日市。它们大多是由间日一集上升为日日集的,试举一例于下:

> "关厢,原间日一集,正德五年,知县高举易为常市。"[③]

这里所说的柘城县关厢的集市,由原先的间日一集改为每日一集,可以看作是由定期市上升为常市的典型事例。此类常市,明清两代无论南方北方均很常见,例如:

> "李家道口集,日日集。"[④]

> "凡三日百货一聚,聚之时少,虚之时多,故曰虚。东莞则不然,若教场墟、石龙墟、樟树墟,皆有廛肆,而亦名墟,每日一小聚,三日一大聚。"[⑤]

> "其墟期则逐日、三日、四日、五日均有之。而大率以逐

---

① 嘉靖《雄乘》卷上疆域。

② 弘治《易州志》卷五街坊。

③ 嘉靖《柘城县志》卷一市集。

④ 嘉庆《浚县志》卷一舆地。

⑤ 钱以垲:《岭海见闻》。

日、三日为多。"[1]

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一地区的市，大多已超越定期市的阶段，成为经常市，不再是四乡农家定期赶集的集市，而是每天都有频繁交易活动的经济中心地。因而这种市的规模之大、经济地位之重要，都是定期市无法望其项背的。

苏州府吴县的月城市，"阊门内出城自钓桥西渡僧桥分为市……各省商贾所集之处"、"又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繁盛"[2]。

苏州府昆山县的半山桥市，"在县西北隅，民居辐辏，朝夕为市。旧在宝月桥南为市心，又有后市，在后市桥西"[3]。

苏州府长洲县的枫桥市，"在城外，离治数里，与阊门相属……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米市"[4]，是长江三角洲最大的粮食交易中心市场，直至清末才由市升为镇。

长洲县的山塘市，"在城外，离治四五里，即虎丘山塘，亦与阊门相联属……储积商贾亚于枫桥，而川广诸货亦骈集焉"[5]。

太仓州的鹤王市，是长江三角洲著名的棉花交易中心市场，"近市土厚田肥，为阖邑冠，故其民殷富，其俗淳厚。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泾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矣"；"闽广人贩（棉花）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6]。

苏州府吴江县的新杭市，"离县治东南九十里，居民千家成市，

---

① 民国《湖州府志略》(不分卷)墟市条。

②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

③ 正德《姑苏县志》卷十八乡都。嘉靖《昆山县志》卷四市镇。

④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一乡镇。

⑤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⑥ 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上原始、卷下物产。

共南接王江泾"，"自明以来居民日盛，自成市井"①。

吴江县的黄溪市，"去县治东南六十里，明以前以村名，居民止数百家，国朝康熙中至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居民多业机杼"②，是著名的丝绸产地和交易市场。黄溪市所产绫绸几乎全部外销，由市上"绸领头"（牙侩）收购，转运至盛泽镇及王江泾镇，出售给丝绸牙行，再由牙行转售给各地客商，"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③。

嘉兴府嘉兴、秀水、桐乡三县间的濮院镇的前身永乐市，建于元代，濮氏家族在市中构居井街，立四大牙行，召民贸易，收购机户所产丝绸，招徕远近商贾。据传，称永乐市的原因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近商贾旋至旋行，无羁泊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永乐市在元明间，"贾人鳞集"，"市业日盛"，"寺观崇隆，园庄环绕"，有大街、横街、义路街，十分繁华④。

苏州府嘉定县的钱门塘市，是著名的棉布集散地。南宋时，钱门塘水深港阔，"居民鳞比，商贾辏集"，一度建镇于此。元代，水道淤浅，改为钱门塘市，明代仍称钱门塘市。市虽不大，却是远近闻名的丁娘子布的产地，"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之，遂称钱门塘布。"钱门塘市的商业因此而繁荣，虽称为市，却可与镇相比拟。其全盛时代，"东达盐铁塘，西过姚家宅，人烟稠密，街巷纷歧"⑤。

苏州府常熟县的唐市，地跨尤泾，旧名尤泾市。明中叶唐氏聚居于此，始改称唐市；为区别于新起的西唐市，改称东唐墅。市中有河东街、河西街、北廊下街，居民四百余户。"百工居肆，无雕文刻

---

①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

③ 道光《黄溪志》卷一风俗。

④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濮川所闻记续编》卷一坊巷。

⑤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

缕之技，唯治田器，制渔具，作舍编篱，捆履织席为能事"[1]。方燧深《唐市志序》说："唐市虽小，有水市，有物产，有名胜，有科第，有仙释节烈，经术之湛深，于明则有杨（彝）、顾（梦麟）；文章之雄伟，于本朝则有苏苞九、陶子师；书画擅长则有邱屿雪、黄尊古，诸家诸体咸备"[2]。因而唐市成为常熟县的文化中心。天启五年，杨彝尝集应社诸公会文于唐市凤基园，一时传为文坛佳话。唐市在明清之际成为吸引吴中文士的人文荟萃之地，天启时柏小坡筑柏园，董其昌题其额曰"十亩之间"，颇具雅致风采。"凡吴中骚人墨士，琴师棋客，咸集于中。园之主人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3]。唐市自明末迄清初，"文章道德之彦，掇巍科高第者，后先辉映"，进士及第者竟达七人之多。一个小小的唐市，文化如此之发达，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诸如此类作为地域经济中心或文化中心的市，在长江三角洲是不少的，还可举出一些：

吴江县的江南市，"居民又千百家，使舟官舰之往来，贡赋财物之接递，朝暮不绝"[4]。

吴江县的八斥市，地当南北要冲，嘉靖间居民三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李，久而居民辐辏，百货骈集"[5]。

吴江县的庉村市，嘉靖间始称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附近市上人皆铁工"，所制铁器行销各地[6]。

吴江县檀丘市，居民数百家，"以工为业，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

---

①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卷上物产。

② 乾隆《唐市志》卷首方燧深序。

③ 乾隆《唐市志》卷中人物、卷上园亭。

④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⑤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⑥ 顺治《庉村志》（不分卷）物产、村舍。

皆备"[①]。

像吴江县这种规模的经常市,在常熟县也有不少,例如:

西唐市——居民五六百户,市约里许;

李市——居民六七百户,街五六道;

横泾市——居民数百户,人丁一千五百;

白茆新市——居民三百余户,街四道;

老吴市——居民三四百户,街三道;

老徐市——居民四百户,街三道;

何家市——居民三百余户,街二道;

王墅市——居民三百余户,街二道[②]。

这种市与定期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和镇颇为接近,也有相对固定的四乡,俗称乡脚,即传统上隶属于它的村落所构成的市场网络。《重修常昭合志》的编纂者独具只眼,对乡脚提供了可贵的实态描绘,且略举二例于下:

西唐市——"邻江阴界,市约里许。西半属江阴。街中有石牌。居民五六百户……附近小村庄有:西庄、胡卢段、范家港、底坝、颜家巷、卢巷、倪家巷、钱家巷、西洋巷、后房巷、南园、北园、华巷、汤家桥、看庄、新市、高田上、徐家宅基、顾舍角";

西徐市——"在让塘之西,明侍郎徐恪累代聚族于此,故名。距城三十六里。街三道,居民百数十户(多钱徐二姓)……附近小村庄有:徐巷(居民三十余户)、曹庄、孙塘沿、谢巷(居民皆二十余户)、乌舍(居民三十余户)、下庄(居民四十余户)、钮巷、徐塘头(居民皆二十余户)、卢巷、冯巷(居民皆四十余户)、六市里(居民十余户)、高庄、周家水渠(居民皆五六十余)、倪家宅(居民皆奉教堂,建于嘉庆年)、西谢、西张家巷、俞家村、广步尖、东张家巷(居民皆四

①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②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五十户)、天字号小庄、东庄、河阳山、前英舍、大树巷(居民皆三四十户)、石塘(居民二百余户)、后巷里、史家桥、徐岸、巫马坝、陆家巷、西庄、滚塘岸(居民皆三四十户)、八房巷(徐侍郎行八,此其旧居都宪坊在焉)、小墅、严塘庄(居民皆数十户以上)"[①]。

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性,无论南方、北方都是如此。加藤繁先生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引用了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员青山定雄氏所发现的有关正定县城乡的抄本,指出一些村民赴某个集市是固定的。

赴县市的(县市集期为二七日):
东关村(离城一里);
顺城村(离城二里);
小林济村(离城三里);
大林济村(离城五里);
丁家庄(离城五里);
王家屯(离城三里);
东上寨(离城五里);
西上寨(离城五里);
桃村(离城十五里);
梁家庄(离城五里);
东洋村(离城十里);
西洋村(离城八里)。
赴朱河村集的(集期四九日):
朱河村(离城八里);
罗家庄(离城六里,离朱河村二里)。
赴朱夫屯集的(集期为五十日):
朱夫屯(离城十二里);

①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南圣板村(离城十五里,离朱夫屯三里);
中圣板村(离城十六里,离朱夫屯四里);
北圣板村(离城十八里,离朱夫屯四里)。
赴南牛屯集的(集期为三八日):
南牛屯(离城十二里);
侯家庄(离城十三里,离南牛屯四里);
东邢家庄(离城十五里,离南牛屯三里);
北永固村(离城十五里,离南牛屯一里);
树路村(离城十二里,离南牛屯四里)。
赴北路新城铺的:
东杨家庄(离城二十一里,离新城铺十三里);
西杨家庄(离城二十里,离新城铺十三里);
东贾村(离城二十里,离新城铺十三里)[1]。

加藤繁先生还引光绪《曲江县志》所载二十五个墟市隶属村落的状况:

---

[1] 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载《东方学报》二十三卷二号。

墟市	距离	隶村	墟市	距离	隶村
大塘墟	县东四十里	三十九村	白土墟	县南六十里	三村
枫湾墟	县东七十里	一十四村	白沙墟	县南七十里	八村
火山墟	县东三十里	一十一村	樟树潭墟	县西南八十里	二十九村
小坑墟	县东八十里	四村	罗坑墟	县西南一百里	二十一村
龙归墟	县西南五十里	五十一村	大桥墟	县东北五十里	一十五村
犁埠墟	县西北四十里	三十二村	零溪墟	县东九十里	一十三村
重阳墟	县西四十里	二十一村	冷田墟	县东北一百十里	一十二村
一六墟	县西六十里	三十五村	周田墟	县东北八十五里	九村
仁和墟	县西北六十里	四十村	大坝墟	县东一百里	四村
马坝墟	县南四十五里	三十五村	黄坑墟	县东一百里	一十三村
石角墟	县南九十里	一十六村	苦竹墟	县东北十里	四村
杨梅墟	县南一百里	一十六村	江湾墟		四村
沙溪墟	县东南八十里	三十五村			

据此，加藤繁先生指出，可知广东省曲江县各村落所赴的墟市也是固定的。所以这种习惯可说是南北各地几乎普遍地实行着，不能看作二三县的特例①。这是很正确的。

三、镇市与市镇

在宋代，草市之外还出现了称为镇市的商业中心。从人文地理的视角看，镇市是比草市更高层次的经济中心地，也就是比"市"更大规模的行政区划——"镇"。

这种镇，不同于唐五代那种军事性质的镇。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置县尉，削夺镇将干障地方政治，确认镇市为县市与草市之间的市场建置，并在镇市设置监镇官，"诸镇监官，掌警逻盗及烟火

① 见《东方学报》二十三卷二号。

之禁，兼征税榷酤"[1]。嘉泰《吴兴志》对此有更为明晰的阐述：

"(宋初)收藩镇权，县之有兵者知县掌都监或监押……财赋则参丞贰，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2]

于是一大批草市升成了镇市，例如开封府的草市镇，齐州的新市镇、真州的瓜步镇、梓州的吴店镇、泰州的柴墟镇等。

因此，宋代官方公文中常将镇市与草市并提：

"诏诸城外草市及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如共不及一都保者，止令厢虞候、镇将兼管。"[3]

"提举河东路保甲司言，欲乞应坊郭、草市、镇市义勇及委系义勇之家，改排充保甲。"[4]

于此可知，镇市、草市是介于坊郭与乡村之间的行政区域，它们既不同于州县(坊郭)，也不同于乡村。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乡村的城市化现象，集中地体现在镇、市这种新兴的地理层次上，行政区划也显示出多层次的倾向，在州县与乡村之间，增加了镇、市一级的行政与经济中心地，呈现如下模式：

州、县——镇、市——乡、村

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镇这一层次的行政区划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大大超过了县的数目。且看下表[5]：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八之九十二。

② 嘉泰《吴兴志》卷八公廨。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二，熙宁七年四月甲午。

④ 《宋会要辑稿》兵第二乡兵。

⑤ 参看梅原郁：《宋代地方小都市的一面——以镇的变迁为中心》，载《史林》第41卷第6号。

地域 \ 类别	县数	镇数
四京	50	84
京东东路	37	29
京东西路	35	32
京西南路	30	59
京西北路	45	61
河北东路	40	108
河北西路	53	51
永兴军路	83	91
秦凤路	38	77
河东路	75	19
淮南东路	37	62
淮南西路	32	112
两浙路	79	75
江南东路	48	54
江南西路	47	52
荆湖南路	34	23
荆湖北路	47	44
成都府路	58	163
梓州路	49	141
利州路	39	117
夔州路	30	77
福建路	45	24
广南东路	40	36
广南西路	64	53
合计	1106	1644

由上表可知，全国有 1106 个县，1644 个镇，镇成为行政区划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层次。进入南宋以后，镇和市，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因而宋元明清时代的地方志——府志、县志中，大多列有“市镇”的专章，较为详细地介绍各市、各镇的地理位置及其概况。由于市镇的经济地位及文化地位的提高，影响的扩大，这一时期还编纂了大批镇志、市志，成为地方志中的新模式。

北宋时代，市镇的发展占有明显优势的，除了四京以外，就是河北东路、淮南西路以及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而两浙路、江南东路的市镇似乎还处在初兴阶段。

当时的东京开封府(领十七县)共辖三十一镇：

开封县——赤仓镇，

祥符县——陈桥镇、郭桥镇、八角镇、张三馆镇，

尉氏县——朱家曲镇、宋楼镇、卢馆镇，

陈留县——北南镇、城西镇、城南镇、城东镇、河口镇、萧馆镇，

雍丘县——圉城镇，

封丘县——潘镇，

中牟县——白沙镇、圃田镇、万胜镇，

阳武县——阳武旧镇，

酸枣县——草市镇，

东明县——济阳镇，

襄邑县——崇化镇、黎驿镇，

扶沟县——建雄镇、义声镇，

鄢陵县——马栏桥镇，

太康县——高柴镇、崔桥镇、香桐镇[1]。

西京河南府有二十二镇，南京应天府有十三镇，北京大名府有

① 元丰《九域志》卷一四京。

二十镇[1]。而同时代的苏州仅四镇，秀州仅四镇，杭州仅十二镇，湖州仅六镇[2]。

镇这一地理层次，各地的称呼没有什么差异。至于市这一地理层次，各地的称呼却颇不一样，诸如市、店、步、埠、墟、集、场、行之类，都是市这一地理层次因地而异的称呼。

市的用法最普遍，因而市、镇并称，使市镇成为一个专门名词。不妨略举二例以见一斑。

常熟县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有七市：县市、梅李市、石闼市、练塘市、支塘市、甘草市、涂菘市，到理宗宝祐年间，县市废，梅李市升为梅李镇，石闼市升为庆安镇，又新增杨尖市、直塘市[3]。

常州在南宋有九市：

县市——在县东街，

洛社市——在县北招义乡，

望亭市——在县南新安乡，

竹塘市——在县西北六十里招义乡，

陆墟市——在县西北四十七里富安乡，

甘露市——在县东六十里延祥乡，

江市——在县南十三里扬名乡，

陶市——在县南十二里扬名乡，

郭市——在县南十八里扬名乡[4]。

市也称为店，以北方为多。日本学者周藤吉之先生的论文《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指出北方地区的店相当于市，它们大多处于交通要道，商业发达，政府常在此设置场务，征收商税。他根据

---

① 元丰《九域志》卷一四京。

②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

③《重修琴川志》卷一叙县、市。

④ 咸淳《毗陵志》卷三地理·坊市。

《宋会要辑稿》食货、商税杂录所载熙宁十年以前所置的旧场务的商税额及熙宁十年的商税额，其中揭示了店这一经济中心地的广泛存在：

开封府——郭店镇，

大名府——邹店，

河南府——府店，

齐州——李家店，

淄州——孙家店，

郑州——郭店，

澶州——东西店、卫城店、大韩店，

沧州——车毂辘店，

博州——王馆店，

永静军——袁村店，

邢州——新店镇，

磁州——二祖店、台村店、大赵店、邑城店，

耀州——孟店镇，

乾州——李吴店，

晋州——晋桥店，

威胜军——南关店，

成都府——雍店①。

一些店以后又逐渐发展为镇，如开封府的郭店镇，邢州的新店镇，耀州的孟店镇等。因此，北方常店、镇并称，犹如南方常市、镇并称一样。这种情况，明清时代仍旧存在。正德《汝州志》载汝州有十六店一镇：

瓦窑店——在州南十五里，

① 周藤吉之：《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载《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第808—809页。

小屯店——在州东南三十里，
东纸坊店——在州东二十五里，
长埠店——在州东四十里，
官庄店——在州西北五十里，
春店——在州西二十里，
北纸坊店——在州北三十里，
临汝镇——在州西北六十里，
汤池店——在州西南四十里，
石台店——在州西南四十里，
乾料店——在州南五十里，
庙下店——在州西三十五里，
夏店——在州西北四十里，
灵头店——在州西北三十五里，
冶墙店——在州西南二十五里，
东店——十里，
西店——八里[1]。
嘉靖《许州志》载许州有二店十一镇。
五女店——在州东四十里，
许田镇——在州东五十里，
张潘镇——在州东南三十里，
灵井镇——在州西三十里，
大石桥镇——在州南三十里，
榆林镇——在州南五十里，
泉店——在州西四十五里，
石固镇——在州西北五十里，
帐地镇——在州北三十里，

① 正德《汝州志》卷一村店。

椹涧镇——在州西南三十里，

水滰镇——在州西四十里，

小赵镇——在州东北三十里，

繁城镇——在州西南三十里①，

市也称作步。步作为一个地名，早已有之。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江之浒，凡舟可系而上下者，曰步"②。宋代扬州附近的瓜步镇，在唐代称为瓜步，是"舟舻津凑而遥系江南"的一个草市，瓜步镇就是在瓜步草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③。唐宋时代，一些地方以"水津为步"、"江岸为步"④，逐渐形成为市。据周藤吉之先生的研究，宋代这种步是不少的，例如：

铁路步——真州、六合县附近，

店步——卢州附近，

石濑步——临安府余杭县附近，

闲林步——临安府附近，

薛步市——镇江府金坛县西南，

高友步——建康府溧阳县南二十五里，

周城步——建康府溧阳县西南四十五里，

上兴步——建康府溧阳县西六十里，

黄连步——建康府溧阳县西北五十五里，

邀笛步——建康府上元县附近，

赵家步——宁国府南陵县附近，

---

① 嘉靖《许州志》卷一地理·村镇。

② 《柳河东集》卷二十八。

③ 《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七，《张延赏传》："瓜步，舟舻津凑，而遥系江南。"《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世宗显德五年三月己亥：宋太祖从世宗，破江南李景军船百余艘于瓜步。

④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岭南谓村市为虚，水津为步"。王阮《义丰集》卷一："楚语，以江岸为步"。

古步——饶州余干县附近，

赵家步——饶州余干县附近，

金步市——同上

太阳步——饶州附近，

唐罗步——信州上饶县附近，

桃花步——信州贵溪县附近，

秆堆步——洪州生米镇附近[1]。

这些步相当于市，景定《建康志》在镇市一栏中载有镇、市、步，上元、江宁、句容三县的市与溧水、溧阳二县的步，是同义语。现将景定《建康志》镇市一栏摘引如下，以资比较：

淳化镇——在上元县东四十五里凤城乡，淳化五年置；

金陵镇——在江宁县南六十里，本陶吴铺，景德二年改为镇；

秣陵镇——在江宁县南五十里；

常宁镇——在句容县东南五十里，天禧元年以镇置寨；

下蜀镇——在句容县北六十里；

土桥镇——在上元县东南六十里；

东阳镇——在句容县西北六十里；

江宁镇——在江宁县西南六十里；

邓步镇——在溧水县南一百二十里，乾道四年正月差官收税，宝祐四年权镇张师鲁申府移东坝市收税；

孔家堽镇——在溧水县南四十五里；

固城镇——在溧水县南九十五里；

高淳镇——在溧水县南一百里；

举善镇——在溧阳县西南六十里，乾道四年移税额于溧水县邓步；

---

① 周藤吉之：《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唐宋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第845—846页。

古市——案《宫苑记》,吴大帝立;
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市亦名大市寺,宋武帝永初中立;
北市——在大夏门外归善寺前;
南市——在三桥篱门外斗场村内,亦名东市;
汤泉市——在上元县神泉乡汤山延祥院之前,去城六十里;
栖霞市——在上元县长宁乡摄山栖霞寺之前,去城四十五里;
索墅市——在上元县清化乡,去城五十里;
泉都市——在上元县泉水乡,去城五十五里;
东流市——在上元县宣义乡,去城四十五里;
花林市——在上元县清风乡,去城三十五里;
龙湾市——在上元县金陵乡,去城一十五里;
竹筱市——在上元县长宁乡,去城二十里;
蛇盘市——在上元县开宁乡,去城二十里;
麒麟市——同上,去城三十里;
西下市——在上元县长宁乡,去城四十五里;
章桥市——在上元县长宁乡,去城五十里;
石井市——同上,去城二十五里;
五城市——在上元县崇礼乡,去城二十五里;
土桥市——在上元县丹阳乡,去城六十里;
湖熟市——同上;
新村市——在城西南二十里;
板桥市——在城西南三十里;
铜井市——在城西南八十里;
东口市——在城南长干桥下东;
西口市——在城南长干桥下;
小口市——在城西南江宁县安德乡;
牛门市——在朱门南;
水桥市——在江宁县归善乡;

杜桥市——在江宁县万善乡，去城四十里；

路口市——在城南七十里；

仓头市——在句容县仁信乡，去城九十里；

柴沟市——在句容县琅玡乡，去城七十五里，有馆驿；

白土市——在句容县来苏乡；

高友步——俗名上步，在溧阳县南二十五里；

周城步——在溧阳县西南四十五里；

上兴步——在溧阳县西六十里；

黄连步——在溧阳县西北五十五里[①]。

此处所提及的高友步、周城步、上兴步、黄连步，与上述诸市同属一种类型，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邓步镇，显然是由步升成镇的。此类事例还可举出一些：

税子步镇——颍州万寿县，

瓜步镇——真州扬子县，

谢步镇——寿州安丰县，

成家步镇——寿州霍丘县，

麻步镇——寿州六安县，

郭界步镇——寿州六安县，

故步镇——寿州六安县，

航步镇——卢州舒城县，

石步镇——江宁府上元县，

郎步镇——广德军建平县，

盐步镇——筠州新昌县，

潘步镇——兴国军永兴县，

炭步镇——同上，

驿步镇——循州龙川县，

① 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镇市。

板步镇——英州真阳县，

鱼步镇——邕州宣化县[1]。

埠与步一样，也是市的别称。嘉靖《武康县志》记载该县墟市有二，都称为埠：

三桥埠——在县北七里，自平远门至水埠，有三桥，故名；

上陌埠——县南一十八里，陌山之上游，故名[2]。

此外，金华府浦江县有杨家埠，在县东四十里，"路通诸暨，有巡司，洪武六年置，万历中革"[3]。衢州府西安县有沙埠市、航埠市，龙游县有尹家埠市，开化县有华埠市[4]。宁国府宣城县、南陵县也有称市为埠的，嘉庆《宁国府志》载宣城县远近市镇二十一，其中有孙家埠、沈家埠；南陵县远近市镇一十三，其中有许村埠镇[5]。

市也称为集，盖取市集之意，市镇因而也叫作集镇。例如嘉靖《宿州志》所载宿州灵璧县有二镇十四集，此十四集即十四市，请看：

中乡十五保，镇一：

楼子镇——在县西三十里，

集六：

楼子庄集——即楼子镇，

永定庄集——在县西四十里，

濠城集——在县南五十里，

韦里集——在县南九十里，

---

① 周藤吉之：《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

② 嘉靖《武康县志》卷三山川志·墟市。

③《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三浙江五。

④ 康熙《衢州府志》卷九市镇。《读史方舆纪要》载，开化县有华埠镇，"在县南三十里，自常山至县，此为通道，隆庆中设营于此以御寇，曰华埠营"。

⑤ 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二舆地志·乡都(街巷市镇附)。

孟山集——在孟山下，
沦河集——在县西南四十里；
南乡十三保，集三：
固镇集——在固镇桥北，
九湾集——在县南九十里，
十八塔集——在县西南一百三十里；
北乡十二保，镇一：
陵子镇——在县北五十里，
集五：
陵子集——即陵子镇，
渔沟集——在县北七十里，
双沟集——在县北一百四十里，
杨疃集——在县西北三十里，
三村集——在县西北七十里[1]。

称市为集大多为北方习惯，北方地区的地方志中往往有市集、镇集或集市镇店的条目。康熙《裕州志》所载集镇有：

兴隆镇——系康熙二十九年知州潘云桂招徕流寓，新设此店，现在数十家；

大酒店——知州潘云桂招集数十家；

券桥店——久废，知州潘云桂招徕起集，今有数十家[2]。

康熙、雍正间，裕州又新增市集多处，乾隆《裕州志》载：

康熙四十五年赴任的知州董学礼，新设十二里河集、袁家店、兴隆集；雍正九年赴任的知州金理，新设柏树冈集、维摩寺集；雍正十三年赴任的知州宋名立，新设四里店集、五龙庙集、高家集、鬼湾

---

① 嘉靖《宿州志》卷一坊乡。

② 康熙《裕州志》卷二建置志・集镇。

集[1]。

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此种集大多是定期市。例如易州涞水县：

涞水集——十日一市，

永安坊集——十日一大市，五日一小市，

楼村集——五日一市，

石亭集——五日一市[2]。

市也称为墟，岭南犹为多见。岭南谓村市为墟，……盖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村市，满时少虚时多，谓之为虚不亦宜乎!”[3]“岭南村落，有市谓之虚，不常会多虚日也。”[4] 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统计，宋代文献所见墟市，大体分布如下：

广南东路	77
广南西路	36
江南西路	10
两浙西路	8
江南东路	8
荆湖南路	7
福建路	5
夔州路	3
两浙东路	3
淮南东路	2
荆湖北路	1
成都府路	1[5]

---

① 乾隆《裕州志》卷二建置志、卷四官师志。

② 弘治《易州志》卷五衙坊、镇集。

③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

④ 陈元靓：《书林广记》新集卷三城市门·市肆类。

⑤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市》，载《东洋学报》44卷1—2号。

明清时代两广地区墟市大量兴起、发展，凡粤东贸易之所，多名为墟。各立限期，或三日一聚，或五日一聚。所谓有人则满，无人则虚。间有开列廛肆，无间晨夕，如他省之为市者，亦或市与墟兼之，常日为市，至期则益以墟也"[①]。例如乾隆《潮州府志》所载：

军埔墟——县南六十里，诚水山埔，无村店逢市，听民架木覆茅，三六九日市；

太平墟——县南四十里，旧在同仁社中，康熙甲寅年改设新村近河之地，乡民环处，廛舍稠密，一四七日市；

白堠墟——县南六十里，白堠甲溪南地与枫朗同仁相接，乡民辐凑，市店纵横；

溪东仔墟——县南四十里，诚水山埔，无廛舍，逢市架木覆茅，以为贸易之处，一四日市；

大麻墟——县西六十里，大麻社，距大河一里，民居鳞次，村店蝉联，四九日市[②]。

又如道光《英德县志》所载墟市：

望夫冈墟——在县东三十里，地势平旷，商民铺屋数百户，苏杭杂货齐备，土产药材油豆谷麦花生尤多，墟期二五八日；

横石塘墟——在县北五十里，下隅图由观音坑入二十里，四山围绕中，商民铺舍数百户，杂货齐备，山茶香信豆麦花生俱有，贮谷尤夥，墟期三六九日；

黄土坑墟——又名王城口墟，搅坑墟对岸相隔数里，铺店数百间，市柴炭谷米；

大镇墟——在县东七十里黄塘乡，铺户数百，货物具备，油豆谷麦尤多[③]。

---

① 乾隆《河源县志》卷二墟市。

② 乾隆《潮州府志》卷十四墟市。

③ 道光《英德县志》卷六建置略下墟市。

市也称为场，尤多见于四川等地，当地俗称"场集"，兹举万县场集于下：

余家场——一百五十里，
邵家场——一百六十里，
二甲分水场——九十里，
瑞池场——一百四十里，
三元场——一百四十里，
王家场——一百四十里，
后三甲新场——一百二十里，
九甲熊家场——三十五里，
复兴场——七十五里，
万顺场——一百里，
二甲武宁场——九十里，
五甲瀼渡场——六十里，
八甲高峰场——四十五里，
三甲裕隆场——四十里，
大十甲马头场——一百四十里[①]。

市也称为行，苏松一带较常见。万历《嘉定县志》市镇一栏中，除载有练祁市等三市、南翔镇等十七镇之外，还载有相当于市的六行：

殷家行——在县治东南七十二里，
陆家行——在县治西南一十八里，
刘家行——在县治东南二十里，
吴家行——在县治东北二十四里，
蒋家行——在罗店镇东南，

① 同治《万县志》卷八地理志·场集。

赵家行——在罗店镇东北[1]。

此外还有由行升成的镇:

杨家行镇——在县治东南五十里,里人杨垕所创,故名,其地东西二里;

徐家行镇——在县治东北五里,里人徐冕所创,故名,其地南北可一里[2]。

市的名称的地域性差异,表明市的兴起与发展乃是一个普遍现象,它的名称虽因地而异,但结构、功能却大致相同,这又一次显示了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市镇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因而对典型市镇的研究就具有一般意义,在这方面长江三角洲的苏、松、杭、嘉、湖五府之地是最具研究价值的。

---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上市镇。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上市镇。

第二章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镇网络

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教授曾经指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比较适当的研究单元,既不是府,也不是省,更不用说是整个帝国,而是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区综合而成的经济区。"根据这种观点,他研究中国历史与经济,把中国分作九个独特的区域,提倡进行不同区域的个案研究,批评过去把中国当作单一体系研究的倾向。他用区域系统分析方法来研究清代的市场经济与都市化现象,强调从整体上看问题,打破行政区域结构,而着眼于经济区域的研究,把一个经济区域的各个方面看成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把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恢复到活生生的整体中,并具体地显示出整体中的局部[1]。

长江三角洲正是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地区综合而成的经济区域,它跨越了行政区划的人为界线,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共同体而存在,在明清两代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而著称于世。

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一般特征

广义的长江三角洲包括太湖流域及江北通扬运河以南的长江

---

[1] 施坚雅:《市场及区域经济的结构与发展》(1980年中美联合召开"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及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并参看施坚雅发表于1964年至1965年《亚洲研究学刊》连载论文:《中国乡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

口两岸，它的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全新世以来，在古三角洲的基础上，由于冰后期全球性海面上升，在六千年前左右，高浪、潮流、合成风向将长江所挟带的泥沙加积于长江南北两岸，形成长江南北两条沙坝。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海水由古河道侵入太湖盆地，逐渐把原有的土地及文化层淹没，形成后世的湖积平原。

距今四千年前以来，气候寒暖不断变化，海面也在发生微小的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在上升。在每次海面上升过程中，海水由古河道侵入太湖盆地。太湖及其四周的低洼地因此发生着变化：太湖湖面扩大、形成一系列浅水湖泊。大约在唐末宋初时期，太湖及四周的湖泊群达到面积最大的时期，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及人类的不断围垦，湖泊面积渐趋缩小，形成太湖四周的湖群及低洼地。

太湖古称震泽，又名具区。它的面积的不断扩大及其周围诸湖荡的形成，是与吴淞江、东江、娄江的逐渐束狭以至淤废同时进行的。原来渲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反而变成了海水内浸的通道。潮水倒灌所挟带的泥沙在河口地带大量堆积，使三江系统渐趋淤塞，堵塞了太湖水入海的去路，于是泛滥成太湖中部平原的积水区域，形成了大小零星的湖泊沼泽。

长期以来，在太湖下游陆续开凿了江南运河、元和塘(即今常熟塘，自苏州齐门北至常熟县城)、吴江塘路(即今吴江运河西堤，自苏州以南至平望以北)，以后又浚新洋河故道，导昆山积水南入吴淞江，浚柘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加之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水网系统。水网化的形成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大片土地得到开发，原田腴沃，常获丰收，太湖平原发展成农业的高产地区。

南宋末至清末，长江三角洲雨水较多，这一多雨期不但延续年代久，而且水年多达二百一十三次，几乎占这一时期的三分之一，水情也较以前严重；旱年仅一百二十四次，故湿润指数高达 1.26，

为有史以来气候最湿润的阶段。这种有利的气候条件，也为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①]。

江南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东汉以来，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已明显呈现上升趋势，昔日地旷人稀的面貌正在逐渐改变。从永嘉之乱、十六国到南朝时期，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北方流民的南下为扩大江南的耕地面积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湖泊纵横的自然条件为扩大耕地提供了来源，陂、塘、渠、堰的兴修，生产技术的改进，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向精耕细作迈进。隋唐时期继承南朝以来的发展趋势，江南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成为重要农业生产区域。唐代后期，"军国大计，仰于江淮"[②]，江南地区已成为粮食生产基地。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开发与进展，江南的吴越尤其如此，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比较显著的发展。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③]，"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④]。

宋代特别是南宋时代，两浙路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水稻耕作技术精益求精，占城稻的推广，逐渐形成了早稻、中稻、晚稻的稻作体制。绍兴地区稻的品种多达五十六种，其中早稻四种：早白稻（一名回犁望）、乌粘早白、宣州早、早占城；中稻二十四种：白婢暴、红婢暴、八十日（以上三者为占城种）、八月白、红穤、红莲子、上秆青（一名中秋白）、赤壳、大张九、小张九、红粘白、泰州红、黄岩硬秆、白软、秆白（以上三者为占城种）、午内、青丝、青虾、便撩撒、穤泥乌、冷水乌、下路乌、红占城、叶里兰；晚稻六种：寒占

---

① 参看魏嵩山：《太湖水系的历史变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江苏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褚绍唐：《关于长江三角洲的形成问题》，张天麟：《长江三角洲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② 《权载之文集》卷四十七，《论江淮水灾上疏》。

③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范祖禹传》。

④ 《渭南文集》卷二十，《常州奔牛闸记》。

城、见霜、狗蜱、九里香、黄稑、魏撩[1]。杭州地区也是如此，“区分早熟、中熟、晚熟，粳六种，糯四种”[2]。平江府常熟县，有粳稻、糯稻、籼稻三大类，粳稻二十一种，糯稻八种，籼稻四种。因吴地宜粳，故粳稻多，籼稻少[3]。平江府昆山县，有早稻(籼稻)八种，晚稻(粳稻)十八种，糯稻九种，共三十五种[4]。将两地水稻品种合计，删除重复的，大致上可以反映平江地区的情况：籼稻、粳稻四十一种，糯稻十三种，合计五十四种。可见这一地带水稻种植的发达。

水稻精耕细作，插秧后耘草，常有一耘、二耘、三耘，还采用靠田与还水的新技术，加固稻根，增强秧苗抗旱能力。高斯得记载两浙路农民的靠田法甚详：

> “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暵，可保无忧其熟也。”[5]

因此之故，两浙路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是很高的，高斯得说：

> “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6]

上面所说的亩收五六石，是指谷，折合成米三四石左右。证之其他记载，可知高斯得言之有据。范成大说：浙西路平江府“中稔之年，每亩收米二石至三石”[7]，折合谷三石至五石。朱熹也说浙东路绍兴府，每亩收米二石[8]，折合谷三石。

---

① 嘉泰《会稽志》卷十七物产。
② 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物产。
③《重修琴川志》卷九叙产。
④ 淳祐《玉峰志》卷下土产。
⑤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⑥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⑦《范文正公全集》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厚农桑》。
⑧《晦庵朱文公文集》卷十六，《奏救荒事宜状》。

麦原以北方为主要栽培区，唐至北宋间逐渐推广至江南，到北宋中叶，稻麦二熟制还不普遍，故有“两浙水乡，种麦绝少”之说[1]。北宋末南宋初，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建炎、绍兴间，江南路、两浙路、荆湖路、福建路、广南路人口激增。北方人口南下，带来了面食习惯，一时间江南对小麦的需求量迅速上升，价格也日趋上涨，这就刺激了江南农村种麦的极大积极性。庄绰《鸡肋编》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编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十二贯），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稻麦二熟制正在普及过程中，佃户缴租仍按旧例——“只有秋课”，只在秋收稻米中按成缴纳，“种麦之利，独归客户（即佃户）”，这对佃户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

此外，政府由于军事需要大量籴买马料大麦；地方官劝导农民种麦，以济荒年，都促使稻麦二熟制的普及。一些过去从不种麦的地方，南宋时出现了麦苗遍野的状况。“向也涂泥之地，宜植粳稻，罕种彝麦。今则弥川布陇，其苗蒙蒙，无不种麦矣”[2]。地方官也以劝民种麦为己任，黄震在咸淳七年（1217 年）写了《中秋劝种麦文》：“今太守为尔云之，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时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温足。故农为国之本，麦又为农之本，是麦之功甚大也”[3]。

稻麦轮作改变了过去单一种稻的模式。早稻不仅成熟期短，产量也高，早稻之后所种之麦，产量也超过北方，大致每亩五斗至一石间[4]。

---

① 《苏东坡奏议集》卷六，《乞赈济浙西七州》。

② 吴泳：《鹤林集》卷三十五，《温州劝农文》。

③ 《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七十八，《中秋劝种麦文》。

④ 据景定《建康志》、开庆《四明续志》资料折算。

稻麦二熟制的普及，使农业生产达到一个新阶段，粮食产量有大幅度提高，于是两浙路成了全国的粮仓，号称“苏湖熟，天下足”[①]。苏湖明越一带成了政府税收的主要基地。

陈旉所写《农书》系统地反映了南宋时代两浙路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新水平：农家普遍以稻作为主，多种经营。农家以稻作为中心，兼种麦、豆、油菜、麻、桑，还兼营养牛、养蚕、纺织。《农书》中关于养牛、养蚕、栽桑、栽麻的叙述很详细，从中透露出多种经营之间的有机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家经营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日趋密切。农田除施自然粪肥外，还施商品肥料石灰之类。种麻用于纺织麻布，栽桑用于养蚕、缫丝、织绢，这些布帛丝绢大量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农书》卷下种桑之法篇记载湖州农家的经营方式十分典型：

> “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以一月之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也哉！”

按照陈旉的说法，十口之家养蚕十箔，可以获茧一百二十斤，收丝一百五十六两，可织小绢三十一匹，以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计，一月养蚕后再缫丝织绢的收入相当于四十三石四斗米。把这与一季稻的收入相比，经济效益是很高的，按亩产米三石计，四十三石四斗米，需十四亩四分七厘水稻田的一熟产量，才可与养蚕十箔相比拟。因此，陈旉《农书》极为重视桑、麻经营，认为桑麻间作，“若能勤粪治，即一岁三收，中小之家只此一件，自可了纳赋税，充足布帛也”[②]。

---

①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杂志。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② 陈旉《农书》卷下种桑之法篇。

农家经营开始突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框架。农业经济的新进展，促使地域性商品交换的活跃，这就为市镇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进入明代以后，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深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新模式。这种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集中地体现在新兴的棉作经济和蚕桑经济，包括与之配套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栽培与加工的商品化经营，日益明显地压倒了传统的稻作经济，从而改变了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而代之以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栽培，以及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

从长江三角洲形成的历史看，它还应包括扬州与通州，但这两州地处江北，与江南苏、松、常、杭、嘉、湖六府难以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因此本文所提及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仅以江南六府为限。这六府分别隶属于明代的南直隶与浙江布政司，跨越了行政区域的界限，其内在经济共同点使它们连成一体。

这一地带经过历代的开发，南宋时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号称"苏湖熟，天下足"①。当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仰赖于两浙路，而两浙路税粮大半出于苏、湖、常、嘉四州。进入明代以后，这一区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财赋重地。明代大学士邱浚(1418—1495)在《大学衍义补》中对韩愈关于"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的论述加以发挥，进一步指出："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②。出生于昆山县的另一位大学士顾鼎臣(1473—1540)对此更有切身体验，一再强调："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供输甲天下"，乃"东南财赋

①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杂志。

②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四经制之义下。邱氏又说："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万余石，以实京师，而此五郡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

重地"[1]。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两点。其一是这一地区是财赋重地;其二,他们二人或以苏松常嘉湖五府并提,或以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并提,可见当时朝野上下都把这一地区视作一个整体。

《大明一统志》记录了全国二百六十多个府(州)的税粮数字,其中苏松常嘉湖杭六府是名列前茅的。按税粮多寡排列的前四十名是:1. 苏州府,2. 平阳府,3. 松江府,4. 西安府,5. 济南府,6. 常州府,7. 开封府,8. 青州府,9. 嘉兴府,10. 太原府,11. 南昌府,12. 河南府,13. 湖州府,14. 兖州府,15. 吉安府,16. 延安府,17. 淮安府,18. 重庆府,19. 绍兴府,20. 怀庆府,21. 莱州府,22. 广州府,23. 东昌府,24. 镇江府,25. 抚州府,26. 应天府,27. 彰德府,28. 黄州府,29. 扬州府,30. 卫辉府,31. 登州府,32. 杭州府,33. 袁州府,34. 临江府,35. 瑞州府,36. 衡州府,37. 饶州府,38. 承天府,39. 凤阳府,40. 潞安府[2]。

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税粮如下:

府	税粮
苏州府	2,502,900 石
松江府	959,000 石
常州府	764,000 石
嘉兴府	618,000 石
湖州府	470,000 石
杭州府	234,200 石

与全国税粮总额 26,560,220 石相比较,苏州一府税粮即占全国税粮的将近十分之一,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税粮占全国税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间,而苏、松二府的税粮分别名列全国第一位与第二位(按:平阳府税粮统计有误)。

---

① 《明实录》嘉靖十八年六月己未。《顾文康公集》卷一,《陈愚见划积弊以裨新政疏》。

② 《大明一统志》(万历中万寿堂增订本、日本东京汲古书院影印)。

重赋并非人为的，它不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意志的体现，而是这一地区经济富甲天下的产物，也就是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经济的高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遍于这一地区的市镇充分地显示了它的富庶情况："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舟航辐辏"[①]；"百货并集，无异城市"[②]；"百货贸易，如小邑然"[③]。风俗的豪华侈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富庶情景："万历后率以声华气谊相高……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冒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且陈列，幕瓴罄尽矣；往时非贵显不乘轩，今则肩舆塞路矣"[④]。消费幅度的提高显示出致富道路的通畅。时人论及这一地区的生财之道，"大抵本富十之六，末富十之四，奸富十之一"[⑤]。显然商品经济的发展乃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富甲天下的根本原因。

二、明代市镇的发展与分布

明代的苏州府、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成为财赋重地，商品经济发达，市镇的发展也最引人注目。

先看苏州府。据正德《姑苏志》所载，苏州府属各州县的市镇分布是十分稠密的。

吴县有市一镇六：

1. 月城市——阊门内，出城自钓桥西渡僧桥南分为市。各省商贾所集之处；

2. 横塘镇——去县西南十三里，有横塘桥；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一疆域，卷二古迹。

②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

③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村镇市。

④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六风俗。

⑤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六风俗。

3. 新郭镇——去县西南十五里;

4. 横金镇——去县西南三十里;

5. 木渎镇——去县西南三十里,有巡检司;

6. 光福镇——去县西五十里;

7. 社下镇——去县西一百十里。

长洲县有市五镇三:

8. 大市——在乐桥,今名存市废;

9. 黄埭市——去县北四十里;

10. 相城市——去县东北四十里;

11. 王墓市——去县东二十里;

12. 尹山市——去县东南二十里;

13. 甫里镇——去县东四十里;

14. 陈墓镇——去县东南五十五里,有巡检司;

15. 许市镇——去县西北二十五里,一名浒墅,旧有巡检司、急递铺,景泰间置钞关于此。

昆山县有市四镇五:

16. 半山桥市——在县西北隅,民居辐辏,朝夕为市,旧在宝月桥南为市内,又有后市,在后市桥西;

17. 周市——去县东北新塘;

18. 陆家浜市——去县东南十二保木瓜浦,创于宣德初;

19. 红桥市——去县西北。

20. 丘墟镇——在县东南十八里,东通太仓,南接吴淞江,有税课子局;

21. 泗桥镇——去县东南三十六里,其地商贾辏集,有税课纂节;

22. 石浦镇——去县东南四十里,南通淀山湖,北枕吴淞江,有巡检司;

23. 安亭镇——去县东南四十五里,与嘉定接境,有税课

子局;

24. 蓬阆镇——去县三十里。

常熟县有市九镇五:

25. 县市——在县城;

26. 杨尖市——去县西南四十五里;

27. 河阳市——去县四十里;

28. 奚浦市——去县七十里,北通大江,饶鱼盐之利;

29. 徐家市——河阳山西,同在南沙乡,称新市;

30. 唐市——去县东南三十里,旧名尤泾市;

31. 李市——去唐市东南六里,同在双凤乡,又名山泾市;

32. 支塘市——去县东北四十五里;

33. 练塘市——去县西南三十六里;

34. 福山镇——去县西北四十里,有巡检司;

35. 许浦镇——去县东七十里,宋绍兴置镇;

36. 梅李镇——去县东三十六里;

37. 庆安镇——去县西北八十里,旧名石阕市,宋元丰改为镇;

38. 常熟镇——去县一百二十步,镇废而名存。

吴江县有市三镇四:

39. 县市——在吴淞江西,滨太湖。旧经云:城无十里,市无千家。今民生富庶倍于往昔;

40. 江南市——出东门过长桥为市;

41. 新杭市——民居城市,其南接嘉兴王江泾;

42. 同里镇——去县东十六里,有巡检司、税课局;

43. 黎里镇——去县东南二十里;

44. 平望镇——去县东南四十里,有平望驿、巡检司;

45. 震泽镇——去县西南九十里,有巡检司。

嘉定县有市九镇六:

46. 州桥市——县治前东南竖龙桥，又名东市；

47. 新泾市——去县东六里；

48. 广福市——去县东南二十四里；

49. 真如市——去县东南五十里；

50. 娄塘桥市——去县北十二里；

51. 封家浜市——去县南二十四里；

52. 纪王庙市——去县西南三十六里；

53. 钱门塘市——去县西北一十里；

54. 瓦浦市——去县西北六十里；

55. 罗店镇——去县东十八里；

56. 南翔镇——去县南二十四里；

57. 大场镇——去县东南四十八里；

58. 黄渡镇——去县西南三十六里；

59. 江湾镇——去县东南六十里，有巡检司；

60. 清浦镇——去县东南八十里，南接上海县境。

太仓州有市十镇四：

61. 诸泾市——去州东十里；

62. 半泾市——去州南十五里；

63. 新市——去州东北二十里；

64. 璜泾市——去州东北五十里；

65. 隆市——去州东六十里；

66. 甘草市——去州东北十里，有巡检司；

67. 直塘市——去州北三十里；

68. 吴公市——去州南十五里；

69. 涂崧市——去州东北三十五里，宋元丰间置；

70. 陆河市——去州北七十里；

71. 双凤镇——去州北二十四里，又名双林，居民稠密，市物旁午；

72. 沙头镇——去州东北三十六里;

73. 新安镇——与沙头近;

74. 茜泾镇——去州东北四十五里,有巡检司[1]。

以上七十四市镇,其中长洲县大市、常熟县常熟镇名存实亡,实际共有七十二市镇,反映了明代正德年间以前苏州府市镇发展的基本状况。

如果把正德前后编纂的县志(州志)与之比较,可以发现这一地区市镇发展之迅速,是很惊人的。吴江县就是突出的例子。弘治《吴江县志》仅载二市四镇:县市、江南市、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2]。正德年间增为三市四镇。嘉靖年间增为十市四镇:县市、江南市、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盛泽市、新杭市、庵村市、震泽镇、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3]。明末清初又增为十市七镇:县市、江南市、新杭市、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庵村市、黄溪市、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震泽镇、盛泽镇、芦墟镇、章练塘镇[4]。从弘治至崇祯这一百几十年中,吴江县由六个市镇猛增为十七个市镇,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正德至嘉靖的半个世纪中,由七个市镇增为十四个市镇,增长达一倍之多。

嘉定县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正德年间有十五个市镇,到万历年间几乎增长了一倍。万历《嘉定县市》记载了三市十七镇,另有六行(按:苏松一带的"行",实质类乎市),一并计算共有二十六市镇:练祁市、钱门塘市、封家浜市、南翔镇、娄塘镇、新泾镇、罗店镇、月浦镇、外冈镇、广福镇、大场镇、真如镇、杨家行镇、江湾镇、清浦镇、徐家行镇、安亭镇、黄渡镇、纪王镇、葛隆镇、殷家行、陆家行、刘

---

① 以上均见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②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③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地理志·疆域。

④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疆域。

家行、吴家行、蒋家行、赵家行[1]。正德年间的真如市、娄塘市、新泾市、广福市、纪王庙市，万历年间都升成了镇；此外还新增了月浦、外冈、杨家行、徐家行、葛隆等镇；殷家行等六行，则是几十年中陆续兴起的村市。而且万历时代市镇的规模与繁荣程度也大大超过了正德时代。南翔镇成了"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的大镇；罗店镇成了"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的大镇；新泾镇成了"棉花管屦所集，顷年浸盛"的棉花交易中心[2]。

常熟县市镇的发展也颇令人注目。正德年间十四个市镇，到嘉靖年间增加到二十二个市镇，原先是九市五镇，后增为十六市六镇：杨尖市、河阳市、奚浦市、徐家市、唐市、李市、支塘市、归家市、双凤市、直塘市、李墓市、沙头市、甘草市、璜泾市、张家市、练塘市、福山镇、许浦镇、梅李镇、庆安镇、常熟镇、涂松镇[3]。嘉靖《常熟县志》把划归太仓州的一些原属常熟县的市镇也列入其内，因而实际增长数并没有那么多，不过市镇的规模确实是有明显发展的。例如福山镇"居民可二千余家，中有甃衢，有通、泰、苏、湖商舶"；梅李镇"居民可二千余家，中有甃衢，许浦未塞，有通、泰、苏、湖商舶"；奚浦市"饶鱼盐之利"，"有通泰商舶"；支塘市"居可二千余家，有商舶"[4]。

再看松江府。从正德《松江府志》的记载可知，当时松江府有四十四市镇，就总数而言少于苏州府，但松江府仅华亭、上海二县，苏州府却有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太仓七州县，松江以二县之地而有四十余市镇，分布密度当不亚于苏州府。

华亭县有十六镇六市：

---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 · 市镇。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 · 市镇。
③ 嘉靖《常熟县志》卷二市镇志。
④ 嘉靖《常熟县志》卷二市镇志。

1. 风泾镇——在一保，以乡名，一名白牛市，以陈舜俞名。占于此置风泾驿。其南半属嘉兴；

2. 朱泾镇——在四保胥浦乡，元于此置大盈务。东南有吕巷、杨巷二市；

3. 金泽镇——在四十二保，地接泖湖。田于是者获其泽如金，故名；

4. 小蒸镇——在四十一保，居此者多文人；

5. 凤凰山镇——在二十八保，为府人春游之地；

6. 亭林镇——在十保，去县东南三十里，元于此置金山巡检司；

7. 沙冈镇——在三十六保。镇地即古三冈之一，与竹冈、紫冈相去五里，自府城至上海必由之地；

8. 南桥镇——在十三保，有桥旁横泾，曰北桥，与此相峙，故名；

9. 萧塘镇——在南桥北。自昔富繁，近世宋溧、宋瑛兄弟自此登第，镇名益著；

10. 张泾堰镇——在七保，去县南五十里，宋人堰海十八所之一。一名张溪，自府城至金山孔道；

11. 小官镇——距张堰南十二里。浦东盐司旧在张泾堰，与牢盆相去甚远，别建官衙于此，俗呼为小官衙镇。明设金山卫于此；

12. 柘林镇——在十二保，去县东七十二里，为海人辐辏之地；

13. 青村镇——在十五保，去县东南八十里。洪武十九年立千户所。高桥市独盛，海渔者得鱼悉于此鬻；

14. 陶宅镇——在十五保，去县东南八十里。著姓陶氏居此，俗呼为陶家宅镇；

15. 叶谢镇——在八保，与萧塘邻，以叶、谢二姓名镇；

16. 北七宝镇——在三十五保，左为横泺，前临萧汇塘，商贾必由之地，有税课局。镇以寺名，旧有南北二寺，而此为北；

17. 兴塔市——在二保，旧有兴塔院，故名；

18. 杨巷市——在五保；

19. 吕巷市——在四保，一名璜溪；

20. 泗泾市——在三十七保，因泗泾塘名；

21. 北钱市——在四十一保，石湖塘上，与南钱相望，盖一姓分处为市而异其称；

22. 广富林市——在三十八保。科第前后不绝，而民居亦日蕃庶，蔚为一方之望；

上海县有十一镇十一市：

23. 吴会镇——在十六保，去上海东南五十四里；

24. 乌泥泾镇——在二十六保，人民盛于他镇，有税课局；

25. 下沙镇——在十九保，一名鹤沙。镇多巧工拨罗绒纹绣及木梳、交椅之类，皆精制，他郡所不及；

26. 新场镇——距下沙五里，一名南下沙。元初迁盐场于此，故名。赋为两浙最，北桥税司、杜浦巡司皆徙于此。四时海味不绝，歌楼酒肆贾衕繁华，县未过也；

27. 周浦镇——在十七保，一名杜浦，去县东南三十六里。元置下沙盐场、杜浦巡司于此，后逐利而迁新场；

28. 盘龙镇——在三十四保，地濒松江盘龙汇，故以为名。界于华亭、昆山间；

29. 青龙镇——在四十五保。唐以控江连海置镇防御，宋以海舶辐辏，岛夷为市，又设监镇理财。镇故有治、有学、有狱、有库、有仓、有务、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有二浮图南北相望。江上有龙舟夺锦之盛，人号小杭州。其后陵夷谷变，市舶之区徙于太仓，又迁于杭越，镇遂衰落；

30. 唐行镇——在五十保，控淀湖，为吴门要冲。元初有大姓

唐氏居此，商贩竹木，遂成大市，因名镇。有十字港，临港市廛谓之四嘴，新泾税局在此；

31. 赵屯镇——在四十九保，赵屯浦上；

32. 三林塘镇——在二十四保，三林塘上，去县东南十八里，昔东西塘有大姓林氏聚族居此；

33. 八团镇——在十七保，三场盐司在此，民居率多盐丁，盐贾辐辏，逐末者多归之市；

34. 嵩宅市——在四十六保，唐行东南。青龙镇盛时已称："草庙、高塔，重固、嵩宅，亲臣巨室，邻烛辉赫"。今皆萧条，唯此市廛日辟，商贩交通；

35. 泰来桥市——在唐行南咸鱼港上。自宋元来人烟阛阓，市中飞梁对峙，东西巷院介乎其间；

36. 杜村市——在四十七保西村；

37. 白鹤江市——又称新市，在杜村北，白鹤江口，其地上海、嘉定南北杂居；

38. 杨林市——在三十一保吴淞江之北；

39. 诸翟巷市——在三十保，俗呼为诸地；

40. 鹤坡市——在二十保；

41. 东沟市——在二十二保，东沟浦上；

42. 北蔡市——在二十保，旧有大姓蔡氏分南北为市；

43. 闵行市——在十六保，横泺东。近岁已庚二水、横泺、沙竹二冈田南有秋，灾乡多从贸易，市始知名；

44. 高家行市——在二十二保[1]。

到崇祯年间，松江府市镇已增加到六十一个。其中华亭县增加了莘庄镇，上海县增加了一团镇、龙华镇、陈家行市，而万历元年

---

[1]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并参照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一镇市；正德《华亭县志》卷五镇市；嘉靖《上海县志》卷二建置。

由华亭、上海二县析置的青浦县，除上述二县划归的市镇外，新增了朱家角镇、沈港镇、刘夏镇、北竿山镇、郏店镇、重固镇、艾祁镇、古塘镇、金家桥镇、杨扇镇、天兴庄镇、双塔镇、王巷市、杜家角市[①]。新析置的青浦县界于苏松二府之间，市镇的发展最为可观，发展的高潮是在万历年间，这从万历《青浦县志》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万历《青浦县志》所载市镇比崇祯《松江府志》多泗泾镇、凤凰山镇、种德庄镇、古桥头镇、刘家角镇，其中泗泾镇镇东为华亭界，西市梢为青浦界，凤凰山镇也属华亭、青浦交界处，均记载于华亭县内，种德庄镇、古桥头镇、刘家角镇则系崇祯《松江府志》所无[②]。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万历年间新兴的朱家角镇，"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双塔镇(又名商榻镇)是"商人往来苏松适中之地，至夕驻此停榻"的重要交通枢纽；跨吴淞江两岸的黄渡镇，江北老街属嘉定县，江南新街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近来商贩颇盛"；先前已经见诸记载的金泽镇，在这一时期日趋兴盛，"市盛佛庐，穷壮极丽"，"舆梁飞亭，列肆又他镇所无"；北七宝镇与华亭所属南七宝镇隔蒲汇塘为界，也在此时成为"商贾猬集，文儒辈出"的"邑之巨镇"[③]。

嘉靖，万历年间在华亭县兴起的莘庄镇，北邻七宝镇，南近乌泥泾镇，"其地产花少稻"，成为"居民数千指"的棉布集散中心；在上海县兴起的龙华镇，则成为著名的稀布(号称龙华稀)的集散中心；距新场镇二十里的一团镇，"盐商多聚于此"，是上海县新兴的盐业中心[④]。

再看杭州府。杭州为"水陆要冲"，是"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

---

①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②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③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④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会"之地，宋南渡后，成为首都，"市镇繁饶，颇闻宇内"[1]。"且值地产之盛"，因此市镇发达，府城内有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鱼行、南猪行、北猪行、羊行、果行、鸡鹅行、驴市、马市、布市、蟹市、牛市、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书房、南瓦、中瓦、大瓦、下瓦等，城外又有浙江市、西溪市、赤山市、龙山市、半道红市、安溪市、江涨桥镇、范浦镇、汤村镇、北土门市、南土门市、临平镇。进入明代以后，"五六百年来，其存无几"[2]；然而"此衰彼盛，以实计之，倍徙畴曩"[3]。

杭州府城内外有二十二市镇，府城内有：

1. 寿安坊市——俗呼官巷口，其南属钱塘县，北属仁和县。郡市之盛，惟此为最；

2. 清河坊市——属钱塘县；

3. 文锦坊市——属钱塘县，俗名羊坝头；

4. 塔儿头市——属钱塘县，清波门内；

5. 东花园市——属钱塘县，百丸诸物举贸于此；

6. 众安桥市——属仁和县，在清宁坊口；

7. 盐桥市——属仁和县；

8. 褚堂市——属仁和县；

府城外有：

9. 嘉会门市——候潮门外；

10. 沙田市——艮山门外；

11. 夹城巷市——去城五里；

12. 宝庆桥市——去城五里余；

13. 德胜桥市——去城六里；

---

① 万历《杭州府志》卷二十四市镇。

② 嘉靖《仁和县志》卷一封畛·市镇。

③ 万历《杭州府志》卷二十四市镇。

14. 石灰坝市——去城八里；

15. 江涨桥市——去城八里；

16. 北新桥市——去城十里；

17. 临平镇——去城四十里；

18. 塘栖镇——去城五十五里；

19. 浙江市——浙江驿前；

20. 鲞团——候潮门外浑水闸；

21. 范村市——溶浙江，近年客商物货多于此居仃，渐成巨镇；

22. 西溪市——去钱塘县西二十里。

海宁县有七市镇：

23. 县市——县治西南双庙巷口；

24. 郭店市——去县北七里；

25. 袁花市——去县东五十里；

26. 转塘市——县东一十二里；

27. 黄冈市——县东五十里；

28. 长安镇——县西北二十五里，与仁和县接界，有坝以限，上下两河商贾往来，舟航辐辏，昼夜喧沓；

29. 硖石镇——县东北五十里，与嘉兴府秀水、桐乡接界。

富阳县有五市：

30. 汤家埠——在祥凤村；

31. 场口埠——在永宁村；

32. 灵椿埠——在江阴村；

33. 渔里山埠——在灵峰村；

34. 洋婆场——在惠爱村。

余杭县有六镇：

35. 瓶窑镇——去县东三十里，与钱塘县接界，镇之大半属钱塘；

36. 石濑镇——去县东北三十五里，在山后界；
37. 双溪镇——去县东三十五里，在吴山界；
38. 黄湖镇——去县北四十里，在黄湖界；
39. 长乐镇——去县西北二十里，在杳后界；
40. 闲林镇——在县东南一十八里，在闲林保。

临安县有六镇：

41. 青山镇——去县一十五里，在谷昌乡；
42. 下管镇——去县二十五里，在庆云乡；
43. 横板溪镇——去县三十里，在高陆乡；
44. 鹤山镇——去县十里，在灵令乡；
45. 西墅镇——去县四里，在保锦乡；
46. 黄潭镇——去县五里，在南止乡。

新城县有四镇：

47. 渌川镇——在太平乡；
48. 松溪镇——在昌东乡；
49. 山溪镇——在广陵乡；
50. 洞桥镇——在宁善乡。

昌化县有二镇：

51. 河桥镇——去南门一十五里；
52. 手穿巡检司镇——去西门二十里。

于潜县市镇无。[1]

嘉兴府原辖嘉兴、海盐、崇德三县，宣德四年巡抚胡概以三县地广，奏分嘉兴西为秀水，北为嘉善（旧魏塘镇），海盐东北为平湖（旧当湖镇），崇德东为桐乡（旧凤鸣市），共七县。

嘉兴县有四镇：

1. 王店镇——治南三十六里；

---

[1]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

2. 新丰镇——治东三十六里;

3. 钟带镇——治东南五十里;

4. 新行镇——治东南五十四里[①]。

秀水县有四镇:

5. 王江泾镇——永乐乡旧有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镇,镇南尽秀水县界,北据吴江县界。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

6. 新城镇——后唐景云中镇遭兵乱,居民垒土城,故云新城,城久废,今仅存其名。其民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攻纺织。居者可万余家;

7. 濮院镇——在县西南三十六里。元至正间右族濮鉴一姓,迨明朝濮氏流徙他卜,居者渐繁,人可万余家,因以濮院名镇。南隶桐乡县之梧桐乡界,北隶秀水县之灵宿乡界。民务织丝纻,颇著中下声,亦业农贾,商旅辐辏;

8. 陡门镇——夹运河南北,廛居仅二百余家,较诸镇最为阒寂,民务耕桑,女纺织,颇多朴茂之风[②]。

嘉善县有六镇

9. 魏塘镇——在府城东三十六里,嘉善县治据此而建;

10. 玉带镇——治东南十里,通平湖;

11. 斜塘镇——治北二十里,一水横界,自乾迄巽,故名斜塘;

12. 陶庄镇——治西北五十里,旧名柳溪;

13. 风泾镇——治东北一十八里,宋陈舜俞居此,又名白牛市;

14. 干家窑镇——治西北一十二里,旧止窑户,知县章士雅建

---

①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疆域。

②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志·市镇。

常平仓于此,今为镇[1]。

海盐县有五镇五市:

15. 茶院镇——治西南二十七里。吴越王钱镠幸金粟寺,命寺僧于此设茶施众,故名;

16. 半逻镇——治西三十五里,一名半路亭镇;

17. 鲍郎镇——治西三十里,俗名水关埭。周围六里三十步,有盐场,亦名鲍郎场;

18. 澉浦镇——治西南三十六里,有城,与乍浦镇南北对峙;

19. 沈荡镇——去县二十六里,水四通,县西北境民皆赴之,列廛五六百家,五谷、丝市、竹木、油坊、质店皆有;

20. 欤城市——去县十五里;

21. 砂腰市——去县十八里;

22. 梅园市——去县二十里;

23. 通玄街市——去梅园市五里;

24. 甪里堰市——去县四十二里[2]。

平湖县有十市镇。

25. 当湖镇——县治西二百五十步,有当湖税课局;

26. 芦沥市——县治东北四十里;

27. 钱家带市——县治北七里;

28. 徐家带市——县治南十二里,店舍滨河,村墟小市;

29. 乍浦镇——县治东南二十七里。宋元时番舶凑集,居民互市,洪武十九年置乍浦守御千户所;

30. 广陈镇——县治东北二十七里。元时番舶至,列肆于此,故曰广陈。与旧衙、金山水陆交会;

31. 新仓镇——县治东北三十六里,旧芦沥盐课司在此,虽小

---

[1]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疆域;卷二城池。

[2]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一方域篇之一县坊乡镇图。

聚落，而百货泉流，商民云萃；

32. 新带镇——县治北三十里，有中市、东市、西市，饶鱼米花布之属，徽商麇至，贯镪纷贸，出纳雄盛；

33. 旧带镇——县西三十里；

34. 灵溪镇——县东北二十七里，产细布，人争市之，方数里[①]。

崇德县有三市镇：

35. 石门镇——县治北二十二里；

36. 洲钱市——县治西北二十七里；

37. 御儿市——即义和市，运河塘西五十步，县治据此建[②]。

桐乡县有四市镇：

38. 凤鸣市——即县市，县治建于梧桐乡凤鸣市南；

39. 皂林镇——县治北九里，有巡检司；

40. 石门镇——县治西北二十五里；

41. 濮院镇——县治东北一十八里[③]。

湖州府在宋代熙宁、元丰间有乌墩、施渚、梅溪、四安、水口、新市六镇[④]；嘉泰中，废水口镇，置和平镇，仍为六镇[⑤]。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增至二十二市镇：

1. 乌镇——在乌程县治东南九十里，与归安、桐乡、崇德、吴江诸县接界。旧名乌墩，又名乌戍。地处浙(江)直(隶)之交，河港四通，本镇居民近万，为乌程巨镇；

2. 南浔镇——在乌程县治东六十一里，张士诚尝筑城于此，故址尚存；

---

①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疆域；卷二城池。天启《平湖县志》卷一舆地·都会。

②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疆域；卷二城池。

③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疆域；卷二城池。

④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

⑤ 嘉泰《吴兴志》卷十管镇。

3. 菁山市——在乌程县治南三十六里；

4. 妙喜市——在乌程县治西南三十七里；

5. 菱湖镇——在归安县治南三十六里；

6. 埭溪市——在归安县治西南九十里；

7. 琏市——在归安县治东南九十里；

8. 双林镇——在归安县治东南五十里；

9. 乌镇——在归安县治东南九十里，东北属乌程界，西南属归安界；

10. 马家渎镇——在安吉州治东三里；

11. 递铺镇——在安吉州治东南二十里；

12. 梅溪镇——在安吉州治东北三十里，设有税库局，近革；

13. 四安镇——在长兴县治西南七十里，宋设监镇，元设税务，明设巡检司；

14. 和平镇——在长兴县治南五十里；

15. 皋塘镇——在长兴县治东北三十里，设巡检司；

16. 合溪镇——在长兴县治西二十五里，宋设税务，元设巡检司，明裁革；

17. 水口镇——在长兴县治北二十里；

18. 塘栖镇——在德清县治东三十五里，官道舟车之冲要，丝缕粟米皆聚贸于此；

19. 新市镇——在德清县治东北四十五里，民物之饶视塘栖较盛；

20. 三桥埠市——在武康县治北七里，自平远门至水埠，有三桥，故名。舟楫交通，商贾辏集，有税课局；

21. 上陌埠市——在武康县治南一十八里，陌山之上游，故名；

22. 沿下市——在孝丰县治东北四十里[1]。

明代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市镇发展，确实在江南地区是名列前茅的。南直隶(包括南都)各府如应天府、凤阳府、常州府、镇江府、扬州府、淮安府、庐州府、安庆府、太平府、宁国府、池州府的市镇发展状况，都无法与苏松二府相提并论。且以南都应天府为例，上元县有四镇：淳化、石步、上桥、靖安；江宁县有四镇：金陵、秣陵、江宁、大成巷；句容县有二镇：常宁、下蜀；溧阳县有二镇：举善、杜褚，五埠(埠即市)：高友、周城、上兴、黄连、上沛；溧水县有四镇：官塘、浦塘、孔镇、蒲干，四市：乌山、杨塘、柞塘、邵市；江浦县有一镇：乌江，三市：新路街、东葛城、西葛城；六合县有三市：竹镇、冶浦、合百；高淳县有五市：南塘、漆桥、银林、固城、芦溪[2]，共计八县之地，有十七镇二十市，与苏松二府相比较，是稍逊一筹的。

再以常州府为例，武进县有二市：一在天禧桥北、一在新坊桥西，三镇：奔牛、魏村、横林；无锡县有二市：大市、南市，七镇：洛社、甘露、望亭、竹塘、陆墟、江市、郭市；江阴县有三市：大市、江下、三丫，十一镇：华墅、青阳、宗利、竹塘、长泾、长寿、顾山、杨舍、申港、利城、石桥；宜兴县有二市：县南、长桥，四镇：湖洑、张渚、河桥、小里；靖江县有五市：米市、布市、柴市、猪市、杂市[3]。常州府各县中市镇较发达的当首推江阴县，《南畿志》所记十一镇无误，而三市则不确切，据嘉靖《江阴县志》，该县有二十市：三叉路、虞门、利城、石堰、月城桥、四河口、流黄、黄塘、东望桥、云亭、黄村桥、杨墅桥、长泾、北角、南角、顾山、筑塘、南新桥、北新桥、周庄[4]。此县的市镇分布密度大体与苏松二府各县相近，除此之外的各县，即如武进

---

①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乡镇。嘉靖《武康县志》卷三山川志·墟市。

② 嘉靖《南畿志》卷四应天府·城社。

③ 嘉靖《南畿志》卷二十常州府·城社。

④ 嘉靖《江阴县志》卷二提封记·市镇。

县、无锡县也无法比拟。镇江府则更无论矣，全府仅九镇：江口、丹徒、大港、丁角、延陵、吕城、丁桥、弭村、埤城，市则多为县市，如大市、小市、中市之类[1]。

近旁的太平府、宁国府市镇虽然不少，但缺乏足以成为经济中心的大镇，当然不及苏松杭嘉湖远甚。且看：

太平府当涂县有五镇：丹阳、大信、石慈、采石、黄池，市十一：薛店、新丰、褚桥、博望、江口、十里、黄山、青游、清沟、三湖；芜湖县有一镇：河口，十市：县市、河南、板桥、杨清、石冈、山口、石硊、东管、橹港、孤汀；繁昌县有六镇：黄浒、杨家会、新林、下峨、县市、荻港，六市：上峨、蒋桥、中会、唐灿、三山、黄山[2]。

宁国府宣城县有四镇：符里、水阳、黄池、临丧，市二：双桥、水东；南陵县有二市：金家阁、丁家埠；泾县有二镇：赤滩、马头，三市：藤溪、安吴、下坊；宁国县有四市：河沥、石口、东岸、港口；旌德县无市镇；太平县有一镇：宏潭[3]。

池州府、徽州府则更无论矣。

再看浙江。明代浙江各府的市镇发展，杭嘉湖三府是佼佼者，此外各府均无法望其项背。浙江各府市镇发展状况，除杭嘉湖三府之外，首推绍兴府，然而绍兴府的状况是镇少市多，全府仅六镇，即山阴县的钱清镇、会稽县的三界镇、萧山县的西兴镇与渔浦镇、上虞县的纂风镇、嵊县的蛟井镇；市的数量不少，但多处于定期集市水平上。会稽县有平水、马山、樊江、道墟、伧塘、白米堰、曹娥七市，山阴县有漓渚、柯桥、夏履桥、安昌、玉山陡门五市，萧山县有县市、临浦、长山三市，诸暨县有枫桥、黄润街二市，余姚县有江桥、临山、浒山、姚家店、新坝、梁同、马渚、周巷、天华、店桥、埋马、匡堰、

① 嘉靖《南畿志》卷二十四镇江府・城社。

② 嘉靖《南畿志》卷四十四太平府・城社。

③ 嘉靖《南畿志》卷四十七宁国府・城社。

黄清堰、石人山十四市，上虞县有县市、梁湖、五夫、小越四市，嵊县有县市、华堂、上冈、长乐、三界、崇仁六市，新昌县有王泽、胡卜、长潭、棠墅、坑西、蔡岙六市[1]。这些市，"大约城内外者日聚，乡则旬中一二日，或二八，或三七聚，然只日用常物耳，无珍奇"[2]。显然，除了少数每日皆聚的市以外，大多数市仍停留在五日一市的定期市水平，每逢二日、八日，或每逢三日、七日才有"以有易无"的集市，这种市当然无法与杭嘉湖地区的市相比拟。

邻近的宁波府、金华府的情况大体相似。宁波府仅一镇：鄞县的小溪镇，此外全是市，鄞县有：西郭八市、南郭三市、东津四九市、后市、甬东市、宝幢市、小白市、东吴市、下水市、韩岭市、横溪市、小溪市、栎社市、林村市、凤岙市、石塘市，慈溪县有文溪市、大隐市、黄墓市、车厩市、渔溪市、蓝溪市、鸣鹤市，奉化县有奉化市、江口市、蔡桥市、尚田市、溪口市、南渡市、泉口市、白社市、袁村市、公棠市，定海县有城西市、江南市、石湫市、蟹浦市，象山县有附郭市、白石市、坟头市、南堡市、泗洲头市、三角市、丝歌市[3]。金华府仅四镇：金华县的孝顺镇、兰溪县的青溪镇、平渡镇、汤溪县开化镇，此外全是市，金华县有县市、溪下街市、北关市、含香市、曹村市、孝顺市、里浦市、何楼市、梅溪市、阳波市、竹马馆市、马海市，兰溪县有县市、河西市、杨塘市、厚仁市、都心市、皂洞市、马涧市、石渠市、永昌市、赤溪市，东阳县有县市、良渡市、茶坊市、大化市、长衢市，义乌县有县市、念三里市、倍磊市、酥溪市、青口市、光明市、洋滩市、赤岸市、野墅市、楂林市、芦寨市、江湾市，永康县有县市、高堰市、李溪市、前仓市、净心市、可投市、四路口市、岩下市、芝英市、胡堰

---

① 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万历《新昌县志》卷二区域志。万历《会稽县志》卷四治书·作邑。

② 万历《绍兴府志》卷一疆域志。

③ 嘉靖《宁波府志》卷九经制志·都鄙。

市、龙山市、清渭市、杨公桥市、太平市、黄塘市、武义县有县市、泉溪市、苦竹市、厚舍市、横路市、茭道市、端村市、南湖市、浦江县有县市、横溪市、朱村市、下柳市、汤溪县有县市、马海市、酤坊市、花园市[1]。

其他各府更是等而下之。数量众多的市，或五日一市，或六日一市，或十日一市。例如台州府太平县：

南监街——二七日市，

塘下街——一六日市，

温岭街——一六日市，

夹屿街——三八日市，

泽库街——四九日市，

下村市——二七日[2]。

从全县范围看，每逢一、二、三、六、七、八日都有市集，对于每个市而言，仍是五日一市。其中温岭街特别热闹，它南通江下水路入海，西陆路通乐清、温州，北水路通路桥、官河，东陆路通本县、黄岩，"贾舶交会，人烟辏集，实一大市镇"，但还保持"五日一为市"的传统[3]。

处州府丽水县则为六日一集：

石牛市——以子卯日定市，

碧湖市——以丑辰日成市[4]。

宁波府象山县则是十日一集：

白石市——逢九有市集，

坟头市——逢四有市集，

---

① 万历《金华府志》卷二乡隅。

② 嘉靖《太平县志》卷二地舆地·坊市。

③ 嘉靖《太平县志》卷二地舆地·坊市。

④ 雍正《处州府志》卷二建置志。

南堡市——逢五有市集，
泗头市——逢二有市集，
三角市——逢七有市集[①]。

从上述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市镇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商贾云集的万户大镇与十日一集的乡村小市，同时并存，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三、清代前期市镇的继续发展

进入清代以后，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市镇仍处在向上发展的势头中。其中尤以苏松二府的进展最为引人注目。且看清代乾隆年间苏松二府的市镇分布状况：

苏州府吴县有二市六镇：

1. 月城市——阊门内外；
2. 枫桥市——阊门西七里，与长洲县合治；
3. 横塘镇——县西南十三里横塘桥；
4. 木渎镇——县西三十里；
5. 光福镇——县西五十里；
6. 社下镇——县西一百十里；
7. 新郭镇——县西南十五里；
8. 横金镇——县西南三十里。

长洲县有三市六镇：

9. 大市——在乐桥，即市心；
10. 黄埭市——县北四十里；
11. 相城市——县东北四十里；
12. 唐浦镇——县东二十二里；

① 嘉靖《宁波府志》卷九经制志·都鄙。

13. 陆墓镇——县北八十里;
14. 金墅镇——县西北四十里;
15. 望亭镇——县西北五十里;
16. 蠡口镇——县北十二里;
17. 浒墅镇——县西北二十五里,即浒墅关。
元和县有二市七镇:
18. 五墓市——县东北二十里;
19. 尹山市——县东南二十里;
20. 角直镇——县东北四十里,旧名甫里;
21. 陈墓镇——县东南五十五里;
22. 唯亭镇——县东三十五里;
23. 蠡口镇——县北十八里;
24. 周庄镇——县东南七十里;
25. 章练塘镇——县东八十里;
26. 韩镇——在南二十六都;
27. 徐庄镇——在上十七都,
昆山县有三市十镇:
28. 半山桥市——县西北跨至和塘;
29. 吴家桥市——县东南二十九里;
30. 陆家浜市——县东南二十四里;
31. 石浦镇——县东南四十里;
32. 千墩镇——县东南四十里;
33. 安亭镇——县东四十五里;
34. 泗桥镇——县东南三十六里;
35. 石浦镇——县东南四十里;
36. 蓬阆镇——县东三十里;
37. 吴家桥镇——在千墩南六里;
38. 杨及泾镇——即杨抢泾,县东南四十六里;

39. 张浦镇——县西南二十余里。

新阳县有一市三镇:

40. 周市——县东北二十里;

41. 丘墟镇——县东南十八里;

42. 真义镇——县西十八里;

43. 巴城镇——县西北十八里。

常熟县有十市三镇:

44. 县市——县治西慧日寺前;

45. 杨尖市——县西南四十五里;

46. 河阳市——县西北四十里;

47. 奚浦市——县北七十里;

48. 西徐家市——河阳山西南沙乡;

49. 唐市——县东南三十里,旧名尤泾;

50. 练塘市——县西南三十五里;

51. 大河市——县西十八里;

52. 田庄市——县西北三十里;

53. 范家市——去县三里,自城东南下白茆港,夹河为市者,西曰范家市,属常熟,东曰陈家市,属昭文;

54. 福山镇——县北四十里;

55. 鹿苑镇——县西北七十里;

56. 庆安镇——县西北八十里,旧名石闼市。

昭文县有二十四市四镇:

57. 老徐市——县东五十里,跨李墓塘,一名李墓市;

58. 董家浜新市——县东四十五里;

59. 苏家尖市——县东二十余里,众水所会,岸有尖形,夹河成市;

60. 李市——去唐市东南六里,傍东山泾,又名山泾市;

61. 陈家市——去县三里;

62. 白茅新市——县东南三十余里;
63. 珍门庙门——在梅里南六里;
64. 沈家市——珍门庙南;
65. 周泾口市——去县五十里,建闸座;
66. 五家市——县北三十里,傍耿泾;
67. 陆家市——在王家市东;
68. 赵市——去县三十里;
69. 彭家市——在赵市北;
70. 项市——在彭家市北;
71. 文村市——梅里镇北五里;
72. 碧溪市——在周泾口北;
73. 西周家市——在碧溪市旁;
74. 小吴家市——在徐六泾东三四里;
75. 老吴家市——在小吴市东南五里,去县七十里,临金浦;
76. 周家市——在老吴市东三里;
77. 横塘市——县东七十里;
78. 归家市——去县七十里,在白茆北;
79. 张家市——在归家市东,亦名双浜市,去县东八十里;
80. 何家市——在支塘东十二里,去县八十里,接太仓花桥界;
81. 梅李镇——县东三十六里;
82. 支塘镇——县东北四十五里,因白茆港支流故名;
83. 许浦镇——县东七十里,临江;
84. 徐六泾镇——康熙间港堡。
吴江县有六市六镇:
85. 县市——北门外同里湾,号江上城;
86. 江南市——东门外一里长桥东;
87. 八斥市——县东南二十五里,运河所经,为南北冲要

之地;

88. 新杭市——县东南九十里,其南接秀水王江泾;

89. 黄溪市——县东南六十里,即旧青草滩,居民多业机杼;

90. 庵村市——县东北二十里,居民多铁工;

91. 盛泽镇——县南六十里,居民蕃阜,以绸绫为业,商贾贩缯远近毕集;

92. 同里镇——县东六十里,有巡检司、把总,为县东藩蔽;

93. 黎里镇——县东南二十里;

94. 平望镇——县东南四十里,为控扼嘉湖之要道,列肆陈货,粮食尤饶,运河东南属吴江,运河西北属震泽,有巡检司、千总;

95. 芦墟镇——县东南五十里,与嘉善、青浦接境,有巡检司、把总。

震泽县有五市二镇:

96. 县市——在城内;

97. 双杨市——县西南六十里;

98. 严墓市——县西南八十里;

99. 檀邱市——县西南五十里;

100. 梅堰市——县西南六十里;

101. 震泽镇——县西南九十里,西去湖州南浔镇十二里,地滨太湖,故名,有巡检司[1]。

原属苏州府的太仓、嘉定,现已析为太仓、镇洋、崇明、嘉定、宝山,其所属市镇当然也应一并记入。

太仓州有五市三镇:

102. 直塘市——州北三十里,临戚浦塘;

---

[1] 以上参看: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五舆地志·关津。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镇市村。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103. 陆河市——州北七十里，邻昭文县；

104. 涂松市——州东北三十五里，傍七浦塘；

105. 渚泾市——州东十里；

106. 甘草市——州东七十里；

107. 双凤镇——州北二十四里，一名双林；

108. 沙头镇——州东北三十六里，一名沙溪，为州第一都会，

109. 璜泾镇——州东北六十里，一名赵市。

镇洋县有一市三镇：

110. 鹤王市——县东北二十里，一名新市，临杨林塘，花市兴盛；

111. 刘河镇——县东六十里，为关东、山东诸海船收口之所，百货丛集，居民稠密，号称极盛；

112. 茜泾镇——县东三十里；

113. 新安镇——太仓州东北三十六里。

崇明县有四镇：

114. 杨家河镇——县东八里；

115. 新镇——县西北三十三里；

116. 平安镇——县西东阜沙；

117. 新开河镇——县东仙景沙。

嘉定县有三市十四镇：

118. 练祁市——县治；

119. 钱门塘市——县西南二十里，出布；

120. 封家浜市——县西南三十里；

121. 南翔镇——县南二十四里，其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

122. 娄塘镇——县北十二里，其地四面方广各二里，出斜纹布；

123. 新泾镇——县东三里，为棉花管履所集；

124. 外冈镇——县西二十二里，其地东西仅一里，为水陆要冲；

125. 广福镇——县东南二十四里，其地东西仅一里；

126. 真如镇——县东南五十里，其地东西一里，南北二里，出棉布；

127. 杨家行镇——县东南五十里，其地东西二里；

128. 徐家行镇——县东北五里，其地南北可一里，出管屦；

129. 安亭镇——县西南二十四里，其地与昆山、青浦接界，出药斑布、棋花布；

130. 黄渡镇——县西南三十六里，与青浦接界，南北可二里；

131. 纪王庙镇——县西南四十里，其地方广可一里，

132. 葛隆镇——县西北二十里，与太仓接界，南北仅一里，又名吴公市；

133. 马陆镇——县南一十二里；

134. 诸翟镇——县西南五十里。

宝山县有五镇：

135. 罗店镇——县西北三十六里，其地东西三里，南北二里，比闾殷富，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136. 月浦镇——县西北十二里，其地东西仅一里；

137. 大场镇——县西南三十六里，其地东西三里，出棉布、麻皮；

138. 江湾镇——县南二十七里，其地东西三里，南北一里，出棉布；

139. 高桥镇——县东南四十里[1]。

---

[1] 以上参看：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六舆地志·关津。民国《太仓州志》卷四营建·市镇。民国《镇洋县志》卷二营建·市镇。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情况清楚地表明，苏州府市镇的发展，明代万历年间是一个高潮，清代乾隆年间又是一个高潮，与正德年间相比，市镇几乎增加了一倍。松江府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清代乾隆时期松江府华亭县有十八镇：

1. 亭林镇——县东南三十六里；
2. 叶谢镇——县东南二十里；
3. 莘庄镇——北邻七宝，南近乌泥泾；
4. 颛桥镇——北半属华亭，南半属上海；
5. 十字庙镇——三十六保；
6. 新桥镇——三十六保；
7. 陈家行镇——三十六保；
8. 朱家行镇——三十六保；
9. 车墩镇——三十七保；
10. 张泽镇——十保；
11. 后冈镇——七保；
12. 寒字圩镇——七保；
13. 张堰镇——自觉海庵至夏家弄止，余属金山，在七保；
14. 山洋镇——九保；
15. 蒋庄镇——十一保；
16. 崇阙镇——十二保；
17. 漕泾镇——十二保；
18. 沙冈镇——县东北四十里。

奉贤县有一市七镇：

19. 东新市——十五保；
20. 南桥镇——县西三十四里；
21. 青村港镇——县西十里，一名青林，舟楫往来如织，百货聚集，市廛兴盛；
22. 陶宅镇——县西北十八里；

23. 庄家行镇——十三保，珺湖泾东南，桥西居民繁稠，布缕充斥；

24. 泰日桥镇——街长亘南北，中贯运盐河，居民隔河相望，亦东北一巨镇；

25. 萧塘镇——十三保，为府治由黄浦取道县治之口；

26. 高桥镇——与县治相近。

娄县有十四镇：

27. 枫泾镇——县西南五十四里，为江浙界首，南半属嘉善县，镇人科举相继，商贩旅集，至今称蕃庶；

28. 六店湾镇——一名角钓湾；

29. 七宝镇——左为横沥，前临蒲汇塘，蒲汇塘贯镇而东，割桥为界，其北隶青浦；

30. 泗泾镇——傍泗泾塘，自改筑北塘桥，祥泽镇衰落，泗泾镇特盛；

31. 祥泽镇——三十八保，俗称塘桥；

32. 张庄镇——四十一保；

33. 北钱镇——石湖塘上南北二钱相望，盖一姓分聚各成聚也；

34. 石湖塘镇——去南钱三里；

35. 五舍镇——亦曰庐沙，以吾彦故居名，镇有五舍；

36. 横山镇——依山成落；

37. 天马镇——为周氏、瞿氏居地；

38. 沈巷镇——接青浦界，其地鱼梁虾市饶水族；

39. 天马山镇——依山成落；

40. 昆山镇——依山成落。

金山县有九市五镇：

41. 韩家坞市——在三保，朱泾西北，与娄县接壤；

42. 杨巷市——在五保，与吕巷、朱泾鳞次鼎分；

43. 兴塔市——在二保，去泖桥十里；

44. 北仓市——在七保，县北门外三里，市有浦东盐场大使署；

45. 西仓市——在六保，县西门外三里，市有横浦盐场大使署；

46. 旧巷市——在七保，县北门外十二里，即旧运河基，故名；

47. 南陆市——在五保，吕巷镇之东南；

48. 姚家廊市——在五保，吕巷镇之南；

49. 二龙庙市——在六保；

50. 朱泾镇——县西三十六里；

51.张堰镇——县南五十里，一名张泾堰；

52. 吕巷镇——县西南三十五里，一名璜溪；

53. 于巷镇——一名干溪，在六保；

54. 松隐镇——旧名郭汇，在七保。

上海县有四市十三镇：

55. 东沟市——县东北二十二里；

56. 高行市——县东北三十里，分南行、中行、北行；

57. 梅源市——在县西北三十六里，俗名王庵；

58. 鹤坡市——在县治南；

59. 龙华镇——县西南十四里，以龙华古刹得名；

60. 颛桥镇——县西南四十四里，西半属华亭；

61. 北桥镇——县西南四十八里；

62. 塘桥镇——在县东南五里；

63. 三林塘镇——县东南十八里；

64. 引翔港镇——县东北二十里；

65. 法华镇——县西十二里，以法华寺名；

66. 诸翟镇——县西四十里，其西属青浦、嘉定，一名紫堤；

67. 吴会镇——县西南五十四里，本名吴汇；

68. 乌泥泾镇——县西南二十五里;

69. 八团镇——县东南五十四里;

70. 闵行镇——县西南六十三里,南枕黄浦,横沥贯之;

71. 高桥镇——县东北三十六里,北半属宝山。

南汇县有一市十二镇:

72. 陈家行市——在十七保;

73. 沈庄镇——县西北四十二里,当五灶港之冲,列咸塘西岸,南北街约半里;

74. 航头镇——县西三十六里,明时有盐仓,名斜角仓,商牙多聚于此,东西街约里许;

75. 横沔镇——县西北四十二里,依横沔港北为虹桥港,四周袤广各里许,市房廛舍栉地,街路盘曲;

76. 北蔡镇——县西北六十里,民居列肆百余家,虹桥在镇中市,其下东西通河为白莲泾;

77. 张江栅镇——县北七十里,一名古桐里,居民廛肆约二百余家;

78. 周浦镇——县西北四十八里,一名杜浦,自顺治己亥科朱锦会试及第,向半者众,科名遂多。街道回复,绵亘四五里。其东西街夹咸塘,南北街夹周浦塘,居民稠密,为通邑巨镇。雍正四年置新县粮仓,漕艘毕集,市肆益盛;

79. 下沙镇——县西北三十六里,东对北三四灶港,西接盐塘。吴氏文学科名仕宦,一时称盛;

80. 新场镇——县西南二十四里,歌楼酒肆,商贾辐辏,乡人有赛苏州之谣,南北街长四五里,东西各二里许;

81. 杜家行镇——县西北六十里,从杜浦迁此后,科第兴盛,多建第宅廛舍,商贾辐辏;

82. 三灶镇——县西北十二里,向呼为周家庙,以先有庙而后成市。市中即北三灶港,港北东西街,港南南北街,约共里许;

83. 北泰日桥镇——又称坦石桥镇，县西北二十四里，跨北四灶港，市廛相接，东西绵亘约二里许，市中贸易较就近各小镇为盛；

84. 六灶镇——县西北二十四里，在六灶港北，自东而西约三里许。

青浦县有十一市二十一镇：

85. 泰来桥市——县南六里，唐行南咸鱼港上，人烟稠密；

86. 杜家角市——在五十保；

87. 古塘桥市——在五十保；

88. 嵩宅市——县东十二里，一名松泽，市廛日辟，商贩交通；

89. 白鹤江市——县北二十里，一名白鹤汇，吴淞江南，南接青龙，东通黄渡，以北三里名蒋浦，一名新市；

90. 九团市——在二十保；

91. 八团市——在十七保；

92. 杜村市——县北十八里；

93. 高行市——在二十二保；

94. 天兴庄市——县南十里；

95. 刘夏市——在三十八保；

96. 唐行镇——即县治，为吴门要冲；

97. 凤凰山镇——县东南二十四里，凤凰山下；

98. 佘山镇——县南十八里；

99. 长山镇——县南二十里，南通广富林，东连佘山；

100. 泗泾镇——县东三十六里，以塘水名；

101. 北七宝镇——县东北五十四里；

102. 曹家路镇——在二十二保；

103. 顾家路镇——在二十二保；

104. 赵屯镇——县西北二十七里，赵屯浦上；

105. 盘龙镇——县东北三十六里，地濒松江盘龙汇；

106. 黄渡镇——县东北三十六里，商贩颇盛；

107. 金家桥镇——县西北十二里,西界昆山、元和两境,为一省通道;

108. 小蒸镇——县西南三十里,一名贞溪;

109. 金泽镇——县西南三十五里,为江浙之交;

110. 朱家角镇——县西十二里,一名珠溪,亦称珠街阁,商贾贸易甲于他镇,文儒辈出,为一邑望

111. 商榻镇——县西三十四里,一名双塔,

112. 重固镇——县东北十八里

113. 簳山镇——县东十八里,簳山西,西至嵩宅,东连顾会浦;

114. 沈港镇——县南十八里;

115. 郏店镇——县东北十五里;

116. 艾祁镇——县东北二十七里[①]。

由于方志的记载常有遗漏、重复,所以上述统计不可能十分精确,但是它反映的清代前期市镇的发展趋势,是毫无疑义的。与明代正德年间四十四个市镇相比,与崇祯年间六十一个市镇相比,松江府市镇的增长率是十分惊人的:清中叶比明中叶增长二倍半,比明末增长近二倍。这种情况,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乡村的都市化趋势。

四、市镇的规镇与结构

一般而言,市的居民大多在一百户至三百户之间,五百户至一千户的为数较少。且以嘉靖时吴江县为例:居民在一百户至三百

① 参看: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五舆地志·关津。乾隆《华亭县志》卷一疆域志·镇市。乾隆《金山县志》卷一疆域·镇市。乾隆《娄县志》卷三疆域·村镇。嘉庆《[illegible]》卷[illegible]·镇市。

户的有盛泽市(一百户)、严墓市(二百余户)、八斥市(三百余户)、双杨市(三百余户);居民在五百户至一千户的有梅堰市(五百余户)、新杭户(一千户);其余两市(庉村市、檀丘市)为数百户①。

再以光绪时常熟、昭文二县为例,居民在一百户至三百户的市有:

谢家桥市——居民百余户,街一道;
金村市——居民百余户,街二道;
西庙桥市——居民二百余户,街二道;
黄家桥市——居民二百余户,街二道;
新庄市——居民百余户,街一道;
阑干桥市——居民百余户,街二道;
西张墅市——居民百余户,街二道;
西徐市——居民百数十户,街三道;
大墅桥市——居民二百余户,街三道;
小墅桥市——居民百余户,街一道;
王庄市——居民二百余户,街二道;
练塘市——居民三百户,街二道;
翁家庄市——居民百许户,街一道;
张家桥市——居民百许户,街二道;
钓渚渡市——居民百余户,街三道;
吴塔市——居民二百余户,街一道;
吕舍市——居民百五十户,街一道;
辛庄市——居民二百余户,街一道;
东始庄市——居民数十户,街一道;
莫城市——居民百三十户,街一道;
任阳市——居民二百户,街二道;

---

①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归家市——居民二百户,街一道;
东张市——居民二百余户;
赵市——居民百许户,街一道;
小吴市——居民百余户,街三道;
东周市——居民百余户,街一道;
碧溪市——居民百许户,街一道;
西周市——居民百余户,街一道;
横塘市——居民百数十户,街一道;
……
居民在三百户以上的市不多,仅以下几处:
西唐市——居民五六百户,市约里许;
李市——居民六七百户,街五六道;
横泾市——居民数百户(人丁一千五百);
白茆新市——居民三百余户,街四道;
老吴市——居民三四百户,街三道;
老徐市——居民四百户,街三道;
何家市——居民三百余户,街二道;
王墅市——居民三百余户,街二道①。

也有一些市居民仅数十户、十余户,大体是一些村市,无法与商业发达的数百户大市相比拟。如归安县,它拥有菱湖镇、双林镇、练市镇、埭溪镇、荻港镇、善连镇等远近闻名的大镇,而十余个市都比较小,除了下昂市是"市廛百数十家","阛阓相望"、"山货贸易"的商业中心之外,其余多为村市:

千金市——市廛数十家;
石冢市——市廛十数家;
钱家潭市——市廛数十家;

①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东林市——市廛十数家；
射林市——市廛十数家；
东泊市——市廛十数家；
湖趺市——市廛数十家；
南商林市——市廛数十家；
重兆市——市廛十数家；
新兴港市——市廛数十家；
竹墩市——市廛十数家；
双开市——市廛十数家；
后塘市——有小市十数家；
思溪市——市廛十数家；
璐村市——东西村市廛数十家；
史舍市——有小市十余家；
含山市——有小市六七家[①]。

有少数市，由于其经济地位十分显要，规模与功能都不亚于一般中等类型的镇。例如苏州府吴县的月城市，“阊门内出城自钓桥西渡僧桥南分为市……各省商贾所集之处”，“又有南北濠、上下塘，为市尤繁盛”[②]。苏州府昆山县的半山桥市，“在县西北隅，民居辐辏，朝夕为市。旧在宝月桥南为市心，又有后市，在后市桥西”[③]。苏州府长洲县的枫桥市，“在城外，离治数里，与阊门相属……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米市”[④]，是长江三角洲最大的粮食交易中心市场，直至清末才由市升为镇。长洲县的山塘市，“在城外，离治四五里，即虎丘山塘，亦

---

① 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志·区域村镇。
②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
③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嘉靖《昆山县志》卷四市镇。
④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一乡镇。

与阊门相联属……储积商贾亚于枫桥，而川广诸货亦骈集焉”[1]。又如太仓州的鹤王市，是长江三角洲著名的棉花交易市场，“近市土厚田肥，为阖邑冠，故其民殷富，其俗谆愿。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泾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矣”；“闽广人贩（棉花）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2]。再如吴江县的新杭市，“离县治东南九十里，居民千家成市，其南接王江泾”，“自明以来居民日盛，自成市井”[3]。吴江县的黄溪市，“去县治东南六十里，明以前以村名，居民止数百家，国朝康熙中至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居民多业机杼”，是著名丝绸产地[4]。

镇的居民明显的多于市，一般在一千户以上，大的镇可达万户左右。以下便是万户大镇：

南浔镇——潘尔夔《浔溪文献》曰：“市廛云屯栉比”，“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都，实江浙之雄镇”。巡抚常安《请通判移驻南浔疏》也指出：“南浔镇与江省接壤，地处湖滨，烟火万家，商贾云集”[5]。

盛泽镇——嘉靖时是“居民百家”的小市，明末清初时成为“居民万有余家”的大镇，乾隆时仍然保持“万家烟火”的盛况，“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6]。

乌青镇——乌镇与青镇东西相望，“升平既久，户口日繁，十里

---

①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② 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上原始，卷下物产。

③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④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

⑤ 咸丰《南浔镇志》卷一疆域。民国《南浔志》卷二公署。

⑥ 康熙《吴江县志》卷一市镇。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乾隆《盛湖志》卷上沿革。

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而两镇之四栅八隅则为江浙二省湖、嘉、苏三府，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七县错壤地，百货骈集[①]。

王江泾镇——明代万历年间，"居民可七千余家"，乾嘉以后，"烟户万家"。清末萧条，居民才三百家，"不及盛时二十分之一"[②]。

双林镇——明末清初三千余户，嘉道以来增至万户，"津梁环亘、里角骈镇"，"国朝自嘉庆至咸丰尤称富庶"[③]。

濮院镇——万历时"人可万余家"；明江汉《濮川月夜清游歌》，"鱼鳞万屋似城市"[④]。

唯亭镇——原先"人皆散处村庄"，自明季至清中叶二百余年，"太平翔洽，聚庐而居，人烟稠密，比屋万家"[⑤]。

硖石镇——明末周宗彝《修备纪略》说："海昌素称大邑，邑中雄镇有四，而硖川为最要"，号称"烟火万户"[⑥]。

法华镇——乾嘉时鼎盛，"桑麻接壤，烟户万家"[⑦]。

新城镇——万历时"居民可万余家"[⑧]。

千户以上万户以下的中型镇为数更多，例如：

黎里镇——弘治时"居民千百家"，嘉靖时"居民二千余家"，清

---

①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五村镇。
②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宣统《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沿革。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八户口。光绪《归安县志》卷六区域村镇。
④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民国《濮院志》卷一疆域。
⑤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⑥ 嘉庆《硖川续志》卷十一艺文。
⑦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⑧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

初"居民更二三倍"，达五千户左右"[1]。

章练塘镇——清初，"居民稠密"，"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2]。

江湾镇——宣统二年调查，全镇5692户；民国五年调查，9721户[3]。

朱泾镇——明顾纯《重建万安桥记》说："郡西三十里有朱泾，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4]。

同里镇——正德、嘉靖间，"居民二千余家"。清初以来，"居民日增，市镇日扩"[5]。

临平镇——明末沈谦说，"临平一镇也，僻在杭郡之东，地不满十里，户不满万人"[6]。

平望镇——明初"居民千百家，自成市井"。清康熙、雍正年间，"居民数千家，比于苏之枫桥，故人呼曰小枫桥"[7]。

周庄镇——清中叶，居民近五千人，"其户口赋役之数足当西北一小县"[8]。

璜泾镇——"镇地南峙飙山，北滨大江，东通沧海，西绕钱泾，唐茜泾横其中，蒋泾、姚荡纵如廿字。镇民烟火数千家，攒集廿字之中"[9]。

震泽镇——正德、嘉靖间"地方三里，居民千家"，清初以来，

---

①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③ 民国《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户口。

④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

⑤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嘉庆《同里志》卷一沿革。

⑥ 顺治《临平记》卷一事记第一。

⑦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道光《平望志》卷一沿革。

⑧ 嘉庆《贞丰拟乘》卷首，喻荣甸序。

⑨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形势。

"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1]。

长安镇——"堰头桥尾约千家"[2]。

市镇的人口构成颇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县城、府城，在十分紧凑的街市范围内，"工贾艺术杂处"[3]。其中有机坊、染坊、练坊、踹坊等作坊主及手工业工匠，有开设花行、布行、丝行、绸行等牙行的牙侩、行霸，有仰食于市镇的脚夫、乐人、市井流氓，有从全国各地到此经商的客商及商帮；有在市街上开设各种店铺的坐贾，有受雇于作坊、牙行的各类专业的雇佣劳动者，有亦工亦农的农业人口，也有聚居于此的士大夫。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很有生气的社区，充分显示其作为手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的功能。例如：濮院镇上"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港，皆务于织"[4]。盛泽镇上"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镇上雇佣劳动者——佣织及曳花——"约数千计"[5]。枫泾镇"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6]。南翔镇上除了牙侩、行商、坐贾之外，"脚夫、乐人聚夥结党，私画地界"，"市井恶少无赖所谓打降、白拉者，处处有之"[7]。黎里镇"上岸多士夫之家，崇尚学术，入夜诵读声不绝"[8]。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市镇作为一个经济中心、文化中心，聚居着大量人口，又开设了各种坊行店铺，其面积虽不大，方圆不过数里，但其市街规模却

---

①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元方回：《过长安市诗》，见《修川小志》卷下物产。

③ 乾隆《盛湖志》卷上疆域。

④ 沈廷瑞：《东畬杂记》。

⑤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⑥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

⑦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

⑧ 嘉庆《黎里志》卷二形胜。

颇为可观，一些特大型的市镇简直可以使县城、府城暗然失色。

处于湖州府乌程县与嘉兴府桐乡县之间的乌青镇，堪称江南巨镇之首，这当然与它是由乌镇、青镇合并而成大有关系。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二里，“巨丽甲他镇，市逵广袤十八里”[①]。这就是说，乌青镇四周达十八里，确实颇有府城架势：明代湖州府城、嘉兴府城四周都只有十二里[②]。无怪乎当时人要说乌青“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③]。由于它“民物繁缛，甲于他镇”，虽无城垣之设，亦有坊门之置，“以郡城规模名之”：

南昌门——青镇之南门，通杭州；

澄江门——乌镇之北门，通苏州；

朝宗门——青镇之东门，通嘉兴；

通霅门——乌镇之西门，通湖州[④]。

镇中街巷纵横交错，乌镇从南门至北门大街沿线共十六巷（其中波斯巷万历三年间辟为大街），青镇从南门至北门大街沿线共十三巷，乌镇西街从安利桥至西门共十三巷，青镇东街共五巷。

湖州府乌程县的南浔镇不亚于此。南浔镇兴起于南宋，元末张士诚修建南浔城墙，周长一千六十六丈五尺，高三丈，宽一丈[⑤]，颇有一点城郭之势。明初拆除南浔城墙，建东西南北四栅，有吊桥，有城隍，仍然是一派城郭之势。自东栅至西栅三里，南栅至北栅七里，周长近二十里[⑥]。镇中运河、南市河、北市河两岸街巷密布，主要干道有大街（即东栅上塘）、寿星街（即西栅上塘）、爆场街（即北市河东岸）、丝行埭（即南市河东岸）、米廊下（俗称米棚）、树

---

① 《乌青文献》卷一疆域。

② 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四建置志。

③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④ 《乌青文献》卷一疆域；卷二门坊。

⑤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七碑刻三，无名氏《南浔重修城记》。

⑥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

行埭(即西栅下塘)、西木行等[1]。

苏州府嘉定县的南翔镇,明代万历年间就号称"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2]。全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周长十余里。街道分布很密,东有走马塘南岸街、北岸街、新街;西有封浜南岸街、北岸街;南有白鹤寺南街、太平桥南街(西岸米巷街、东岸混堂街)、横街、黄花场街;北有横沥西岸街、东岸街、约浦街(明时为大街直达镇北冈身路),全镇与大街相贯通的小弄,共四十一条[3]。

界于嘉兴府嘉兴县、秀水县、桐乡县之间的濮院镇,"四栅以内,东西广三里许,南北亦如之"[4]。元代时已有庙桥街(即大街)、南横街、北横街、义路街四大街道。此外有卧龙街、集庆街、鹤栖街、柳岸街、语儿街、横屋街、蜡作街等。其后又新辟南新街、墩头上(南新街西市房梢)、花坛街、石条街、西河石路等。至清末,全镇共有街二十七条、弄十五条、巷二条,还有鱼行汇、船厂汇等八处,以及南埭、北埭、北廊栅、西廊栅等。濮院镇鼎盛时期规模之大使嘉兴府城、桐乡县城相形见绌。

湖州府归安县的双林镇,东西长四里,南北宽三里。镇中主要街巷有上横街、下横街、新开巷、旧绢巷、老绢巷等,全镇共有街七条、巷十五条、弄四十三条[5]。

苏州府吴江县黎里镇,南北四里、东西三里半。镇中以浜名者十五,以弄名者十三,以汇、扇名者二,以港、街、池名者各一。全镇民居稠密,瓦屋鳞次,沿街有廊[6]。

此外,江湾镇,万历时东西三里、南北一里,入清后扩大为东西

---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四衢巷。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③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街巷。

④ 民国《濮院志》卷一疆域。

⑤ 民国《双林镇志》卷四街市。

⑥ 嘉庆《黎里志》卷二里巷。

长六里、南北广一里[1]；周庄镇，长三里、宽二里[2]；罗店镇，东西三里，南北二里[3]；临平镇，东西三里，南北二里[4]；娄塘镇，四面方广各三里[5]；七店镇，市长约四里[6]；硖石镇，南北四里[7]；璜泾镇，东西二里，南北一里[8]；真如镇，东西二里，南北一里[9]；月浦镇，东西一里，南北二里[10]；方泰镇，东西一里，南北一里[11]；马陆镇，东西不及一里[12]。江南市镇的规模于此可略见一斑。

江南水乡，河道纵横交错，是城乡间交通要道，市镇大多分布于河流两岸，成为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较大型的市镇往往处于两条河流十字相交处，镇中心就是"十字港"，周围有桥梁与街道相连，系阛市所在。十字港四周的市廛，当地人称为"四嘴"，正德《松江府志》所载唐行镇，"有十字港，临港市廛谓之四嘴"。江南水乡大镇，多有十字港及四嘴布局。例如南浔镇，自西而东的运河与自南而北的市河相交，构成十字港，四周有通津桥、清风桥、明月桥相连，运河及南市河、北市河两岸是通衢大街：东栅上塘（俗称大街）、西栅上塘（俗称寿星街）、丝行埭等。民国《南浔志》载："十字港，在中市通津桥西、清风桥南、明月桥北，运河与南北二市河交午相贯处"。董载昌《浔溪竹枝词》吟咏道：

---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民国《江湾里志》卷一建置。
②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界域。
③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④ 《临平记补遗》卷二事纪。
⑤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⑥ 《嘉兴新志》上，第59—60页。
⑦ 《硖川续志》卷一形势。
⑧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形势。
⑨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⑩ 《月浦志》卷一市镇。
⑪ 嘉庆《方泰志》卷一街市。
⑫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建置

市楼灯火映波红，
十字中分处处通，
一水盈盈不得语，
郎家明月妾清风①。

南浔镇除了镇中心有十字港以外，镇南镇北另有十字港，谓之南十字港、北十字港。"南十字港，在南栅便民桥北、东西两交界坝桥之间，城壕西来司前港东出与市河交午相贯处"；"北十字港，在北栅栅椿桥北、连界桥西，西木行西来百间楼港，东出与市河交午相贯处"②。南浔镇可以看作江南市镇中典型的十字港型。

与南浔镇相类似的十字港型市镇有：

濮院镇，东市河、南市河(梅泾)、西市河、北市河相交③；

王江泾镇，市河与运河相交。"市河……东经回龙桥会夹河，折南出射襄桥，一支由太平桥东南流经百岁街，会源、定中、万福、浔阳四桥，东经汛署前贯夹河，左会射襄桥北来之水……东出闻座桥，入于运河"；"运河……至是南流之时居多，宽十七丈深一丈余，稍北二十八丈，左为闻店桥，受王江泾市河之水"④；

璜泾镇，镇中心有两个十字港，构成廿字形："唐茜泾横其中，蒋泾、姚荡纵如廿字。镇民烟火数千家，攒集廿字之中"⑤；

南翔镇，横沥、上槎浦、走马塘、封家浜十字相交于镇。横沥，"贯市之南北"，南接上槎浦，西有封家浜，东有走马塘。十字港北首有跨横沥南口的太平桥；南有跨上槎浦的泰康桥(旧名感梦桥)；东有跨走马塘口的吉利桥；西有跨封家浜东口的隆兴桥，使全镇大

---

① 民国《南浔志》卷四河渠。
② 民国《南浔志》卷四河渠。
③《濮川所闻记》卷一水道。
④ 宣统《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水道。
⑤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乡域志·形势。

街与十字港连成一体①；

梅李镇，“街如十字，分为四条，东西通官路，南北通冈身，中贯以河，东西为梅李塘、浒浦，南北为盐铁塘”。梅李塘自常熟宾阳门外合城濠东流，南分青墩浦，北合耿泾塘，……至梅李镇，经盐铁塘至浒浦口。浒浦北抵扬子江，东抵海。盐铁塘西接江阴而连松江，分支白茆而入海。“浒浦流通，江海之沙船远集；盐铁塘浚，沪渎之洋货纷来”②。

稍异于十字港型的是丁字港型，即两条河流丁字相交于镇中，有桥梁把夹河两岸的街道沟通。例如塘栖镇，运河与市河丁字相交，运河北岸的水北大街、南岸的河南诸街以及市河两岸东市街、西市街有桥梁相连，镇南有小十字港，南首有南市街(俗称南横头)③。王店镇也是如此，镇中长水与市河丁字相交，市河绵亘三里，系闹市所在。横跨市河的桥梁十一座，横跨长水的桥梁十一座，称横十一竖十一，沟通全镇街道④。

另一类市镇是一河二街型，即一条河流横穿镇中，两旁是市街店肆。例如黄渡镇，临吴淞江上，江水把镇分成两半，南岸为老街，北岸为新街。里人徐峡芳记：“吴淞江袤三百里，跨江成市者惟黄渡镇，镇为嘉(定)、青(浦)接壤，商贩最盛”⑤。又如硖石镇，市河南分硖石湖之水，入市北注入长水，穿越镇市，系南北舟航孔道，两旁为街道店肆，横贯全镇南北四里⑥。

江南市镇大多有四栅：东栅、南栅、西栅、北栅，方志中说某镇东西若干里、南北若干里，就是指从东栅至西栅若干里，从南栅至

---

①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水道。

② 黄鉴人：《新续梅李小志》。黄宗城：《梅李补志》。黄冈：《梅李文献三志稿》。

③ 光绪《唐栖志》卷一图说；卷四街巷。

④ 光绪《梅里志》卷一山水；卷四桥梁。

⑤ 万历《青浦县志》卷三镇市。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

⑥ 嘉庆《硖川续志》卷一形势；卷一山川。

北栅若干里,也就是各该市镇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直辖范围,手工业作坊、商业行庄店肆大多密布于这一范围之内,故又习惯地称为市街或街市。不过,这仅仅是市镇这个地理实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事实上各市镇都辖有大批村庄,俗称四乡(东乡、西乡、南乡、北乡)或乡脚。这一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市镇向外输出的手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大多数出四乡农家提供,在市镇集中后,再经牙行、客商之手散往各地市场。因此可以说,没有四乡的支撑,市镇经济断然难以为继。从这个意义上看,四乡村庄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市镇的四乡往往大致方圆数十里,比市镇本身方圆数里的范围,大得不可比拟。如塘栖镇的四至疆界:"栖镇四乡,东西相距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十五里","本镇四至:东界语溪,北抵德清,西至奉口,限于大溪,南向仁和,有乔司、临平、小林连壤相错"[1]。市镇所辖村庄往往多达几十个,例如同里镇,"属范隅下乡,领都三:二十四都、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四都辖二十四村,二十五都辖九村,二十六都辖二十村,共辖五十三村[2]。又如朱泾镇,全镇共辖村三十个:

镇西:塘西;

镇西南:张家浜;

镇南:市前浜、王家浜、尤家阁;

镇西北:下圩、锈针浜;沈家浜、徐家浜、高家村、河沿村;

镇东:周家埭、三家村、潦浜、南腰浜、北腰浜、黄草塘;

镇东北:赵坟、新浜、东瑶潭、西瑶潭、和尚淀、竖头港;

镇东南:二塘浜、许家库、上圩村、徐家浜、南旁湾、北旁湾、王

---

① 光绪《唐栖志》卷一图说。

② 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乡都。

油坟[1]。

《重修常昭合志》的编者，在记述各市镇的概况时，不仅涉及方位、四至、人口，还涉及各市镇的附属村庄，比较全面地显示了市镇的各个侧面。不妨略举数例于下：

西唐市——"邻江阴界，市约里许。西半属江阴。街中有石牌，居民五六百户……附近小村庄有：西庄、胡卢段、范家巷、底坝、颜家巷、卢巷、倪家巷、钱家巷、西洋巷、后房巷、南园、北园、华巷、汤家桥、看庄、新市、高田上、徐家宅基、顾舍角"[2]。一个五六百户居民、市街仅一里的小市，居然也辖有十九个村。

西徐市——"在让塘之西，明侍郎徐恪累代聚族于此，故名。距城三十六里，街三道，居民百数十户（多徐钱二姓）……附近小村庄有，徐巷（居民三十余户）、曹庄、孙塘沿、谢巷（居民皆二十余户）、乌舍（居民三十余户）、下庄（居民四十余户）、钮巷、徐塘头（居民皆二十余户）、卢巷、冯巷（居民皆四十余户）、六市里（居民十余户）、高庄、周家水渠（居民皆五六十户）、倪家宅（居民皆奉教堂，建于嘉庆年）、西谢、西张家巷、俞家村、广步尖、东张家巷（居民皆四五十户）、天字号小庄、东庄、河阳山、前英舍、大树巷（居民皆三四十户）、石塘（居民二百余户）、后巷里、史家桥、徐岸、巫马坝、陆家巷、西庄、滚塘岸（居民皆三四十户）、八房巷（徐侍郎行八，此其旧居都宪坊在焉）、小墅、严塘庄（居民皆数十户以上）[3]。很明显，西徐市的范围较之西唐市更大，居民仅百数十户的小市，所辖村庄多至三十四个，由此可知市的四乡并不亚于镇的四乡。

---

1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村庄。
2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3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五、市镇网络及其功能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星罗棋市的市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互相联系，相互依存，形成市镇网络体系，在沟通各地理层次——村、乡、市、镇、县、府间的商品交流中，显示出单个市镇所无法体现的独特功能。这种市镇网络因水陆交通线的具体状况的差别而有所差别，但大体上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寻的。

市镇间的密度，因地而异：

相距六里的，如盛泽镇至王江泾镇；

相距九里的，如南浔镇至震泽镇，璜泾镇至时思庵镇；

相距二十里的，如黄渡镇至南翔镇，罗店镇至刘行镇，安亭镇至黄渡镇，黄渡镇至方泰镇；

相距十八里的，如周庄镇至陈墓镇，黄渡镇至马陆镇，乌青镇至皂林镇，南翔镇至广福镇，璜泾镇至沙头镇，琏市镇至乌青镇，罗店镇至月浦镇；

相距二十里的，如王店镇至濮院镇，硖石镇至王店镇，金泽镇至周庄镇，周庄镇至芦墟镇，双林镇至琏市镇；

相距二十四里的，如南翔镇至大场镇、方泰镇至南翔镇，罗店镇至杨行镇；

相距二十六里的，如朱家角至周庄镇，角直镇至周庄镇，乌青镇至南浔镇，南浔镇至双林镇，双林镇至乌青镇，菱湖镇至双林镇；

如此等等。

大体而言，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以间距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较常见的模式。这并非人为的，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市镇的土壤在于四乡，也就是所谓“乡脚”。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主要交通工具是木制手摇小船，农家把商品运入市镇出售，大抵总

是选择相距较近的某一市镇，而这一市镇一般说来与其四乡又有着传统的经济联系，形成一个小小的市场圈。农家上市镇，往返时间不可能过长，要赶得上早市或午市，并来得及返回本村。这种状况直至交通发达的民国时代仍然如此："各大镇如南浔、旧馆、织生、菱湖、袁家汇、双林、乌镇，各有定班航船，直通附近各村。船系木制，一二人摇橹，可坐十余人。每日开一二班不等。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中午由镇返乡"①。因而两镇的间距十二里、十八里、二十四里、三十六里，对于四乡农家来说，到邻近市镇的距离大致在六里、九里至十二里、十八里之间。这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市镇密度，过分密，必然会由于商业不振而趋于衰落；过分疏，则无法适应商品集散的需要，必然会兴起新的市镇来填充补缺。

苏州府吴江县市镇的发展进程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明代弘治年间吴江县仅三市四镇，弘治《吴江县志》载：

县市——"在吴淞江上，西滨太湖，去郡城盘门四十五里，号江上……旧经云：城无十里之方，市无千家之聚。今民生富庶，城内外接栋而居者，烟火万井"②；

江南市——"出城东门过长桥为江南市，居民又千百家，使舟官舰之往来，贡赋财物之接递，朝暮不绝"③；

新杭市——"县治东南九十里，居民千家成市"；

平望镇——"在二十四都，莺脰湖之滨，去县治东南四十里，有巡司、水驿，冲要之所也。……居民千百家，自成市井"④；

黎里镇——"在二十三都，去县治东南二十里，居民千百家，舟楫辐辏，货物腾涌，喧盛不减城市，盖一邑之巨镇也"⑤；

---

①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1938年)。

②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③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④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⑤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同里镇——"在二十六都，旧名富土，后以其名太侈，析富字之田加土之上，为今名。去县治东一十六里，环以四栅。有巡司、税局……居民千百家，贸易尤盛，亦一方之巨镇也"[1]；

震泽镇——"在十都，太湖之滨，去县治西南九十里……有巡司、寺观，居民亦千百家，自成市井"[2]。

到数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吴江县市镇猛增，由先前的三市四镇发展为十市四镇，新增的七市为：

八斥市——"离县治东南二十里，当南北要冲，居民三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3]；

双杨市——"离县治西南五十里，居民三百余家"[4]；

严墓市——"离县治西南八十里，居民二百余家，近年货物颇盛"[5]；

檀丘市——"离县治西南五十里，居民数百家，以工为业，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6]；

梅堰市——"离县治西南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自成市井"[7]；

盛泽市——"离县治西南六十里，居民百家"[8]；

庵村市——"离县治东二十里，居民数百家"[9]。

到清朝初年，吴江县已拥有十市七镇，新增了一市三镇，它们

---

①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②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③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④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⑤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⑥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⑦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⑧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⑨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是黄溪市、盛泽镇(由市升镇)、芦墟镇、章练塘镇[1]。

由此可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吴江县市镇的增加速度与数量都是十分惊人的。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弘治时代三市四镇之间逐渐涌现了大批新兴市镇(七市三镇),增大了吴江县市镇网络的密度。吴江是个小县,总领有范隅上、范隅下、澄源上、澄源下、震泽、久咏等六乡之地,共二十九都,然而却有十七个市镇,平均每乡有三个市镇,密度是很高的。因为这个关系,尽管康雍乾盛世吴江县经济仍有巨大的进展,但市镇不再继续增加。雍正四年割吴江县之半置震泽县,到乾隆年间吴江县与震泽县所具有的市镇仍未超过康熙年间的规模。据乾隆《苏州府志》及乾隆《吴江县志》载,吴江县有六市六镇:县市、江南市、八斥市、新杭市、黄家溪市、庵村市、盛泽镇、同里镇、黎里镇、平望镇、芦墟镇、章练塘镇;震泽县有四市一镇:双杨市、严墓市、檀邱市、梅堰市、震泽镇,两县合计共十市七镇[2],与康熙《吴江县志》所载毫无二致。由于吴江县西靠太湖,市镇大多集中在东、东南、西南三方,尤以东南方市镇密度为最大:

东南十余里同里镇;

东南二十四里八斥市;

东南四十五里黎里镇;

东南四十七里平望镇;

东南五十里芦墟镇;

东南六十里黄溪市、盛泽镇;

东南七十五里新杭市。

其次为西南方:

西南五十里檀丘市;

---

[1]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乡域。

[2]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西南六十五里梅堰市；

西南八十里严墓市；

西南九十里震泽镇。

上述市镇的间距少则数里，多亦不过十余里，这种市镇分布密度基本上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市镇分布的较大密度。

这种情况可以在苏州府嘉定县找到印证。正德年间嘉定县有五市七镇：娄塘桥市、钱门塘市、广福市、瓦浦市、真如市、罗店镇、南翔镇、安亭镇、黄渡镇、大场镇、江湾镇、清浦镇[①]。到万历年间增为九市十七镇：练祁市、钱门塘市、封家浜市、殷家行、陆家行、刘家行、吴家行、蒋家行、赵家行、南翔镇、娄塘镇、新泾镇、罗店镇、月浦镇、外冈镇、广福镇、大场镇、真如镇、杨家行镇、江湾镇、清浦镇、徐家行镇、安亭镇、黄渡镇、纪王镇、葛隆镇[②]。雍正三年嘉定县改隶太仓州，析东境置宝山县，其后市镇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嘉定县有六市二十镇：封家浜市、陆渡桥市、朱家桥市、镇门塘市、望仙桥市、吴家行、南翔镇、纪王庙镇、江桥镇、栅桥镇、诸翟镇、马陆镇、石冈门镇、戬浜桥镇、娄塘镇、唐家行镇、外冈镇、葛隆镇、方泰镇、安亭镇、黄渡镇、陆家行镇、新泾镇、徐家行镇、罗店镇、广福镇[③]。宝山县有一市十一镇：盛家桥市、月浦镇、罗店镇、杨行镇、刘行镇、广福镇、大场镇、真如镇、江湾镇、胡巷镇、高桥镇、彭浦镇[④]。两县相加共有七市三十一镇。由此可见万历时的九市十七镇虽然较正德时的五市七镇有大幅度增加，但市镇分布密度并未饱和，因此以后才有可能猛增至七市三十一镇。如此众多的市镇分布于五乡二十七都[⑤]之地，其密度是可想而知的。不妨略举数

①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③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建置。

④ 光绪《宝山县志》卷一镇市。

⑤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建置。

例以见一斑。

以黄渡镇为中心，东至南翔镇十八里，东南至纪王庙镇十二里，北至安亭镇十二里，北至方泰镇十二里，东北至马陆镇十八里。[1]。

以南翔镇为中心，西至黄渡镇十八里，北至马陆镇十二里，东南至大场镇二十四里，东北至广福镇十八里，西南至纪王庙镇十二里，西北至方泰镇二十里[2]。

以方泰镇为中心，东至石冈门镇十六里，东南至马陆镇十八里，南至南翔镇二十四里，西南至黄渡镇十二里，西至安亭镇十二里，北至外冈镇十二里[3]。

以外冈镇为中心，西南至安亭镇十五里，南至方泰镇十里，南至黄渡镇十五里，东南至南翔镇三十六里，北至葛隆镇六里，东北至娄塘镇二十里[4]。

以马陆镇为中心，东至广福镇十二里，西至方泰镇十二里，南至南翔镇十二里[5]。

以罗店镇为中心，东至月浦镇十八里，南至刘行镇十二里，东南至杨行镇二十四里，西南至广福镇七里[6]。

以真如镇为中心，东至彭浦镇十二里，西至栅桥镇十二里，东北至大场镇十二里，西北至南翔镇二十四里[7]。

上述吴江县与嘉定县的市镇密度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点，只要看看经济发展水平稍逊一筹的归安县的情况，便可一目了

---

①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疆域·里至。
②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里至。
③ 嘉庆《方泰志》卷一街市。
④ 崇祯《外冈志》卷一里域。
⑤ 嘉庆《马陆里志》卷一疆域志·里至。
⑥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里至。
⑦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里至。

然。清末时归安县有十九市六镇，集中分布于县城南面，而以东南面为最多。

东南三十里有东泊市、新兴港市、长起市、思溪市；

东南四十里有重兆市；

东南四十五里有双开市；

东南五十四里有石冢市；

东南六十里有善连镇、千金市、南商林市、后塘市、双林镇；

东南八十里有含山市；

东南九十里有练市镇。

南面其次：

南十八里有潞村市；

南二十六里有湖跌市；

南三十里有荻港镇；

南四十里有菱湖镇；

南四十五里有史含市；

南六十里有钱家潭市。

再次是西南面：

西南三十里有竹墩市；

西南三十五里有下昂市；

西南四十里有射林市；

西南六十里有东林市、埭溪镇[1]。

再如常熟县，在明代正德年间市镇还不太多，仅九市四镇：县市、杨尖市、河阳市、奚浦市、徐家市、唐市、李市、支塘市、练塘市、福山镇、许浦镇、梅李镇、庆安镇[2]。由于其地域较大，随着经济发展，市镇持续大幅度增加，常熟县也一分为二，析置了昭文县。到

---

[1] 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域·村镇》。

[2]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乾隆年间，常熟县有十市三镇：县市、杨尖市、河阳市、奚浦市、西徐家市、唐市、练塘市、大河市、田庄市、范家市、福山镇、鹿苑镇、庆安镇；昭文县有二十市四镇：老徐市、董家浜新市、苏家尖市、李市、陈家市、白茅新市、珍门庙市、周泾口市、王家市、赵市、文林市、碧溪市、西周家市、小吴家市、老吴家市、周家市、横塘市、归家市、张家市、何家市、梅李镇、支塘镇、许浦镇、徐六泾镇[1]。两县合计共三十市七镇。到光绪年间，常熟、昭文市镇增至七十九个，其中镇二十个、市五十九个[2]。平均每县有近四十个市镇，这在江南各县中也是不多见的。

如此密布的市镇网络在各县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县城中的经济中心区称为县市，这种县市的经济地位往往比县城外围的市镇大为逊色，也就是说市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超过了县城，——这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普遍情况。以经济发达的吴江县为例，吴江县的县市自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以来就颇为繁荣，居民二千余家，坊巷井然，栋宇鳞次，"百货具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事者往来无虚日"[3]。可以说得上是一派兴旺景象了，但与该县的盛泽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盛泽镇虽然嘉靖年间才称为市，明末清初才成为引人注目的镇，但很快就一跃为吴江县的绫绸交易中心，"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4]。其他各镇如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震泽镇等虽较盛泽镇稍次，但都比县市发达。黎里镇"百货并集，无异城市"；平望镇"百货贸易如小邑"，"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

---

①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

②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稿》卷五市镇志。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④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同里镇"民物丰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具"，"室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可方州郡"；震泽镇"货物并聚"[1]。甚至黄溪市这个明代仍是村落清初才成市的二千余家之地，其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县市可望其项背[2]。吴江县如果离开了它周边的市镇网络，几乎没有发达的经济可言。当地是著名的丝绸产地，吴绫久负盛名，吴江县境内所产绫绸并不以县市为集散中心，而是以盛泽镇为集散中心，"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焉"[3]。这是市镇网络经济功能的显著体现。

市镇网络使各市镇连成一体，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呈现一种经济一体化的态势。例如盛泽镇，由于丝绸业发达，本地所产蚕丝不能满足织绸所需，镇上丝行大多向邻近市镇采购，"东则嘉湾、平湖，西则新市、洲钱、石门、桐乡，南则王店、濮院、新篁、沈荡，北则溧阳、木渎，由丝行趸买分售机户"[4]。

乌青镇以盛产辑里丝闻名，小满新丝上市，"各处大都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贩子"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5]。乌青镇向无经行，"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于上海洋庄，为出口货，名辑里经"[6]。乌青镇还是一个桑叶的集散地，"叶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三眠后买叶者以舟往，谓之开叶船，买卖皆曰稍"；南浔镇商人"蚕时往乌镇

---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乾隆《震泽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参看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

④ 沈云：《盛湖杂录》。

⑤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

⑥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做叶"，用以射利，谓之作叶，又曰顿叶[1]。

南浔镇是湖丝集散地，"湖丝甲天下"，"缫丝莫精于南浔人"，"每当新丝生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另一方面，南浔蚕茧不足，又向别处收购蚕茧，南浔镇"多有往嘉兴一带买茧，归缫丝售之者"，亦有嘉兴各市镇"载茧来鬻者"[2]。

以出产纺车、锭子著名的金泽镇，以其精湛的工艺吸引各市镇的机户前来购买，"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故金泽锭子谢家车，方百里间习成谚语"[3]。

以出产水车著名的章练塘镇，"形式不一，制作灵便，迥非他处所及……环练塘数十村庄，车船约三百多艘。其营业发达，西至常州以西，东至浦东间"[4]。

周庄镇与硖石镇之间相距甚远，然而在发达的市镇网络中仍可互通有无。周庄镇农妇"以木棉花去其核，弹作絮，卷为棉条而纺之，复束成绞，以易于市，遂捆载至浙江硖石镇以售"[5]，以供硖石镇织布之需。因硖石仅产香粳稻、羊眼豆、梅、茭、茶等，不产棉花，但农家多以织布为业，故需大量购入周庄棉纱[6]。

朱泾镇、枫泾镇、吕巷市、杨巷市所构成的棉纺织业小型市镇网络颇有典型意义。朱泾镇是明清两代闻名全国的棉布集散地，所产标布尤为精良，镇中标行林立，估客云集，"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7]。朱泾镇与西面的枫泾镇、东南面的吕巷市、杨巷市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棉纺织业中心。

---

1 民国《南浔镇志》卷三十一农桑二。
2 民国《南浔镇志》卷三十一农桑二；卷三十二物产。
3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土产。
4 民国《章练小志》卷三风俗。
5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6 嘉庆《硖川续志》卷五物产。
7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杨巷市与吕巷(市)、朱泾(镇)鳞次鼎分"[1]。为棉纺织业配套的纱锭、纺车也由本地出产，号称"朱泾锭子吕巷车"，朱泾镇尤家铁锭，吕巷市的纺车，驰名苏松嘉一带[2]。朱泾镇与枫泾镇经营棉布贸易的布号大多融为一体，"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3]。布号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染坊、踹坊，加工棉布。

钱门塘市不大，由于明代有大批徽商在此收购棉布，嘉定外冈一带市镇所产棉布自然而然地向钱门塘市集中。"丁娘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之，遂俱称钱门塘市"[4]。"外冈布因徽商僦居钱鸣塘(即钱门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5]。

从上述典型剖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市镇网络在促进地区分工协作、商品流通集散、把长江三角洲农业、手工业纳入全国市场诸方面，都有着乡村，县城或单个市镇所不可能体现的经济功能。

六、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

市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提高的产物。

长江三角洲在宋代是著名的粮食高产区，当时民间谚语说："苏湖熟，天下足"[6]，高度概括此地作为全国粮仓的重要地位。

明代以来，却发生了新变化，由"湖广熟，天下足"取代了"苏湖熟，天下足"。这一方面反映了湖广地区农业生产的突飞猛进，另

---

1 乾隆《金山县志》卷一疆域·镇市。

2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土产

3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4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土产。

5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

6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十杂志。

一方面也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新变化。长江三角洲农家经营方式不断受商品经济影响,改变了传统的耕作结构,把以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改变为以经济作物为主体的结构。这一地区最具商品价值的经济作物是蚕桑和棉花,因而这一地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蚕桑区与棉作区。

江南蚕桑经营由来已久,但长期保持在以稻作为中心、兼种麦、豆、油菜、麻、桑的水平上,农家的蚕桑经营仅仅是一种居于次要地位的副业。南宋时陈旉《农书》所反映的农业生产结构仍是如此。不过,这种结构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正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陈旉《农书》记载了蚕桑之乡湖州已视蚕桑为重要经济来源,农家"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可以获茧一百二十斤,收丝一百五十六两,可织小绢三十一匹。以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的市场价格框算,养蚕十箔的收入相当于四十三石四斗米。以每亩产谷五石计,折合米三石,需十四亩四分七厘优质稻田才可获得相当于养蚕十箔的收益。因此,陈旉十分深刻地指出:"中小之家,只此一件,自可了纳赋税,充足布帛也"[1]。

到明中叶,此种情况更加明显。嘉靖时人徐献忠说:湖州一带农家,"田中所入与蚕桑各具半年之资"[2]。明末清初桐乡人张履祥则比较精确地估算出蚕桑经营比稻作经营收益要高许多倍。他说:"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地得(桑)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3]。这就是说,同样一亩地用于栽桑养蚕比用于种稻麦,其收益要高四五倍乃至十几倍。因此蚕桑区的耕地出现了十分之七栽桑、十分之三种粮的

1 陈旉:《农书》卷下种桑之法篇。

2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风土、卷十三物产。

3 张履祥:《杨园先生文集》卷五十《补农书》。

比率。

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下，作为丝绸业生产中心与交易中心的市镇大量兴起、发展。

丝业市镇可以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震泽镇为代表。

南浔镇——湖丝号称"遍天下"，而以南浔镇为重要输出中心。南浔镇四乡农家缫丝技术精湛，故有"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的说法[1]。湖州一府之中，蚕丝业"尤以南浔为甲"[2]。南浔镇西南乡辑里(七里)村所产辑里(七里)丝闻名遐迩。新丝上市时，镇上客商络绎不绝，"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乡农卖丝争赴市"，"骈肩累迹不得前"。牙行(丝行)收丝后，转售给各地客商，分工对口，有京庄(行)、广庄(行)、乡庄(行)、经庄(行)、划庄(行)之分。五口通商后，洋商聚集上海，湖丝销售洋庄(行)，南浔镇仍是重要的集散地和转口贸易中心，"一日贸易数万金"[3]。

乌青镇——乌镇与青镇分属湖州、嘉兴二府，但仅一河之隔，明清时代统称乌青镇。以西乡所出之丝为佳，号称辑里(七里)丝，北乡次之。新丝上市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生意十分繁忙。"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或由贩子"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4]。

菱湖镇——新丝上市时，"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之内，农家摇船至镇，出售新丝，"乡人贸丝船排比而泊"。丝行则临河收丝，形成热闹的水市。万历《湖州府志》说："丝……属县俱有，惟出于菱湖洛舍者第一"；《菱湖镇志》说："菱湖多出蚕丝，贸易者倍他处"。

---

[1] 民国《南浔镇志》卷三十二物产。

[2]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

[3]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民国《南浔镇志》卷三十一农桑。

[4]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

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或转售于客商，"镇人大半衣食于此"[1]。

震泽镇——蚕丝是震泽镇的主要物产，四乡农家生产的经丝、绸丝，集中于镇，通过牙行、客商运销各地。丝业贸易的盛况可与邻近的南浔镇相比拟。当地所出"苏经"最负盛名，此种经丝主要供应苏州机户织缎，故名"苏经"。镇上专做经丝生意的经行甚多[2]。

绸业市镇可以濮院镇、盛泽镇、双林镇、王江泾镇为代表。

濮院镇——元明间即以盛产濮绸闻名远近，万历年间，制作工艺更趋精湛，濮绸名声大噪，"自后织作尤盛"。清初，濮院镇已号称"日出万绸"。镇上绸行(亦称绸庄)收购四乡农家或镇上机户所产丝绸，交付练坊练熟，然后转售给前来采购的各地客商。绸行招接的客商，来自闽、广、西湖及北方各地，其中尤以京帮商人为最多，故镇上绸行也以京行实力最强，京行之货远销琉球、蒙古、关东等地[3]。

盛泽镇——早在盛泽还未成市之时，即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四乡农家已精于机丝绫绸之业，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农家都以绫绸为业。由盛泽市到盛泽镇，绸业贸易日趋繁荣，明末时已盛况空前："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4]。盛泽镇的经济至清代而达于鼎盛，镇上受雇佣从事丝织业的机工、曳花儿多达几千人。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丝绸业市镇的经济结构："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倘或商客稀少，机户

[1] 天启《吴兴备志》卷二十九琐征。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物产。

[2]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物产。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

[3] 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沈廷瑞:《东畲杂记》。

[4] 《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利薄，则怨咨者多矣"[1]。

双林镇——近镇四乡以织绢为业，所产包头绢质地精良，远销各地。明代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所织的绫罗、花纱、绉纱、斗绸，为湖州丝绸之精品。"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由万历至乾隆，久盛不衰。镇上大宗出产，首推包头绢，由"本镇及近村乡人为之"，"通行天下"[2]。

王江泾镇——四乡农家及镇上居民，"多织绸收丝缟之利"。万历至乾隆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嘉道间，"绸业极盛之时，有'日出万绸'之谚"。五口通商后，"洋商及镇江等处客帮来泾购买"，绸业仍很兴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3]。

明初松江府各地已普遍种植棉花，"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耕地"种棉二年，翻稻一年"[4]。苏州府的嘉定、太仓、昆山、常熟一带，也是著名的棉作区。由于棉花的经济收益明显地高于粮食，农家很自然地趋向于"多种木棉"及"专业纺织"。据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阅世编》记载的价格数据，可以将两者作一比较。且选择物价较平稳的康熙三十九年为标准年代，该年新米每石价银八钱至九钱，棉花每担（百斤）价银三两至四两间[5]。松江地区近海沙土，用于种稻能亩收米二石，用于栽棉能亩收棉花八十斤。八十斤棉花价银二两四钱至三两二钱，二石米价银一两六钱至一两八钱，两者相差几近一倍。在市场价格因素的刺激下，农家逐步把稻作为主改为棉作为主，例如：

---

1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2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3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市镇。《闻川志稿》卷二农桑。

4 褚华：《木棉谱》。

5 《阅世编》卷七食货一、食货四。

罗店镇四乡，"土产稻三棉七，农民生计惟赖木棉"[1]；

安亭镇四乡，"土田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2]；

七宝镇四乡，"大熟所种，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3]；

南翔镇四乡，"沙土高仰，粒米不产，仰食外郡"、"仅种木棉一色"[4]。

农业经济的新变化，促成了经营棉花加工的棉纺织业的发达，正如嘉靖时松江人徐献忠在《布赋序》中所说："邑人以布缕为业"、"乡村纺织尤尚精敏"[5]。棉布业市镇以此为背景迅速兴盛、繁荣起来。

棉业市镇可以新泾镇、鹤王市、七宝镇为代表。

新泾镇——嘉定县新泾镇，向为"棉花管屦所集"，四乡农家"春作悉以栽(棉)花为本业"、"(棉)花才入筐，即为远贩所贩"[6]。

鹤王市——太仓州鹤王市是长江三角洲著名的棉花交易市场，"每岁木棉有秋，市肆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泾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声誉卓著，"每秋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7]。

七宝镇——位于华亭、青浦二县间的七宝镇也是棉花集散地，四乡"所种者皆白色，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8]。

棉布业市镇可以南翔镇、罗店镇、朱家角镇、朱泾镇、枫泾镇为

---

1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
2 嘉庆《安亭志》卷三风俗。
3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风俗。
4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
5 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卷五风俗。
6 万历《嘉定县志》卷二风俗；康熙《嘉定县志》卷一市镇、卷四物产。
7 《增修鹤王市志略》卷上原始、卷下物产。
8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物产。

代表。

南翔镇——盛产刷线布，又名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镇上布商字号多由徽商经营，贩运至江淮、临清间[1]。

罗店镇——四乡盛产棉花，且精于纺织，"种田之暇惟以纱布为事"，所织之布有套布、泗泾布、紫花布、斜纹布、棋花布等。镇上布商云集，尤多徽商，贩买棉布运销各地[2]。

朱家角镇——明代万历年间已"商贾凑集，贸易花布"。所产标布盛行各地，"京省标客往来不绝"。康熙以后，标布为本色布、青蓝布所取代[3]。

朱泾镇——明清两代松江府数一数二的重要棉布集散中心，经营标布贸易的商人在此开设了数以百计的标行(布号)，故时人谓："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4]。

枫泾镇——明中叶以来，商贾骈集，所产大布、小布成为争购商品。镇中多布局，局中雇染匠、砑匠，加工棉布[5]。

仅次于丝绸业和棉布业市镇的是粮食业市镇，可以枫桥市、平望镇、长安镇、同里镇、黎里镇为代表。

此外还有：

交通业市镇，如澉浦镇、乍浦镇、浒墅镇、刘河镇、商榻镇、八斥市、梅李镇、胡庵镇等。

盐业市镇，如新场镇、下沙镇、航头镇、一团镇、北仓市、西仓市、新仓镇、芦沥镇、鲍郎镇等。

---

[1]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物产。

[2]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物产、风俗。

[3]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珠里小志》卷五里巷、卷四物产。

[4] 嘉庆《朱泾志》卷一因革、物产。

[5] 《枫泾小志》卷一食货、卷十拾遗。

渔业市镇，如青村镇、沈港镇、清浦镇、福山镇、思溪市等。

编织业市镇，如黄埭镇、唯亭镇、周庄镇、唐市镇、茜泾镇等。

竹木山货业市镇，如唐行镇、埭溪镇、陈庄镇、簰头镇、长乐市等。

窑业市镇，如千家窑镇、二都市、陆墓镇、瓶窑镇等。

冶铸业市镇，如炉头镇（长兴）、虎村市、檀丘市、炉头镇（桐乡）等。

刺绣业市镇，如光福镇等。

菸叶业市镇，如屠甸镇等。

制笔业市镇，如善琏镇等。

制车业市镇，如章练塘镇等。

榨油业市镇，如石门镇等。

市镇专业化分布的多样性，不仅体现了各市镇的地理与经济特色，而且显示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地区性特色行业的蓬勃兴起，对市镇经济结构的巨大刺激作用。从宏观视角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市镇网络中有专业分工如此众多的市镇群落，其经济作用是极其显著的，一方面有力地推动本地区经济向高水平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市镇及其四乡自身获取了持续的经济活力。

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看似无规律性，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纵观长江三角洲，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既是多样化的也是整体化的。即使从一个县的范围来看，市镇也是多样化与整体化的统一体，它的分布并非清一色的、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相互补充的。

以吴江县为例，盛泽镇、黄溪市都以绫绸为业，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1]；

---

[1]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

震泽镇则是蚕丝集散地，"居民以蚕桑为业"，"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1]，镇中经丝、绸丝源源不断向外输出；平望镇、同里镇则是以粮食经营为支柱的，前者"以米业为大宗"、"里中多贩米为业"[2]；后者的米市"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3]；黎里镇以粮食业、棉纺织业为主[4]；章练塘镇以棉纺织业与制车业为主[5]；庉村市以冶铸业为主，镇上"铁工过半"[6]。

以桐乡县为例，乌青镇经营的蚕丝业、桑叶业远近闻名，所产辑里丝成为"各处大郡商投行收买"的紧俏商品，又是桐乡、石门桑叶的转销市场[7]；濮院镇是著名的濮绸产地，号称"日出万绸"，"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居民藉此为利"[8]；石门镇以榨油为业，镇中"油坊可二十家"[9]；炉头镇"居民以铸为业"[10]；屠甸镇"菸市极盛"[11]；陈庄镇"居民以竹器为业"[12]。

以长洲县为例，枫桥市是江南著名米市，清初"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贩卖所集，有豆市、米市"[13]；浒市(后为浒墅镇)，明景泰间置钞关，系商品流通重要关津[14]；唯亭镇

---

[1]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
[2]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3] 嘉庆《同里志》卷八物产。
[4]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
[5] 民国《章练小志》卷二物产、卷三风俗。
[6]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7]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8]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物产。
[9] 康熙《石门县志》卷七纪文。
[10]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11]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12] 光绪《桐乡县志》卷六物产。
[13]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市镇。
[14]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以编织毛毯、芦席、蒲包为业[1]；周庄镇以生产棉布、竹器、关衫为业[2]；甫里镇(亦名六直镇)，"四栅之民，工商佃农之外，大都业织席"、"业蒲屦"、"业织棉布"、"业织夏布"[3]；黄埭镇"大率以种稻为业，妇女勤工作，或织席、织屦，或绩麻、绩纻"；[4] 陆墓镇"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5]。

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表明，作为基层商业市场的市镇，在商品集散功能方面是具有共同性的。但是，它们又各有自己的特色行业作为经济支柱，显示了市镇这种新兴的经济实体的优势，当它们连成一体结成网络之后，这种优势就更加突出了。市镇之所以能成为百货骈聚、商贾辐辏的繁华富庶的地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

1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2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3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风俗。

4 民国《黄埭志》卷二风俗。

5 乾隆《长洲县志》卷二市镇。

第三章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与结构

一. 农家的棉作经营及其商品经济化

据《吠陀经》的记载，棉花最早种植于印度。宋代以降，棉花始由印度次大陆通过两个方面移植于中国：陆路由中亚细亚移植于陕西一带；由海路移植于广东、福建一带。清乾隆年间松江府上海人褚华是一位棉花及棉纺织专家，著有一本《木棉谱》，其中提及棉花的传入问题，他很赞同明代经济学家邱浚的意见：“汉唐之世，木棉虽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间传其种，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闽广海舶通商，关陕接壤西域故也”[1]。

宋代文献中关于棉花的记载已零星可见，例如：

宋仁宗时四川筠州高安人彭乘在《续墨客挥犀》中写道：“闽岭以南多木棉，土人竞植之。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2]。

宋哲宗时浙江婺州人方勺在《泊宅编》中写道：“闽广多种木棉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开露白棉茸然。土人摘取，去壳，以铁杖杆尽黑子，徐以小弓弹，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3]。

宋孝宗时任广南西路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写

---

1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2 见《说郛》卷二十四所辑彭乘《续墨客挥犀》。

3 方勺：《泊宅编》卷三(《读画斋丛书》第二十六册)。

道："吉贝木，如低小桑枝，萼类芙蓉花之心，叶皆细，茸絮长半寸许，宛如柳絮，有黑子数十"；"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丝纻。雷、化、廉州有织正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疏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有绝细而轻软洁白，服之且耐久者"[1]。

宋末元初浙江天台人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梁纪高祖武皇帝大同十一年条所作的注中写道："木绵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之晦下子种之，既生，须一月三薅其四旁……至秋生黄花结实，及熟时其皮四裂，其中绽出如绵。土人以铁铤碾去其核，取如绵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丝，令其匀细，卷为小筒，就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不劳纫缉织以为布。自闽广来者，尤为丽密"[2]。

宋末元初是棉花移植中国的重要时期，元代司农司编纂的《农桑辑要》说："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遂即已试之，效令所在种之"[3]。其后王祯《农书》也记载了此事，指出："(木棉)其种本南海诸国所产，后福建诸县皆有，近江东、陕右亦多种"；"夫木棉者产自南海，诸种艺制作之法，駸駸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此，服被渐广，名曰吉贝，又曰棉布"[4]。可见从元初以来的几十年间，棉花在迅速推广，江东、江淮、陕右、川蜀均已大量种植，棉布作为商品的流传也渐次扩大。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以都提举司监之"[5]。反映

---

① 周去非：《岭外代答》(《知不足斋丛书》第十七集)。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九梁纪大同十一年条胡注。

③ 《农桑辑要》卷二论苎麻木棉。

④ 王祯：《农书》谷谱十、农器图谱十七。

⑤ 《元史》卷十五世祖本纪。

了当时棉花种植的普遍化。

明初洪武元年(1368年)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1]。以行政手段督促各地种植棉花。其后还规定可用棉布、棉花折纳税粮,"棉布一匹折(米)一石","棉花一斤折米二斗"[2],以相当优惠的折算比例鼓励农家种植棉花与纺纱织布。

由于政府的督促奖励,以及棉作的收益大于稻作麦作,因此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已达到"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3]的普及状态。正如李时珍所说:"此种宋末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矣,不蚕而棉,不麻而布,利被天下,其益大哉"[4]。

宋末元初,松江乌泥泾一带,"得木棉种于闽广,差宜土性"[5]。元元贞年间(1295—1296年)黄道婆从崖州(广东海南岛)回到乌泥泾,"以广中治木棉之法,教当地轧弹纺织。久之,三百里内外悉习其事"[6],人人皆大获其利"[7]。元末松江人陶宗仪对黄道婆所传授的棉纺织技术评价很高:"做造杆、弹、纺、织之具","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8]。松江地区"初无踏车椎弓之制",黄道婆发展了杆、弹、纺、织之具,从王祯《农书》的记载大体可以知道:

杆即轧花搅车(即踏车),"用四木作框,上立二小柱,高约尺

1 《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赋役。

2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五,洪武三十年冬十月癸未。

3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治国平天下之要。

4 《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六卷木棉。

5 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五(《安吴四种》卷二十九),《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文》。

6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

7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黄道婆。

8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黄道婆。

五，上以方木管之，立柱各通一轴，轴端俱作掉拐，轴末柱窍不透"，使用时，"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二轴相轧，则子落于内，棉出于外"；

弹即椎弓，"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棉英，如弹毡毛法"；

纺即纺车，"其制比苎麻纺车颇小"，"轮动弦转，莩繀随之，纺人左手握其棉筒，不过二三，绩于莩繀，牵引渐长，右手均繀，俱成紧缕，就绕繀上"；

织即织机，沿用织麻布的投梭布机，有杠（经线轴）、杼、卷布轴。有平纹织机，也有提花织机[1]。

随着棉纺织业的兴旺，作为加工棉、纱的器械也在不断改进，最显著的莫如搅车了。王祯《农书》所记载的搅车是二人使用的，到了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已改为一人使用，当时的松江搅车以一人当三人，而句容搅车以一人当四人，太仓搅车以二人当八人，有了很大的改进[2]。

明代前期，松江冈身以东地带已普遍种植棉花。洪武三年朱元璋在批复户部关于"请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的奏疏时说："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3]。可见其时松江作为植棉产布之地已颇有名气了。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棉花种植愈加普及，"沿海高乡皆种之"[4]。棉花种植在这里的发展，与地理条件关系至为密切。一方面由于近海易淹，远海无法灌溉，种稻不易；另一方面冈身以东沙壤土粗而松、地势高仰，宜于种棉。故从松江至苏州府属嘉定、太仓一带，都是"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明初上海

---

1 王祯：《农书》卷二十一。

2 《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3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六，洪武三年九月辛卯。

4 正德《松江府志》卷五土产。

人顾彧《竹枝词》写道：

平川多种木棉花，
织布人家罢绢麻，
昨日官租科正急，
街头多卖木棉纱[1]。

明中叶以来，棉花种植逐渐由冈身以东向冈身以西推移。冈身两边农家植棉之多已十分引人注目。昆山一带“多种木棉，土人专业纺织”；嘉定一带“专种木棉”，种稻土地仅及棉豆土地的十分之一[2]。从松江府的华亭县、上海县、青浦县，到苏州府的嘉定县、太仓县、昆山县，常熟县，以及嘉兴府嘉善县、平湖县、海盐县，都是著名的棉作区和棉纺织区。正德《姑苏志》说：“木棉布诸县皆有之，而嘉定、常熟为盛”[3]。海盐县“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4]。平湖县“枲多于桑，布浮于帛”[5]。嘉善县的魏塘镇、枫泾镇更是著名的棉纱、棉布产地[6]。

在这些地区的农家经营中，棉作逐渐压倒稻作，棉花种植以及与此相关的纺纱、织布的经济收入日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全赖此”[7]，就是指的纺纱、织布。嘉靖时代松江人徐献忠在《布赋序》中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以万计，以织助耕”[8]。这种“以织助耕”，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

---

[1] 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
[2] 崇祯《松江府志》卷十田赋。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
[3]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4]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之四县风土记。
[5] 康熙《平湖县志》卷四风俗志·习俗。
[6] 康熙《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7] 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嘉靖《常熟县志》卷三物产志。
[8] 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卷五风俗。

范畴的男耕女织，它已经被商品经济所渗透。

农家所种棉花就是作为商品抛入市场的。棉花集市遍布于各地。每当秋季棉花上市之时，牙行商人收购棉农出售的棉花，转销于外来客商，棉花集市贸易十分兴隆。嘉定县新泾镇向为"棉花管履所集"[1]，附近农家"春作悉以栽（棉）花为本业"，"（棉）花才入筐，即为远贩所购"，"民之公私赖焉"[2]。这一带的农家以棉作为本业，公私开支（即官赋私债）都仰赖于棉花出售后的收益。太仓的鹤王市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棉花交易市场，"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泾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3]。此地农家亦以栽棉为主业，所产棉花色泽、纤维均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声誉卓著，"每秋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4]，一季的成交额即达白银几十万两，可见当地棉花的商品量是十分巨大的。界于华亭、青浦二县间的七宝镇四乡也是棉花集散地，四乡农家所种棉花，"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5]。

很明显，苏松等地农家经营已卷入了商品经济的旋涡之中。棉花这种农产品，农家或作为自产商品出售，或从市镇购入作为纺纱原料，都与市场发生紧密的关系，更不必说商贾的大批贩运了。棉花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其价格随各种因素的作用而波动，起伏幅度很大。叶梦珠《阅世编》所记载松江府上海县的棉花价格资料，就具体地表明了这点。叶梦珠说：

"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绩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粳稻等。秋收之后，予幼闻木棉百斤一担，值银一两六、七钱。崇祯初，渐至

---

1 万历《嘉定县志》卷二风俗、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2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3 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上原始。

4 乾隆《镇洋县志》卷一物产，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下物产。

5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物产。

四、五两。甲申以后，因南北间阻，布商不行，棉花百斤一担不过值钱二千文，准银五、六钱而已。顺治三、四年后，布渐行，花亦渐长。六年己丑，花价每百斤值银三两五、六钱。七年九月，花价五两百斤。八年三月，九两一担。是时，三四年间递有升降，相去亦不甚悬绝。至十四年丁酉，每担价止二两五钱。十六年闰三月，长至四两五钱。十八年辛丑冬，价至二两。康熙元年正月，增至三两。七月以后，犹二两百斤也。九月秋，价止一两七、八钱，长至二两五钱。十月，花价三两有奇。十月终，每担价银四两。十年辛亥十一月，花价每担值钱三千三百，准银亦不下三两。十三年，上上花每担不过一两九钱。十六年丁巳夏，长至二两六、七钱，上者直至三两，积年陈花为之一空，富商之获利者甚众。十八年己未秋成，棉花百斤价银止一两五、六钱。次年夏，长至三两。二十年辛酉夏，价银之两五、六钱。二十一年夏五月，上白者每百斤价银四两一钱。二十三年秋成，上白好花每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1]

上述棉花价格的变动趋势可以由下表显示出来：

1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四。

年　代	棉花价格 [两(银)/担(棉)]	年　代	棉花价格 [两(银)/担(棉)]
1621—27	1.6—1.7	1670	3.0—4.0
1628—35	4.0—5.0	1671	3.0
1644—45	0.5—0.6	1674	1.9
1649	3.4—3.5	1677	2.6—3.0
1650	5.0	1679	1.5—1.6
1657	2.5	1680	3.0
1659	4.5	1681	3.5—3.6
1661	2.0	1682	4.1
1662	3.0—2.0	1684	1.3—1.4

（资料来源：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四）

棉作区的农家普遍从事纺纱、织布的家庭手工业。这种家庭手工业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范畴的家庭副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商品生产，而且又是农家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

常见的一种经营方式是，农家"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1]，金山卫一带如此，嘉善县及松江府各县莫不如此。农家不但把自己生产的棉花纺成纱出售，而且还从市场上买回棉花加工，当时人这样描述这种商品生产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2]。产棉花甚少的海盐县也有此种经营方式：

"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之市，易木棉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

1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一风俗

2 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风俗；康熙《青浦县志》卷一风俗。

织者日成布一匹。燃脂夜作，男妇或通宵不寐，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1]

农家不仅纺纱且又织布，是另一种常见的经营方式。农家男妇通宵达旦，每日可织成一匹。嘉靖时松江人徐献忠在《布赋序》中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以万计”[2]。号称“衣被天下”的松江府各种棉布，诸如精线绫、三梭布、尤墩布、卫稀布、飞花布等，大多是农家织机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农家的商品化手工业为全国市场提供了名噪一时的棉布精品。

宣德间巡抚侍郎周忱奏以布折税，匹准二石，以便耕者。此种布两端织红纱为标识，谓之“红纱官布”。后折数益减，布亦纰薄。其后有“三纱布”，又称三梭布，幅宽三尺余，质地细密。成化间乡人有以饷贵近者，流闻禁廷，下府司织造赭黄、大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等纹，工作胥吏并缘为奸，一匹有费至银百两者，弘治初罢绝。又有云布，成化间湘阴宋端知华亭县，以云布一端献其师华容黎付郎。所谓云布，据《云间郡志》说，以丝作经而纬以棉纱，旧志谓之“丝布”，俗称云布。《云间据目钞》说，云布松人久不用，近年有精美如花绒者，价与绫等。以后渐至滥恶，改为抹绒布，杂用蚕丝纬之，其花纹各种如织锦花，素者更雅淡。又有捺布，促线为之，犹苏机之捺绸。紫花布以紫花纺纱织成，不加染工。大红布以花子红作染，鲜明倍于绫罗。丁娘子布又称飞花布，纱极细而精轻，光洁如银，幅阔二尺。小布，幅密而狭，又称为扣布。稀布，幅阔纱粗，质地疏松。兼丝布，以白苎或黄草兼丝织成，制作暑服尤佳。药斑布，以皮纸积褙如板，以布幅广狭为度，簇花样于其上，将染以板复布，用豆面等调和为糊，刷之候干，入靛缸染成色，晒干

[1]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之四县风土记。

[2] 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后，药斑纹灿烂夺目，俗称浇花布。品种名色多样，大抵"各村镇自立名色"[1]。从规格大小而言，又有所谓放阔布、新改布、标寸布之类[2]。据叶梦珠说，"标布，出于王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最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3]；"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入清后标布"俱改为中机，故松人谓之新改布"；"更有最狭短者，曰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十六尺，单行于江西之饶州等处，每匹在前值银止六、七分"[4]。

乾隆时上海县诸生褚华（字秋萼，号文洲），"生平留意经济、名物、海隅轶事"[5]，对于松江上海一带农家棉业经营有详尽的记述。从中可看到此种经营的全过程。

植棉——"邑产棉花自海峤来，初于邑之乌泥泾种之，今遍地皆是。农家赖其利，与稻麦等。……今棉花有白有紫，自濒海所种转贩至邑中者曰沙花，邑产曰杜花"。"凡高昂田可棉可稻者，种棉二年，翻稻一年，即草根溃烂，土气肥厚，虫螟不生"[6]；

卖花——秋收后，行户收购棉花，"晨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于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贸易焉。少者以篮盛之，多者以蒲包，一包如盘，两包如合"。"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摩袂相接焉。至被褥衣裤所用棉絮，皆取黄晦不中经纬者，土人捣羊肠如弦弹

1 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

2 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

3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4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5 褚华：《沪城备考》卷末叙（《上海掌故丛书》）。

6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之,价不甚贵"[1];

轧花——"搅车今谓之轧车,以木为之,形如三足几,坐则高与胸齐,上有两耳,卓立空耳之中,置木轴一径三寸,有柄在车之左,以右手运其机,向外复置铁轴一径半寸,有轮在车之右,以左足运其机,向内皆用木楔笼紧,中留尺许地取花,塞两轴之隙,而手足胥用,则子自落,无子之花自外出"[2];

纺纱——"今纺者将就经纬时始从木铤上翻纺于芦管,以去其粗断不匀之缕,从无所谓续于莩罗者。或者无木铤之制,故纱有纺成经纬者,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善纺者能四罗,三罗为常,两罗为下";"手车有两耳,迭立矮木床上……以一手摇轮,一手曳棉条而成一缕,小儿女用以消夜伴织而已。若郡城有纺铁铤者,纱极紧细,而价亦甚贵"[3];

浆纱——"成纴后次乃用浆,浆必细白好面调。……此种最贵,名刷纱。次则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布经团,燥者多团,湿者多霉黦。又有以棉纱作绞入浆水不复刷,而成纴名浆纱最下";"吾邑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4];

织布——"凡布密而狭短者为小布,松江谓之扣布;疏而阔长者为稀布,产邑中;极细者为飞花布,即丁娘子布,产邑之三林塘;文侧理者为斜文,文方胜者为整文,文棱起者为高丽,皆邑产,他处亦间有之"[5];

染布——"染工有蓝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红坊,染大红、露桃红;漂坊,染黄糙为白;杂色坊,染黄、绿、黑、紫、古铜、水墨、血牙、驼绒、虾青、佛面金等。其以灰粉渗胶矾涂作花样,随意染侧

---

1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2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3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4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5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色，而后刮去灰粉，则白章烘然，名刮印花。或以木版刻作花卉、人物、禽兽，以布蒙板而砑之，用五色刷其砑处，华采如绘，名刷印花"[1]；

踹布——"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板，为承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下，压大石为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2]；

卖布——乡人卖布于牙行，牙行转售于布商。褚华的六世祖即开设牙行，招徕布商。"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至国初犹然。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米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然都人或有自搜罗至他处觅售者，谓之水客，或有零星购得而转售与他人者，谓之袱头小经纪"[3]。

道光年间人张春华对此也有较具体的记载。他指出，农家种棉花，"一亩之入有百斤为满担，倍者为双担，双担是年之极丰者，不恒有"；农家种棉外又纺纱织布，"机声朗逐漏声过"。"机式大象与绸缎机同，而布机较省便，布幅亦较狭。织布者皆女工，日可得布一匹，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功，得布两匹者，然亦仅见。织之时，以紫色拈经纱之边为捏口，谓织数有眼目也。交竹梗处为页，每六页为匹"；布肆常遣人下乡收售布匹："贫家往往待织妇举火，布成漏或四下矣，其夫若子负之出，虽霜雪不敢惮也。村行苦寂，必有侣伴。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为出庄"；外地客商则坐庄收购："布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亦不过廿三尺。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

---

1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2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3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宝尖名目，龙华、七宝皆吾邑镇名，……其行远者，为标布，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1]。

苏州府的嘉定、常熟、太仓、昆山一带情况大体相似。所产药斑布、棋花布、斜纹布、缣丝布等，以嘉定、常熟为盛，“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2]，所以有“苏布名重四方”之誉。嘉定县钱门塘一带乡村，所产丁娘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为之，遂俱称钱门塘布”，外冈也因此而兴盛，万历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3]。嘉定县诸翟一带，“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按：指布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4]。

苏松地区发达的棉纺织业与各地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市镇上牙侩所开设的花行、布行成为乡农与客商的中介，“四乡木棉布悉来贸易于此”，“商贾辏集，贸易花布”[5]。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就这样卷入了市场经济之中。这种经营方式的商品化程度较高，收益也较纯农业经营要高得多，农家“衣食全赖此”，“邑之民业，首藉棉布”，“躬耕之家，织布以易银，易银以输赋”[6]。

松江一带，一般而言，每亩耕地用于种棉，可收棉花一担（百斤），这可以当地人张春华的记载为据：“木棉……一亩之入有百斤者为满担，倍者为双担”[7]。而一亩耕地用于种稻，大约可收米二

---

(1)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
(2)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3)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卷一沿革。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土产。
(4)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风俗。
(5) 万历《青浦县志》卷一市镇。乾隆《奉贤县志》卷二市镇。
(6)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康熙《嘉定县志》卷四风俗。
(7)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

石左右，这可以当地人何良俊的记载为据："西乡……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东乡田高岸陡……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1]。根据上海县人叶梦珠记载的物价资料，可以将两者的经济收益加以比较：

以康熙中物价较平稳的年份为准，米价为每石银八钱，棉花价为每担银三两，二石米值银一两六钱，一担棉花值银三两，两者相差几近一倍。

农家如自己织布，收益就更可观了。康熙中一匹标布值银二钱，农家妇女每日可织布一匹，以"棉三斤织布一匹"[2]，扣除工本银九分(以百斤棉值银三两计)，净余银一钱一分。这就意味着：一个妇女劳动力以半月的时间织就十五匹布，其收益可以相当于一亩稻田一熟的收益；清初一般农村短工，"日给工食银五分"[3]，农家妇女一日织布所得竟高于短工工价的一倍。

这无疑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新现象，也是这一地区棉作压倒稻作、家庭手工业压倒纯农业经营的根本原因。

因为这个缘故，湖州府、嘉兴府一带蚕桑区，虽然不产棉或少产棉，但农家多热中于棉纺织业。通常的经营方式是，农家从市场上买回棉花加工成布匹出售，这种来料加工性质的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更高。万历时代湖州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对湖、嘉一带农家从牙行商人处买棉花，纺纱织布后再出售给牙行商人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

---

1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四史十。

2 陆世仪：《陆桴亭文集》卷六、《青浦魏令君德化记》。

3 康熙《常熟县志》卷一，粲天颜：《请除水利疏》。

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田家收获输官偿债外，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

这种农家经营，显然已不再是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而带有商品加工性质：原料从市场购得，产品又回到市场，农家对商人及商业资本的依赖性很大。

湖州南浔镇四乡的情况最为典型。当地农家以经营蚕桑为生，兼营棉纺织业，"椎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之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亦作，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蚩蚩续来不已"。市镇上的行商成为棉农与蚕农的中介，苏松等地棉农在棉花收获后，捆载至镇出售于行商，行商在镇上设店囤棉。四乡农家织成布匹后，前来与行商交易，行商"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行商又把棉布转手出售给南浔以西百余里山地村民[1]。此外，嘉兴府海盐县也有类似情况，"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2]。

常州府无锡县的情况颇相类似，据乾隆时无锡人黄印（宗尧咨）说，"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3]。他详细地描述了无锡农家的这种经营方式："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有雨

---

1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引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

2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四方域篇·县风土记。

3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

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农家所织的布有三等，以三丈为匹者称为"长头"，以二丈为匹者称为"短头"，以二丈四尺为匹者称为"放长"。前两种（即长头、短头），农家"皆以换花"，即卖给商人后换回棉花；后一种（即放长），农家"以易米及钱"。这些布匹，由市镇上的坐贾收购后，转售给行商，由行商"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由于"机杼声遍村落"，棉布产量极大，市镇上"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无怪乎徽州商人说："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无锡为布码头"，"言虽鄙俗，常不妄也"。无锡县下属怀仁乡、宅仁乡、胶山乡、上福乡等地，农家"不分男女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故此数乡出布最夥，亦最佳"。市镇上坐贾开设花布行，收布换花，"不数年即可致富"，"盖邑布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成于邑人之手而行于四方者，棉布最广，次则席，次则砖瓦"[1]。

长江三角洲的棉布业市镇，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蓬勃发展起来的。

二.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

江南棉纺织业是一个学者们久已深入研究的课题，硕果累累。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1963），赵冈的《中国棉业史》（台北，1977），全汉升的《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台北，1958），西嶋定生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中国初期棉业史研究》（东京，1970）等，堪称这一领域中博大精深之作。然而学者们较少从江南市镇这一视角去考察江南棉纺织业发展的各个侧面。长江三角洲大量存在的棉纺织专业市镇，是这一经济区域棉

[1]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

纺织业在全国遥遥领先的重要基地。从市镇的角度去考察棉纺织业，进而考察江南农业、手工业、商业各经济部门的新发展、新变化、新趋势，将有助于研究工作别开生面。

宋元之际棉花在长江三角洲逐渐种植、推广，到明代已形成相当的优势，由于这一冲积平原特别是冈身以东地带的沙壤适宜于种植棉花，导致棉作压倒稻作的农作物配置结构，松江府全境及苏州府一部分(如嘉定、常熟、太仓、昆山一带)、嘉兴府的一部分(如嘉善、平湖、海盐一带)，成为全国瞩目的棉花产区。此地从事棉纺织业的历史并不长，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讲求工艺技巧，纺纱织布精益求精，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产各色棉布成为全国各地争相购买的紧俏商品。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一大批棉布交易中心市镇。

棉布业市镇在长江三角洲市镇网络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沟通棉纺织个体生产者、手工业作坊、棉布行庄与各地客商、各地市场联系的重要渠道及商品交易中心，也是远近闻名的棉布生产中心。

这种状况在明代中叶就十分引人注目地显示了出来，稍稍翻检苏松一带的地方志，便可获得深刻的印象。

正德《松江府志》："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线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1]

"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这八个字，极简练生动地概括了松江棉布业市镇及其所提供的棉布，在全国市场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松江棉布工艺精良，品种繁多，有三梭布、云布、标布、官布、飞花布、丁娘子布、织花绒布、尤墩布、紫花布等[2]。

正德《姑苏志》："木棉布，诸县皆有之，而嘉定、常熟为盛"，所

---

1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2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

产有药斑布、苎布、绋丝布、棋花布、斜纹布、麻布、黄草布等[1]。嘉定县所产棉布在苏州一府中可谓首屈一指，如紫花布、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诸暨布、蓝靛布、胜花纹布之类，都是质地精致的名品，吸引各地商人前来贸贩，号称"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2]。

之所以能形成"衣被天下"的局面，除了苏松棉布品质特别优良之外，还仰赖于商品经济高水平发展、水陆四通八达的市镇网络，如果没有市镇网络商贸辐辏、商品大量集散的功能，那么苏松棉布也就无法进入各地市场。在这种流通过程中，棉布业市镇的商品流通机制起着重要的作用。

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群落中，影响最大、数量最多是棉布业市镇、丝绸业市镇；而苏松一带棉布业市镇占有更大的优势。

松江府有朱泾镇（原属华亭县，后划归金山县），枫泾镇（原属华亭县，后划归娄县，与嘉兴府嘉善县合辖）、莘庄镇（华亭县）、七宝镇（原属华亭县，后划归娄县，与青浦县合辖）、乌泥泾镇（上海县）、龙华镇（上海县）、法华镇（上海县）、三林塘镇（上海县）、塘桥镇（上海县）、诸翟镇（上海县）、朱家角镇（青浦县）、金泽镇（青浦县）、盘龙镇、黄渡镇（青浦县与嘉定县合辖）、庄家行镇（奉贤县）、金家行镇（南汇县）、周浦镇（南汇县）。

苏州府有南翔镇（嘉定县）、娄塘镇（嘉定县）、新泾镇（嘉定县）、罗店镇（原属嘉定县，后划归宝山县）、月浦镇（原属嘉定县，后划归宝山县）、外冈镇（嘉定县）、真如镇（嘉定县），江湾镇（原属嘉定县，后划归宝山县）、安亭镇（嘉定县与昆山县合辖）、纪王庙镇（嘉定县）、葛隆镇（嘉定县）、马陆镇（嘉定县）、大场镇（原属嘉定县，后改归宝山县）、章练塘镇（原属吴江县，后划归青浦县）、周庄

---

1 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

2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镇(原属长洲县,后划归元和县)、璜泾镇(原属常熟县,后划归太仓州)、鹤王市(原属昆山县,后划归太仓州)。

这些市镇可以统称为棉布业市镇,但由于各自的地理、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与经营方式。比较有名的一些市镇,大多以经营棉布交易而著称,成为棉布集散中心;也有一些市镇偏重于经营棉花交易,成为棉花集散中心;有些市镇兼营棉纱交易,或兼营棉布加工业(染坊、踹坊之类)。以下分门别类予以介绍。

以经营棉花交易为专业的市镇,首推新泾镇及鹤王市。

新泾镇——在嘉定县治东三里,因水而名,"为棉花管屦所集,顷年更盛"[1]。每当棉花上市的季节,镇上牙行纷纷忙于收购四乡农家出售的棉花,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 "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棉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羽为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抢攘之间甚至亡失货物。"[2]

鹤王市——在太仓州治东北二十四里,东滨大江,西达州城,南控浏河,北抵沙溪,为水陆交通要道。原属昆山县,弘治十年割归太仓州。其地属沙壤,适于生长棉花,所产棉花"比之他乡,柔韧而加白,每朵有朱砂斑一点。离市十数里即无"[3]。因此鹤王市棉花成为优质棉花的代名词,各地商人都闻名前来贩买。"闽广人贩归其乡者,市题必曰太仓鹤王市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4]。鹤王市上经营棉花生意的牙行称为净花行,开设净花行的牙侩因生意兴隆而发财起家的不可计数[5]。鹤王市地近浏河出海口,"支干诸河俱通利,大舸小艑往来不绝,以故

---

1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2 万历《嘉定县志》卷三风俗。

3 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下物产。

4 乾隆《镇洋县志》卷一物产。

5 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俗。

数十里之货群萃于市中"[1]，成为远近数十里所产优质棉花集散中心。其生意是十分兴隆的：

"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泾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矣。"[2]

等而下之，七宝镇、月浦镇、真如镇、外冈镇也是棉花交易重要市场。七宝镇，原属华亭县，万历元年析置青浦县后，其北划归青浦，其南仍归华亭(顺治十三年析置娄县后，划归娄县)。七宝镇四乡盛产棉花，有早棉、晚棉、"以供纺织，且资远贩"[3]。月浦镇，在嘉定县治东三十六里，以水名，后划归宝山县。其地所产棉花有紫花、白花两种，是大宗外销商品，陈钧《月溪棹歌》曰："千家村里人喧闹，八月棉花满客航"[4]，就是棉花交易的一个写照。真如镇，在嘉定县治东南五十里，以寺名，后划归宝山县。四乡系棉作区，所产棉花量多质优，"色有洁白，种有早晚，以供纺织，且资远贩"[5]。外冈镇，在嘉定县治西十二里，地处冈身，盛产棉花，每当棉花上市时，"牙侩持灯而往，悬于荒郊要路，乘晦交易"[6]。

嘉道间人杨光辅《淞南乐府》描述棉花交易情况曰：

"天未明，棉花上市，花行各以竹竿挑灯招之，曰收花灯。"

又曰：

"淞南好，耕织不辞劳。刷布经车沿架走，收花灯竹插檐高，辛苦利如毛。"[7]

乾隆时人褚华《木棉谱》述及上海一带棉花交易时也指出：

---

1 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下物产。

2 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上原始。

3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物产。

4 光绪《月浦志》卷九风俗志·物产。

5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物产。

6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风俗。

7 杨光辅：《淞南乐府》(《上海掌故丛书》)。

“邑产者另有行户，晨挂一秤于门，俟买卖者交集户外，乃为之别其美恶而交易焉。少者以篮盛之，多者以蒲包，一包如盘，两包如合。”[1]

这里所说的花行、行户，就是经营棉花交易的牙行，农家必须将棉花售与牙行，牙行再将棉花大量转售给外地客商，贸易额是相当惊人的：

“闽粤人于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按：当地人称棉花为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2]

巨额的棉花贸易使苏松一带棉花产地日趋富饶，正如太仓人吴伟业所说：“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3]。

棉布交易中心市镇较之棉花交易中心市镇更胜一筹。苏松一带经济繁荣、规模宏大、商贾云集的市镇，大多以经销各式棉布为专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法华镇、真如镇、月浦镇、盘龙镇、南翔镇、罗店镇、安亭镇、外冈镇、娄塘镇、钱门塘市、周庄镇等。

朱泾镇——原属华亭县，顺治十三年析置娄县后，改归娄县，雍正二年析置金山县后，又改归金山县，乾隆二十五年成为金山县治。朱泾四乡盛产棉花，又精于纺织，所产标布质地精细，优于远近闻名的尤墩布。清人赵慎徽有诗描绘朱泾棉布业的兴旺：

万家烟火似都城，
元室曾经置大盈，
估客往来多满载，
至今人号小临清。

---

[1]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2]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3] 《梅村家藏稿》卷十，《木棉吟序》。

其自注云："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1]。所谓标行，即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所谓估客，即各地前来贩布的客商，他们挟带巨额资金，来此购买棉布。正如清初叶梦珠所描述的那样："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2]。由于朱泾镇生意兴隆，市面繁荣，可以与江北运河沿线的著名商业城市临清相比美，故号称"小临清"。"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3]。数百家布号大多是外地布商在此地开设的营业所，它们兼办染坊、踹坊，加工棉布，营业额与盈利都相当可观。朱泾镇因而成为一个富庶的经济中心，"商舶鳞集，群倡杂处其间"[4]。

枫泾镇——界于松江、嘉兴两府之间，北半属华亭县(后改归娄县)，南半属嘉善县。四乡农家多植棉且精于纺织，镇上收购棉布的布号鳞次栉比，数以百计。所产棉布有大布、小布两种，"用一尺筘者为小布，用二尺筘者为大布，小布以二丈二尺为匹，大布则以四丈为匹"[5]。农家收获棉花后，先碾核以车纺纱，或出售给镇上纱庄，或自织棉布，藉以为业[6]。镇上纱庄、布号生意隆盛，沈蓉城《枫泾竹枝词》写道：

> 贸易隆盛百货全，
> 包家桥口集人烟，
> 男携白布来中市，

---

[1]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因革。

[2]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3]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

[4] 康熙三十六年《费郡尊嵘祠堂碑记》，见嘉庆《朱泾志》卷二建置志·节孝祠。

[5] 光绪《嘉善县志》卷十二物产。

[6] 光绪《枫泾小志》卷一区域志·食货。

女挈黄花句务前[1]。

这种盛况从明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清代中叶，使枫泾镇一直保持“物阜民殷，巨贾辐辏，称邑都会”[2] 的独特地位。

七宝镇——原属松江府华亭县，万历元年析置青浦县后，其北划归青浦，其南仍归华亭（顺治十三年析置娄县后划归娄县）。四乡所产之纱“较西乡为独异”，所织之布，有标布、扣布、稀布三种。稀布疏而阔，一般七宝稀布阔一尺二寸，长二丈三尺，“龙华稀、七宝稀最驰名”，“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宝尖名目”[3]。扣布又名小布，密而狭。标布、扣布、稀布远销各地，“织布者率日成一匹，其精敏者日可二匹”；“比户织作，昼夜不缀，乡镇皆为之，暮成匹布，易钱米以资日用”[4]。

朱家角镇——在青浦县治西十二里。明代万历年间已号称“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5]。是远近闻名的标布贸易中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6]。每当棉布购销旺季，镇上“布肆黑夜燃灯为市”[7]。入清以后，标布被本色布、青蓝布取代，“本色布，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青蓝布，估客贩至崇明南北二沙”[8]。

南翔镇——在嘉定县治南二十四里。四乡农家纺纱织布，所产有浆纱、刷线二种。刷线布又名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9]。这些布商字号大多由徽商经营，把镇上收购的棉布贩至江淮、临清

---

①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
② 康熙《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③ 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
④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风俗、卷一物产。
⑤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⑥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⑦ 万历《青浦县志》卷一风俗。
⑧ 嘉庆《珠里小志》卷四物产。
⑨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物产。

一带出售，营业额在嘉定一县中遥遥领先，当时人称“布商莫盛于南翔，娄塘、纪王庙次之”[1]。

罗店镇——在嘉定县治东十八里。明中叶已成为棉布集散中心，“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2]。所产棉布有套布、泗泾布，还有紫花布、斜纹布、棋花布等[3]。

安亭镇——在嘉定县治西南二十四里，其地半属嘉定，半属昆山。安亭以盛产药斑布、棋花布而著名。所谓药斑布，即以药(染料)涂布染青，干即拂去，青白相间成纹，有楼台、花鸟、山水、人物等图案。所谓棋花布，以青白缕间如棋枰。此外还出产浆布、黄布、线毯、被囊、高丽布等[4]。

外冈镇——在嘉定县治西十二里。万历以来，外冈布闻名遐迩，成为徽商争购的佳品，“因徽商就居钱鸣塘(即钱门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5]。其中紫花布尤佳，价倍于常布。入清以后，外冈布名声更有过之，浆纱布、飞花布堪称绝品，“纱必匀细，工必精良，价逾常布”[6]。布商众口一辞：“外冈之布，名曰冈尖，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在镇开庄收买”[7]。

娄塘镇——在嘉定县治北十二里。四乡农家“习花布以营生”，“比户缉纺缫之具，连村轧机之声。浆纱行于本境，刷线达于京师”[8]。所产斜纹布，“经直纬错，织成水纹胜子，望之如绒”，“士人馆而饷客，莫不诧以绝伦”，深受各地客商欢迎，“行于京省”[9]。

---

[1]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风土志·风俗。

[2]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3]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物产。

[4]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嘉庆《安亭志》卷三土产。

[5]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

[6] 乾隆《续外冈志》卷四物产。

[7] 乾隆《续外冈志》卷四物产。

[8] 乾隆《娄塘志》卷八杂类志。

[9] 乾隆《娄塘志》卷八杂类志。

钱门塘市——嘉定县治西南二十里。所产棉布号称丁娘布（又称丁娘子布），“光洁细软，朱竹垞所谓‘晒却浑如飞瀑悬，看来只讶神云话’者也”[1]。由于钱门塘所产丁娘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就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之，遂俱称钱门塘布”[2]。

诸翟镇——在县治西南五十里。遍地种棉，“乡民多恃布为生”。清中叶，“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3]。

周庄镇——界于长洲、吴江、青浦三县之间。四乡农家“以棉纱着浆理作经，卷于机轴，复以棉纱为纬，织成布”，堪称名品。有緜布——以棉纱为经白緜为纬织成；棋子布——白棉纱间以青棉纱，织作小方块成棋盘纹；雪里青布——以青白棉纱逐一间织而成。农家所织布匹运至镇上售于布庄，由布庄转销外地客商，号称“周庄布”[4]。

一些棉布业市镇兼业棉纱交易。如在青浦县治西南三十五里的金泽镇，其地为水乡泽国，宜种水稻，不产棉花，但四乡农家“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5]。农家纺纱织布，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或抱布入市，易木棉以归。这种经营方式带有来料加工的性质。镇上收购棉纱棉布的牙行称为花纱布庄，农家与花布纱庄的关系是：“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纱易，辗转相乘”[6]。又如周庄镇，农家“妇女以木棉花去其核，弹作絮，卷为棉条而纺之。复束成

---

[1] 杨光辅：《淞南乐府》（《上海掌故丛书》）。
[2]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土产。
[3]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风俗。
[4]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5]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风俗。
[6]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风俗。

纹，以易于市，遂捆载至浙江硖石镇出售”[1]。再如外冈镇，四乡农家“卖纱卖布者必以黎明”，谓之“早市早回”，“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2]。

此种情况在金山一带十分普遍，“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3]。其实精于纺织的松江地区纺织出售也是常见现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4]。不少市镇上棉纱交易十分兴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一些棉布业市镇还兼营棉布加工业，成为该市镇的一大特色，如枫泾镇、南翔镇、朱泾镇、金泽镇、黄渡镇的染坊业、踹坊业、纺车业、锭子业、布机业，都是当地颇有影响的重要行业。枫泾镇上布号林立，收购大量棉布，再由布局整理加工。布局设有染坊、砑坊，棉布毛坯经过染、砑之后才可运销外地。据吴遇坤《天咫录》记载，“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多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5]。南翔镇上，乾隆年间为棉布字号服务的踹坊有十家之多，由坊总长、包头人、踹匠组成，形成一种雇佣关系，踹布工价按照布匹长短、大小、阔狭而定[6]。朱泾镇及其东南的吕巷市，为棉布业配套的铁锭业与纺车业十分发达，《朱泾志》说：“铁锭朱泾最良，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近数尤御亭及骆姓家，远近争购”。程超诗曰：“鳞比人家纺织勤，木棉花熟白于银，邻家买得尤家锭，缫

---

[1]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2]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风俗。
[3]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风俗。
[4]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5]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志・拾遗。
[6] 乾隆十年《嘉定县为禁南翔镇踹匠恃众告增规定踹匠工价钱串告示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00页

出丝丝胜绮纹"[1]。金泽镇所制纺车、锭子之名声不亚于朱泾镇，成为附近百里方圆争购的名牌产品。《金泽小志》说："锭子以铁为之，车以绳竹为轮，夹两柱，中枢底横之木，偏左而昂其首，以著锭子，轮旋而纱成焉。到处同式，而金泽为工。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故'金泽锭子谢家车'，方百里间习成谚语"[2]。黄渡镇则以布机业闻名，所产徐家布机，"坚致而利于用，价亦稍昂，机之横木必书其年月某房造"[3]。

上述简略分析已充分表明，棉布业市镇的类型是多样化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一切都取决于各市镇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状况。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包括棉花、棉纱、棉布各种不同层次的商品的集散地，通过商品流通渠道与各地市场相联系。明清时代苏松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高水平的，其"衣被天下"的棉纺织业也是高水平的，这些都与多功能的市镇网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三、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棉布业市镇作为商业与手工业中心，商品经济占据着明显的支配地位，在这些流通极其迅速的市场上，一切都日趋商品化。苏松一带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再属于延续已久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而进入了崭新的以商品生产与市场流通为显著特点的商品经济范畴，并且由此逐渐孳生出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历史特点，在农家、布商、牙行的经营方式及其三联环中显示得淋漓尽致。

---

①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物产。
②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土产。
③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疆域·物产。

1. 农家："土人专业纺织"

四乡农家经营农副业不再是以生产物为直接消费品，而是将生产物以商品形式运入市场与货币交换，换取货币后再购置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形成了"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1]的新型农家经营模式。市镇四乡棉作区农家经营方式的这种新变化，乃是棉布业市镇经济的坚实基础。

棉布业市镇四乡农家所从事的纺纱、织布的家庭手工业，虽然还保留着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模式，它已不同于传统的"男耕女织"，即不再是以"耕"提供全家口粮；以"织"提供全家衣着的旧模式，而是一种商品生产新模式。农家"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2]；"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3]因而这种家庭手工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织助耕"的家庭副业，而易位为农家的主业，即主要经济来源。因为棉作压倒了稻作，不少地区是棉七稻三，甚至棉九稻一或全不种稻，农业经营发生了变化："多种木棉，土人专业纺织"，"邑之民业，首藉棉布"[4]。在这种情况下，副业与主业的地位被置换了，农家植棉、纺纱、织布的传统副业一变而为主业，而传统的主业稻作却退居次要地位，降为副业。

反映此种状况的文献资料比比皆是。嘉靖时松江人徐献忠《布赋序》说："邑人以布缕为业，农氓之困藉以稍济"[5]。《紫堤村志》说："乡民多恃为生"[6]。《真如里志》说："比户织作，昼夜不辍，

---

[1]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

[2]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风俗。

[3] 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4]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5] 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

[6]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风俗。

暮成匹布，晨易钱米，以资日用"[1]。《蒲溪小志》也说："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暮成匹布，易钱米以资日用"[2]。这种经营方式较之传统的经营方式是一大进步，长江三角洲农村之所以富庶，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农家经营的商品化趋势，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长江三角洲发达的市场经济刺激下，农家耕地大量用于种植棉花，这里有市场需求与价格等经济因素在起作用。松江一带，一亩耕地用于种稻，能收米二石，用于种棉，能收棉花一担（一百斤）[3]。据叶梦珠所纪录的明末清初的松江地区价格资料可知，在价格比较平稳的康熙中叶种棉较之种稻的经济收益高达一倍左右。例如康熙九年，新米每石价为银八钱至九钱，棉花每担价为银三两至四两[4]，二石米合银一两六钱至一两八钱，一担棉合银三两至四两，两相比较相差一倍。又如康熙二十一年，白米每石价银八钱五分，上白棉花每百斤价银四两一钱[5]。两相比较相差二倍有余。再如康熙二十三年糙米每石八九钱，上白好花每百斤价银一两三四钱[6]。两相比较相差几近一倍。在这种市场价格的作用之下，农家耕地大量用于种植棉花便不足为奇了。

如果把棉花纺纱、织布，其经济收益更是大大超过单一的种植业。叶梦珠说，松江标布"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

---

[1]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风俗。

[2]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物产。

[3]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松江西乡亩产米三石为高，通常为二石五斗，东乡亩产米一石五斗，统算亩产米二石。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一亩之入有百斤者为满担，倍之为双担。双担是年之极丰者，不恒有。"可见棉花亩产一担较为常见。

[4]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食货四。

[5]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食货四。

[6]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一、食货四

七八分至二钱而止"[1]。棉布市镇四乡农家大多每日织成一匹，每匹卖价一钱五分。而工本呢？据陆世仪说："棉三斤织布一匹，利率三倍"[2]。每匹布卖价一钱五分，扣除四分之一工本，净收入还相当可观；何况有的农家每日可织二匹至三匹，收入就更大了。按照这种比率推算，一个妇女劳动力从事纺纱织布的收入显然大大超过一个男劳动力从事田间劳动的收入。一个妇女日织一匹，三个月可织布九十匹，以每匹一钱六分计，共得银十四两四钱，约相当于五六亩水稻田一季的收益。这种经济收益的差异使农家从事实中看到商品经济较之自然经济要优越得多，只要棉布有销路，这一带农家必然会继续保持这种经营方式。

2. 客商："操重资而来市"

外地客商(主要是徽州商人、陕西商人、山西商人等)挟带巨额资金，前来贸贩棉纺织品，是促使棉布业市镇日趋繁荣的重要经济力量，因而这种布商是棉布业市镇经济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关于此种布商，叶梦珠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飞花、尤墩、眉织不与焉。上阔尖细者曰标布，出于三林塘者为最精，周浦次之，邑城为下，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价与标布等。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而中机之行转盛，而昔日已作标客者，今俱改为中机，故松人谓之新改布。"[3]

---

①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② 《陆桴亭文集》卷六《青浦魏令君德政记》。

③ 《阅世编》卷七食货六。

这里所谓标客是指贩买标布的客商，他们充斥于各棉布业市镇，从“明季多标行”的朱泾镇，到“京省标客往来不绝”的朱家角镇[①]，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身带巨额资金，贩买大批棉布到各地转销，经济实力很大。以每匹标布值银二钱计，银一万两可买布五万匹，十万两可买布五十万匹，五十万两可买布二百五十万匹。一个标客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其运销额当在数十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决非一般小商小贩所可比拟的。由此可以窥见各棉布业市镇每日集散之棉布数量是惊人的，也可窥见各棉布业市镇的商品流通功能及牙行的贸易组织功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一般地说，市镇上的交易都由本地牙侩所开设的牙行操纵，农家所生产的棉花、棉纱、棉布不得超越牙行直接与客商成交。由于这些富商巨贾资本雄厚，牙行“奉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其中不少布商都陆续在市镇上设立经营机构——棉布字号(或称布庄、布号)，直接插手棉布交易，如外冈镇“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②]、“徽商就居钱鸣塘收买”[③]。如南翔镇“布商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④]。如月浦镇“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⑤]。如朱泾镇、枫泾镇明代有数百家布号在此乐业[⑥]。这种布号、布庄不同于本地牙行，一方面在镇上坐庄收布，另一方面附设染坊、踹坊，雇佣工匠，加工棉布，亦工亦商，控制了棉布的收购、加工、贩运各个环节。

这种自行收购棉布的布商在清代日渐增多，他们在市镇租屋、

---

①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因革。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② 乾隆《续外冈志》卷四物产。

③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

④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物产。

⑤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

⑥ 《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

雇人四出收购。乾隆时人褚华说："近商人乃自募会计之徒，出银米采择，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也有本地"水客"、"袱头小经纪"把小批量收购的棉布，转售给这些布商[①]。道光时人张春华也说："布肆列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静处觅屋半间，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这叫做"出庄"；还有一些布商则"坐庄"收购，大多是关陕及山左诸省商人[②]。

3. 牙行："市中贸易，必经牙行"

牙行是市镇经济结构的中枢，操纵市镇经济的运行。"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③]。"贫民持物入市，不许私自交易，横主索值，肆意勒索，名曰佣钱"，举凡"花、布、柴、米、纱、緀，下及粪田之属，皆有牙行，类皆领帖开张"[④]。

在棉布业市镇上最有财有势的当推布行，"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⑤]。各地布商大多通过牙行之手收购布匹。一种方式是"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按即布庄，布行的别称)，徐收其布"[⑥]；另一种方式是布商挟带资金到各市镇直接向牙行购买布匹现货。[⑦]褚华说，其六世祖在明代就是专门招接陕西、山西商人的牙行老板，此公"精于陶猗之术"，很会经商，"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如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⑧]。

牙行一方面凭藉势豪之家撑腰，另一方面自恃经济实力雄厚，

---

①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②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

③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④ 光绪《月浦志》卷九风俗志　风俗。

⑤ 《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⑥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风俗。

⑦ 《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⑧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常常成为地方一霸，称为行霸。牙霸把持行市，花行、布行、柴行、米行、猪行均有行霸，擅自抬高或压低物价，"擅取用钱，卖者买者各有抑勒，曰内外用"[1]。此类行霸可以说是各市镇都有，成为"市镇之民害"，他们"私立牙行，高低物价，擅取用钱，买者卖者各有除勒，名曰内用、外用，结连光棍，邀人货物，卖布者夺其布，贸花者夺其花。乡人不得自由"[2]。有的行霸为了把持行市、垄断一方，"其所用秤、斗不与常同，故称名亦异其称，曰桥秤、桥斗"[3]。

这种情况在长江三角洲是带有普遍性的，地方志中此类记载甚多，不妨再举几例：

太仓州——"州为小民害者，旧时棍徒，赤手私立牙店，曰行霸。贫民持物入市，如花布米麦之类，不许自交易，横主价值，肆意勒索，曰用钱。今则离市镇几里外，令群不逞要诸路，曰白赖。乡人持物，不论货卖与否，辄攫去，曰：'至某店领价'。乡民且奈何，则随往，有候至日暮半价者，有徒手哭归者，有饥馁嗟怨被殴伤者。如双凤镇孔道，为行霸四截，薪米告匮，至粪田之具不达。又如茜泾镇，以蒲鞋著数里内，乡民夫妇穷日夜捆织，惧为白赖攫，欲达蒲鞋场，有伏地蛇行者"[4]。

上海县——周浦镇举人高延亮向上海县知县上书《请行严禁恶俗五条》，其中之一曰"白拉"："其人并不开张店铺，纠集游民，伺客船至镇，拉其货物，或散居民，或散店口，十分货价偿其二三，公行侵蚀。小商资本不过数十金，告官则费时日，资斧愈亏；争论则拳勇相加，反受荼毒。而此辈洋洋自得。甚至乡民以柴米等物入市，悉遭搬抢，以多为少，以贵为贱，名为代卖，实资中饱，致商民俱

---

①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域考·风俗。

②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风俗。

③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④ 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

惴栗远避，市价腾涌，贫民啬日”[1]。

宝山县——“有私立牙行，高低物价，擅取用钱，买卖各有名，曰内外用，结连光棍，邀人货物，卖布夺布，贸花夺花，乡人不得自由，名曰行霸”[2]。

南翔镇——“市井恶少无赖所谓打降、白拉者，是处有之，南翔为甚。打降逞其拳勇，凡抢亲、扛孀、抬神、扎诈诸不法事，多起于若辈。白拉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民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资不止”[3]。

很明显，牙行是市镇上新兴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混合物，带有自相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在助长商品经济的发展，藉以从中获利；另一方面却用自己的手破坏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因面牙侩、行霸成为市镇上恶势力的代表，如果没有牙侩、行霸的指使、怂恿，“打降”(或曰“打行”)、“白拉”之类恶习决不可能在市镇上横行无忌。康熙时长洲人褚人获引用《亦巢偶记》说，“打行，闻兴于万历间，至崇祯时尤盛”，“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作降字”[4]。万历年间范濂也说：“恶少打行，盛于苏州。……此风沿入松，以至万历庚辰后尤甚。又名撞六市，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5]。可见这种现象是伴随市镇经济的繁荣而出现的，入清以后愈演愈烈。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在江南任巡抚的余国桂曾严禁打降，他所公布的《严禁打降移文》指出：“照得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遂有其名。询其根由，始于游手无赖各霸一方，城镇乡村无处不有”，“倚靠势力为城社，结连衙蠹为

---

[1] 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九风俗。
[2] 乾隆《宝山县志》卷一风俗。
[3]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纪事。
[4] 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二。
[5]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

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乎三尺之法"[①]。

4. 脚行："私分地界，把持勒索"

与行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脚行。脚行是市镇上从事搬运的脚夫的行帮组织，上有脚头，下有脚夫，以行霸为后台，在市镇上把持地段，肆行勒索。例如法华镇，"镇有脚行，三诚和里谓中行，东西各有一。其间强而黠者为脚头。凡运商货，脚头争昂其值，而朘其余。遇吉凶事则论地段把持措勒，稍弗遂欲，即恃强生事，屡禁不止"[②]。

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而尤以棉布业市镇为甚。

南翔镇——"所以拳勇之患，脚夫为甚。其人既不足比数，而闾里恒耻与为伍，人无智愚，客无远近，不过资其力，肩挑背负任彼定价横索，惟恐弗得其欢心，以致货物壅塞河下市口，遂酿成彼等骄横之习日盛一日。而米客受其笼络，米店受其凌虐，米牙受其挟制，彼等且收其无穷之利，贿赂公行，结纳败类，于是焰日以炽，祸日益烈"[③]。

南汇县——"各镇游手强悍之徒，聚党约盟，自占为脚夫名色，分立段界。凡婚丧之家借彩舆、丧輀等具，故高其值，又不容别役他处人夫。市肆货物迁运，毋论远近必索重价。能自运者，群聚喧哗，强禁不许。必餍其欲而后已，商民为之丧气"[④]。

江湾镇——"嘉邑大害，莫甚于脚夫，而脚夫之横莫甚于南翔、江湾两镇。若辈什百为群，投托势官，结纳豪奴，私自分疆划界。凡商民货物横索脚价，稍不如意，则货抛河下，无人承挑，商贾裹足……有米客投牙发店，被恶棍聚众阻挠，商客各投别镇"[⑤]。

---

① 康熙《江南通志》卷六十五艺文。

② 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

③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石崗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

④ 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五风俗。

⑤ 民国《江湾里志》卷三徭役。

罗店镇——东西南北四角乡人入市孔道，遍布脚行，各有一块地盘，把持勒索，“一切货物出入铺户不得自行挑运”，一定得由脚夫挑运，从中勒索脚费。“甚至婚嫁、丧葬、鼓手、炮手、轿夫、脚夫私分地界，把持勒索”[①]。

月浦镇——脚夫人等，每遇民间婚嫁丧葬，私分地段，任意抬高工价。”且以私自所分地段，父子相承，称为世业”[②]。

对于脚夫、脚行的横行，商民早有怨言，官府也屡次颁布禁令。例如康熙二十五年江苏巡抚赵士麟严行禁革，刊刻于石碑：“先是，斛米一石，无论侧近，定例三分，米客复有津贴脚米之例，每石一二升不等。东西南北除杂货外，米之上下动以万计。彼等虎踞枭占，非其类不与，家有使令者不得用。自禁革后，听民雇募，每石四厘”[③]。

康熙五十一年苏州知府又有“禁革脚夫碑文”：“幸前抚宪赵访悉脚夫为害，南翔镇士民公叩勒石永除大害，而江湾一镇，虽屡奉各宪示禁，始犹阴违阳奉，继而渐渐恢复，今则猖狂更甚”[④]。

看来官府的禁令的成效是大成问题的，可以说是屡禁而不止。因而苏松一带此类禁革脚夫勒索的石碑到处可见，仅以嘉定县为例就有如下一些：

《禁脚夫分界碑》——一在城隍祠东辕门，一在黄渡镇罗汉寺，康熙二十五年奉巡抚赵示禁；

《严禁脚夫打降碑》——康熙二十七年知县闻在上奉巡抚田批示，立石南翔镇；

《禁拦丧阻葬碑》——康熙三十年知县周仁奉总督傅、巡抚郑

①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考，风俗。

② 民国《月浦里志》卷四风俗。

③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石嵩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

④ 民国《江湾里志》卷三徭役，康熙五十一年禁革脚夫碑文。

批示，立石县署；

《严禁脚夫分疆勒价碑》——康熙四十五年署县吴应豫奉巡抚于批示，立石南翔镇；

《严禁吹手、花轿、土工、脚夫分界碑》——乾隆元年知县程国栋奉布政使张批示，立石南翔镇；

《脚夫定价碑记》——乾隆十九年知县廖运芳奉升任布政使郭、布政使彭批示，立石南翔镇；

《禁脚夫、炮手人等勒索碑》——知县田祚奉巡抚丁示谕，立石城隍祠前；

《禁脚夫人等强霸碑》——一在石冈门，一在石拈花庵，并光绪六年知县程其珏示禁[1]。

此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中的《常熟县呈准禁止豪强私占土地脚夫倚势诈民文》、《遵奉各宪严禁脚夫勒索碑记》，《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中的《上海县为萝夫扛夫议定脚价订定界址告示碑》等，莫不从各种角度反映了脚夫、脚行在市镇的根深蒂固性。从康熙二十二年申令："其脚夫工钱，本府计程远近定价例给"，"不许再勒"，"其随地雇夫承值，不许脚夫分地霸占"[2]；到道光十一年的禁令："照得民间婚娶丧葬及铺户挑运一切货物，所用轿夫、脚夫例应听民自便，雇人扛抬，毋许地棍私分地界，把持勒索，扰害闾阎"[3]；到光绪六年再禁"民间婚丧等事，需用轿夫、脚夫、吹手、炮手人等，听民自雇……不准私分地界，借口差徭，把持勒索"[4]，说明陋习如故，禁令犹如一纸空文，再三申严禁令恰恰表明禁令之无效。其实，这种现象乃是市镇经济繁荣的产物，它作为

---

[1]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金石

[2] 道光《蒲溪小志》卷四碑记，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奉宪严禁脚夫霸横扰民碑》。

[3]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考·风俗。

[4] 光绪《嘉定县志》卷二十九金石。

市镇经济结构运转中的润滑剂，是不可或缺的。

四、棉布贸易与棉布市场

布商在棉布业市镇上从布行，布号或布庄中收买到布匹后，必须经过染色和踹布等加工程序，才能贩运到各地出售。因此，在棉布的集散中心多有布商委托包头开设踹坊，将布用大石脚踹研光，因而踹坊、染坊也就成了大型棉布业市镇的一大特色。

例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①]，枫泾镇“里中多布局，局中所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②]。

嘉定县的棉布集散中心南翔镇，徽州商人在此开设布号，收购棉布。镇上依附于棉布字号的踹坊多达十家，由坊总长、包头人和踹匠组成，“踹布工价总按布匹长短、大小、阔狭定价”[③]。

上海县的棉布业市镇上也有此种踹坊，专门制作“踏光布”，同治《上海县志》载：“染成而以巨石压磨者为踏光布”[④]。乾隆时上海县人褚华对当地的踹坊有很精彩的描写：“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为承，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旋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此西北风日高燥之地，欲其勿著沙土，非邑（上海县）人所贵也”[⑤]。

长江三角洲棉布的最大集散地苏州，踹坊、染坊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浙江总督李卫在雍正八年的一个奏折中说：

---

①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

② 《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引《天咫录》。

③ 乾隆四十年《嘉定县为禁南翔镇踹匠恃众告增规定踹匠工价钱串告示碑》，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100页。

④ 同治《上海县志》卷八物产。

⑤ 褚华：《木棉谱》。

"苏郡五方杂处，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习此业者，非精壮而强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县之人，递相传授牵引而来，率多单身乌合不守本分之辈。……从前各坊不过七八千人……现在细查苏州阊门外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不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余块，人数称是。"①

在另一个奏折中，李卫指出："苏州以砑布为业者，皆系外来单身游民，从前数有七八千余……日前砑匠又增出二千多人。……藉以糊口，奸良不一。……阊关外一带地方辽阔，各匠数盈万余"②。

苏州织造胡凤翚在雍正元年的一个奏折中指出：

"查苏州系五方杂处之地，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又有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③

由此可知，苏州阊门、南濠一带客商云集的繁华商业区，也是著名的棉布集散地，各地布匹集中于此加工染踹，然后由客商运往各地市场出售。这一地带共有踹坊四百五十余处，踹匠一万余人，如果包括染坊的染匠在内，共有二万余人。可谓蔚为大观。

置备踹坊的包头，也称作头、保头、坊户和坊主。保头与包头

---

①《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二册，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李卫奏。
②《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二册，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李卫奏。
③《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八册，雍正元年四月五日胡凤翚奏。

系同音同义；作头，因踹坊也称踹作，"踹作包头"简称作头[1]；坊户、坊主的称呼，大抵由踹坊之"坊"而来，也与康熙四十年以后官府规定包头十人设一坊长之制有关，因而碑刻资料中有如下的记载："为此示仰六坊坊户人等知悉，嗣后尔等领踹布匹，毋许再立随牌名目"、"坊主开设作坊，一切动用家伙均须置办"[2]。

包头向布商字号或染坊店主领取布匹，在踹坊中雇佣踹匠踹砑，布商支付加工费，即工价，每匹约为银一分一厘三毫，归踹匠所得，但踹匠每人每月必须上交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作为包头的房租家伙之费及包头的盈利。这种关系不仅从上引李卫奏折可以得到印证，而且大量碑刻资料均可资说明。

康熙九年《奉督抚各大宪核定踹匠工价给银永遵碑记》："嗣后一切踹工人等，应听作头稽查，作头应听商家约束"；

康熙三十二年《苏州府处理踹匠罗贵等聚众行凶肆凶科敛一案并规定以后踹布工价数目碑》，"踹匠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有家土著之民，散漫无稽，盗逃叵测，且异方杂处，奸宄易生，故择有身家之人，踹坊领布转给，则踹匠之来历，货物之失错，悉与布商无预，责有攸归"；

道光十四年《苏州府为布商坊户应照章听号择坊发踹不得无端另换致碍贫民生计出示碑记》对布商字号与包头的关系规定得很清楚。"查坊户领踹布匹，先由同业互保，写立承揽交号，然后立折领踹，其所立经折，不过登记布数"；

康熙三十一年《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又缘踹匠孤身赤汉，

---

① 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所载康熙五十九年《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

② 《吴县永禁六坊坊户领踹布匹毋得再立随牌名目应听铺号自行发踹不得垄断把持碑记》；《苏州府规定踹匠每布一匹工价连薪等加等计银一分三厘该商等给发坊主伙食银一两给钱八百二十文以后不许增加碑记》，均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一无携带，保头租赁房屋，备买□□□□□银叁钱陆分，是亦有本"；"嗣后踹布工价，条遵宅□每匹一分一厘，踹石坊户每月得赁石租银三钱六分，毋容增减。至于踹匠如有拐窃盗逃，为非作歹，责成保头"①。

由此可见包头的身份和作用是十分清楚的，第一，置备生产资料（巨石、木滚、家伙、房屋等）和踹匠的生活资料；第二，在劳动力市场上招募踹匠，并垫发食费（柴、米、银钱）；第三，向布商字号（或染坊）领取布匹，发与踹工踹碾；第四，每月向每名踹匠征收银三钱六分；第五，踹匠应听包头稽查，包头应听商家（布商字号）约束。因此，包头实际上是踹布加工过程的承包者和组织者，他从踹匠处征收的包头银，其实是从布商支付的布匹踹砑工价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资料表明，踹坊、包头是依附于布商字号的，踹匠与包头之间形式上存在雇佣关系，但深入追究，真正的雇佣关系是存在于布商与踹匠之间的，包头不过是两者之间的承包人而已。道光十四年《苏州府为布商坊户应照章听号择坊发踹不得无端另换致碍贫民生计出示碑记》对此有所反映："且查坊户向（布）号揽踹布匹，是犹佃户向业（主）揽种田亩，佃户拖欠租籽，尚得退佃别召，坊匠踹不光明，岂竟不能更换"②。

苏州踹坊加工的棉布大多是青蓝布，此种布匹颇受北方各地消费者青睐，销量很大，所以苏州阊门一带聚集了四百五十多处踹坊、一万多踹匠，专业加工。前引李卫奏折中说："各省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兑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清朝文献通考》也如此写道："南北商贩青蓝布匹，俱于苏郡染造，踹坊多至四百余处，踹匠不下万有余人"③。这样苏州阊门外上下塘就成了全国闻

---

① 以上碑刻资料均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② 见《江苏省明清以为碑刻资料选集》。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三职役考三。

名的高层次的棉布市场，布商们在较低层次的棉布市场收购到棉布之后，大量运抵此地漂染踹砑，然后再转销各地。南翔镇、朱泾镇、枫泾镇等大型棉布业市镇，也多建有染坊、踹坊，但规模无法同苏州阊门外相比拟。正如乾隆《长洲县志》所说："苏布名称四方，习是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数十家赖以举火"[1]。

苏松棉布业市镇所集散的棉布品种多、质地精，号称"衣被天下"，殆非虚言。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说，上海县三林塘镇、周浦镇的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中机布"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2]。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当地出产的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蓝靛布、紫花布等，"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3]。充分表明苏松棉布是面向全国市场的。诸如此类的记载相当多，不妨再列举一些：

> "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4]。
>
> "常、昭两邑，岁产棉布，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5]。
>
> "布有三等，……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6]。

在长江三角洲棉布业市镇经营棉布贸易的商人集团，首推徽州商人（即新安商人），几乎各大镇均可见徽商活动的踪影。

---

[1] 乾隆《长洲县志》卷十物产。

[2]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3]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

[4]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钦氏：《松问》。

[5] 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七。

[6]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

南翔镇，"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①。

罗店镇，"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②。

外冈镇，"因徽商僦居钱鸣塘(即钱门塘)收买，(外冈布)遂名钱鸣塘布"③。

钱门塘市，"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之，遂俱称钱门塘布"④。

其次为秦晋商人集团，褚华《木棉谱》说："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⑤。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说："其行远者为标布，关陕及山左诸省设局于邑广收之，为坐庄"⑥。《月浦里志》也说："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⑦。

再次为闽粤商人集团，《木棉谱》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上海)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以归"。可见除秋天专运棉花以外，福建、广东的商人在其他季节是要自上海运布回去出售的⑧。又如以出产刷线布、紫花布著名的江湾镇，前来购买的布商以广东商人为主，"粤商争购，务求细密，不计阔长，需棉少而布价昂"⑨。

各地客商出于经商的需要，编制了行商的路程手册，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水陆路程》便是其中之一，该书第七部分的小标题是"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其下有两行小字夹注："路虽多迂，布客不可少也"，可见这是为布商们贩运棉布提供指南的。它列举了以松江

---

①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③ 崇祯《外冈志》卷一市镇。
④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土产。
⑤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⑥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
⑦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
⑧ 参看全汉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1972)。
⑨ 民国《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

府为中心的十五条水路，把各市镇、县城连成一线，反映了当时的商业水路网络。且略举数例于下：

苏州由嘉兴府至上海县：

本府—50—吴江县—40—平望驿——王江泾—30—嘉兴府—10—东栅口(南六十里至平湖县)—3—七里桥—24—嘉善县—6—张泾会—12—丰泾(按：枫泾)—18—泖桥寺—9—朱泾——斜塘桥—14—松江府跨塘桥—20—四泾(按：泗泾)—20—七保(按：七宝)—24—龙华寺塔(即黄浦)—12—上海县(此为外河)

松江府由南翔至上海县：

松江府—30—砖桥—40—陆家阁—40—南翔—20—江桥(即吴淞江)—30—上海县

松江府由官塘至苏州府：

松江府—20—凤凰山—18—北昆山—18—唐行(按：青浦县)—40—陶桥—30—昆山县—30—苏州府

松江府由嘉善县三白荡至苏州：

松江府前—20—斜塘桥—13—朱泾—9—泖桥—18—枫泾—12—张泾会—6—嘉善县西门(跨塘桥雇船)——长春桥—45—芦魁—1—三白荡—12—牛蚕泾—10—叶寨湖(按：叶泽湖)—12—铜里镇(按：同里镇)—18—尹山—18—盘门—9—阊门

松江府至吴淞所：

本府北门—18—唐桥—50—南翔—20—嘉定县—12—罗店—36—吴淞所

松江府至乌泥泾:

本府出北门$\frac{\quad}{15}$新桥$\frac{\quad}{6}$陈家行$\frac{\quad}{10}$新村桥$\frac{\quad}{3}$新庄(按:莘庄)$\frac{\quad}{10}$乌泥泾($\frac{\text{纺棉纱脚车}}{\text{始自本处一老妇}}$[①])

以上这些路程,显然与布商的贩运事宜关系十分密切,因此除路程外,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也一一注明,如:"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太仓、昆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梭船,怕风防潮,南翔北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至上海,或遇水涸,七保(宝)、南翔并有骡马而去。港多桥小,雨天难行"[②]。从中可以窥知当日苏松一带棉布业市镇上布商们频繁往来、络绎不绝的景象;通过行商、坐贾的交易活动,把苏松一带的棉布纳入到全国市场的流通之中。

长江三角洲棉布的外销量是十分惊人的,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③]。以每匹标布值银二钱计,银一万两可买布五万匹,十万两可买五十万匹,五十万两可买二百五十万匹。而这仅仅是到松江来买布的布商们个人所挟带的资金,可以想象众多的布商从松江贩买出去的布匹的数量一定更为惊人。据钦氏阶撰《松问》的估计,"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焉"[④]。每天的销售量达十五万匹,一个月的销售量达四百五十万匹,一个季度的销

---

① 参看川胜守:《长江三角洲镇市的发达和水利》(载《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此路程表,所注数字系两地间的里程,双行夹注是原注,地名讹误由本人以按语纠正。

② 以上均见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水陆路程》七"苏松二府至各处水"。

③《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④ 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售量达一千三百五十万匹。《锡金识小录》说无锡是“布码头”，由这里销往江北淮扬高宝一带的棉布：“一岁交易，不下数十百万”[1]。郑光祖也说，“常、昭两邑，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由商贩运往淮扬、山东、浙江、福建[2]。

这一地区的棉布不仅运销全国各地，而且还运销国外。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南京棉布”是当时洋人对苏松一带所产棉布的通称，正如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过的英国植物学家所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3]。英、美、法、荷、瑞典、丹麦、西班牙等国从 1786 年至 1833 年由广州输出的南京棉布共计四千四百余万匹。请看以下两表：

---

①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力作之利。

② 《一斑录杂述》卷七。

③ R. Fortune, Three Years Wonderings in the Northern Prouinces of China, London, 1847, pp. 126, 264—265.参看全汉昇：《鸦片战争前江苏的棉纺织业》，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1972）。

各国商船自广州输出南京棉布数量

(1786—1816年)①

年代	输出数量(匹)	年代	输出数量(匹)
1786	372,020	1804	1,720,000
1790	509,900	1805	1,679,500
1792	402,200	1806	860,000
1793	426,000	1807	1,488,000
1794	598,000	1808	775,000
1795	1,005,000	1809	1,245,000
1796	820,200	1810	1,038,200
1797	573,000	1811	634,400
1798	2,125,000	1812	418,400
1799	1,160,000	1813	610,000
1800	1,471,300	1814	763,500
1801	1,584,700	1815	678,500
1802	1,050,000	1816	441,000
1803	941,000		

① 资料来源：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Vol Ⅱ—Ⅳ.

各国商船自广州输出南京棉布数量及价值

(1817—1833 年)[1]

年　代	输出数量(匹)	输出价值(元)	年　代	输出数量(匹)	输出价值(元)
1817	1,229,000	1,048,940	1826	547,900	417,735
1818	798,500	716,167	1827	1,380,500	1,016,978
1819	3,359,000	1,703,486	1828	1,314,000	976,971
1820	910,000	602,409	1829	1,055,000	743,638
1821	1,876,000	1,317,626	1830	1,051,000	617,560
1822	1,629,384	1,095,836	1831	438,785	233,023
1823	1,110,000	808,010	1832	170,500	128,825
1824	1,115,750	793,969	1833	30,600	22,644
1825	1,217,000	1,010,325	1817—1833	19,232,919	13,254,142

从上表可推算出棉布的平均价格为每匹约 0.69 元。

而国内市场的价格又如何呢？请看根据叶梦珠《阅世编》资料所列下表。

[1] 资料来源：H.B.Morse，前引书，Vol Ⅲ—Ⅳ。

明末清初松江府棉布价格

年 代	品 种	价 格 [钱(银)/匹(布)]	年 代	品 种	价 格 [钱(银)/匹(布)]
1628—1643	标 布	1.5—2.0	1662—1664	小 布	0.8—1.0
1644—1645	标 布	0.9—1.0	1682	中 机	3.0
1651	标 布	3.3	1684	标 布	1.3—2.0
1652—1653	小 布	2.0	1691	标 布	2.0
1654	标 布	4.0—5.0			

《阅世编》所记,不仅是上海一县的现象,也反映了松江府及邻近的苏州府棉布市场的一般价格趋势。这一带织布业的市场以北方为主,兼及长江流域及两广地区。因而苏松棉布价格受到各地市场需求的影响,标布的衰落、中机布的兴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北方标布销路阻滞。

其他零散资料所反映的棉布价格大体与叶梦珠的记载相近。从郑友玄《布解议》(崇祯《松江府志》卷十一)、赵昕《官布考略》(光绪《嘉定县志》卷三)、张诗《永折论略》(光绪《嘉定县志》卷三)、汤斌《解送布匹疏》(《汤子遗书》卷二)、洪亮吉《意言·生计篇》(《卷施阁文甲集》第一)所见价格资料可列如下表[1]:

[1] 参看中山美绪:《清代前期江南的物价动向》,《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七卷第四号。

年　代	品　种	价　格 [钱(银)/匹(布)]	年　代	品　种	价　格 [钱(银)/匹(布)]
1629	官　布	4.0—4.2	1683—1684	监　布	4.79
1652	官　布	6.0	1685	青　布	5.01
顺治间	扎　布	4.0—5.0	1685	监　布	4.51
1662	官　布	5.0	乾隆初	棉　布	0.99—1.31
1672—1673	官　布	4.15	乾隆末	棉　布	1.63—3.45
1683—1684	青　布	5.29			

在遇到灾荒的年月，布价会发生较大波动，主要表现形式为米贵布贱或棉贵布贱，以致影响织布农家生计。崇祯三年(1630年)，松江、嘉兴间，“荒年米贵，则布愈贱，各贾乘农夫之急，闭门不收，虽有布无可卖处”①。嘉庆、道光间，青浦一带水灾，“木棉价贵布价贱，爨火欲断心皇皇”②。

五、棉布业市镇的衰落

苏松一带的棉布业市镇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到同治、光绪年间几乎同时趋于衰微。

以棉花交易市场闻名遐迩的鹤王市，乾嘉以后，由于山东、直隶、河南、湖广棉花生产日臻发达，远商挟重资来此采购棉花者日

① 陈龙正:《几亭全书》卷二十五政书·乡筹二。

② 光绪《青浦县志》卷二十八艺文，何其伟:《大水后多鬻女者诗以悲之》。

渐减少,棉花交易越来越不景气,"皆散而之四方"①。到清末民初,向以棉花集散地著称的鹤王市,已无棉花输出,当地特产不再是棉花,而是野味、天花粉之类②。

另一棉花交易中心新泾镇,道光、咸丰时仅存商店二十余家,"每晨市一次,贸易花布杂粮之类",由于棉花生意清淡,"附近村民多种黄草,织成凉鞵,俗名凉鞋,行销远近"。同治年间,新泾镇(即澄桥镇)完全衰落,贸易移至北面的徐行镇,而新泾镇蜕变成商店不足十家的农村集市,"仅晨间略有贸易"③。而取代新泾镇的徐行镇,景况也不佳,不过店铺二十余家,"入民国,布市衰落"④。

曾经"徽商丛集",号称"金罗店"的罗店镇,因"粤匪之乱","三年中屋宇半毁","败壁颓垣鞠为茂草,昔之绮罗食珍羞者,今则什无一二焉"⑤。清末民初,由棉布交易中心一变为普通的消费性市镇,镇上商店多为榨油业、轧米业、面粉业、地货行、肉庄之类。一些昔日繁华的商业街,"旧有若干小商店,民国初年尚有三四家,今全属居户"⑥。

昔日作为棉花棉布集散地的月浦镇,同治以后棉布业衰落,镇上"商铺以酒、米、南货为最,并有兼营小熟豆饼、洋纱者,花行、布行不过一二,率皆客商开设,土人鲜有投资者。近年以来如机器油坊、碾米厂之类,集本经营,日增月盛"⑦,月浦与罗店一样,成为一个并无棉布贸易的普通集镇。

以往盛产小布、稀布、紫花布的法华镇,咸丰以来,"典商停歇,

---

① 道光《增修鹤市志略》卷下物产。
② 民国《鹤市续志》(不分卷)。
③ 民国《嘉定疁东志》卷一市集。
④ 民国《嘉定疁东志》卷一市集。
⑤ 光绪《罗店镇志》卷三武备志·纪兵。
⑥ 民国《嘉定疁东志》卷一市集。
⑦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

市面萧条"①。

粤商聚集的棉布集散地江湾镇，嘉道以后，"闽广滞销，女有余稀"；清末民初，"木棉贵而布不与之俱贵，民力倍形拮据"，农家不再经营纺织业，"辄种蔬菜、莳花卉，至沪销售"②。

"自洋纱盛行，市遂衰落"③，恐怕是棉布业市镇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洋纱洋布的倾销使土布市场日益狭小，机器织布业又在城镇陆续兴起，它们的技术优势使农家手工纺织业相形见绌。正如民国《月浦里志》所说："近自洋纱盛行，土布价值又复衰落，获利渐薄，业此者仍墨守成法，不知改良"④。这就使土布纺织业无可挽救地走向没落，依赖于此的市镇当然难以继续兴盛了。据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江苏省鉴》记载："苏省有清一代，素以出产土布著名，且远销欧美日本各国。迨各国机织棉布勃兴，吾国土布一落千丈"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调查资料也充分证实了这一变化。嘉定县一九三六年的统计，年产棉花十六万五千担，除农家纺织供自家衣料外，绝大部分经中间商人之手销往上海。农家手工生产土布虽有七十万匹左右，但大多供自己消费，作为商品出售的仅一万三千匹，数目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昔日棉花输出县，现在竟大量输入机织布如白粗布、白细布、白细料纹布、漂布等。农民在农业劳动之外，编竹业占第一位，捕鱼业占第二位，织布业与缝纫业并列第三位⑥。

---

①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② 民国《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卷五实业志·农业。

③ 民国《嘉定疁东志》卷一市集。

④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工业。

⑤ 赵如珩：《江苏省鉴》(1935，新中国建设学会)，第1356页。

⑥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昭和十五年出版非卖品)，第17—20页、66页、96页、100页、103页。

松江地区的调查资料也显示着这种变化。松江县耕地由以前棉七稻三或棉稻参半，一变而为以稻为主，秋熟作物耕种面积为：

早籼稻占 25%；

晚籼稻占 56%；

糯稻占 3%；

棉花占 11%；

其他占 5%[①]。

据华阳桥镇的抽样调查，农家经营普遍以农业为主，其他为副，占第一位的是编织草鞋，第二位是贩卖黄豆、蚕豆、蔬菜、水果之类；而传统的织布业已跌落至最末位：在三十四户的村庄中仅一户一人从事家庭手工织布业[②]。

五十年代初的调查资料也提供了与此一致的佐证。

嘉定县农作物的构成，已不再是先前的"稻三棉七"，秋熟作物的耕种面积分别为：

稻　4611.5 亩

棉　2021.8 亩

豆　1065.5 亩

其他　568.9 亩

棉作面积不及稻作面积的二分之一。而且农家所生产的棉花，绝大部分不再由农家纺纱、织布，而是以原棉形式销运上海。昔日"比户纺织"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大多以编竹、纺织毛巾、捕鱼、小商小贩弥补生计之不足[③]。

---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昭和十六年出版非卖品），第 5 页。

②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江苏省松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昭和十六年出版非卖品），第 165—166 页。

③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部发行），第 83 页、85 页。

松江县的情况较之嘉定县更为严重。对泗泾新农乡的抽样调查表明，水稻是主要农作物，棉花种植面稀少，纺纱织布不再是农家生计所赖的主要经济来源，"除木匠与裁缝稍多外，其他副业生产很少，全乡虽有二百多架布机，但因织布本钱大，销路少，故农民只织了自用"[①]。这种"织了自用"的纺织手工业，显然与先前"衣被天下"的盛况无法比拟了。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昆山县太平乡大熟作物几乎全是水稻，约占耕作面积的95%，农家副业几乎与传统的纺织业绝缘，有泥水匠、木匠、竹匠、裁缝、短工、小贩、厨司、屠夫、草竹匠等，唯独没有纺织[②]。

太仓县原是著名棉花产地，由于"交通阻隔，各地粮食不易运销，形成了粮贵棉贱"，加以外棉大量倾销，"太仓棉花的价格被压得很低，农民在这种情况下，都将土地改种其他杂粮，棉田面积因而剧减"。所产棉花，"除供给本县纱厂及农民自用外，余多销售苏州、常熟、上海等地"，而且棉花价格下跌，"花价好的年份，每亩棉花出产相当一亩田的稻谷"[③]。势必促使本地棉业衰落，农家土布生产因失去销路或工本太贵获利不多而趋于消灭。

经济结构的这种急剧变化，使昔日"衣被天下"的情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失去了赖以孳生的土壤，棉布业市镇不是由昔日繁华的商业中心衰落为一个荒僻冷落的农村集市，就是蜕变为一个畸形发展的消费性、寄生性市镇。

---

①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部发行)，第150—151页。

②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部发行)，第156—157页。

③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部发行)，第404页。

第四章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与结构

一、农家蚕桑经营及其商品经济化

太湖流域素以栽桑养蚕闻名于世，据《新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记载，太湖流域各州的贡品以丝织品居多。苏州有丝葛、丝绵、八蚕丝、绯绫，常州有绸、绢、红紫绵巾、紧纱，杭州有白编绫、绯绫，湖州有乌眼绫、绵绸。晚唐罗隐有"吴蚕万机"之语[1]，足见当时丝织业之盛。到了宋代有进一步发展，官营的杭州织锦院云集了两浙路各地的能工巧匠，雇佣工匠达数千人之多，有织机数百张。私营作坊更多，能织造白编绫、棉席绫、素罗、花罗、缬罗、熟罗、锦缎、克丝、纱绢、纻丝。吴兴的樗蒲绫，武康、安吉的绢，安吉的纱，武康的鹅脂绵，均属上品。嘉善魏塘宓家所织画绢，远近闻名。

值得注意的是，农家的蚕桑经营与商品经济关系日趋密切。陈旉《农书》记载湖州农家"唯藉蚕办生事"，一方面表明蚕桑经营在农家经济中已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表明农家养蚕后缫丝、织绢，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换回货币维护生计。他指出：

> "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十二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绢与米价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以一月之

① 《全唐文》卷八百九十四。

劳，贤于终岁勤动，且无旱干水溢之苦，岂不优裕哉。"[①]

按照陈旉的记载，十口之家养蚕十箔可以获茧一百二十斤，收丝一百五十六两，可织小绢三十一匹，以一匹绢易米一石四斗的比价折算，三十一匹绢相当于四十三石四斗米，按当时最高亩产三石米计，需十四亩四分七厘优质水田一熟产量，才可以与之相抵。无怪乎陈旉《农书》如此重视蚕桑经营，要说"唯借蚕办生事"了。

进入明代，蚕桑业、丝织业不仅产量、品种有所增加，而且产地和从业人员范围也日趋扩大。农家经营中蚕桑压倒稻作，蚕丝之事歉成为有岁无岁的决定性因素。这与熙、宣、成、弘以来丝织业由城镇向乡村推广有很大关系。吴江县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镇及近镇各村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②]。这里所反映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农家除栽桑养蚕之外还兼营丝织，富裕农家雇佣机工，贫下农家多自家纺织。这对于丝织业的发展是很大的促进因素，同时也必然促使农业经济的商业化程度提高，所以"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绌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绸之缎，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③]。

导致蚕丝业向乡村推广的根本原因在于：蚕丝经营受商品经济影响，桑、丝、绸均可作为商品出售，而其经济收益要大得多。谢肇浙《西吴枝乘》说，蚕桑之事"湖人尤以为先务，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说，"蚕桑之利莫甚于湖，大约良地

① 陈旉《农书》卷下种桑之法。

②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 · 生业。

③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引《双林志》。

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1]。因此，农家普遍认为"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即多种稻不如多栽桑。

明末湖州府涟市沈氏所撰《沈氏农书》和清初嘉兴府桐乡人张履祥所撰《补农书》，反映了明末清初这地区农业生产的实态[2]。张氏在《补农书》中说，"浙西之利，蚕丝为大"，"田地相匹，蚕桑利厚"，"余里蚕桑之利，厚于稼穑，公私赖焉，蚕不稔则公私俱困，为苦百倍。"《沈氏农书》中关于蚕桑的论述所占篇幅最多，重视桑园管理，例如种桑，"种法以稀为贵，纵横各七尺，每亩约二百株，株株茂盛，叶便满百，不须多也"；又如垦地，"桑之细根，断亦无害，只要棱层空敞。若倒地，则春天雨水正多，地面要犁平，使不滞水。背后脚迹，尽数揉平"；再如春天壅地，"清明边再浇人粪，谓之撮叶，浇一钱多二钱之叶。剪桑毕，再浇人粪，谓之谢叶，浇一钱多一钱之叶，毫不亏本，落得桑好"[3]。

涟市沈氏与桐乡张氏都是雇工生产的经营地主。沈氏"有地不得不种，田不得不唤长年"；张氏"岁耕田十余亩，地数亩"，"雇人代作"[4]。此种经营方式的商业性色彩很浓，是以蚕桑为主、稻作为副、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蚕桑、稻作之外的多种经营，在桐乡大体有这样一些：

种梅豆——"惟桐乡得擅其利，六七月陈豆数腐，腐少，若得挽人梅豆，腐便如故。每遇豆熟，商贾来至，官私赖焉"；

种麻——"东路田皆种麻，无桑者亦种之，盖取其成之速，而于

---

①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资类·农桑。

② 《沈氏农书》见《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九，《补农书》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

③ 均见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九，《沈氏农书》。

④ 见《沈氏农书》、《杨园先生全集·张履祥年谱》及张履祥：《补农书上卷跋》（按：《补农书》上卷即《沈氏农书》）。

晚稻晚豆仍不害，其工力较菜子相去不远，其收利则倍……脱其皮，每亩盛者可得二百斤。……吾乡种此，为利自浮于东路，但恐业之不精"；

种萝卜——"以供家用，固为便易，即卖亦得厚利(本地萝卜价常贵太湖)"；

种芋艿——"早艿种出广德，清明时彼处排卖于湖"；

种甘菊——"若种之成亩，其利视种豆自倍，吾里不种棉花，亦有以此为业者"；

养牛——"里亦有以畜牛为利者，买瘠牛，使童子牵之，朝食露草，日饲棉花饼，养一二月，则牛肥而价格，一牛尝得数金之息"；

养鱼——"湖州畜鱼必取草，籴螺蛳于嘉兴，鱼大而卖，则价钱贱于嘉兴。盖吾地鱼俱自太湖来，及鱼至市，已离地数日，少亦一二日矣，故鱼瘦而价不能不贵。……鲢鱼种临平买，草鱼、白鲢、螺青诸种本地可买"；

养猪羊——"养猪羊尤为简便"，计羊一岁所食，取足于羊毛、小羊而足，所费不过垫草，宴然多得肥壅。养猪旧规亏折猪本，若兼养母猪，即以所赚者抵之，原自无亏。若羊必须雇人砍草，则冬春工闲，诚靡廪糈。若猪必须买饼，容有贵贱不时。今羊专吃枯叶枯草，猪专吃糟麦，则烧酒又获赢息，有盈无亏，白落肥壅，又省载取人工，何不为也"①。

张履祥在《补农书》中所写《策邬氏生业》，给有田十亩、池一方、屋数楹的母子家庭策划生产事宜时说："瘠田十亩，自耕尽可足一家之食，若雇人代耕，则与石田无异；若佃于人，则计其租入，仅足供赋役而已"。因此，他的经营对策是，不种水稻，而栽培桑三亩、豆三亩、竹、果树各二亩，兼养鱼、饲羊，也体现了商业性农业的多种经营特色。

---

① 均见《补农书》补农书后，《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

这种经营方式与市场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产品大量投入市场，而且表现在经营过程中时时与市场有密切来往，连肥料都从邻近城镇购买：

——"要觅壅，则平望一路是其出产。磨路猪灰，最宜田壅。在四月、十月农忙之时，粪多价贱，当并工多买。其人粪必往杭州，切不可在坝上买满载，当在五道前买半载，次早押到门外过坝，也有五六成粪，且新粪更肥。至于谢桑，于小满边蚕事忙迫之日，只在近镇买坐坑粪，上午去买，下午即浇更好。"①

《沈氏农书》所载农家向外购买情况大致如下：

铁扒、锄头、稻铗、桑锯、桑剪——向石门镇购买；

粪——向苏州、杭州、近镇购买；

牛壅——向平望镇购买；

豆饼、豆泥——向角直镇购买；

大麦——向长兴、澉浦购买；

枯叶——向桐乡、海宁购买；

桑叶、茧黄——向南浔镇购买；

盐、茶叶、猪油——向嘉兴购买；

酒——向苏州购买。

以及篙竿、稻杠、筛匾、蓑衣、笠帽、锹蒲、猪灰、羊草、蚕蚁、蒜苗、小鸭、螺蛳、麻苎布、柴炭等。

《沈氏农书》和《补农书》所反映的明清之际嘉湖一带农家经营，所占比重最大的是蚕桑，其次是稻作，(包括其他作物)，再次是禽畜饲养。《沈氏农书》说："壅地果能一年四壅，罱泥两番，深垦到净，不荒不蟥，每亩产叶八九十个，断然必有。比中地一亩采四五十个者，岂非一亩兼二亩之息"。一亩之地用于栽桑，亩收桑叶八

---

① 《沈氏农书》运田地法，见《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九。

十个(一千六百个),以每个价银 0.09 两计,八十个计银 7.2 两。一亩之田用于种稻,亩收米三石[①],以每石米价银 1.2 两计,三石米计银 3.6 两。两相比较,栽桑的经济收益比种稻高达一倍。

嘉靖时归安县人茅坤对此早已有所关注,他说:地一亩用于栽桑,高产时可采叶二千斤,卖价为银五两至六两;中产可收一千斤,卖价为银二、三两;低产所收也不下银一、二两。而圩田一亩种稻,高产亩收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②]。当时米价大抵每石银三钱至五钱左右[③],二石米仅银六钱至一两左右,与二千斤桑叶的卖价(银五两至六两)相比,相差六至八倍;与一千斤桑叶的卖价(银二、三两)相比,相差二至五倍;与桑叶最低产(银一、二两)相比,也相差一、二倍。即使以万历十六年奇荒之米价每石银一两六钱计[④],二石米价(三两二钱)也仅及二千斤桑叶价(五两至六两)的一半左右。

张履祥在《补农书》中对种粮与栽桑作了一个估价比较:

第一,就种田与治地(即种粮与栽桑)所用工力多少、繁简而言,治地栽桑工力省。"田工俱忙,地工俱闲。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俗云:'千日田头,一日地头'是已";

第二,就种粮与栽桑的经济收益多少而言,栽桑收益大大超过种粮。"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

---

① 参看陈恒力:《补农书研究》的有关计算说明。

② 茅坤:《与甥顾儆韦侍郎书》,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一艺文。茅氏曰:"大略地之所出,每亩上者桑叶二千斤,岁所入五六金,次者千斤,最下者岁所入亦不下一二金,故上地之值每亩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犹三四金。圩田上者岁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岁所入米一石五斗,下者仅数斗,被水之年则无粒矣。即如地田、荡田,无论水与旱,岁所入三石二石,故其价亦与地相为甲乙。由此言之,则地之赋例当从重,而田之赋例当从轻。"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灾祥。

④ 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二旧闻:"吾乡万历十六年荒甚……米愈不出,价日益高,到一两六钱一石才住。"

为常耳。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者即有豆二熟"。这就意味着，"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即栽桑养蚕的收入可达种粮收入的四五倍到十几倍；就以平常年景而论，种桑一亩用以养蚕，其经济收益比种粮一亩要高二至三倍[①]。

这个估算是合乎实际的。将《沈氏农书》、《补农书》与其他文献资料综合分析，大体可知：良地一亩可产桑叶八十个，每个二十斤，共一千六百斤。一般情况，蚕出火一斤食叶百斤，作茧十斤，缫丝一斤。桑叶千斤，养蚕十斤，谓之本分蚕。亩产桑叶一千六百斤，可养蚕十六斤，缫丝十六斤。

对于上述数据可按不同时期的丝价、米价加以比较。

丝价：嘉靖中丝每两价银 0.02 两，

康熙中丝每两价银 0.03—0.04 两，

乾隆中丝每两价银 0.06—0.08 两[②]。

米价：嘉靖中米每石价银 0.3 两，

康熙中米每石价银 0.9 两，

乾隆中米每石价银 3.8 两[③]。

十六斤丝与三石米的比较结果如下：

嘉靖中：前者为银 5.12 两，后者为银 0.9 两，两者相差五、六倍；

康熙中：前者为银 7.6 两至 10.2 两，后者为银 2.7 两，两者相差三、四倍。

乾隆中：前者为银 15.3 两至 20.84 两，后者为银 11.4 两。说

---

① 张履祥：《补农书》补农书后·治地，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一生业，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生业。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灾祥。道光《震泽镇志》卷二物产。

明在米贵丝贱时，蚕桑收益仍高于粮食。

农家妇女如果缫丝后织绢，经济收益更为可观，常常超过男子从事田间劳作的收益。《沈氏农书》记载，农家妇女二人，全年可织绢一百二十匹，每匹平价为银一两，共得银一百二十两。扣除经丝（七百两）价银五十两，纬丝（五百两）价银二十七两，丝线、家伙、线腊等价银五两，口粮十两，共计工本银九十两，净盈利银三十两[①]。

涟市沈氏的经营模式大体上也反映了蚕桑在经济中的地位，请看下表：

经营项目	数量	产量	收益(银)
稻 (含其他粮食作物)	30 亩	90 石	90 两
桑	10 亩	850 个＝17000 斤	
		养蚕 600 个→织绢 120 匹	120 两
		贩卖 250 个	22.5 两
禽畜	猪羊鸭鹅鸡 58 头		55.1 两

共计收益 287.6 两，应扣除长工三人工食银 49 两[②]，织绢工本银 90 两，禽畜工本银 31.3 两，积余 117.3 两。这粗收益 117.3 两，还包括未扣除的种子、肥料在内。

农业经济的这种结构，促成了太湖东南地带“近镇人家多业机杼”。沈廷瑞在《东畲杂记》中描写濮院镇四乡的农家经营方式是有典型意义的：“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

① 《沈氏农书》蚕务六畜附，见《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九。

② 《沈氏农书》运田地法·长年：“长年每一名工银五两，吃米五石五斗，平价五两五钱，盘费一两，农具三钱，柴酒一两二钱，通计十二两。”

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1]。可见濮院镇四乡农家经营的重心在蚕桑与丝织，而农田耕作视为副业，常弃之不顾，雇石门、桐乡农家相帮。采用这种经营方式的农家，已迥然不同于一般农家，他们以生产丝绸为第一要务，是一种丝绸专业农家。

不言而喻，这种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家的富裕程度大大超过单纯务农的一般农家。双林镇四乡农家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双林镇志》说："近镇数村以织帛为业，男子或从事绞线，必常出市买丝卖绢。田功半荒，而衣帛食鲜，醉饱市肆，其佚乐远胜常农"；又说，"近村织绢乡人赚钱甚易"，"工余必入市，闻见奢华，日用易费"[2]。这种农家以织绢为主业，成为家庭经济主要来源，当然把田中农事视为无足轻重，即使"田功半荒"，也在所不惜，因此，"凡此等村落，田地不足贵"[3]。

从栽桑开始，农家经营就已经卷入商品经济之中。有的农家或以所栽桑叶不足，或自家并不栽桑，而向市场购买桑叶；而不少栽桑农家，尤其是家有成片桑园的农家，则将桑叶当作商品抛入市场。因而一到采叶季节，市镇上便有所谓叶市。大致在立夏后三日，农家无论老少都采桑贸叶，聚集市镇，形成热闹的叶市。桑叶的季节性价格差很大，即使一日之中，早市与晚市也因桑叶新鲜度的变化而价格上落悬殊。无怪乎湖州南浔人朱国祯说："其叶价倏贵倏贱，谚至谓'仙人难断'"[4]。

蚕农从叶市上买进桑叶，称为稍（亦作梢）叶。稍叶有现稍，有赊稍。预先立约以定价格，待蚕毕贸丝之后偿付叶款，称为赊稍。

---

[1] 沈廷瑞：《东畲杂记》，见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农桑。

[2]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3]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4]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农蚕。

事先支付叶款，待桑叶长成后买进，或临时以现金买进，称为现稍。大体养蚕一斤用叶八个，二十斤为一个，共一百六十斤，现稍者先期付银约四钱左右，赊稍者收茧后偿还，约付银五钱左右，外加杂费五分[1]。赊价高于现价，是符合一般市场规律的。

由于桑叶贵贱难料，而对养蚕关系又大，农家无法自己掌握，往往乞灵于神祇，事先占卜，乞问桑叶贵贱。农家都以自己栽桑为最稳当，自己不栽桑而稍叶者，称为“看空头”，往往因稍叶过多或过少，造成亏折，“竭产供蚕，毫无获茧者”[2]。

在商业性农业经济结构中的农家，受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控制愈来愈深。

首先是控制叶市。市人专有商人经纪桑叶贸易，开设青桑叶行，他们“无牙帖牙税，市价早晚迥别，至贵每一个钱至四五缗，至贱或不值一饱”[3]。嘉兴府石门县、桐乡县多产桑叶，多贩运至乌镇出售。卖叶农家从各地摇船前往，称为“开叶船”，商人大批购进，哄抬物价，称为“作叶”或“顿叶”。乌青镇上“每岁立夏设柜，见采叶船三朝开秤。开秤前发叶，每担只发七十斤或八十、九十斤。开市有头市、中市、末市，每市三日。叶价有早市、晚市、夜市之分”；“叶行上市通宵达旦，采叶船封满河港，叶行营业顺利，骤可利市三倍（俗语云：四月黄金随地滚）”[4]。濮院镇上桑叶行开在四栅近处，以利船出进，“立夏三日开市，有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凡三日。每日市价凡三变，曰早市、午市、晚市。价贱而望其长者，谓之做大眠；价贵而望其短者，谓之做小眠；其无叶而交易者，谓之空头叶……至卖叶与蚕户，待其做丝而收钱者，曰赊丝车钱”[5]。蚕

---

[1] 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七蚕桑。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农桑。

[2]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物产引《东林山志》。

[3]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舆地略·蚕桑引《西吴蚕略》。

[4]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桑叶业。

[5]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农的桑叶买卖,完全受制于商人。

其次是控制丝市,农家生产之丝,绝大部分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故时人说:"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①]。《湖录》:小满之日必有新丝出市,谚云:小满见新丝。著名的湖丝集散地南浔镇的丝行埭,"列肆购丝,谓之丝行,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焉,谓之新丝市"。董蠡舟《卖丝诗》写道:

> 闾阎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
> 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
> 商多窃揣丝当贵,亟向丝行埭上卖。
> 一车值不盈三千,牙郎吹毛恣狡猾[②]。

丝行牙侩在新丝上市时压低市价,新丝收进后,再抬价出售,称为"顿丝"。董恂《卖丝》云:"吾镇丝市最盛,向之顿叶者至此则转而顿丝焉"[③]。从属于丝行的秤手,肆意欺弄乡民,"秤手口蜜腹剑,狡猾百出,遇诚实乡民丝每以重报轻,价每以昂报低。俟其不售,出门时又倍其价以伪许之,以杜其他处成交"[④]。

再次是控制蚕农生计。商人不仅左右市价、抑勒蚕农,而且以高利贷手段插手其经营,有普遍放行的"加一钱"和"转斗米"。所谓"加一钱",大抵是农民养蚕时缺乏资金,向富室称贷,答应蚕毕时贸丝偿还,每千钱偿息一百,利息百分之十。所谓"转斗米",大抵农家在青黄不接时向富室借米,秋收后偿还,借一还二。有诗云:

> 子母偿清丝卖矣,归来依旧囊如洗。
> 青黄不转可奈何,待吃豪家转斗米。

---

① 天启《吴兴备志》卷二十六方物征。
②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二。
③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二。
④ 光绪《长兴县志》卷八蚕桑。

又有诗云：

米凭转斗接青黄，加一钱多幸已偿。

二月新丝五月谷，为谁辛苦为谁忙[1]。

乌青镇的情况与此相似。《乌青文献》说："有他方商客投牙放米，谓之牙账"[2]，于是便有"蚕毕收账"的习俗[3]。所谓"蚕毕收账"，实质是高利贷的一种形式。农家"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凡借贷契券，必期蚕毕时相偿"[4]。

除了上述形式的高利贷外，当铺也是一种重要形式。市镇上当铺遍布，蚕桑农家"大率以米从当铺中质银，俟蚕毕加息取赎"，"然当铺中持衡搭色，轻重其间，庾囤狼藉，一出一入，子钱外不止耗去加一矣"[5]。"典户出银大半，小民取给完粮，当时以成色作足丝，还时以白丝作成色，销赔屈折，苦莫可言"[6]。

除了经济手段之外，把持行市的牙侩们还凭借垄断权肆意欺诈乡民。正如康熙《石门县志》所说："民间育蚕如炼丹，力最劳瘁，成败亦在转盼间。而丝行牙侩愚弄乡民，造大秤至二十余两为一斤，银必九七八色折，折净又搭高低色银"，"官府屡行严禁，终不能止"[7]。

二、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太湖流域是传统的蚕桑区、丝织区，号称"湖丝遍天下"，绫绸

---

[1]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二。

[2]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

[3] 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二旧闻。

[4] 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二旧闻。

[5] 康熙《石门县志》卷十二外纪·丛谭。

[6] 康熙《石门县志》卷十二外纪·丛谭。

[7] 康熙《石门县志》卷十二外纪·丛谭。

绢纱行销各地，名冠一时。在丝绸商品流通过程中，太湖周边的市镇网络的集散功能与贸易机制，起着特殊的作用，令人瞩目。

大批丝绸业市镇分布于太湖东南面不大的扇形地带，其星罗棋布的分布密度，在全国各经济区域中是罕见的。最近的盛泽镇与王江泾镇相距仅六里，南浔镇与震泽镇相距仅九里，其他市镇相距也不过二三十里，例如濮院镇与王店镇、王店镇与硖石镇相距二十里，盛泽镇与震泽镇相距三十里，濮院镇与乌青镇相距三十二里，长安镇与临平镇相距三十五里，南浔镇与双林镇，双林镇与菱湖镇，乌青镇与双林镇，南浔镇与乌青镇相距三十六里，濮院镇与石门镇相距三十九里等，构成丝绸业市镇网络。

太湖周边的丝绸业市镇就其经营性质而言，可以区分为丝业市镇与绸业市镇两大类。丝业市镇著名的有苏州府吴江县的震泽镇，湖州府乌程县的南浔镇、乌青镇(与嘉兴府桐乡县合辖)，归安县的菱湖镇，嘉兴府崇德县的石门镇，杭州府仁和县的塘栖镇(与湖州府德清县合辖)、临平镇等。

震泽镇——地滨太湖，位于吴江县治西南九十里。宋代称震泽市[①]，元代仍是一个小市，景况萧条，居民仅数十家[②]。至明代成化年间，居民增至三四百家。市廛繁荣，由市成镇。弘治年间震泽镇"有巡司、寺观。居民亦千百家，自成市井"[③]。正德、嘉靖间，震泽镇已发展成"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大镇[④]。入清以后有进一步的发展，"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⑤]。

震泽镇四乡，"居民以蚕桑为业"[⑥]，农家"颇善治桑"，"视蚕事

---

① 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商税。

②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③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④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⑤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镇市村。

⑥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

綦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1]。养蚕农家又精于缫丝，"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2]。所缫之丝，较他处更光白，细者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稍粗者多用以织绫，俗名绸丝[3]。

四乡农家所生产的经丝、绸丝集中出售于镇上丝行，由丝行转销给各地客商，震泽镇因而成为蚕丝的集散中心，其繁荣状况并不亚于邻近的南浔镇。

南浔镇——西距湖州府治（乌程县附郭）六十一里，北距太湖口十八里。运河穿越而过。全镇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自北栅至南栅七里，"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郁为巨镇"[4]。它兴起于南宋，至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日趋兴盛，"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舟航辐辏"，正如万历时本地名人朱国祯所说："浔虽镇，一都会也"[5] 清人范颖通也说，"前明中叶，科第极盛"，"当蚕丝入市，客商云集"，"彬彬然一大镇会矣"[6]。南浔四乡所产湖丝极负盛名，吸引了各地客商，"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列肆喧阗，衢路拥塞"[7]。镇南栅的丝行埭，丝行"列肆购丝"，"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一方面是"乡农卖丝争赴市"，另一方面"客船大贾来行商"[8]。明清两代南浔镇成为湖丝（辑里丝）的主要集散中心。五口通商后，洋商集聚上海，湖丝销售洋庄，南浔镇实开风气之先，"一日贸易数万金"[9]。

---

[1]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物产；卷二十五风俗·生业。

[2]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生业。

[3]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物产；道光《震泽镇志》卷二物产。

[4]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5] 朱国祯：《修东塘记》，见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6] 范颖通：《研北居琐录》，见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7]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8]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

[9]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

乌青镇——乌镇与青镇相隔一水，分属乌程县与桐乡县。然而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当地人习惯合称乌青镇。南宋时已是颇为著名的商业市镇，南宋末年及元朝末年两度由盛转衰，至成化、弘治年间趋于繁荣。镇上店铺、民屋"鳞次栉比，延接于四栅"[1]，到嘉靖年间出现了"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郡"的盛况，"居民殆万家，""宛然府城气象"[2]：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四里，四周均有坊门设置[3]。

乌青镇出产的大宗商品是蚕丝。四乡所出，以西乡为上，号称辑里(七里)丝，北乡次之。小满新丝上市时，镇上丝行十分繁忙，"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贩子"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4]。至清末，"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名为辑里经"[5]。

菱湖镇——位于湖州府治(归安县附郭)南四十里。南宋时"兴市廛"，元末毁于兵火，明初复兴，设税务司，由市升镇。嘉靖、万历年间，迅速趋于繁荣，"第宅连云。阛阓列螺，舟航集鳞"，成为"归安雄镇"[6]。菱湖四乡盛产蚕丝，万历《湖州府志》说，湖丝"属县俱有，惟出于菱湖洛舍者第一"[7]。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内所产蚕丝，由农家摇丝船运载至镇，"投主交易而退"。牙行则临河收丝，"四五月间，乡人货丝

---

[1] 《乌青文献》卷首，陈观：《校正乌青志序》。
[2] 《乌青文献》卷一建置。
[3] 《乌青文献》卷二门坊、卷一疆域。
[4]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
[5]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丝业。
[6]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疆域引庞太元《菱湖志》。
[7]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

船排比而泊"，十分热闹[1]。《菪纪》说："菱湖多出蚕丝，贸易者倍他处"；小行买之以餉大行，转售外来客商，"镇人大半衣食于此"[2]。

新市镇——位于德清县治东北四十五里。兴于宋而盛于明，居民近万户，"街衢市巷之盛，人物屋居之繁，琳宫梵宇之壮，蚕丝粟米货物之盛"，为全县之冠。镇西乡、北乡盛产桑叶，农家采桑而"聚于市衢以卖"，形成叶市；新丝上市时，又形成丝市，各地客商前来贩买，生意兴隆。时人谓，湖州所出之丝以新市镇"所得者独正"[3]。

石门镇——位于崇德县治北二十里，俗称石门湾，康熙二年改崇德县为石门县，镇名改为玉溪。石门一带"上下地必植桑"，"蚕月无不育之家"。明王稚登说："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4]。明清之际，"农桑视昔更盛"，丝市兴旺，"公私取偿丝市"，"丝市之利胥仰给贾客腰缠，乃大驵小侩递润其腹，而后得抵乡民之手"。镇上除丝行外，桑叶行、绸行也生意繁忙，"岁盛时坐贾持衡，行商麇至，资以贸迁"，"商贾辐辏浮于邑"[5]。

塘栖镇——一名唐栖，位于杭州府治北五十里，与湖州府德清县接界。南宋以前南北往来取道于临平镇，塘栖僻处下塘，乃一荒村。元末修新开河，连通杭州；明正统间又修筑塘岸官道，塘栖成为交通要津，"商货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6]。嘉靖年间，"市区

---

① 天启《吴兴备志》卷二十九琐征。

②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物产。

③ 正德《新市镇志》卷一物产。康熙《德清县志》卷二市镇。

④ 王稚登：《客越志》。

⑤ 康熙《石门镇志》卷一纪疆·市镇。同上书卷七纪文、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

⑥ 光绪《唐栖志》卷一图说。

民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1]。塘栖田少，"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几无隙地，剪声梯形，无村不然，出丝之多甲于一邑，为生植大宗"[2]。

临平镇——位于杭州府治东五十七里。南宋时渐趋兴旺，"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塘栖兴起后，临平的重要性虽有所下降[3]。但明末时仍是大镇，"地不满十里，户不满万人"[4]。经济主要仰赖蚕丝，"海宁、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市贸易居多"[5]。

绸业市镇著名的有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黄溪市，嘉兴府桐乡县的濮院镇(与秀水县合辖)、秀水县的王江泾镇、嘉兴县的王店镇，湖州府归安县的双林镇，杭州府海宁县的长安镇、硖石镇等。

盛泽镇——原名青草滩，直至明初仍是一个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只有"寅亥市"——即六日一集的村市[6]。嘉靖年间才成为离县治西南六十里、居民百家的小市[7]。其后逐渐发展成"以绫绸为业"的大镇，"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康熙时一跃而为居民万户的大镇，"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商咸萃"，"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8]。乾隆时可与苏州阊门繁华商业区相比美，"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9]，成为丝绸贸易中心。

吴江县向以产丝绸著称，"蚕桑盛于两浙，所产绫绸以盛泽为集散地，"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

---

[1] 光绪《唐栖志》卷一图说，卷三桥梁。嘉靖十四年《唐栖镇通济桥碑记》。

[2]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物产。

[3]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康熙《杭州府志》卷二市镇。

[4] 沈谦:《临平记》卷一事纪。

[5] 《临平记补遗》卷三附记。

[6] 乾隆《盛湖志》卷下古迹。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

[7]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地理志·疆域。

[8] 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康熙《吴江县志》卷一市镇。

[9]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来，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绫罗纱绸运销各地，"衣被遍天下"[1]。

黄溪市——一称黄家溪，位于吴江县治东南六十里。明代是一个居民数百家的村落。清康熙年间发展成市，居民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2]。其地四五十里方圆之内，自明中叶以来就精于丝织，居民尽逐"机丝线纬之利"[3]。入清以后，丝绸业发展，"机户益多"、"雇人织挽"成风。机户所织绫绸以西机、真西、徐绫、惠绫、四串最为著名，"经纬必皆精选，故厚而且重"[4]。所产绫绸由"绸领头"收购，运至盛泽镇、王江泾镇售于牙行，牙行对花样、轻重都有特定要求，"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5]。

濮院镇——位于桐乡、秀水间，西南距桐乡县治十七里，东北距秀水县治三十六里。旧名永乐市，"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6]。明初时，"居者渐繁，人可万余家"，"民务织丝纻"，"商旅辐辏"[7]。此地以产濮绸著名。万历年间，"改土机为纱绸，制作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镇上街巷"接屋连檐，机声盈耳，里人业织者多矣"[8]。机户从事丝织业，分工极细，有络丝、摇纬、牵经、运经、刷边、织手、拽花等。织成后，出售于镇上绸行，必须由"接手"居间介绍，收取用钱若干。绸行招接来自各地的客商，有来自附近城镇，也有来自闽广、两湖及北京各地。镇上也有丝行，大多兼业绸行生意；绸行也大多兼收新丝，交机户加工，称为

---

① 康熙《吴江县志》卷十六风俗。同上书，卷十七物产。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③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④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土产。

⑤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⑥ 嘉庆《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

⑦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⑧ 《濮川所闻记》卷二织作。

"折丝"[1]。

王江泾镇——位于秀水县治北三十里永乐乡,"旧有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镇",南尽秀水县界、北据吴江县界。明万历年间已成大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2]。清初,发展成"烟户万家"的大镇,"其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嘉道间,丝织业鼎盛,由"日出千匹"一跃而为"日出万绸"[3]。

王店镇——位于嘉兴县治东南三十六里,有市河梅溪自西而东沿围三里,故又称梅里。兴盛于明中叶,乾隆时,"居民稠密,夹岸无隙地"[4]。极盛之时,号称"万宅烟火"[5]。丝绸是仅次于棉布的第二大产业,"蚕丝之利不下吴兴,户勤纺织,人多巧制"[6]。所产褚绸、画绢远近闻名,号称"王店褚绸为最,画绢亦甲于天下",薛机绸、诗胧绸亦堪称佳品。直至清末,王店所产五色丝线、绿丝、花绉、绵绸仍负盛名[7]。

双林镇——位于湖州府治东南五十四里。旧名东林村,永乐三年改名为双林镇。其时"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明末清初增至三千余户,嘉道间增至近万户,"尤称富庶"[8]。双林镇是著名的包头纱(绢)的产地,深受各地妇女喜爱,"通行天下"。明代成化年间双溪两岸农家都精于织绢,四方商贾纷纷前来采购[9]。隆庆、万历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

---

①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②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志·市镇。
③ 宣统《闻川志稿》卷二农桑。
④ 光绪《梅里志》卷一山水。
⑤ 光绪《梅里志》卷十六碑刻。
⑥ 光绪《梅里志》卷七物产。
⑦ 民国《梅里备志》卷二物产。
⑧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八户口。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
⑨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二碑碣。

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1]。乡人所产之绢，出售于镇上牙行，“黎明入市，曰上庄；辰刻散市，曰收庄”[2]。镇上还有加工绫绢的皂坊、黑坊、胶坊。蚕丝贸易是仅次于绫绢贸易的重要行业，不仅有客帮商人到此“坐庄抄丝”，而且由丝行直接经营出口业务[3]。

长安镇——南宋时已是临安府的大镇，属盐官县，位于县治西北二十五里，为运道所经，“上下两河商贾往来，舟航辐辏，昼夜喧沓”[4]。长安米市远近闻名，仅次于米市的是棉布市、绢绸市，所产绵绸、绢、丝带都很著名[5]。

硖石镇——位于海宁县治东北五十里。明末号称“烟火万户”[6]。其他兼产棉布、丝绸。所产紫微绸远近闻名，“以丹井水缫茧，色微碧”，“名松阴色，享上价”[7]。

这些市镇都各具特色，且互相沟通，形成一个丝织业的网络，因而具备了单个市镇所不可能具有的优势，在全国丝绸交易市场上始终居于领先地位。

三、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市镇作为手工业与商业中心具有商品集散的显著功能。丝绸业市镇的特征也正体现在这方面，即它首先是一个丝绸生产与交易的中心。因而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必然不同于农村以

---

①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引《双林志》。

②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④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

⑤ 同治《修川小志》卷下物产。

⑥ 《硖川续志》卷十一艺文。

⑦ 《硖川续志》卷五物产；卷十九丛谭。

及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城、县城，迥然有别于当时仍占优势的传统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而更具有时代的特色与生机，体现出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这种机制在丝绸业市镇的三大支柱——牙行、客商、机坊的联系中显示得淋漓尽致。

1. 牙行："聚四方商旅"

牙行作为商品生产者与客商之间的中介，一面招揽生产丝、绸的乡人，一面招接四面八方前来购买丝绸的客商，左右着市面繁荣与生意兴旺，成为市镇商业的主体。它资本雄厚，控制乡人与机户的生产、经营，垄断了市场贸易，成为市镇经济盛衰标志。

濮院镇可以作为一个典型。镇上牙行种类繁多，有绸行、丝行、桑叶行、烟叶行、六陈行、麻皮行等。

绸行又称绸庄，四乡农家及镇上机户所生产的绸均由绸行收购，或由"接手"居间介绍，或由绸行"出庄"收绸。《濮川所闻记》说，"绸既成，有接手持诣绸行售之，每一绸分值若干，谓之用钱"；"绸行日向午赴市收绸，谓之出庄；其善看绸者，谓之看庄；归行再按，谓之复庄"[1]。绸行收绸后，交付练坊练熟，然后转销于各地来镇贩卖的客商。绸行招接的客商来自全国各地，"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因而绸行也分别有京行、建行、济宁行、湖广行、周村行之别，而以京行财力最雄厚。"京行之货有琉球、蒙古、关东各路之异"[2]；清末，濮院镇绸庄为扩大经营范围，纷纷前往苏州、上海设立分庄，"以便京帮客商之接洽者"[3]。

丝行专门收购农家所产蚕丝。每当新丝上市，"乡人抱丝诣行，交错道路。丝行中着人四路招揽，谓之接丝日，至晚始散"[4]。

---

[1] 《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

[2] 《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沈廷瑞：《东畲杂记》。

[3]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4] 《濮院琐志》卷六岁时。

丝行收购之丝，除销于本地机户外，大量转销给苏州、上海、杭州、绍兴、南京、镇江、盛泽等地各帮丝商。丝行大多兼业绸行生意；绸行也兼收新丝，不过绸行并不转销新丝，而是交机户加工成绸[1]。

桑叶行，设于镇东西南北四栅，以利船只进出。立夏后三日，新叶上市，各桑叶行纷纷开市。沈涛《幽湖百咏》诗曰："青叶行开四市梢，客船衔尾恣喧闹"。叶市有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共三日，三市共九日；每日又分早市、午市、晚市，市价三变。蚕户买叶大多不付现钱，待新丝上市时付清，称为"敲丝车钱"。

绸行、丝行、桑叶行构成丝绸业市镇的基本特色。由于濮院镇西南乡盛产烟叶(俗称桐濮烟)，"乡人种此者利较桑麻尤厚"，乾隆以后成为大宗出产。镇上西南市开设烟叶行购进烟叶，由江淮客商运销至江北各路。每当烟叶上市，各烟叶行在栅外揽收，桥头、路口随地交易，喧哗如市，称为"出庄"[2]。麻皮行多设于东市，收购麻皮。六陈行，经营米、麦、豆、杂粮，兼业米铺。由于"本地所出之米恒不足供本地之食，故必赖客米接济"[3]六陈行不同于其他牙行，起着引进客米的作用。

在丝绸业市镇上，经营丝绸贸易的牙行数量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双林镇上招接各地丝商的牙行，称为广行或客行，遍布于镇四栅。"丝业牙行聚四方商旅，饶富立致"，"在本镇经纪者，以丝、绵、绸、绢为盛，有资设店获利固易，而精其业者，即空手入市，亦可日有所获"；"客商赍银来者动以千万计，供应奢华，同行争胜，投客所好，以为迎客，无所不至"[4]。小满后闽广大贾投行收买新丝，头蚕、二蚕是大市，往往"日出万金"；中秋节后客商大多返归，为其服

---

①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② 民国《濮院志》卷十五物产、卷十四农工商。

③ 民国《濮院志》卷十五物产。

④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务的夥友也四散，此时镇上丝市称为"冷丝市"，陆续零星发卖，可与次年新丝市衔接，故当地人说："买不尽湖丝"。每逢客商多而货物少时，"行家雇船下乡收买，谓之出乡"；又有代行家收买的"抄庄"，有既买而卖与各行的"撥庄"(或曰贩子)，还有代撥庄充作乡货上行出卖的"撑旱船"，有平时零卖于机户的"折丝庄"①。

菱湖镇上的丝行，有大行、小行之分。每当新丝上市，农家以丝船载丝至镇，"投主交易"；牙行则临河收丝。"四五月间，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②。收丝的牙行，有财力雄厚的大行，也有小本经营的小行。小行又称"钞庄"，它所收购的丝主要是转手给大行，一部分出售给买丝客人。此外还有"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③。

南浔镇的情况大体类似。丝行因其销售对象及经营方式的不同，而有京庄、广庄、经庄、划庄、乡庄等。时人有诗曰："阛阓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丝经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④京庄也称京行，专门供应苏杭两地织造局所需上等细丝，织成绸绢后解京，故称京庄(行)。广庄也称广行，专门招接广东商人，也称客行。乡庄也称乡行，指专门"买乡丝者"。经庄也称经行，指专门"买经造经者"，经营专售苏州机户的苏经及专售广东商人的广经。划庄又称小行，专门"买之以饷大行"。此外还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的"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从"镇人大半衣食于此"的描述来推论，南浔镇依赖丝行谋生者当占全镇人口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丝行在南浔镇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乌青镇上，"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⑤。丝行营业额

---

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② 天启《吴兴备志》卷二十九琐征。

③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舆地略·物产。

④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

⑤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

巨大，多于小满时开秤，发售于客帮商人，收取千分之十八的用金。咸同间的张同盛、徐添源，光绪初的沈永昌都是"囤丝巨万"的大丝行[1]。旺季过后，"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谓之贩子"[2]。尤为特殊的是"官丝行"，即承包嘉湖两府所办贡丝的牙行，"每年新丝上市，由官丝行向县领价购丝，解缴嘉郡收丝局委员验收转解"[3]。

黄溪市上的丝绸牙行经营规模较小，称为"丝领头"、"绸领头"。丝领头是专门经营蚕丝买卖的牙行商人，"其开设牙行代客售丝者，谓之大主人；牵机户来买者，谓之小主人"。绸领头是专门经营绫绸买卖的牙行商人，机户所产绫绸由绸领头收购后，运至盛泽镇、王江泾镇，转售于绸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转手贸易[4]。

盛泽镇上绸行极盛，据明末苏州人冯梦龙描述："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5]。证之以地方志，冯梦龙所说并非小说家言。盛泽镇上的绸行，不仅要收购四乡所产绫绸，而且吴江一县所产绫绸均以盛泽为出口中心，集中向外输出。《吴江县志》说，"吴绫见称往昔"，"今郡属惟吴江有之，邑西南境多业此"，"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6]。要承担各地富商大贾巨大的购买力，如果没有千百余家绸行，是难以想象的。盛泽镇经济状况，取决于"商客之盛衰"，亦取决于绸行生意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

---

①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②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

③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二土产。

④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⑤ 《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⑥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物产，将盛泽镇误写作震泽镇。

于此"[1]。

2. 客商："坐贾持衡，行商麇至"

丝绸业市镇所出产的丝绸行销全国乃至海外，各地客商视为财利之渊薮，纷至沓来，镇上富商大贾云集。以产濮绸闻名的濮院镇，"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绸绢为生，为都省商贾往来之会"[2]。"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3]。一年之内的贸易额高达白银数十万两之多是惊人的。康熙时绸价为每两值银一钱[4]。一匹绸轻重不等，重的一匹十六七两，轻的一匹二三两[5]。姑以每匹十六两计，一匹售价为银一两六钱，十万两银可买六万二千五百匹绸，五十万两银可买三十一万二千五百匹，一百万两银可买六十二万五千匹绸。清初人说濮院镇"日出万绸"，每天的贸易额就达银一万六千两，全年贸易额必超过百万两无疑。何况乾隆时人沈廷瑞在《东畲杂记》中就指出"日出万绸"的估计偏低，"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由此可以推知，各地客商全年的购买力当在白银数百万两左右。

南浔镇的湖丝贸易额更为惊人。温丰《南浔丝市行》说："一日贸易数万金"[6]，如果以乾隆时丝每两值银八分计，一万两银可买丝十二万五千两，十万两银可买丝一百二十五万两，南浔镇一天出售的丝当在数十万两至百万两左右。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以每天贸易额数万两白银计，整个旺季的贸易额约为五百万两白银上下。这一估算，可以从另一资料得到证

---

[1]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2] 康熙《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3]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物产。
[4]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
[5]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6]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

实。徐有珂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1]。以每包一千三百二十两计，十万包有丝一亿三千二百万两，如果按一万两银可买丝十二万五千两计，十万包丝的售价为白银一千零五十六万两。就是说，湖丝极盛时的出口额达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由此可见"一日贸易数万金"并非夸张之词。

从上述两个典型市镇的剖析所显示的各地客商的购买力，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这类拥有巨额资金的富商大贾的经营方式，当然不会停留在一般行商的水平上，他们凭借经济实力与长年累月的经营基础，都在各市镇上建立了立足点，不少人由行商转化为坐贾。塘栖镇上"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2]。徽杭商人在镇上经营典当业、粮食业、蚕丝业者比比皆是。其他各镇也大多如此。这些客商在镇上长期经营工商各业，为维护自身利益，陆续设立了长期性的商务公共机构——会馆、公所。南浔镇有：

宁绍会馆——在北栅外下坝，嘉庆中建，咸丰时毁，同治五年重建，光绪十六年复建；

新安会馆——在南栅寓园旁，道光十一年建，咸丰时毁，同治四年重建；

金陵会馆——在南栅广胜桥东北，光绪十一年建；

闽公所——即福建会馆，在南栅陈家墩；

丝业公所——同治四年丝商庄、李、吴、华等公建。

此类丝业公所，"以收解捐税，维护丝商为职志"[3]。与双林镇上的绢业公所（新公馆）属于一种类型。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客商

---

① 民国《南浔志》卷四河渠，徐有珂：《重浚三十六溇港议》。

②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③ 民国《南浔志》卷二公署。

与牙行合二而一了,二位一体了。双林镇上的绢业公所,本名新公馆,位于新绢巷,雍正四年由各绢行公建,各绢行每日午前在此会集,"收乡人售绢,位先后有序"。咸丰时被毁,光绪二十八年由绢业商人出资重建,改称绢业公所[1]。

双林镇除了新公馆以外,还有旧公馆,本名泾县会馆,康熙年间由宁国府泾县绢商朱、胡、洪、郑、汪、王及旌县绢商列公建;泾县会馆,嘉道年间泾县商人在镇上开设皂坊,加工生绸,专制绫绢,集资筹建会馆。此外还有新安义园("凡徽州六县之商人客死者皆得入殡")、金陵会馆、宁绍会馆、米业公所、药业公所等[2]。各地商人在双林镇上的势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3. 机坊:"雇人织挽"

由于各地对太湖周边市镇所产精美丝绸的需求与日俱增,个体劳动的家庭手工业显然无法适应,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手工作坊如机坊、染坊之类大量涌现,这是明中叶以来值得注意的重大变化。乾隆《吴江县志》在谈及绫绸之业的发展时指出,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3]。盛泽、黄溪一带富裕机户"雇人织挽",拥有若干张织机,形成规模不等的机坊。盛泽镇上受雇为人"佣织"的雇佣劳动者有机工、曳花儿等,人数多达几千人。乾隆《盛湖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4]。不仅有受雇于机坊的佣织与曳花,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轴坊也有大批雇佣劳动者。清末时镇上"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

---

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

② 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

③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

④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1]。盛泽镇鼎盛时有万户人家，受雇于机坊、炼坊、染坊等作坊的雇佣劳动者达数千人之多，几乎一半人家以此为生。

黄溪市的富裕机户所开机坊也"雇人织挽"，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机工每天清晨"立长春、泰安二桥，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2]。这些待人雇织者多有一技之长，生意繁忙时，机户为招徕机工，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佣工"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生意萧条时，机户雇工减少，这些"无人雇织"者，便"沿途求乞以为常"[3]，显然是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吴江县这种"走桥"、"找做"，在长洲县一带称为"唤找"。"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有他故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4]。

濮院镇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拥有较多织机和较雄厚资本的机户，采取作坊形式经营，雇佣各种工匠。镇上每天都有大批待雇者，太平巷是雇工待雇的集结地点，也就是劳动力市场。《濮州所闻记》说："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拽工，每晨集此以待雇"[5]。《濮院琐志》说，镇上工匠"或遇无主，每早向各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6]。以炼绸为业的炼坊，"每坊佣者数十人，名曰炼手"[7]。由于雇佣劳动的盛行，分工越来越细，有络

---

① 沈云:《盛湖杂录》。
②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③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上·风俗。
④ 康熙《长洲县志》卷三风俗。
⑤ 《濮川所闻记》卷二地宇·坊巷。
⑥ 《濮院琐志》卷一机杼·卷七杂流。
⑦ 《濮川所闻记》卷三人物·织作。

丝、织工、拽工(挽工)、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接收、修绸、看庄,"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1]。这或许就是濮绸质地精良的重要原因吧!

市镇作为新兴的商品经济中心,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镇上牙行、店铺、作坊林立,各地客商云集,商品与资金的流通不仅数量大而且效益明显,又为新型的雇佣劳动提供了温床,手工作坊分工细密,生产出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丝绸产品。由此可见,丝绸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已站在当时经济发展的前沿上。

四、丝绸业市镇的盛衰

丝绸业市镇的盛衰,与国内外市场的丝、绸贸易有着直接的牵连。

乾隆《吴江县志》有一则引自《黄溪志》的资料,是关于丝、绸贸易价格的记录:

> "明嘉靖中,绫绸价每两银八九分,丝每两二分;我朝康熙中,绫绸价每两一钱,丝尚止三四分;今(按:乾隆中)绸价视康熙间增三之一,而丝价乃倍之,此业织绸者之所以生计日微也。"[2]

由此可见,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乾隆年间,丝价由每两值银二分增加到银六分至八分,增长三至四倍;而绸价由每两值银八九分增加到一钱三分,增长仅六至七成(即60%至70%)。

这种情况,与国内及国际市场对丝的需求量日益增大有密切的关系。

从康熙中叶以来,丝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乾隆时

---

[1] 《濮院琐志》卷一机抒。

[2]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一生业。又见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

已成为仅次于茶的出口商品。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在一个奏折中说：

> "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缎等货自二十万余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卖与各行商，转售外夷，载运回国。"[1]

从广州出口的湖丝，每年价值白银数十万两至百余万两上下。由于出口有利可图，太湖周边丝绸业市镇出产的湖丝，经由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外销，致使国内市场丝价日趋昂贵。乾隆二十四年李兆鹏指出："近年以来，南北丝货腾贵，价值较往岁增至数倍"，"民间商贩希图重利出卖，洋艘转运，多至盈千累万，以致丝价日昂"[2]。

鉴于国内市场丝价日益昂贵，政府申令限止出口。乾隆二十七年清高宗颁发谕旨：前因出洋丝斤过多，内地市价翔踊，是以申明限制，俾裕官民织纴"[3]。所谓限制，其实是官样文章："每船准其配买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4]。两年以后，便宣布弛禁。这固然是考虑到前任浙江巡抚庄有恭的申请：体察杭、嘉、湖三府民情，以丝斤弛禁为便"[5]，其实恰恰反映了湖丝出口的经济发展趋势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此后的输出量与输出价格都在不断增长。

英国学者马士(H.B.Morse)对康熙、乾隆时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购买湖丝的价格有很详细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丝价渐趋上

---

1 《史料旬刊》第十五期，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

2 《史料旬刊》第十五期，李兆鹏折。

3 《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三十九，又见《东华续录》卷五十五。

4 《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三十九，又见《东华续录》卷五十五。

5 参看中山美绪：《清代前期江南的物价动向》，载《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七卷第四号。

涨的基本趋势，兹列表于下[1]：

年代	价格[两(银)／担(丝)]	年代	价格[两(银)／担(丝)]
1699	137.0	1764	260.0—290.0
1700	137.2	1765	269.0
1701	195.0	1766	265.0
1702	140.0	1767	260.0
1722	150.0	1768	265.0—294.0
1723	145.0	1771	272.5
1724	155.0	1773	272.5
1730	159.6	1774	272.5—277.5
1731	155.0	1777	270.0
1750	175.0	1780	265.0
1753	175.0	1783	275.0
1754	155.0—220.0	1784	310.0
1755	190.0	1785	290.0—320.0
1756	192.5	1787	280.0
1757	187.0	1792	312.0
1759	198.0	1792	255.0
1763	240.0—250.0		

(资料来源：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n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1926—29, Vols. Ⅰ.Ⅱ.Ⅴ)

五口通商以后，湖丝大量经上海出口，南浔镇丝商到上海经营湖丝出口贸易者甚多，如庞云缯、陈煦元、蒋堂(维城)，其中陈煦

[1] 参看中山美绪：《清代前期江南的物价动向》，载《东洋史研究》第三十七卷第四号。

元，“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倚为长城”[1]。从上海出口的湖丝数量大体是逐步增长的，请看下表[2]：

年代	数量(包)	年代	数量(包)
1845	6,433	1853	58,319
1846	15,192	1854	54,211
1847	21,176	1855	56,211
1848	18,134	1856	79,196
1849	15,239	1857	59,986
1850	17,243	1858	85,970
1851	20,631	1859	67,874
1852	41,293		

(资料来源：H.B.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Ⅱ.P.366)

年代	数量(包)	年代	数量(包)
1845—1846	18,600	1853—1854	61,984
1846—1847	19,000	1854—1855	51,486
1847—1848	27,377	1855—1856	50,487
1848—1849	17,228	1856—1857	74,215
1849—1850	16,134	1857—1858	60,736
1850—1851	22,143	1858—1859	81,136
1851—1852	23,040	1859—1860	69,137
1852—1853	25,571	1860—1861	88,754

① 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一人物。

② 参看河鲭源治：《太平天国占领下南浔镇的湖丝贸易》，载《东方学》第二十二辑。

续表

年代	数量(包)	年代	数量(包)
1861—1862	73,322	1863—1864	46,863
1862—1863	83,264	1864—1865	41,123

(资料来源: Lindley, The History of Taiping Revolution, Vol Ⅱ.P.838—839)

从上述两表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1856年至1863年间,由上海出口的湖丝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1864年以后,输出量逐渐下降,直到1875年以后,才渐趋上升。请看下表[1]:

年代	数量(捆)	年代	数量(捆)
1860—1861	80,336	1870—1871	31,618
1861—1862	72,492	1871—1872	46,753
1862—1863	64,133	1872—1873	51,157
1863—1864	37,259	1873—1874	52,345
1864—1865	14,368	1874—1875	65,141
1865—1866	41,792	1875—1876	68,748
1866—1867	44,563	1876—1877	71,462
1867—1868	49,368	1877—1878	53,639
1868—1869	59,567	1878—1879	61,487
1869—1870	41,816		

(资料来源: 1860—1866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65.P.114.

1866—1875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4, Shanghai.P.104.

1875—1879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9, Part 1, China. P.59)

按:此表所用单位"捆",与上两表所用单位"包",基本相似。

1 参看秦惟人:《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输出》,载《中嶋敏先生古稀记念论集》下卷(汲古书院,1981年)。

一捆等于八十斤，而一包等于一千三百二十两[1]，约合八十二斤半。因此这些统计数字是可比较的。

众多的资料表明，进入1880年以后，出现了湖丝的全盛期，1890年以后的几年间，达到了湖丝出口的高峰，年输出量达到十万担上下，其后稍有下降，1905年为六万担左右。1910年，每年为四万担左右；1920年，每年为三万担左右[2]。由此看来，刘大钧氏所说：1870—1920年，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于是辑里丝价雀飞，桑蚕业愈盛"[3]，是言之有据的。

湖丝的出口价格的上升幅度也相当可观。前引马士(H.B.Morse)关于1699年至1792年出口丝价的统计表，最高价为每担银320两。而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丝价的明显上升势头，1877年三等七里丝的上海价格为每担410—610两(银)，1879年四等七里丝的上海价格为每担360—475两(银)[4]。1880年代以来，丝价略有下跌，但仍较1699—1792年间的价格为高。1885年上海四等七里丝每担价格为425两(银)至390两(银)之间，1889年为380两(银)至430两(银)之间[5]。

清末民初，太湖流域的蚕桑丝绸业仍在继续发展，丝绸生产与贸易的中心还是原先的那些丝绸业市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些经济学者所编纂的文献资料，不仅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丝绸贸易与丝绸市场的实态，也可以看到丝绸业市镇鼎盛时代的实态。

---

[1]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

[2] 参看秦惟人：《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输出》。

[3]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局，1938年。

[4]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1877 P46.1879.P.57.参看秦惟人：《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输出》。

[5]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 1885—1889.Shanghai，参看秦惟人：《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丝的输出》。

刘大钧所撰写的《吴兴农村经济》一书，是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代表作，此书作为"中国经济统计研究丛书"之一，于一九三八年出版[1]。明清时代湖州府的乌程、归安二县，民国时代并为吴兴县，是传统的丝绸业地区，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植桑饲蚕最为适宜。境内农民以蚕桑为正业，农作物不甚重视，每年禾稻仅一熟，丰年时米仅自足，荒歉时不敷。农户中，兼事农、桑者占96.86%，专事蚕桑者占2.27%，专事农业者占0.33%，不事农桑者占0.54%[2]。

据刘大钧的调查研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内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即蚕桑与稻作的比例由7:3退而成3:7。刘氏如此写道：

> "民国十年前后，蚕桑产销最盛时代，吴兴农户蚕桑与种稻比较，蚕桑收入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
>
> 民国二十三年，稻收入占七成，蚕桑收入占三成。
>
> 种稻收入占69.91%。卖桑收入占0.60%，卖茧收入占2.64%，缫丝收入占26.85%，三者合计占30.09%"[3]。

这一转变显示了吴兴蚕桑业的趋于衰落。这种估计与1935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志》的估计是一致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民国)二十年以后丝绸业相继衰退，价格惨跌，养蚕户、养蚕数大减，二十一年仅及十九年之半。农民掘去桑树，改种其他作物"[4]。

刘氏《吴兴农村经济》所反映的正是这一转折时期的状况。

关于蚕桑丝绸，刘氏有如下论述：

桑——农民十九以饲蚕为业，湖桑闻名于世。四乡除高亢之

---

[1]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发行，上海文瑞印书馆1938年出版。

[2] 《吴兴农村经济》第29页。

[3] 《吴兴农村经济》第29页。

[4]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出版，第34—35页。

地遍植桑树外，尚将稻田泥土，垫高桑地，俾桑树易长。大约每户有地十亩，桑地占三、四亩。全县桑地占征粮田地的34.86%[1]。桑地545,569亩，以亩产十担计，春季可产叶546万担，尚可输出(由乌镇、练市输往邻县)。

蚕——东南乡最盛。北乡大钱、小梅一带多以织绸为生，无暇兼顾养蚕。全县蚕户数占总户数75%以上，占农户数95%以上[2]。

茧——每户产茧量，多至四五百斤，少至四五十斤，平均一百余斤。据丝市之盛衰，定卖茧或缫丝之多少。客籍农户不惯缫丝，出卖鲜茧于茧行。茧行各大镇俱有，民国十八年有106家，茧灶1914具。

丝——湖丝又名白丝，亦曰辑里丝。辑里原为南浔附近介于乌镇间一小镇，居民数百家，市廛栉比，农人栽桑育蚕，产丝名甲全国。辑里丝之称起于明洪武年间，至清道光二十二年五口通商后，销售上海洋庄转运出口，其名始显。常年出口二千至三千五百担左右。嗣后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洋庄丝无形淘汰。向之代洋行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南浔、震泽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做成格子，称为花经，专销美国。其时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日出经丝十两，每百两为一经，每十五经为一包，约重公秤一千五百两。

绸——湖绉为大宗，即绉纱，已有七八十年生产历史。绸质匀密，运销平、津、大连、烟台、广东、长江各埠及苏、沪、杭一带。全年产九十万匹。

全盛时代城厢内外有织绸厂六十余家，机户六千余家，零机一

[1] 原注：《湖州月刊》六卷九、十合期。
[2] 原注：《中国经济志》吴兴部分。

万三千余架。近年绸厂不过二十余家,电机四百余架,旧式洋机五百余架,织机约六千余架。家庭工业所产之绸,或系绸庄雇织,或系外路庄客定货,或自行向绸庄兜销,或由掮客收买,方法不一。绸庄盛时约百余家,近则不过四五十家,大多系代办性质,从中赚取佣金。

绫绢——有花曰绫,无花曰绢。双林镇之西栅外村落约有千余家,每户有木机一二架,每日可出绫一匹或绢三四匹。多供帝室补壁及奏章、裱画、装书之用。

包头纱、丝绵吐头——包头纱一名黑纱,产双林镇。丝绵吐头,俗称下脚。

刘氏在论述蚕丝业繁荣之由来时指出:

湖州一带,地近太湖,土沃桑茂,丝业之盛冠于他区。所产之丝俗称湖丝,亦曰白丝,又名辑里丝。实则南浔附近百里之内,皆产辑里丝。

通海以前,辑里丝限销国内,供织绸之用,营业不盛。迨东印度公司来华通商,始有邑人冒险航海至广州,经公行之手与英商交易[1],一时无不积资甚巨。道光二十二年,上海辟为商埠,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

太平天国起兵,至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平浙江,为时历十三年,湖州受兵燹,桑地委弃。但在此时,出产辑里丝之湖州人士,相率避居上海,与外人接触,外商需求辑里丝既殷,乃即经营远销——肇日后贩丝致富之基。

1864年后湖州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招民垦殖,来者多湘人,不善育蚕,本地人务蚕桑。1870—1920年,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兴畅,蚕桑区农民繁荣,乃造成湖州蚕桑事业之全盛时期。于是辑

---

[1] 原注:Morse, H.B: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to China 1635—1842, Cambridge.

里丝价雀起，桑蚕业愈盛。有资产者以低价向农民购丝，以高价向上海洋行售出，一转手巨富可立致。小富一跃为中富，中富一跃为巨富，一时崛起者甚众。

湖丝销售洋庄，南浔镇实开风气之先。当时湖州六属丝行，几皆为南浔人所包办，由湖州出口，亦以南浔为中心。南浔镇上略有资产者，皆由是起家。财至数万、数十百万，人文蔚起，炳然与巨邑相埒。故时人谓“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①。

湖州一带蚕丝贸易既为南浔人士所专营，自为南浔商贩所独得。同为一两丝，育蚕农民所得，不及商贩所入十分之一。以丝商起家者有“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之称。皆资本雄厚，为自与丝通事，或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为“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为“牛”，三十万以上不过五十万者称为“狗”。

家产百万以上实有五家，刘氏、张氏、庞氏、邢氏、邱氏。邱氏仅一百万，庞氏一百六十万，邢氏四百万，张氏一千二百万，刘氏二千万。

八牛、梅、金、谢、张、蒋、顾、李、桂八户，顾、李、桂各数十万，蒋五六十万，张七八十万，顾百万，梅一百六十万。

七十二只狗，与事实不合，大抵为孙氏、朱氏、邵氏、邱氏、林氏等户。

南浔镇富户以丝起家之后，构筑园林成风。小莲庄，光绪中刘镛所筑，有池广十亩。张氏适园，光绪中张钧衡所筑。庞氏宜园，光绪中庞元济所筑。梅氏述园，光绪中朱瑞莹所筑，今归梅氏。邱炳恒半亩园，邱炳华盏园，亦小有名气。

刘氏自刘镛（贯经）以丝商起家后，除在本乡购土地外，还经营盐业、当业。

张氏（竹斋）以丝商起家，亦兼营盐业、当业。

---

①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22页。

邢赓星、邱仙槎,丝业起家,兼营当业。

庞元济(怡斋)还投资设龙章造纸厂于嘉兴。

梅峨乡仍以丝厂为业。

全盛时代吴兴民间生活颇为安逸,衣必丝绸,食必鱼虾,远近不及。雀战(按:麻将)、吸烟、听书、看戏、优游闲散,尤为湖人生活常轨,崇尚奢靡,铺张扬厉。民间打油诗曰:

丝行店伙真写意,

头发梳得光,

咸蛋吃个黄,

鱼虾喝点汤[1]。

三十年代湖州蚕桑业日趋衰落,农民因蚕桑无利可图,减少养蚕,蚕茧收获量渐减。往昔丝业盛时,南浔镇物阜民殷,农村经济超乎其他地区之上。三十年代蚕桑缫丝收入下降,茧丝价低落,销路骤减,南浔受害最甚,经济水平下降至双林镇、菱湖镇之下。双林镇虽仍有织绸、织绡、裱绫等业,但也日趋衰落。菱湖镇丝业衰退后,以浅水养鱼业弥补。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纂的《中国经济志》,有关吴兴县的丝绸业的调查资料也极为丰富。以下资料颇值得注意:

青桑叶行各市镇均有,尤以城区、南浔、菱湖、双林为最多

民国十九年蚕户十二万四千二百三十七户,占全县总户数75%以上,占全县总农户数95%以上

民国十九年产茧三十万担,有茧行九十五家;二十年产茧二十万担,有茧行四十一家;二十一年产茧十二万担,有茧行十家;二十二年产茧十万担,有茧行九十九家;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压迫,丝茧价低,绸绉滞销,农村经济几濒破产,因此田产降落,问津无人,农民"种田负债",田主"置田受

1 原注:湖社《十周年纪念刊论著》第26页。

累"[1]。

在论及湖丝贸易时,《中国经济志》写道:

湖丝以辑里丝为代表,有细丝、肥丝之别。细丝以南浔及太湖沿岸各地出产最多,尤以南浔辑里所产丝质更佳,每年多运销上海转运外洋,或由南浔厂家制成经条(经丝)出售,每年达数百万元之谱。肥丝多产菱湖一带,丝质粗肥,为织绸之原料;

丝之交易,有丝行、丝庄、丝秤之分。丝行、丝庄资本较大,多做销运外埠生意。丝秤俗称掮客,多就地收买,转售与机户,或代客买卖,从中取佣。丝行、丝庄多汇集于城区,计有八十三家。南浔丝庄三家,袁家汇有用丝(按:即用户丝,以别于洋庄丝)行庄十八家,菱湖有用丝行庄七家,荻港有用丝庄三家,织里有用丝秤十三家[2];

数年前绸业兴旺时代,全县共有绸厂六十余家,机户六千余户,今所存不及一半。机坊机户多散处于城区、大钱、小梅一带,其他各地有亦不多。全县共有机坊机户约三千余家,机数约六千余家,惟平时开工仅半数。机户全系家庭工业,全年工作仅八个月(十一、十二、三、四四个月停工)。大约每机每月可出绸四匹(每匹长七丈),年可出四十匹。所织之绸,或系绉庄雇织,或系外路庄客定织,或自行向绉庄出售,或携至城内各茶馆由掮客收买。机工多镇江人,绍兴、杭州、本地人次之。工资以尺论,每尺洋六分,膳食自理。人数约五千余人。牵经工人全县亦有千余人。每牵经六十三丈(约九匹)给工资一元半,工人一天可成;

绫绢产于双林镇之西栅外各村落,约有千余家,每户有木机一二架,每日可出绫一匹,重约二三两,每匹价一元至二元不等。绢每机日可织三四匹,每匹重约五六钱,每匹价约二角至五角,长约

---

[1]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32—40页。

[2]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分册第37—41页。

二丈，宽约二尺。绫绢庄二十三家。

包头纱，一名黑纱，产于双林镇。每家有木机三四具，每天每机约可出纱四五匹，每匹约长一丈七八尺，价约八角至一元。原料全系野蚕丝(作茧于枯桑叶)，缫丝皆雇镇西栅外乡之人[1]。

嘉兴地区的情况也相类似，据《中国经济志》记载：

嘉兴桑树遍地，计157,950亩，年产150万担以上，可供输邻县。

叶行依性质分青叶行、小叶行。买卖习惯，大抵于年底岁尾，蚕农向行家预借叶银，讲明价格，届时依约履行。叶行数月之间获利一倍。三十年代初，叶价日跌，叶行无利可图，相率停业。

育蚕农民几遍全邑，为一年重要收入。当蚕汛时，莫不高利借贷、或典质，以为育蚕资本。但黄金时代已过，三十年代初，育蚕者莫不亏折，育蚕户、育蚕数大大减少，蚕户视育蚕为畏途。

本邑产茧，历称丰盛。二十年代中叶，为茧产黄金时代，全邑有茧行105家，每行资本十余万至二三万，年产茧值500万元左右。近年(按：三十年代初)茧价惨跌，茧额减少，远非昔比。1933年鲜茧产量90,000担左右，不及1932年的2/3，不及1931年的1/2[2]。

蚕农土法缫丝者为数不少，土丝大半经丝行转销各地。丝行以新塍镇、王江泾镇为多，新塍镇有康恒盛、大生信记、刘正顺、张洪顺、义记、万源德、元记、纶顺等行，王江泾镇有同盛、德记、裕顺、信记、鹤记等行，资金以同盛行最多，达26,000元，其余各行大多数千元，少者仅数百元[3]。1920年纬成公司在南堰盐仓桥设立分

[1]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分册，第42—47页。

[2]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出版，第39—42页。

[3]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第44—45页。

厂，收买鲜茧，缫丝出售。自此在土法缫丝之外出现了丝厂洋法缫丝。继起者有厚生、秀纶、福兴等厂。厂丝售于上海。迨后丝业衰落，各厂相率停业、改组[1]。

绸盛产于王江泾镇、濮院镇。王江泾镇毗邻盛泽镇，所产绸缎多由盛泽转销，现有机户千余家，织机千余台，多由妇女操作。织机时开时停，平均每台每月约产十三四匹，总产量约十四万余匹。由机户直销盛泽镇者占 80%，经绸庄转销上海者占 20%。织造工人，每二日织一匹，每匹工资八角。另有雇工择经、结头。濮院镇所产濮绸（俗名湖绉）为嘉兴特产，颇负时誉，销路亦佳。近年（三十年代初）营业凋落，织机约三百余台，每年产量约一万余匹[2]。

1935 年出版的《江苏省鉴》对这一地区蚕桑丝织业的历史传承，及其渐趋衰落，记述甚详。

关于桑叶买卖。农家桑叶固多自用育蚕，亦有以叶出售者。桑叶价格视蚕汛之丰歉而高低。桑叶买卖可分为两种，一种为预定，于阴历年关之前预先订定；一种为临时购买，每年时间不过半月。双方向由叶行居间交易，叶行对于农民，可以代垫叶款，俟茧出售后归还。叶行从中收取佣金，有取于买卖双方，也有单取于卖主者。叶行资本极少，店员均系临时雇佣。有租店屋营业者，也有在街旁设营业场者。营业分春秋两期，春期约十五天，秋期约七天。

关于鲜茧买卖。各农家所产鲜茧，除自行缫行出售或自织绸缎者外，多售与茧行。茧行或转售于当地丝行，或运至上海出售。茧行不论大小，均须纳牙税置牙帖，每年更换一次。1928 至 1930

---

1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第55页。

2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第57页。

年间，茧行以无锡最多，武进、溧阳次之，吴县、江阴、宜兴又次之[1]。

关于丝织业。在江宁、吴江之盛泽、镇江、丹阳、吴县各地殊为发达。江宁缎业始于明代，极盛于乾隆、咸丰年间，衰落于1924年以后。此种缎业纯为家庭手工业，仅有机户，每户各备织机数架，代城内各缎号织造。织缎所用生丝，分经丝、纬丝两种。经丝须用上等细丝，为织面之用，大多来自浙江海宁、硖石、辑里、新市、塘栖、王店及桐乡。纬丝系用肥丝，为织底之用，大多来自江宁本地及溧水、句容各处[2]。

吴江县丝织业集中于盛泽镇，纺绸是历史悠久的人力制造之农家产品，乾嘉间畅销各地。农家织成后，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3]。

丹阳绸俗名阳绸，其先本称湖绉，光绪初丹阳北乡农民往浙江湖州学习织绉，返里备机自织，此后丹阳绸渐负盛名。

镇江以江绸为著，有线绫、绫绸、塔夫绸、线绸光绪间(甲午前)为营业最盛时代，行销两湖及北五省、东三省、系家庭手工业，机户散处各地，盛时有三千余家[4]。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之际，中国丝年受外国人造丝织品倾销，以及自身育蚕治丝技术之陈腐，营业日形萎疲"，丝织业也因外国"人造丝织品之竞争，一落千丈"[5]。

丝绸业市镇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急剧衰落。以辑里丝贸易在市场上独树一帜的南浔镇，再也无法成为湖丝的集散中

---

1 赵如珩:《江苏省鉴》，新中国建设学会1935年出版，第1322—1323页，第1233—1234页。

2 《江苏省鉴》第1362页。

3 《江苏省鉴》，第1365页。

4 《江苏省鉴》第1365—1367页。

5 《江苏省鉴》，第1321页、1365页。

心。菱湖镇则由丝绸业市镇一变而为渔业市镇[1]。昔日以盛产濮绸而闻名全国的濮院镇，衰落成一个普通的农村消费型集镇，镇上茶馆十五家，酒店六家、米店七家、饭店八家以及杂货店、铁店、糖果店、川酱店若干[2]。

历史上曾显赫一时的丝绸业市镇无可奈何地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

1 《中国经济志》浙江吴兴长兴分册，第34—35页。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29—30页。

2 民国《嘉兴新志》第81—82页。

第五章　粮食业市镇与其他专业市镇

一、商品粮的流通与粮价波动

南宋时代的长江三角洲是全国最大的粮仓，号称“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足，天下足”①。这里出产的稻米，除运往京师杭州之外，还运往江北的扬州，转销各地；此外由海路运往浙东、福建。朱熹说：浙东缺粮，“浙西州军极有米稔去处，与本路水路相通，最为近便，已行差官雇舰前去收粜”，“招邀客贩”②。赵汝愚说：福建“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③。这些地区农民多利用山地栽培果树、茶树等经济作物或从事林业④，所以需从市场购买商品粮，其数量相当可观。因此产粮地区的米粮输出贸易非常兴旺，正如王炎所说：“若夫两浙之地，苏、湖、秀三州，号为产米去处，丰年大抵舟车四出，其豪右之家，占田广，收租多，而仓庾富实者，县邑之吏，邻里之民，固能指数其人也”⑤。叶适也指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无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

---

① 吴泳：《鹤林集》卷三十九，《隆兴府劝农文》。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常州奔牛闸记》。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一，《乞禁止遏籴状》。

③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七集英殿修撰帅福建赵汝愚上奏。

④ 参看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风间书房，1968年，第426页。

⑤ 王炎：《双溪类稿》卷二十一上赵丞相。

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粜，以规厚利"[1]。

长江三角洲的米粮运销各地，"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最恰当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商品粮的流通显示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消长态势，也就是说，农村的经济结构中，商品经济成分正在逐步增长。

进入明代以后，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日益渗入农村，促使农家经营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新模式。这种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集中地体现在新兴的棉作经济和蚕桑经济，以及其他经济作物栽培与手工业经营，日益明显地压倒了传统的稻作经济，从而改变了先前以"苏湖熟，天下足"为标志的水稻栽培为主体的农业结构，而代之以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与加工这些经济作物的手工业为主体的新型农业结构，一向作为农家副业的家庭手工业由于经济效益的显著，一跃而成为主业。尽管这一地区仍是全国著名的水稻产地，但农家的经济收益不再以稻作为主。不仅如此，先前号称"苏湖熟，天下足"的状况，不复存在，而代之以"湖广熟，天下足"[2]。民间谚语的这一变化，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一方面显示了宋代明显落后于两浙路的荆湖路，在明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一跃而成为全国的粮仓，源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剩余粮食；另一方面显示了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粮仓，在明代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大量耕地改种经济作物，使粮仓一变而为缺粮区。晚明人士说：

> "吴所产之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按：江西、湖广）之米不特浙属藉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3]

---

① 叶适：《水心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

② 朱绍本：《地图综要》内卷湖广总论："楚固泽国，耕稼甚饶，一岁再获。……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③ 黄希宪：《抚吴檄略》卷一。

商品粮大量输入，米市兴旺，无论城镇人口还是乡村人口，都出现了"仰食四方"的新现象。"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1]。一些向来"物产宜稻"的鱼米之乡，稻米"每不能自给，待食于转输者什之三四"[2]。鱼米之乡尚且要输入30%至40%的商品粮，那么嘉定、太仓、昆山、松江等冈身以东地带，商品粮所占比例就可想而知了。

进入清代以后，这种形势更趋于明朗化。细读雍正时代密摺政治的产物——《雍正朱批谕旨》，可以发现，无论是封疆大吏的密摺还是世宗的朱批，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当时国家财政经济上的一大课题：如何看江浙仰赖湖广粮食接济问题。

鄂尔泰说："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通流之故。"[3]

何天培说："天下粮米……平日藉客商贩易流通……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4]

谢明说："惟江西、湖广产米尤多，向来邻省每于江楚籴买，江楚之民亦赖粜卖米石，得价资用。"[5]

杨宗仁说："湖广产米之地，为东南所仰给。"[6]

清世宗本人也深知此种情况，在王景灏的密摺上朱批道："朕知，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7]

论者或谓，这一地区从湖广、江西大量运入商品粮，主要由于

---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江南。

② 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二风俗。

③ 《雍正朱批谕旨》，鄂尔泰，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

④ 《雍正朱批谕旨》，何天培，雍正四年七月二十日。

⑤ 《雍正朱批谕旨》，谢明，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⑥ 《雍正朱批谕旨》，杨宗仁，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⑦ 《雍正朱批谕旨》，王景灏，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

人口增长的原因,其实不然。把南宋与明中叶相比,长江三角洲人口密度并无突飞猛进般的增长。抽样资料表明,湖州府淳熙九年(1182年)人口为518,352人,景泰三年(1452年)人口为526,546人;苏州府吴江县宋代人口为170,839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人口为259,657[1]。人口增长率并不高,何以从余粮区一变而为缺粮区呢?主要原因在于大量耕地改种经济作物的缘故。正如雍正时人程元章所说:"杭嘉湖三府属地,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2]。杭嘉湖如此,苏松常更是如此。一般棉作区耕地的比例大多是"稻三棉七",即"三分宜稻七分宜棉";有的地方甚至"专种棉花","不产米"[3]。

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地区分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充分发挥其优势,把大部分耕地用于经济作物种植,为发展本区商品生产提供更多的原料,所需粮食则由湖广、江西输入,这比维持粮食自给的落后模式,更加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

商品粮的大量输入,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形成了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首屈一指的苏州米市是阊门西七里的枫桥市,"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4]。仅次于枫桥的米市是长安镇、平望镇。长安镇上米市兴旺,"江南、川、楚之米无不毕集","杭绍宁三府咸资接济"[5];平望镇上"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里中多以贩米为业"[6]。其他市镇也多有规模不一的米市,如南

---

[1] 万历《湖州府志》卷五户口。乾隆《吴江县志》卷五户口丁。
[2] 《雍正朱批谕旨》,程元章奏疏(此疏未标明年月日)。
[3] 崇祯《松江府志》卷十田赋。《梅村家藏稿》卷十,《木棉吟并序》。《震川先生集》卷八,《论三区赋役水利书》。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
[4]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
[5] 同治《修川小志》卷上河道、卷下物产。
[6]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浔镇,"乾隆以前此地米市最盛",镇中米市称为"米廊下"或"米棚下",是全镇仅次于丝市的商业中心[1]。又如同里镇,米市"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2]。再如双林镇米市散布于镇四栅,有代客商买卖的米行,也有零粜的米店[3]。

镇上牙侩、米商执米价低昂之权,乘时规利,所以米价波动幅度之大十分惊人,这也显示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的一个侧面。且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例,将该地区自嘉靖至康熙年间米的最低价与最高价列表如下:

年　代	米　价 [两(银)/石(米)]	年　代	米　价 [两(银)/石(米)]
1545	1.00	1639	4.00
1567	0.30	1647	4.00
1584	0.35	1651	4.20
1585	0.32	1652	2.70
1586	0.25	1661	1.70
1588	1.80	1698	0.70
1620	1.40	1701	0.80
1638	2.00	1709	2.40

[资料来源,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灾祥]

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所记载的松江府上海县米价资料更为详备,起自崇祯迄于康熙,波动幅度也较大。叶梦珠说:

崇祯五年(1632年)夏,白米每斗价钱一百二十文,值银一钱;迨秋成,早米每石价钱止六百五、六十文耳。自是而后,米价大约每以千文钱内外为率。

---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四衢巷。

② 嘉庆《同里志》卷一赋役志·贡赋。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崇祯十一、二年间(1638—1639 年),钱价日减,米价顿长,斗米三百文,计银一钱八、九分。

崇祯十五年(1642 年)春,时钱价日贱,每千值银不过四钱几分,白米每石纹银五两,计钱十二千有奇。

崇祯十六年至顺治二年(1643—1645 年)间,米价以二、三两为常。

顺治三年(1646 年),斗米几及千文。

顺治四年(1647 年),白米每石纹银四两。

顺治六年(1649 年)大熟,糯米每石价止一两二钱,川珠米每石银九钱。

顺治七年(1650 年)二月,白米每石价一两。九月,新米价至二两,糯米一两八钱,白米二两五钱。

顺治八年(1651 年)二月,白米每石三两。三月,每石三两五钱。四月,每石四两。六月,长至四两八、九钱,几及五两一石。七月,新谷石价二两。

顺治九年(1652 年)夏,白米石价四两。秋,旱,新米无收,郡城米价二两五、六钱。

顺治十年(1653 年),米价亦如之。

顺治十一年至十三年(1654—1656 年),米价以次递减。

顺治十四年(1657 年)十一月,每石米价银止八钱,亦有六、七钱者。

顺治十六年闰三月,米价又增至二两。

顺治十八年(1661 年)十月,白米每石一两五钱,新米一两三钱。十一月,新米一两八钱,白米二两。

康熙元年(1662 年)正月,白米二两一钱,糙米一两九钱。七月,早米一两二钱,糯米一两三、四钱。

康熙二年至八年(1663—1669 年),米价又渐减。

康熙八年(1669 年),新米每石纹银六钱,后至五钱有奇,后至

五钱，若四五六月间，预借米钱，秋成还米者，石价不过三钱一、二分而已。

康熙九年(1670年)，大水。六月，白米长至一两三钱。八月，新米九钱。九月中，八钱，糯米七钱。十月，石米九钱，糯米八钱有奇。十月终，石米一两三钱，糯者稍差。

康熙十年(1671年)，早米价每石一千三百文，计银一两一钱。

康熙十二年(1673年)，新米七百，计银六钱三分，嗣后以此为常。

康熙十七年(1678年)，早新米每石价银亦不过七钱三分。

康熙十八年(1679年)，春，长至一两四、五钱。秋八月，长至二两，早新米一两七钱。九月，稍差。

康熙十九年(1680年)夏，白米每石价银二两。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白米每石价八钱五分。至冬，新糙米每石价银五钱六、七分；苏州则五钱一、二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白米每石价银九钱上下。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秋成，糙米每石八、九钱。

把上述米石与万历以前米价相比较，其最低价都高于官府规定的折征价：宣德年间平米折征价为每石二钱五分；万历年间平米折征价为每石三钱，显示了不受政府控制的市场价格的特点，由叶梦珠的记载可以看到一个大致的趋势：从万历至崇祯年间，米价节节上升，明清鼎革之际达到高峰，以后逐渐下降，至康熙前期达到低潮，与吴江县米价波动大体一致。于此可见明清间江南米价受市场支配，已形成一个邻近地区相近似的市场价格，这种状况同商品粮需求量之大、米市之发达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长江三角洲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不仅是本地区商品粮的供销中心，还远销浙江、福建等地。江西、湖广客贩米船把米运到苏州，浙闽米商络绎不绝前往采买。例如乾隆十六年江苏巡抚庄有

恭在奏疏中指出："今岁浙省歉收，遵旨广开海禁"，以便贩运米粮，"浙商贩米数十石及数百石者，在苏州采买，均有浙省藩司及温处台宁回府印照。查苏城两月之间，卖米二十三万九千零"[1]。福建米商至苏州买米，由乍浦或上海经海道运往福建出卖。福建巡抚毛文铨对此有如下记述："江南本地所产既饶，而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臣查苏州之米，须从乍浦由海运来闽"[2]。蔡世远的分析更为清晰，他说："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虽丰年多取资于江浙。亦犹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

苏州米市集中于枫桥市，其他虽然不算大，但米的流通量却很大，大到足以左右苏州米价的上下。康熙四十五年苏州织造李煦在奏报苏州米价时就指出："苏州地方去年收成甚好，今岁菜麦亦俱茂盛，而米价忽然腾贵，卖至每石一两三钱五分、一两四钱三分不等。臣煦留心打听，盖各行家有揽福建省人买米，每石价银一两八钱，包送至乍浦出海，以致本地米价顿贵"[3]。雍正五年苏州巡抚陈时夏也谈及闽商大量在苏买米必致苏州米价高涨，他说："自今春以来，福省督臣二次遣员到苏（州）买米一万一千余石，麦九千石，外有商贩等六次，共计买米二万余石。皆由闽省督抚给咨来苏，接买江（西）、（湖）广之米，逐次运回，以资接济。……近日闽商仍复接踵来苏，……接买江、广之米。臣查苏州地狭民稠，产米无多，即系丰收，亦资江、广之米以敷食用。今闽省已经搬运三万余石之多，若复接踵而至，必致苏州米价高昂"[4]。

---

[1]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一三，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壬辰。

[2] 《雍正朱批谕旨》，毛文铨，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

[3] 《文献丛编》第三十辑，李煦，《奏报苏州米价腾贵摺》。

[4] 《雍正朱批谕旨》，陈时夏，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

另一影响苏州米市上的米价的因素是湖广、江西沿江而下的米粮的数量。据全汉昇教授的估算，雍正十二年一年中，"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为一千万石左右。装载这一千万石的湖广米船，由汉口出发，沿江而下，大部分都运往苏州出卖"①。每年在苏州米市枫桥市集散的米粮在一千万石左右，数量是惊人的，超过了漕运米粮的总额。如果年景正常，湖广(包括江西)米粮供应正常，苏州的米价就比较平稳，反之，米价就会波动。当然仰赖苏州米市的浙闽的米价必将随之波动。

康熙五十一年苏州织造李煦在奏报米价时指出："苏州……因湖广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价甚贱，上号不出八钱，次号不出七钱"②。康熙五十二年李煦又说："至于苏、扬米价，近日因湖广、江西客米来少，所以价值稍增"③。康熙五十五年李煦说："窃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④。

既然苏州米市在江南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苏州的米价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典型意义，大抵反映了米价波动的一般趋势。康熙朝后期任苏州织造员外郎的李煦，在其奏摺中翔实地报告了苏州的米价，起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迄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现列表于下：

---

① 全汉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载《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香港，1972年)，第573页。

② 《文献丛编》第二十四辑，李煦：《奏报米价摺》。

③ 《文献丛编》第三十五辑，李煦：《奏报督催煎盐并报米价摺》。

④ 《文献丛编》二十六年第二辑，李煦：《奏报米价及御种稻子现已收割并进晴雨录摺。

年　代	上米价格（两／石）	次米价格（两／石）	年　代	上米价格（两／石）	次米价格（两／石）
1693	0.90—1.00	0.70	1714	1.00—1.15	0.90—1.06
1698	1.00	0.80—0.90	1715	1.10—1.20	1.00—1.10
1706	1.35—1.43		1716	1.00—1.15	0.90—1.05
1707	1.10—1.70		1717	0.90—1.17	0.80—1.08
1708	1.10—2.00		1718	0.85—1.05	0.65—0.95
1709	1.00—1.40	0.90—1.10	1719	0.80—0.90	0.70—0.75
1710	0.90—1.10	0.80—1.00	1720	0.82—0.96	0.70—0.82
1711	0.80—1.00	0.70—0.80	1721	0.97—1.10	0.83—0.96
1712	0.80	0.70	1722	1.05—1.25	0.90—1.03
1713	0.80—1.10	0.70—1.00			

资料来源：①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文献丛编》各辑所收苏州织造李煦奏摺；

②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李煦奏摺》（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 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

④ 中山美绪：《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动向》（《史学杂志》87 篇 9 号）。

从下表可以看出，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下半叶，长江三角洲苏州米市上的米价，虽有波动，但幅度不大，大体上还算平稳。这种情况持续到雍正时代。根据《雍正朱批谕旨》中官僚奏报的米价资料可知，雍正年间（1723—1735 年）苏州米价大体如此：上米每石价格界于 0.80 两至 1.65 两之间，次米每石价格界于 0.70 两至 1.45 两之间[1]。而同时代杭州米价，每石大体在 1.00 两至 1.75

[1] 参看全汉昇、王业键：《清雍正年间（1723—35）的米价》，《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第 521—522 页。

两之间;福州米价每石大体在0.75两至2.00两之间[1]。

到乾隆初年,米价趋于腾贵,乾隆十三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米贵问题,江浙两省因此而发生了民众暴动。乾隆十三年的米价,苏州府是一石三两,湖州府是一石三两,松江府是一石二两五钱。乾隆十六年米价再度腾贵,常州府无锡县、金匮县石米二两五钱,对此《锡金识小录》的作者大为惊叹:"邑田禾颇稔,而冬底米价,石二两五钱。于出米之时,价昂若此,虽奇荒之岁亦未有也"[2]。其后米价平缓,乾隆二十六年苏州米价,每石为一两至二两间[3]。据钱泳对江南米价的记录,乾隆二十年至五十年,大约每石一两六钱至一两九钱,乾隆五十年大旱,石米一两九钱至二两七钱[4]。

乾隆年间米价的上涨,主要原因是人口的急剧增加。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陈明米贵之由疏》中说:"米谷之贵,由于买食者多","户口繁滋,足以致米谷之价逐渐加增,势必然也"[5]。江西巡抚开泰也说:"米贵之故,……大抵由于生齿日繁"[6]。两江总督尹继善也说:"米粮日贵,由于户口繁滋"[7]。

嘉庆、道光时代,人口还在迅猛增长,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已突破四亿大关。同期米价也呈现节节上升的趋势。十九世纪中叶,江浙地区人口达到颠峰状态[8],对商品粮的需求也与日

---

[1] 参看全汉昇、王业键:《清雍正年间(1723—35)的米价》,《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第522—523页。

[2]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二备参下。

[3] 《清高宗实录》卷六百三十六,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庚戌条所载苏州织造安宁奏。

[4]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米价。并据钱泳所记:白银一两换大钱八九百文,加以换算。

[5]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

[6]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一。

[7]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九。

[8] 全汉昇、王业键:《清代的人口变动》,《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第603页。

俱增。这种经济背景也刺激长江三角洲米市的发达。

二、粮食业市镇与市镇的米市

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首推枫桥市，其次为长安镇、平望镇。

(1) 枫桥市——在苏州阊门西七里，由吴县与长洲县合治。清末民初，由市升镇，称枫桥镇。其他"水陆便利，以集商贾"，"百货之所聚"[1]。明末清初，地位已在长洲县山塘市、浒市（浒墅）之上。康熙《长洲县志》说："枫桥，在城外，离治数里，与阊门相属，故称附郭，为储积贩贸之所会归"[2]。足见其时枫桥市已是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但还未以米市而闻名全国。

康熙中叶以来，枫桥市作为米粮集散中心而日趋显赫。雍正年间蔡世远指出："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虽丰年必仰给于湖广。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3]。可见康雍间数十年来，枫桥市已成为湖广之米的集散地。这是由于枫桥市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即靠近苏州繁华的商业区阊门，在浒墅关（浒墅镇）南，有运河与长江相连，载重三千石至四千石的梁头大船，可自长江驶达。近旁的浒墅关"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之所，商船往来，日以千计"[4]。据全汉升教授推算，"在雍正十二年一年中，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为一千万石左右"[5]。这一千万石左右的粮食，大

---

①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②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③《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十四，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

④ 清代钞档：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巡视东城陕西道监察御史吴震方谨题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55页。

⑤ 全汉升：《清朝中叶苏州的米粮贸易》，《中国经济史论丛》第二册第573页。

多汇聚于枫桥市，然后再转销邻近市镇及浙江、福建一带。

因此乾隆时代编纂的地方志已称其为米市。乾隆《苏州府志》所载吴县二市，一为月城市，一为枫桥市；关于枫桥市写道："在阊门西七里，与长邑合治，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市、米市"[1]。乾隆《江南通志》也说，枫桥市"为南北冲要，地介吴、长二县，各省商米豆麦屯聚于此"[2]。

浙闽二省米商常挟带巨资来此买米。首先是浙西的杭、嘉、湖三府之地仰赖枫桥米市的接济。乾隆十三年上谕曰："浙西一带地方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全藉江西、湖广客贩米船，由苏州一路接济"[3]。其原因正如浙江总督程元章所说："杭嘉湖三府属地方，地窄人稠，民间多以育蚕为业，田地大半植桑，岁产米谷，除办漕外，即丰收之年，尚不敷民食，向藉外江商贩接济"[4]。

其次是浙东一带，"金、衢、严、宁、绍、台六府，山田相半；温、处二府，山多田少，（食米）向资江、楚转输"[5]。即以乾隆十六年为例，"浙商贩米数十石及数百石者，在苏州采买，均有浙省藩司及温、处、台、宁四府印照，查苏城两月之间，卖米二十三万九千零"[6]。

再次是福建一带。"闽省生齿浩繁，全赖本地产米，并江省、粤省收成不薄，然后方保无虞。今粤省自顾不遑……江南本地所产既饶，而湖广之米日至苏州者不可胜数。臣查苏州之米，须从乍浦由海运来闽"[7]——这是福建巡抚毛文铨在雍正四年所说，大体反

---

[1]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

[2] 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五舆地志·关津。

[3]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上谕。

[4] 《雍正朱批谕旨》，程元章，雍正十二年。

[5] 《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三，乾隆十三年四月，陞任浙江巡抚顾琮言。

[6]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三，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壬辰，江苏巡抚庄有恭奏。

[7] 《雍正朱批谕旨》，毛文铨，雍正四年正月十四日。

映了枫桥米市对福建之重要。枫桥米行商人每年都招揽福建买客，给予包送至乍浦出海的优惠。这一点苏州织造李煦早在康熙四十五年就已察知，"各行家有揽福建人买米，每石价银一两八钱，包送至乍浦出海，以致本地米价顿贵"[1]。雍正五年苏州巡抚陈时夏指出，"自今春以来，福省督臣二次遣员到苏买米一万一千余石，麦九千石，外有商贩等六次，共计买米二万余石。皆由闽省督抚给咨来苏，接买江、广之米，逐次运回，以资接济"[2]。

对于江浙一带经济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枫桥，当时还是一个市，不是镇，但其米市之繁荣远远超过其他大镇，成为全国最大的米豆集散中心[3]。直至清末民初，枫桥才由市升为镇，民国《吴县志》说："枫桥镇，在阊门西七里，地与长邑合治，为水陆孔道，贩贸所集，有豆米市，设有千总驻防。同治府志列市。"[4]。

仅次于枫桥市的是长安镇与平望镇。

(2) 长安镇——旧名修川，南宋建都临安，镇扼其要，更名长安，属于海宁县，距县治西北二十五里，与仁和县接界。明清时代成为"商旅聚集，舟车冲要"[5]的大镇，号称"储粮之要地，通运之总枢"[6]。"上下两河，商贾往来，舟航辐辏，昼夜喧沓"[7]。长安镇的米市位于石塘湾，"江南、川、楚之米无不毕集"，"杭绍诸郡商贩咸集"，"杭、绍、宁三府咸资接济"。时人有诗云：

年来米价判高低，
黄白尖团样不齐，

---

[1] 《文献丛编》第三十辑，李煦：《奏报苏州米价腾贵摺》。
[2] 《雍正朱批谕旨》，陈时夏，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
[3] 参看安部健夫：《米谷需給の研究》，《清朝史の究》，创文社，1971年，第528页。
[4] 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一乡镇。
[5]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市镇。
[6] 同治《修川小志》卷首陈序。
[7] 康熙《杭州府志》卷二市镇。

近自江南及川楚，
长安利甲浙东西[1]。

(3) 平望镇——吴江县治东南四十七里。宋元间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自弘治年间至乾隆年间，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2]。平望镇"东接吴淞，北达镇扬淮泗齐鲁之域，行而为通津，坝而为要道"，故"帆樯之萃，粟米之聚，百物喧阗"[3]。"里中多以贩米为业"，"以米业为大宗"，镇上米行、米栈遍布。其他不仅是商品粮集散中心，而且还制作特殊加工的冬春米，这种冬舂米"虽他处亦有，而平望为独盛"，商贩多至平望镇籴买，因此平望"有小枫桥、小长安之称"[4]。平望镇所集散的商品粮，一部分是本地生产的，另一部分则是邻近各乡镇及湖广、江西等地商人贩运而至的。镇上经营米业的牙侩开设米行，招接米商，由各地商贩在此籴买后转销他乡，生意十分兴隆[5]。

除了枫桥、长安、平望三大米市外，还有一些较小的米市，如新市镇、皂林镇、同里镇之类。

(1) 新市镇——德清县治东北四十五里。为德清巨镇，兴于宋而盛于明，居民近万户，"街衢市巷之盛，人物屋居之繁，琳宫梵宇之壮，蚕丝粟米货物之盛"，为全县之冠。四乡盛产优质粳米、糯米，尤以西乡、北乡为多，每年冬季，近镇四乡及长兴县所产之米，聚集于镇，镇上米行生意顿时繁忙得不可开交，"贩夫商客籴而转卖他郡者，络绎于道"[6]。

---

① 同治《修川小志》卷下物产、卷上河道、卷首陈序。
②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③ 道光《平望志》卷首杨楨序。光绪《平望续志》卷首松骏序。
④ 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卷一物产。
⑤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⑥ 正德《新市镇志》卷一物产。康熙《德清县志》卷二市镇。

(2) 皂林镇——桐乡县治北九里。宋时有寨，元明两代皆置驿于此。居民夹运河为市，户口蕃庶，商贾云集。明设巡检、驿丞两员，皆有官署，县中于此建便民仓。自明代宣德年间析置桐乡县后，皂林即为襟喉之地，天启、崇祯间颇称繁盛。"四方舟楫往来停泊，张灯夜市，为河路要津"。镇上"米商广集，中有米市，名小瓜洲"。陈沄《冶塘棹歌》云：

> 便民仓徙剩青畴，
> 米市河湮只一沟，
> 行脚僧归海会寺，
> 而今莫问小瓜洲。

这首诗描述的是已经衰落的皂林镇，其中依稀还可看到"米市"、"小瓜洲"的踪迹。皂林的衰落原因，是清初郑成功出兵此间，"燔毁民房略尽，遂至一过为墟，旧设皂林驿，后改设石门县南门外"，"康熙间移巡检于青镇，而此镇遂为村落"[1]。

(3) 同里镇——吴江县治东十里。"明初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室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可方州郡"。清初"居民日增，市镇日扩"[2]。镇上米市在冲字圩、洪字圩、东稔圩、稠穰圩，"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3]。

此外一些其他专业市镇中，也有规模颇大的米市。例如南浔镇，"本地所产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需客米接济"，镇上米市"喧阗亚于丝市"[4]。米市俗称米廊下或米棚下，"乾隆以前此地米市最盛，故得此名"，嘉道以后，"米市移于西木行"[5]。又如黎里镇，米业、豆饼业生意兴隆，为全镇商业支柱，"每日黎明，乡人咸

---

①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光绪《嘉兴府志》卷四市镇。

② 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沿革。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③ 嘉庆《同里志》卷八赋役志·物产。

④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⑤ 咸丰《南浔镇志》卷四衢巷。

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其繁阜喧盛为一镇之冠"[1]。道光初年，在东栅上下两岸新增官荡上桥、后底、九成汇三处市场，"米饼各货咸集于此贸易"[2]。再如杭州近傍的湖墅镇，号称"烟火万家"，有三塘五坝，"为南北行旅运货必经之地"，历来米市甚盛。"米市在北关门外里桥头"，后来，"移于通市桥东贸易"，通市桥东即珠儿潭，"至今米市犹在此地"[3]。

三、其他专业市镇概况

(一) 交 通 业 市 镇

(1) 青龙镇——在吴淞之滨。唐时控江连海，置镇防御。宋政和间改曰通惠，后复旧名，设监镇理财。南宋时海舶云集，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岛夷闽越交广之途所自出"，"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人号小杭州"[4]。有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自宋及明，兵燹频仍，胜概十不存一。元末，市舶之区已徙于太仓，青龙镇遂鞠为茂草，湖淤水涸，民业渐趋衰落。嘉靖初，曾建青浦县治于此，不久寻废，仅存旧青浦市集而已，居民不过三四十家。惟隆福寺一浮屠屹然尚存，每岁三月十五日乡民瞻礼喧阗数日而已[5]。

(2) 澉浦镇——海盐县治西南三十六里。"宋立镇官监之，人烟极盛，专通番舶"，元代成为嘉兴路达鲁花赤管军上万户府所辖，

---

[1] 嘉庆《黎里志》卷二形胜。
[2] 光绪《黎里续志》卷一里巷。
[3] 光绪《湖墅小志》卷一。
[4]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弘治《上海县志》卷二镇市。
[5]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光绪《青浦县志》卷二疆域·镇市；卷三十杂记·遗事。

之大镇，与华亭的青龙镇相并列[1]，"招集海商番舶"，十分繁盛[2]。番舶皆聚于龙眼潭，诸货皆由招宝闸入运河，抵六里堰，车盘过坝，流通吴浙。又有东浦潮汐自浦入达鲍郎浦，灶丁汲以煮盐。六里河自城壕石灰桥下西抵六里堰，"堰旁居民造作小舟，搬运城中货物，并盐贾引盐，以觅微利"。运河在镇市中，番舶聚于长墙山下龙眼潭，商贾贸易从招宝闸入运渠，经过市中，渭之上塘，其间有塘门弄，有闸头庵。此河西抵六里坝，南通钱家浜、入永安湖，"实镇中之孔道也"。明初严禁下海，在此置城守，"此渠遂绝，市河湮塞为民居"[3]。清康熙二十三年弛各处海禁，通市贸易。次年，准许五百石以下船只由澉浦镇出海贸易，"虽不及宋元之盛，而海舶往来固已流通于内郡矣"[4]。

(3) 乍浦镇——在平湖县治东南二十七里。"宋元时番舶凑集，居民互市[5]。明洪武十九年置乍浦守御千户所，驻军筑城[6]，对外交通与贸易渐趋衰落。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再度兴盛，"生齿日多，闽粤瓯越诸商贾，雁户云集，异时荒榛宿莽之墟，今皆高檐邃宇，鳞次栉比"[7]。有清一代，乍浦与澉浦同时成为杭州湾著名的海上交通市镇，吸引着闽、粤、瓯、越的商人及日本、南洋商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些地区特产商品的中转地。在这里中转的商品有闽粤的糖、粮食、木材、水果(龙眼、荔枝)等，有瓯越的竹、木、铁、鱼、盐之类，有日本、琉球、安南的金、银、铜、锡、铅、珊瑚、玛

---

① 嘉靖《续澉水志》卷一地理纪。
② 康熙《嘉兴府志》卷二疆界。
③ 嘉靖《续澉水志》卷一地理志。
④ 咸丰《澉水新志》卷五课税·关榷。
⑤ 天启《平湖县志》卷一舆地·都会。
⑥ 天启《平湖县志》卷一舆地·都会。康熙《平湖县志》卷一舆地志·乡镇。
⑦ 道光《乍浦备志》卷首徐熊飞序。

瑙、琥珀之类[1]。这些商品在乍浦进港后，通过镇上牙侩所开牙行转手运往腹地，如木材转销于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一带，这些地区"所在棺料、屋料多取给焉"；又如糖转销于长江三角洲各地，"系杭嘉湖及江南南偏诸郡通行之物"；再如杂货(靛、炭、笋干、腌货之类)，"江南各处随地销售"。由乍浦转口外运至浙东南及福建、广东沿海的主要商品是棉布、稻米、肥料[2]。

(4) 浒墅镇——长洲县治西北二十五里。原为市，称浒市，位居南北运河之要冲，民居水际，农贾杂处，有巡检司、急递铺。明景泰年间置钞关于此，即浒墅关，百货到此完税，有监收公署，浒市遂升为浒市镇(亦称浒墅镇)，"舟楫停集，居民益繁，贸易往来"，号称"吴中一大镇"[3]。万历年间全镇居民已达数千家[4]。入清以后更趋繁荣，"关泯比屋连甍，街衢阗噎，杂贿云屯，闤闠鳞次"[5]。镇民"逐什一之利，争刀锥自润，其弟子亦相沿习"[6]，"商吏市驵，充斥杂处"[7]。正体现了这个交通市镇三教九流、八方杂陈的特色，清人凌寿祺《关快词》云：

浒墅关前万客过，
买舟命驾六时多，
家居素近浮桥畔，
好觅生涯托运河[8]。

作为南北运河之冲要，浒墅镇的商船往来日以千计，其中有川

---

[1] 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2] 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卷三城池；卷六关梁。
[3]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卷十九桥梁。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五关津。
[4] 道光《浒墅关志》卷八道路桥梁。
[5] 道光《浒墅关志》卷首文祥序。
[6] 道光《浒墅关志》卷二学校，金应征《建养正书塾记》。
[7] 道光《浒墅关志》卷六名宦。
[8] 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物产。

船、赣船、沙船、航船，成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1]。在此集散的大宗商品是江南的棉纺织品与丝织品，以及湖广、江西的粮食，其次是农副土特产品[2]。

(5) 刘河镇——位于太仓城东娄江(即浏河)入海口。太仓枕长江、傍东海，娄江穿境而过，独具衔江接海的交通有利条件，是江南出海通途要津。刘河镇凭借这一优越地理条件兴起于元，当时海运漕粮以此地为始发港，称刘家港。刘家港港区从娄江入海口一直延伸到太仓城南码头，终元一代繁盛不衰。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也以刘家港为始发港。嘉靖以来屡遭倭患而渐趋衰微。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此地再度兴盛，以刘河镇闻名远近，至乾隆、嘉庆年间转输贸易尤为隆盛[3]。刘河镇是水陆交通枢纽，"江阴、靖江、太仓、通州等沙船，在瓜州、镇江装载货物，契写苏州交卸，行至刘河港停泊；瓜州、江都、泰兴、丹徒、镇江、江阴、靖江等船装载货物，写至刘河交卸"[4]。"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有回揽停泊者，直至口外四五里"[5]。

(6) 商榻镇——青浦县治西三十四里。一名双塔。其地为水路交通要道，商人往来苏松，为适中之地，至夕住此停榻，故名商榻。镇人多驾船为生，又名双塔船[6]。

(7) 八斥市——吴江县治东南二十四里。地当运河沿岸的南北要冲，嘉靖间居民三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

---

[1] 道光《浒墅关志》卷四榷税则例。《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第454页。

[2] 道光《浒墅关志》卷五榷税则例。

[3] 弘治《太仓州志》卷一沿革。道光《刘河镇纪略》卷三创始。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卷五市镇。

[4] 道光《浒墅关志》卷七管辖。

[5] 道光《刘河镇纪略》卷五盛衰。

[6]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市镇。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光绪《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百货骈集[1]。

(8) 梅李镇——常熟县治东二十余里。跨许浦(亦作浒浦)与盐铁塘两条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宋元间已成大镇。镇中有十字港,故市街亦呈十字,中贯以塘,南北为盐铁塘,东西为许浦,乃常熟东乡一大都会。海舶由许浦抵镇中,河船则由盐铁塘抵镇中,终年络绎不绝。"自许浦潮淤,海舶不至;盐铁路断,南舟不来,镇始衰矣。赖徐六泾一水犹通小舟,辐辏云云"。后徐六泾水道因李墓塘淤浅,舟楫阻滞,"而许浦潮水通畅,海舶多到镇者;盐铁浚后,沪货亦通"。鼎盛时代全镇居民二千余家[2]。

(9) 胡巷镇——宝山县治南六里。为海口要道,或称吴淞口。旧设吴淞营捕盗战舰,同顾泾司巡检查盘船只,后移管河巡盐主簿驻此。凡进出海口商船、渔船,由此挂号照验盘查夹带,与上海税关相为联络[3]。

(二) 盐 业 市 镇

(10) 新场镇——原属上海县,县治东南六十九里;析置南汇县后划归南汇,在县治西南二十四里。一名石笋滩,宋建炎年间有两浙盐运司署,元初迁盐场于此,故名新场[4]。弘治《上海县志》说:

> "新场镇,距下沙(镇)九里,以盐场新迁而名,赋为两浙之最。四时海味不绝,歌楼酒肆,贾衒繁华,视下沙有加焉,而习俗浇伪,又下沙所无也。"[5]

---

①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②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③ 光绪《宝山县志》卷一舆地志 · 市镇。

④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

⑤ 弘治《上海县志》卷二镇市。

至明末，"镇之贾贩犹盛"[1]。北桥税司亦来此收税。南北街长四五里，东西各二里许，市街上歌楼酒肆商贾辐辏，"乡人有赛苏州之谣"，繁华程度大大超过县城，故称"歌楼酒肆贾衒繁华，县未过也"[2]。太平军之役后，"廛舍焚毁、名迹就湮"，光绪年间稍稍恢复成市，"寥落处犹多"[3]。

(11) 下沙镇——原属上海县，在县治东南六十里；析置南汇县后划归南汇，在县治西北三十六里。元设盐课司于此，明初盐课司迁至新场镇，而盐仓则自周浦镇迁于此地，至弘治年间，盐仓也罢废，"唯人物丛聚未减于昔"[4]。

(12) 航头镇——一名行头，在南汇县治西三十六里。明代在此设盐仓，名斜角仓，盐商牙行多聚于此镇。东西大街长约里许[5]。

(13) 一团镇——距新场二十里，盐商多聚此[6]。

(14) 大场镇——原属嘉定县，在县治东南四十八里，析置宝山县后划归宝山，在县治西南三十里。宋元时曾设盐场于此。市街东西三里[7]。邑人周兆鱼《潜溪杂咏》之二描绘大场镇道：

十桥侵晓肆成行，
界划三槎聚一方，
曾是赵家鹾使地，
趁墟人说煮盐场[8]。

---

[1]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2] 光绪《南汇县志》卷一邑镇。嘉庆《松江府志》卷二镇市。
[3] 光绪《南汇县志》卷一邑镇。
[4] 弘治《上海县志》卷二镇市。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5]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镇市。
[6]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7]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康熙《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8] 光绪《宝山县志》卷一市镇。

(15) 北仓市——金山县治北三里。市有浦东盐场大使署[1]。

(16) 西仓市——金山县治西三里。市有横浦盐场大使署[2]。

(17) 新仓镇——平湖县治东北三十六里。旧芦沥场盐课司在此，"虽小聚落，而百货泉流，商民云萃"[3]。

(18) 芦沥镇——平湖县治东北四十里。有芦沥盐场。"芦沥场盐粗粗色青，且凝成冰块，其味最咸，吴郡造酱多利此"[4]。

(19) 鲍郎镇——海盐县治西南三十五里。周回六里三十步有盐场，亦名鲍郎场[5]。

(20) 汤镇——杭州府治东北五十里。有仁和盐场。宋苏轼曾开汤村运盐河。由城东前后沙河皆可达汤镇、赭山，以接于海口[6]。

(三) 渔 业 市 镇

(21) 青村镇——元末明初，大族陶氏居此，俗呼为陶家宅头。洪武年间设千户所于此，筑城防海寇。地近海，渔业兴旺。"高桥市独盛，海渔者得鱼，悉于此鬻"[7]。明清之际，全镇有渔船五六十艘，"一日两潮，大鱼则数十金计，小鱼亦以两计"。镇中居民无田可种者，皆从事织网，内河有缯网、打网，外海有稀网、长网、抢

---

[1] 乾隆《金山县志》卷一镇市。
[2] 乾隆《金山县志》卷一镇市。
[3] 天启《平湖县志》卷一都会。
[4] 光绪《平湖县志》卷二风俗。
[5]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一方域篇。
[6]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浙江二。
[7]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一镇市。

网，"为利数倍于田"[1]。青村镇原属华亭县，析置奉贤县后，改为奉贤县治，渔业移至近傍青村港镇，"舟楫往来如织，百货聚焉，廛市之盛，遂冠东乡诸镇"[2]。

(22) 沈港镇——南通长泖，北通朱家角，地处娄县与青浦县之间，"其地鱼梁虾市饶水族"[3]。

(23) 清浦镇——一名高桥镇，在嘉定县治东南八十里。其地东北距海，西濒吴淞江，"多鱼盐芦苇之利，田土丰腴，人民殷富，为通邑诸乡之冠"[4]。

(24) 福山镇——跨福山港口，其西南有城堡，为古南沙县地。距常熟县治三十六里。驻有福山镇总兵，向与江北狼山为对渡，称重镇。北门处民居较密，"镇则为市舶所集，人烟繁盛，每值鱼汛，商贩尤多"[5]。镇中有街四道，居民数百户。

(25) 思溪市——归安县治东南三十里。宋时酒酤，户部榷税，元设巡检。明初设河泊所，管理渔户，又置预备仓，颇称蕃盛[6]。

(四) 编 织 业 市 镇

(26) 黄埭镇——明代为长洲县一小市，在县北四十里，清初成镇[7]。后划归吴县。商肆林立，民居栉比。乡民大率以种稻为业，"妇女勤工作，或织席、织屦，或绩麻、绩纻"[8]。所织草席尤为

---

[1] 曾羽王：《乙酉笔记》。
[2]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镇市。
[3] 乾隆《娄县志》卷三村镇。
[4]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市镇。
[5]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6] 光绪《归安县志》卷六区域村镇。
[7]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8] 民国《黄埭志》卷二风俗。

精致，"或染色相间，织成花草人物，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阔狭花样，无不如其式而为之"[1]。此外还编织草鞋、蒲鞋。

(27) 唯亭镇——元和县东三十五里。后戴家墟、施家浜家家织造毛毯；斜塘家家编织芦席，大者名匾船，小者名讨仓；下雉渎之北家家编织篾帘；南乡村家家编织蒲包；东乡村家家编织蓑衣[2]。

(28) 浒墅镇——长洲县西北二十五里。"浒墅乡村妇女织席者十之八九"，号称浒墅席，"或杂色相间，织成花草人物，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广狭，无不如其式而为之"。"南漳、北漳、通安等桥，席市每日千百成群，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3]。

(29) 周庄镇——元和县东南七十里。其西南属吴江县，东属青浦县。四乡农家以编结竹器为业，种类繁多。农器有泥罱、臂笼、秧䈽、土箕之类；鱼器有退笼、鱼罩、鳗簖、蟹䈽之类；此外还有筛、匾、栈条、鸡笼等。各色竹器"俱细密光滑，各适于用"。"北栅港东全功桥至永安桥，比户以此为业，故名篾竹埭"。周庄竹器销路甚广，同里镇、角直镇、陈墓镇、金泽镇等地无不畅销。乡民还善织关衫，此种关衫，以灯草氏织成，比蓑衣少两袖，十分轻巧，"坚密耐久，较胜他处"，"下塘普庆桥以东比户为之"。"业此者多系乐工，故镇中乐部向称关衫党，亦著名一时"[4]。

(30) 唐市镇——常熟县治东南三十余里。地跨尤泾，故旧名尤泾市。明中叶唐氏聚居于此，始改称唐市。乾隆时，唐市已发展为常熟四大镇之一[5]。后为区别于新起的西唐市(邻江阴县界)，

---

① 民国《黄埭志》卷二物产。

② 乾隆《苏州县志》卷十九乡都。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③ 道光《浒墅关志》卷十一物产。

④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嘉庆《贞丰拟乘》卷上土产

⑤ 龚文洵：《唐市志补遗》(不分卷)。乾隆《唐市志》卷下集文。

改称东唐墅。全镇有河东西街各一道、北廊下街一道，居民四百余户[1]。“百工居肆，无雕文刻缕之技，唯治田器，制渔具，作舍编篱，捆履织席为能事”，所编结的秧荐、芦花鞋、饭箩、麦柴笠、麦柴灯(以麦杆劈如发丝织花草人物)[2]。

(31) 茜泾镇——太仓东五十里。相传此地盛产茜草，故名茜泾镇。镇以产蒲鞋著称，“数里内乡民夫妇穷日夜捆织”[3]。

(五) 竹木山货业市镇

(32) 唐行镇——古称横溪。控淀山湖，为吴门要冲。元初有大姓唐氏居此，商贩竹木，因呼为行，遂成大市，称唐行镇。有十字港，临港市廛谓之四嘴。初属上海县，万历元年改置青浦县，成为县治[4]。

(33) 埭溪镇——归安县治西南六十里。宋名施渚，设监官。元置巡检。明初移施渚巡检司于上沃埠，寻革。清初仍设巡检，改名为埭溪镇，以发源于莫干山之水直泻溪滩，筑石埭遏其冲，故名埭溪。街道宽长，“山货贸易骈集，茶笋时尤盛”[5]。

(34) 陈庄镇——桐乡县治西北二十四里，南距炉镇十一里，北距青镇三里。居民以竹器为业，四方贸易甚远，“苕霅诸山货竹者咸集于此”[6]。陈沄《柞溪棹歌》云：“朱村北去接陈庄，春至红闺事渐忙，多买红干黄竹子，趁闲预织女儿箱”[7]。

---

①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②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卷上物产。

③ 弘治《太仓州志》卷一市镇。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

④ 弘治《上海县志》卷二镇市。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崇祯《松江府志》卷二镇市。

⑤ 光绪《归安县志》卷六区域村镇。

⑥ 康熙《桐乡县志》卷一市镇。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⑦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35) 簰头镇——武康县治西三十里。"竹木出山簰行必于此，故名"，"熙攘往来，略与三桥埠、上柏镇相等"[1]。

(36) 长乐市——余杭县治西北二十里。"通舟楫，聚山货"[2]。

(六) 窑 业 市 镇

(37) 千家窑镇——嘉善县治北十二里。"民多业陶，廛居联络，甓埴繁兴，三吴贸迁勿绝"[3]。明万历时知县章士雄设常平仓于此，千家窑镇遂与枫泾镇、斜塘镇成为嘉善三大镇。直至清末，"民居稠密，仍习陶业"[4]。

(38) 二都市——武康县治东南二十里，"出陶器，交易者云集，故成市"[5]。

(39) 陆墓镇——苏州齐门外六里，属长洲县，在县北二十里。"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6]。

(40) 瓶窑镇——余杭县治东三十里，与钱塘县接界，镇之大半属钱塘县。地俗仆民勤，"自农桑外多以埏埴为业，故市廛之与陶穴相望如栉比"[7]。

(七) 冶 铸 业 市 镇

(41) 炉头镇——古名柞溪。桐乡县治西北十五里。为县北通衢，距青镇十四里。正德年间还是一个村落，名炉头村，有零星

---

[1] 道光《武康县志》卷四乡都。

[2] 嘉庆《余杭县志》卷三市镇。

[3] 康熙《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4] 光绪《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5] 道光《武康县志》卷四地域志。

[6] 乾隆《长洲县志》卷二市镇。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二乡镇。

[7]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嘉庆《余杭县志》卷三市镇。

冶铸农户。嘉靖年间沈济自湖州迁居于此，开设冶铸作坊，冶铸业蓬勃发展，同治年间沈氏作坊有铁炉七座。[1] 居民以冶铸为主业，除夏季外，“三时炉火昼夜不绝”，“釜鬵、钟、鼎之制，大江以南咸取给焉”。陈沄《柞溪棹歌》云：

家住炉溪曲水前，
铸金成釜旧相传，
冶塘时有商船泊，
夜半惊看火烛天[2]。

(42) 庵村市——吴江县治东二十里。弘治以前系一村落，居民“务农业渔”，“亦有为铁冶者”。嘉靖间始称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铁冶作坊多在浜南村，“附近市上人皆铁工”。所制铁器有铁搭、锄头、稻叉等农具，切刀、铲刀、火刀、火叉等炊事用具，另有鸟铳、钢叉、线枪、三眼枪、盘铳等猎具[3]。

(43) 檀丘市——吴江县治西南五十里。居民数百家，“以工为业，凡铜铁木圬乐艺诸工皆备”[4]。

(44) 炉头镇——长兴县治西七里。“居民业冶，故名”[5]。

(八) 刺 绣 业 市 镇

(45) 光福镇——吴县西五十里。“妇女以蚕桑绣绩为工”，“以刺绣绩麻为事”。号称“吴之刺绣勤于光福”。苏绣精细雅洁，一名顾绣(顾姓妇人最工故名)[6]。

(46) 下沙镇——南汇县治南六十里。“镇多巧工，精刺绣，称

---

[1] 正德《桐乡县志》卷二物产，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2]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3]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顺治《庵村志》(不分卷)物产、村舍。
[4]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5] 康熙《长兴县志》卷二市镇，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五村镇。
[6] 光绪《光福志》卷一风俗，卷四土产。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一物产。

下沙绣"[1]。

(九) 烟 叶 业 市 镇

(47) 屠甸镇——旧名石人泾。原先为屠甸市，后升成镇，或称屠甸市镇。在桐乡县治东南十八里。相传寂照寺有二石佛由海中浮至，镇以是得名。地居僻乡，历代皆不设官，亦无外来商贾，"惟近乡烟叶成林，贸易颇盛"[2]。镇东西广三里许，南北袤半里许。乡人种烟叶，"利与桑麻相埒"，"厘税以此为大宗"。有伏烟、秋烟、顶烟、脚烟等品名，"每夏秋间远商来集，烟市极盛"[3]。

(48) 濮院镇——在桐乡、秀水二县间，在桐乡县治东北十八里，秀水县治西南三十六里。其地盛产烟叶，"他处人称桐濮烟"，"乡人种此者利较桑麻尤厚"。乾隆后，"种者渐多，岁值数十万"，为濮院镇大宗出产[4]。镇上西南市开设烟叶行，同治、光绪年间，"江淮客商麇至"，"烟叶上市，各行于栅外揽收，每遇桥梁要路随地交易，喧哗如市，名曰出庄"[5]。

(十) 制 笔 业 市 镇

(49) 善琏镇——归安县治东南六十里。一名善练，以市有四桥，皆取义于善，联络市廛，形如束练，故名。居民制笔最精。元代有冯应科、陆文宝善制笔，擅名海内，其乡人习而精之，故湖笔名于世。村有含山，山巅浮图其卓如笔，孤丘无从，乡民相传善琏笔因此而工。镇有蒙公祠，祭祀制笔祖师蒙恬。镇上"商贾凑聚，庐舍

---

① 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五关津。
② 光绪《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③ 光绪《桐乡县志》卷六物产。
④ 民国《濮院志》卷十五物产。
⑤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郁兴,烟户现有者约千家"[1]。

(十一) 制车业市镇

(50) 章练塘镇——吴江县治东九十里,与长洲县、青浦县合辖,"民居稠密,百货具备,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2]。清末,划归青浦县。农民力耕捕鱼外,"大半以制车为业"。此种水车,俗名镶车,为农家灌溉用具,或以人力,或以牛力,形式不一。章练塘所制镶车,极其灵便"迥非他处所及"。"环练塘数十村庄、车船约三百多艘。其营业发达,西至常州以西,东至浦东间,有修花车者。车业之利不亚于力耕,颇有倚为终岁之生涯焉"[3]。

(十二) 榨油业市镇

(51) 石门镇——在石门县治北二十里。唐有石门驿,宋置赡军监库廨榷酒务,元有巡检司、明分东属桐乡县,西属崇德县。原为市,后升成镇。清初改称玉溪镇,俗亦称为石门湾。"民物阜蕃,贸易尤盛"。四乡盛产豆类,"远方就市者众";且"商人从北路夏镇、维扬、楚、湘等处贩油豆",在镇上"作油作饼"[4]。万历年间镇上油坊达二十家,"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杵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无赖……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铢而赢"[5]。

---

(1)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十三物产。

(2)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3) 民国《章练小志》卷三风俗。

(4) 万历《崇德县志》卷十二丛谭。

(5) 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见万历《崇德县志》卷七记、及康熙《石门县志》卷十二外纪·丛谭。

第六章　江南市镇文化一瞥

星罗棋布的市镇，连结成四通八达、商品交流频繁的市镇网络。市镇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市镇的网络化反过来更加促进了商品经济的高涨，造就了一大批财富集中、人才荟萃的巨镇，成为该地区的经济中心。这些市镇以它巨大的经济活力，为发达的市镇文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

一、人文蔚起，科第兴旺

市镇兴起之后，居民日益增多，明中叶以来，江南数千户上万户的繁华市镇几乎比比皆是。构成市镇人口的主体部分是商人(包括牙侩、客商与小商小贩)、手工业工匠及脚夫、游民；由于市镇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向它集聚。这样，市镇就具备了知识相对密集、文化凝聚力强的特殊优势。

细细考察江南市镇，大多数以人文蔚起、科第兴旺而著称于世。

南浔镇不仅以丝业闻名，而且"数百年来，人文蔚起，阛阓纷屯"[1]。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个镇出了七名进士。清人范颖通《研北居琐录》说："前明中叶，科第极盛，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

[1]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书之谚"。

所谓三阁老，即南浔镇东栅马家港朱国祯，镇西七里之辑里村温体仁，镇西南十一里之马要村沈漼。当地人所谓"九里三阁老"、"七里三相国"[1]之说，以夸张的语调炫耀南浔镇在万历年间接连出了三个内阁大学士的盛况。朱国祯，万历十七年进士，天启初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沈漼，万历二十年进士，光宗立，召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崇祯初累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所谓二尚书，即董份、沈演。董份，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沈演，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南浔是文人辈出之地。三阁老之一的朱国祯，可谓著作等身，撰有《涌幢小品》、《大政记》、《明史概》、《皇明纪传》等。二尚书之一的沈演，其父沈节甫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工部侍郎，喜藏书，有《玩易楼藏书目录》，所辑《纪录汇编》堪称传世之作。《吴兴备志》、《广博物志》、《增定唐诗品汇》的作者董斯张，《七国考》的作者董说，《雁荡杂著》的作者陈忱，都是明代南浔地区知名度颇高的文化人士。

入清以后，南浔镇的科第仍相当可观，进士及第者有十六人、乡试中举者有五十人[2]。文化名人有所谓"南浔三先生"——施国祁、邢典、杨凤苞。虽然显达大官没有明代多，但仍保持了"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3]的传统，为清末民初涌现一大批头面人物奠定了基础。

"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的南翔镇，不仅是棉布业贸易中心，而

---

① 温裴忱：《七里村志》曰："有夸其先者，马溪世家沈氏有相国焉，浔溪世家朱氏有相国焉，吾里之显亦家相也。三相国相距凡七时，至今以为谣。"

② 道光《南浔镇志》卷六科第。

③ 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且也是苏松一带的文化中心之一。镇上文化设施甚多，有大中丞赵公书院（又称惠民书院）、邑侯马公书院、槎溪小学（嘉靖十四年建）、义塾等。

南翔镇明代有贡生十四人、举人十六人、进士十人，清代有贡生二十人、举人十九人、进士七人[①]。其中颇多名人雅士，例如王圻，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湖广提学佥事、陕西布政使司参议，退休归里后，著书三十余种，以《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三才图会》最为著名[②]。又如，李先芳与其弟李名芳、李流芳并噪词坛，一时传为佳话。先芳，万历十七年进士，刻意为诗，尤工七言长句；名芳，万历二十年进士，驰骋文词，时人叹为李长吉再世；流芳，绝意科举进取，工诗善书，尤精绘事。流芳子杭子、孙圣芝、曾孙禔，三代均精于诗文，里中引以为誉。流寓南翔的程嘉燧，与李流芳引为诗文交，李、程二人合唐时升、娄坚，号称"嘉定四先生"[③]。

人文荟萃之所，园林遍布。李流芳所建檀园，位于北市，流芳有诗描写檀园道："短筑墙垣仅及肩，多穿涧壑注流泉"[④]。闵士籍所建猗园，位于东里，后归贡生李宜之，乾隆间叶锦重葺，更拓其地，称古猗园，现仍为嘉定胜景之佼佼者。其他如计氏园、怡园、巢寄园、桐园都从不同角度衬托了南翔镇的文化素质。

蚕丝业市镇菱湖，号称"东南巨都"、"烟火万家"，其经济、文化的繁华程度，也是许多县城、府城所望尘莫及的。请看当时菱湖人对它的描述。

> "数百年来，文章冠冕鼎隆踵继，其骚人墨士握管生花、染翰成雾。即一切游闲豪侠、击筑弹丝、斗鸡走狗……靡不各极

---

① 嘉庆《南翔镇志》卷五选举。

②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首序。

③ 嘉庆《南翔镇志》卷六人物、卷七人物。又见《牧斋初学集·李长蘅墓志铭》。

④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一杂志·园亭。

其工。而又四方舟航所凑，水陆奇深，异货百物所环，廛市之徒摩肩轇轕……盖他境繁华所罕与俪。"[1]

清朝人说，菱湖镇"国朝科第更盛于前明"。自宋至清，进士及第人数不断递增：宋一人、明弘治朝二人、嘉靖朝二人、万历朝四人，清康熙朝三人、雍正朝四人、乾隆朝十七人、嘉庆朝五人、道光朝二人、同治朝一人、光绪朝二人[2]，总计明代八人、清代三十三人，可谓盛极一时。这从侧面反映了明代万历至清代嘉庆年间是菱湖镇的黄金时代。卞斌《募建龙湖书院启》指出："国朝以来人文尤盛"，出现了一门二及第的佳话。"一门上第榜(眼)、(探)花有大小之称。康熙时孙在丰侍郎，殿试一甲第二，从子见龙会试第一。乾隆时孙编修辰东起而兼之，人目侍郎为老榜眼，编修为小榜眼"[3]。不独会试如此，乡试亦然。其乡试同科者，康熙五十三年有吴氏延熙、兆麟、应麋三人；雍正十年有吴氏涞、讷、锦三人；雍正十三年有吴氏龙光、熊光二人，朱氏栋、更二人；乾隆元年有孙氏汝馨、鄂荐、岐三人；乾隆二十五年有孙氏凌云、辰东、级三人；乾隆五十七年有孙氏倬、宪、绪三人；乾隆六十年有孙氏树楷、征槐二人[4]。一个近万户的市镇，获得科第功名者如此之多，令人惊叹不已，足见这个镇的文化知识密集度在同时代各城镇中是遥遥领先的，无怪乎卞斌要说："菱湖科名甲于他镇"[5]。

苏州近傍的唯亭镇，"自明季以迄国朝二百余年，太平翔洽，聚庐而居，人烟稠密，比屋万家"，"里中先民业商贾，务耕织，习儒者亦不少。近时吟咏成风，科名相继，可与诸镇相埒"[6]。唯亭镇人

---

① 王继祀：《重修永宁禅院碑记》，见光绪《菱湖镇志》卷十风俗。

②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九选举志。

③ 光绪《菱湖镇志》卷二公廨引卞斌：《募建龙湖书院启》。

④ 光绪《菱湖镇志》卷二公廨引卞斌：《募建龙湖书院启》。

⑤ 光绪《菱湖镇志》卷二公廨引卞斌：《募建龙湖书院启》。

⑥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才辈出,"明初,高季迪启,为一代开国诗宗;张子宜适诗学与高启、杨基齐名"[1]。高启,字季迪,曾隐居于吴淞江上之青丘,自号青丘子。洪武初,召入纂修元史,擢户部侍郎。有文武才,无书不读,而尤邃于群史。其诗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南楼》、《梓轩》、《姑苏》诸集,文曰《凫藻》,词曰《扣舷》[2]。张适,字子宜。幼颖悟,七岁能赋诗弹琴,十岁通五经,十三岁应江浙乡试,人以为神童。其诗有《甘白先生集》[3]。唯亭镇入清以后又有"尤西堂父子、顾侠君昆仲,相继主持风雅,海内艳称"。"自有明数百年来,先后词坛宗匠蔚然代兴,亦可以识地灵矣"[4]。明代有进士六人、举人二十四人,清代有进士二十三人、举人三十九人,长期保持着引人注目的文化优势。

唯亭近傍的角直镇(亦称甫里),"僻在长洲邑治之东,沃然水壤,其土瘠,谷粟之外无他产;其民习耕,捆织之外无他业,间有贸易,亦不过转输邑中之货,规蝇头利而已,非通衢巨镇商贾辐辏比也"[5]。经济虽不发达,文化却颇为昌明,"诵诗读书者正复不少,比岁科名相继,吟咏成风,胜于他镇"[6],算得上是一个文化名镇。科名词赋相望于明清两代。明代有进士高庸、沈钟等二十四人,举人有赵宗礼等五十九人;清代(截止乾隆时)有进士蒋德峻等六人、举人有许虬等二十四人[7]。无怪乎当地人要说:"甫里之著声吴下者,亦以人物重也"[8]。

---

[1]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
[4]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5]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二十一艺文,金应征:《议革门摊碑记》。
[6]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风俗。
[7]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八进士、卷九孝廉。
[8] 乾隆《吴郡甫里志》卷六人物。

常熟东南的唐市，仅仅是个小市，居然也成为常熟一带的文化中心。方燧深《唐市志序》说："唐市虽小，有水市，有物产，有名胜，有科第，有仙释节烈，经术之湛深，于明则有杨（彝）、顾（梦麟），文章之雄伟于本朝则有苏苞九、陶子师，书画擅长则有邱屿雪、黄尊古，诸家诸体咸备"[1]。杨彝，字子常，号谷园，与太仓顾梦麟并称"杨顾"，"天下翕然从风"，号称"唐市派"。明季应社诸文士各治一经，杨彝专治《诗》，弟子从学者无数，仅著录者即达数百人之多。吴中兴复社，杨彝为中坚人物之一[2]。天启五年，杨彝尝集应社诸公会文于唐市凤基园，一时传为文坛佳话[3]。唐市出了个杨彝，"以故唐市之名闻天下"[4]，决非夸张之词。唐市在明清之际成为吸引吴中文士的理想场所，天启时柏小坡筑柏园，董其昌题额曰"十亩之间"，颇具雅致风采。"凡吴中骚人墨士、琴师棋客，咸集于中。园之主人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5]。

唐市自明迄清，"文章道德之彦，掇巍科高第者，后先辉映"[6]。进士及第者有：许士柔，字仲嘉，天启二年进士；苏祖荫，字苞贻，顺治九年进士；许瑶，字文玉，顺治九年进士；苏凤翔，字苞九，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唐孙华，字君实，康熙二十七年进士；陶元淳，字子师，康熙二十七年进士；许谷，字贻孙，康熙三十九年进士[7]。一个小市的文化发达程度如此之高，在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江南地区也是罕见的，透过唐市这一典型把市镇的文化功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

1. 乾隆《唐市志》卷首方燧深序。
2. 乾隆《唐市志》卷中人物·文苑。
3. 乾隆《唐市志》卷上园亭。
4. 乾隆《唐市志》卷首何忠相序。
5. 乾隆《唐市志》卷上园亭。
6.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
7. 乾隆《唐市志》卷中人物·选举。

此类事例在江南市镇中俯拾即是。以产绢著名的双林镇，明代有进士六人、举人二十七人，清代有进士十六人、举人六十六人。明清两代"愈极繁华，甲第连云"，"四方贤大夫，选胜蹑奇者，咸至于此"[1]。

以米市著称的同里镇，明代有进士十八人、举人四十六人，清代(嘉庆以前)有进士十一人、举人三十一人[2]。人称"自古遵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比他镇为蔚，自宋迄今，故科第不绝，儒风不衰"[3]。

号称"衣被天下"的布业巨镇朱泾，明代有进士十七人、举人三十一人，清代(嘉庆以前)有进士九人、举人二十一人[4]。

"徽商凑集"，"比閭殷富"的罗店镇，明代有进士四人、举人十人，清代有进士三人、举人二十人[5]。

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文化的昌明发达，实为这一地区文化水准遥居全国首位的坚实基础。这一地区先后出现的文人社团如东林、复社、几社、应社等，如果没有这一地域文化为基础，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锡金识小录》记载其地文人结社之多，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市镇文化的影响。这一地区(即无锡、金匮二县)明代景泰初有张思安、唐理等十二子的耆英社，隆庆、万历年间有沈学、浦淇如等二十四子的惜阴社；天启、崇祯年间与几社、复社遥相呼应的华时享、秦镳等十七子的听社，以及华私淑、吕自成等的涯臻诗社；清初，官方禁止文人结社，但是还是涌现了顾景文、顾贞观等云门十子，以及刘齐、刘学洙等蓉湖七子，实际上就是云门社、蓉湖社[6]。

---

① 嘉庆《东林山志》卷二十三艺文志。

② 嘉庆《同里志》卷九选举志。

③ 嘉庆《同里志》卷六典制志。

④ 嘉庆《朱泾志》卷五选举表。

⑤ 光绪《罗店镇志》卷四选举志。

⑥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四综考。

二、市镇风俗——鼎盛时代的投影

风俗是社会生活最生动的写照，它因地而异，带来明显的地域性烙印，它也因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的贫富水平、文化素质、社会心理。翻检江南地区的方志，在风俗这一节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明中叶以来风俗趋向侈靡：

"富室召客，颇以饮馔相高，水陆之珍常至方丈，至于中人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1]；

"明朝风气渐开，人文蔚起，衣冠日盛，但役烦而民贫，教衰而习侈，尚浮靡，好淫祠或僧尼，喜奸讼"[2]；

"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3]；

"明初芟夷豪门，诛戮狂士，于是俗以富为不祥，以贵为不幸……习尚俭素，男子不植党，妇人不市游，久而成俗。……迨百年后人始尚文乐仕，而俭素之习因而渐移。迩来弥甚，厌故常而喜新说，好品藻而善讥详，淳庞之气鲜有存者"[4]；

"吾松正德辛巳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5]；

"万历后率以声华气谊相高，寻盟结社千里命驾，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往时履袜之属出女红，今率买诸市肆矣；往时茶坊酒肆无多家，贩脂胃脯者恒虑不售，今则遍满街巷，旦

---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二疆域考·风俗。

② 康熙《海宁县志》卷二疆域志·风俗。

③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二风土。

④ 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三风俗。

⑤ 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

旦陈列，暮辄罄尽矣；往时非贵显不乘轩，今则肩舆塞路矣"[1]。

出现上述现象何以故？一言以蔽之，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生活日趋富裕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在江南市镇风俗中显示得更为淋漓尽致。不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例一。位于杭嘉水陆交通要道的塘栖镇，明代嘉靖时已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晨驰夕骛，肩摩迹累"[2]。至明末，"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3]。交通运输业、蚕丝业、水果业三大经济支柱造就了繁荣的市镇经济，万历至乾隆年间盛况空前。作为财富渊薮的塘栖镇，每逢年节景况热闹非市。沈士沪《和徐堑君元宵蹈灯西里诗》所描述的塘栖正月十五元宵节之盛景：

> 兹今元宵夕，群游不夜天。
> 画灯娇步影，春烛粲流烟。
> 竹马更新立，星桥忆旧年。
> 太平终日望，惭愧鼓钟前[4]。

万历《杭州府志》记载的元宵灯节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情景，可以作为此诗注脚："元旦前后张灯五夜，而十五夜为最盛。……先是，初旬自官巷口而众安桥计里余，悬卖各色花灯，谓之灯市。至期人家各缚结山棚，悬灯其上，通衢或神庙前醵金装结鳌山船灯。……此五夜箫鼓喧阗，往来游观者至二三鼓始罢，嘉家开宴则装放烟火架以娱客。浪游子弟亦多造硝黄花筒，相对斗胜，谓之高

---

1 《陈司业集·风俗论》，见《常昭合志稿》卷六风俗志。

2 嘉靖十四年陈逵：《唐栖镇通济桥碑记》，见光绪《唐栖志》卷三桥梁。

3 胡元敬：《栖溪风土记》，见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4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花，或粘藏头诗于灯上，谓之猜灯，揣知其意者揭而持去。……街巷歌行舞队竞为奇胜者种种”[1]。

《唐栖志》编者王同在述及明清之际这种盛况时颇为感慨系之：“可见国初承平熙攘气象”[2]。由此可知到清末时，上述热闹气象已不复存在，它是塘栖镇鼎盛时代的产物。

清明节的龙舟竞渡也是如此。龙舟，俗名方船，竞渡以祈蚕业兴旺。各乡竞巧争胜，“水际龙舟，岸滨彩会”，民间俗称“水南会”。钱塘人张仲甫有长诗《唐栖观水嬉曲》记龙舟竞渡五彩缤纷的场面：

画船彩帜风中扬，
两两相继成巨舰，
百室庄严贯月槎，
万花绚烂移春槛。
一时箫鼓闹如雷，
齐向长桥河边来，
后舞前歌花世界，
东船西舫蜃楼台[3]。

咸丰十一年塘栖镇遭太平军之役，“巨室旧家半成瓦砾”，运河堤岸全被破坏，塘栖镇失去了昔日的富庶繁华，早先那种承平熙攘气象荡然无存，反映社会生活的风俗习惯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昔日的元宵灯会、清明竞渡，“经咸丰辛酉兵燹之后，无此盛举矣”[4]。

例二。兴起于南宋的南浔镇，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日趋繁

---

[1] 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
[2]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3]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4]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荣,"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①。每当新丝上市,镇上商贾云集,列肆喧阗,衢路拥塞。南浔镇高度发达的区域经济,培育了它那引人注目的区域文化,前节所述科第极盛是区域文化的一个侧面,而民间习俗则是另一个侧面。万历时当地人王道隆《菰城文献》说:"成化以前,谋饔飧者以兴贩为能,养子弟者以读书为讳,哗者好勇而争讼,细民重释而信巫。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资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笳用为常乐,差有僭逾之风焉"。入清以后此风更甚。这并非守旧士大夫所感叹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而是繁华的市镇经济必然产生的市镇风俗的一个缩影。由于南浔镇久盛不衰,此种风俗持续的时间也特别长。不妨将此间风俗按节序逐一细察:

正月立春,有放风筝、抛球、踢毽诸戏。初五日为五路财神生日,五更时祀以牲醴,称为"接五路"(即接五路财神),又叫"接路头"②。此俗主要是市镇牙行铺肆以及依赖生意谋利的各色人等祈求发财的活动。"祀五路神,以祈利达。……盖古祭行意,而俗以为财神。……是日诸贾人毕集拜叩祈财……市中店肆于初五日后方开张"③。

元宵节前后,鼓声不绝,谓之元宵鼓。镇中街巷到处张灯结彩,贴出藏头诗句,任人揣测,称为打灯谜。又扎造龙、象、狮、马各色灯笼,在街市游行。每夜出会,必有数十对点缀其间,望去宛若纱縠,谓之人引线灯。游行于街市,迎神出现,谓之出灯会,持续十余日始罢。张镇《浔溪渔唱》咏元宵灯会之盛:

元宵风景尽堪夸,
画鼓冬冬灯市哗,

① 潘尔夔:《浔溪文献》,见咸丰《南浔镇志》卷一疆域。

② 道光《南浔镇志》卷一风俗。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

③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补订节序。

卍字栏杆珠箔卷，
争看水面放莲花。

五月十三日，关圣大帝生日，士民焚香拜祝，敛资出会，喧阗街市。二十日为分龙日，南浔镇东西南北四栅俱择空地演水龙。

七月七日，为金元总管诞辰，演剧竟日。十五日为中元节，地官赦罪之辰，僧至录亡者姓名，遍送檀越，谓之关节。建盂兰盆会，夜则放焰口施食，沿河放灯，谓之照冥。市井之家出资，各延僧设瑜伽焰口，镇上街衢间每夜都有。三十日地藏诞辰，士女往东藏寺烧香最盛，入夜各家门前设供香烛，曰点地灯。

九月初五日，南浔镇土神崔、李二承事生日，商贾先期而至，手技杂戏毕集，报赛演剧连日不停。有小艇架以红栏，挡以青缦，仿六柱吴船样式，以供游客观戏。镇上茶寮市列，或歌管纷喧，骚人逸士、估客寓公无不流连忘返。

立冬至岁底数月，乡村皆演戏酬神，谓之社戏。十二月除夕，或有灶前致祷，请方向出门，听市人无意之言，以卜来年休咎，谓之听响卜[1]。

显而易见，此种风俗带有迷信色彩，但如果没有繁荣的市镇经济支撑，断然难以为继。富庶的商品经济造就了市井繁荣昌盛、侈靡豪奢的风俗，难怪嘉道间人要慨叹："迩来风会日趋，稍不如昔，奢靡渐启"[2]。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正如《枫泾小志》所说："赛神之举莫盛于枫泾，始于乾隆癸巳岁，至戊戌更踵事增华，后间三四年辄一为之，择童子十岁以下貌端好者，遍扮诸天列宿尽态极妍，衣皆奇丽，珠以万计，金玉以千计，其有不足，则假诸邻邑，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至期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

---

[1] 以上均见道光《南浔镇志》卷一风俗。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

[2]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

云集，河塞不通，一时传为胜举。然废业耗财，莫此为甚"[1]。又如《锡金识小录》所说："诸乡村去城远者，自二月至四月，或清明，或三月三日、三月十八等日，必有会，或于山，或于庙，或赛神，或传经，男女杂沓，喧哗扰攘"；"村妇终岁机杼所积余钱零布，必罄用始为快，远近村镇多赛会至山"[2]。

例三。松江巨镇朱泾，是标布的集散中心，镇上布号多达数百家，人称"小临清"。赵慎徽诗曰："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3]。朱泾镇的风俗显示了该镇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例如三月初三日清明，上下塘赌赛神会，赌出抬阁，以指粗铁柱扎小儿于上，高出楼檐，装点故事，悉用珠玉珍宝，穷极工巧。谚曰："忙做忙、莫忘朱泾赛城隍"。《朱泾志》说："凡村庄胜会最非善事，会中置办物件，有形之花费，动以累千计，倾动远近，四处人舟云集，阖镇亲友盘桓。其无形之花销更以累万计"[4]。五月五日端午，龙舟竞渡，多至六七舟，舟上旗帐各分五色，亦装抬阁，所费以万计。八月初一日，东林寺开香市，"寺中货卖杂物，列肆而居，至中秋前后，四方男妇填街塞巷，杂遝而来。佛殿几无容足之区，直至九月杪方止"[5]。

例四。棉布业交易中心罗店镇，号称"金罗店"，"日睹贾舶商车之盛，街衢综错"，十分繁华。其风俗显示了这一特色。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各庙宴堂，庙前设立塔灯两座，游人往来不绝"。"更有龙灯盘绕，助以锣鼓，通宵不绝"；"又制一纸船，三四辈扮作妇女，手执荷花，口唱采莲歌或采桑歌"，"鸣金击鼓，谓之闹元宵"。五月五日端午节，龙舟竞渡，五六艘龙舟"旗仗鲜明，锦彩夺目，擅

---

①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

② 《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补正节序。

③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因革。

④ 嘉庆《朱泾志》卷一风俗。

⑤ 嘉庆《朱泾志》卷一风俗。

一邑之胜”。每当棉花、稻谷登场，“好事者率以敬神为名，搭台演戏。甚有两台对峙，两班同演，名曰鸳鸯台，家家邀请亲戚。有力者宰杀猪羊，无力者亦必典质衣物以供酒肴。甲图演罢，乙图接踵而起”[1]。

市镇风俗的另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与市镇及其四乡的经济生活紧密联系、休戚相关，换句话说，此种风俗带有浓厚的市井气息和商品化色彩。

例五。著名的濮绸产地濮院镇，“科名显赫，日出万绸，甲于他镇”。镇民及四乡农家多以养蚕织绸为生，因而风俗多与蚕桑相关。正月间，里巷醵资举办“田柴之会”，祭祀田祖、蚕花诸神，巫者唱神歌侑神。入夜放爆竹、花筒，夜阑送神，焚烧田柴，谓之照田蚕[2]。照田蚕亦称烧田蚕，“正月五日内田间束刍于木末，飏以绯帛，夜出金鼓而焚之，侑以歌词。曰烧田蚕，盖祈年也”[3]。三月初三日，晴主蚕熟，育蚕家贴门神，闭门不炊，亲戚朋友不相往来，揉草头和粉，作青白色茧圆，以祀蚕花诸神。这一天镇上有迎神赛会庆典，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濮院镇醵金为神会热闹异常：

> “结缀罗绮，攒簇珠翠，为抬阁数十座，阁上率用民间娟秀幼稚装扮故事人物，备极巧丽，迎于市中。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

此外还有佑圣会，谢天瑞《鹤林玉露》记康熙十七、十八年佑圣会之盛况简直使人目不暇接：

> “碎翦锦绮，饰以金玉，穷极人间之巧，糜费各数千金，舾舟万计，男女咸集，费且无算。”

---

[1] 以上均见光绪《罗店镇志》卷二街巷、卷一风俗、卷一节序。

[2]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3]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风俗。

这一天乡人每圩各装一船为划船会，用松毛作棚，船中鸣锣鼓一人，椎髻簪花，作蚕妇妆，先翻叶仙诗，卜桑叶价之高低；次为把蚕称茧缫丝等事，以卜蚕丝丰歉；又一人作田夫装，以卜田岁丰歉。划船数十艘，往来如织，士女棹舟往观者甚众，谓之闹清明。

显然，三月三日以来的活动，无一不与蚕桑有关。其后的习俗也是如此。小满时，动三车：丝车、油车、水车，意味着农忙季节的到来。“春末夏初，浸谷种，小满动油车、丝车、水车，谓之动三车”[1]。从这一天开始，家家闭户，谓之“蚕关门”；直到采茧时，才开禁，亲戚才可互相问遗，谓之“蚕开门”[2]。五月端午，“新麦新丝同出场，做丝做麦一齐忙”。镇上店肆开揭账单，赴乡收账，谓之“蚕罢账”[3]。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有盂兰会、水陆道场、翻经会，乡人以为此类活动“利于蚕花”[4]。十二月十二日为蚕生日，养蚕家畚蚕种屑秫做成茧圆，以祀灶神，祈求来年蚕桑兴旺。

例六。以吴绫集散中心见称的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十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一镇风俗全与绫绸业相关，这是因为，“在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5]。例如小满前后，蚕皇殿必演剧三日，谓之小满戏，以祀蚕神。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赛观音会，东西两社庙各迎观音大士像，仪仗鲜艳，互相斗胜。参加者大多是绸行、作坊的伙计，显然是祈求生意兴隆。“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

---

① 万历《嘉兴府志》卷一风俗。
②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③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④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⑤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光绪《盛湖志》卷三风俗。

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1]。年底时，用猪头、鸡、鱼祀神，称为"拜利市"，祈求来年财源茂盛[2]。

例七。王店镇"蚕丝之广不下吴兴"，所产褚绸、画绢都盛销全国各地[3]。全镇视蚕丝为急务，风俗习惯都带有这一特色。正月初五"乞利市"，实为请五路财神。正月十五夜请地仙姑，以卜一年休咎。立春日，沿村间卜，称为送蚕花，养蚕之家清明夜食螺蛳，谓之挑青；清明日早起出游，谓之避青，都是旨在蚕业兴旺的举动。蚕户门上贴"蚕月"两字，例不开门。清明夜还有所谓"听秤"，卜桑叶价格高低及蚕年之丰歉。蚕月有叶市，将立夏之年、月、日、时如算命法推测，称为"叶八字"，意在测算叶价。十二月十二日为蚕生日，养蚕家于此日浴蚕种。

各市镇普遍都有与农事、商事相关的风俗习惯，兹不一一列举。上述数例已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市镇的经济活力和蓬勃生机，是多侧面研究市镇所不可忽略的。

此种风俗仰赖于当地的富庶经济，是与区域经济休戚与共的区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或多或少地蒙上一层宗教迷信色彩，使自身更富有吸引力和凝力，从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杭州近傍的香集、香市就很有显著的典型意义。当地有所谓下乡香市，下乡指苏州及杭嘉三府所属各乡各镇，"村民男女坐船而来杭州进香，均泊于松木场，或上岸自寻下处，或歇各寺院房"，"其船何止千数之多"，"早则正月尽，迟则二月初，咸来聚焉"[4]。"二月起至四月初十，此集最大，香集甚夥……杭地好盛信佛，每在二月前苏常各路船来，香客络绎而至，均泊钱塘门外香荡中。此时

---

①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盛泽镇蚕皇殿旧址今犹存，参看卷首图版。

② 光绪《盛湖志》卷三风俗。

③ 光绪《梅里志》卷七物产。

④ 范祖述：《杭俗遗风》时序类·下乡香市。

赶市店摊各物齐全价贵，诸客游玩，清明前还回养蚕"[1]。来赶香市者"所带银钱无不丰足，故昭庆寺前后左右各行店面均皆云集，名曰赶香市"[2]。还有半山香市、"妇女坐船出艮山门，而富家内眷雇船，借此看桃花。行贩赶市，摊场、盆桶、木桌椅凳堆积，杂货吃食点心齐集买卖。四月底收市，此一季称亦宗大生意也"[3]。无锡一带也有此类情况，"前明二月中旬北塘香灯极盛，苏松两郡往武当进香船俱于北塘齐邦，……船数百，灯数千，城内看灯之船亦齐出，皆悬各色灯，箫管清吹，歌声拂水，士女云集，为一时胜观"[4]。

吴江县黎里镇八月迎神赛会的盛况，也令人叹为观止。每年八月初五、初六为浒弄刘王会，初七、初八为毛家池刘王会。民国十年之后，增加五天会期：初一、初二为东岳会，初三、初四为朱天会，十三为施相公会。以上十三天称为"小会"。十四、十五、十六三天称为"大会"。城隍庙里日夜演戏，叫草台班，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黎里镇迎神赛会的特点是：道子基本按照明代官员出巡的排场，四面大铜锣开道，接着是肃静、回避及官职官衔的行牌，皂隶、判官、旗排十将，太子、太保，前呼后拥。四庵神像出巡的次序是：土地、小天地、财神、城隍，八抬八掇，威风凛凛，前后衔接长达一里许。沿途香案林立，善男信女恭迎神像。日会之外还有夜会，远望似火龙缓缓而行。十六日晚又称夫人会，看灯会，夜市至十二时。街上店铺无不挂灯结彩，赶集的小贩沿路设摊，更增添节日气氛[5]。

凡此种种，莫不反映出太平盛世的社会生活。的确，明清两代

---

[1] 佚名：《杭俗怡情碎锦》时序类·三月初三小和山。

[2] 范祖述：《杭俗遗风》时序类·下乡香市。

[3] 佚名：《杭俗怡情碎锦》时序类·三月初三小和山。

[4]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补订节序。

[5] 邵文长：《黎里镇八月迎神赛会盛况》，载《吴江文史增刊》，第109—110页。

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处在它蒸蒸日上的鼎盛时代，经济的发达程度以及社会的富庶程度，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而市镇在这种高水平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风俗习惯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这种现实。

三、茶馆文化及其他

市镇是商业、手工业中心，它的结构与功能，不同于乡村，也不同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县城、府城。市镇上遍布牙行、作坊、商店、酒楼、茶馆，充斥着牙侩、客商、作坊主、工匠、脚夫、伙计、佣工各色人等，大量商品在这里集散、运转。它不像县城、府城那样带有某种僵化、凝固的惰性，相反，它是富有运动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中心；它也不像乡村那样带有闭塞、呆滞的惰性，相反，它是富有开放性和进取性的，因而才能成为天南地北商贾云集的场所。

在市镇的运转过程中，茶馆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不仅是一个饮茶聊天的处所，而兼具信息、娱乐、赌博的多种功能，是市镇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因为这个缘故，市镇上茶馆之多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太仓的璜泾镇，“自嘉庆以来酒肆有四五十家，茶肆倍之”[①]。璜泾并非大镇，东西二里、南北一里，镇民数千家，茶馆倒有近百家，是令人吃惊的。不过这并非特殊情况，嘉兴的新塍镇有茶馆八十家，王店镇有茶馆六十五家，新篁镇有茶馆四十家[②]。于此可知市镇虽小茶馆不少，此其一；其二，更重要的是，如果茶馆仅仅是茶馆，它不能满足市镇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那么就不可能大量并存于一个市镇的弹丸之地。

首先，茶馆是一个信息中心，也是一个交易场所，商人、作坊主

---

① 道光《璜泾志》卷一流习。

② 《嘉兴新志》上编，第58—75页。

以及农家都把它当作打听行情、做成交易的交际处所。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说：

"各大市镇如南浔、旧馆、织里、菱湖、袁家汇、双林、乌镇，各有定班航船，直通附近各村。……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中午由镇返乡。到镇后即步入茶馆。茧、丝、新米上市时，乡人即以此地为探听市价之所，因而经营茧丝米及其他产品之掮客，亦往往出没于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

很明显，茶馆不仅是喝茶歇脚之处，而是"探听市价之所"。市镇上生意兴隆，也有种种陋规，其中之一就是商品生产品不能与客商直接成交，必须通过牙行居间介绍。而镇上牙行林立，市价变动不一，商品生产者为卖得较好的价钱，就得到茶馆探听市价，与牙行掮客达成交易。

蚕桑地区的市镇，桑叶、蚕丝都是紧俏商品，价格随行就市。《乌青文献》说："凡畜蚕者，或自家蚕桑不足，则豫定别姓之桑，俗曰梢叶。凡蚕一斤用叶八个（二十斤为一个），梢者先期约用银四钱，谓之现梢。既收茧而偿者，约用银五钱，再加杂费五分，谓之赊梢。叶价随时高下，倏忽悬绝，谚云：仙人难断叶价"。又说："蚕毕时，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谓之贩子"[①]。桑叶的现梢、赊梢，蚕丝的买卖，都在茶馆中由牙侩从中撮合成交。

市镇有早市、午市，茶馆也有早茶、晚茶。以生产经济作物及手工业产品为主的镇民、农家，其经营方式与市镇行情休戚相关，每日赶赴市镇吃早茶、吃午茶，并不是一种消费行为，而是一种生产行为——目的在于探听市价行情或做成一笔生意。

茶馆既有此种功能，吸引着市镇上的各色人等，这个信息中心在那个特定的社区中具有某种权威性，因而又成为一个仲裁中

①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卷三土产。

心。如遇纠纷,双方并不向官府诉讼,而是以茶馆为断定是非曲直之地。于是便有所谓"吃讲茶":

"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吃讲茶。"[1]

茶馆的这种功能使它在市镇这个社区中具有颇高的地位。"乡民入市肆饮酒外,无不饮茶者。而地棍游食之徒,一日率二时踞其中,故浮浪不根之说,及图财利、探事情,率由于此"[2]。

茶馆还具有娱乐功能,是市镇的主要娱乐场所。请看:

璜泾镇——"……旁列茶肆,延江湖男女唱淫词,谓之唱滩黄。甚者搭台于附近僻处,演唱男女私情之事,谓之花鼓戏"[3];

罗店镇——"……歌唱淫词小曲,名曰花鼓戏,男女观者致动邪心"[4];

盘龙镇——"……商贾如云,船多桃叶之吟,市尚竹枝之调,新声竞起"[5]。

茶馆戏曲比较粗俗简陋,适合乡民口味。"男敲锣,妇打两头鼓,和以胡琴、笛板,所唱皆淫秽之词,客白亦用土语,村愚悉能通晓"[6]。茶馆戏曲"九调十三腔咸备",如南词、滩黄、花调、大书、道情、戏法、隔壁戏、木人戏、花鼓调、莲花乐声[7]。

茶馆又是一个赌场。赌博是刺激茶馆兴旺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锡金识小录》所说:"酒馆茶坊昔多在县治左右,近则委巷皆有之……至各乡村镇亦多开张,此则近数年以内闻乡之老成人云:

---

[1]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

[2]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流习。

[3]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流习

[4]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

[5] 光绪《盘龙镇志》风俗(不分卷)。

[6] 杨光辅:《淞南乐府》(上海掌故丛书)。

[7] 范祖述:《杭俗遗风》声色类。

由赌博者多故，乐其就食之便"[1]。当时人几乎众口一辞地指出了这点：

"乡镇茶坊，大半赌场"；

"开设茶馆，渐起赌博，小则妨害农功，大则荡废家产"；

"茶肆皆设赌具，接龙、斗虎，无肆不然"[2]。

璜泾镇上，"赌风为盛，……雍正以来忽兴压宝，窝主曰宝场，旁列茶肆，延江湖男女唱淫词"[3]。

外冈镇上，也有宝场，不仅设局于茶馆，还沿街设局。"乡氓负担入市，百计诱骗，一经入局，宝具藏机，照珠揭面，移红变黑，公然肆夺"。宝场还有大局，"先期具柬约至宝所，供以盛馔，侑以歌姬。一宝则捐金成笏，抽头积市如山。开赌者丰衣足食，受赌者荡产倾家"[4]。

罗店镇也是如此，赌场从茶馆向外扩展，有所谓"斗蟋蟀"、"斗鹌鹑"。"每岁秋深，里中无赖辈开设棚场斗蟋蟀，谓之秋兴，与斗者论定花数之多寡，然后赌胜负，主人则按数取头钱。至冬，开设圈场斗鹌鹑，谓之冬兴。……自他处来斗者，谓之客党，本人嫌花数过多，旁人接认者，谓之帮花，于花数外另以钱洋分胜负者，谓之放彩，动以千计"[5]。

月浦镇上，茶馆中赌博花样甚多，有扑八叉、马吊（斗纸牌），游和（小纸牌）、幻和（翻百劳）、挖花等。"茶坊中群小蚁集，一切无赖之徒皆由此起焉"[6]。

---

①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风俗变迁。

②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风俗。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民国《海宁州志稿》卷四十风俗。

③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流习。

④ 乾隆《续外冈志》卷二俗蠹。

⑤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风俗。

⑥ 光绪《月浦志》卷九风俗。

清中叶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市镇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日渐丧失，它的生产性功能逐步减少，消费性功能不断增大。表现在市镇文化上，是越来越多地显示出寄生性与腐朽性，赌博的盛行就是这种变化的集中体现。《南浔镇志》指出：

"市镇乡村每多魁猾奸黠，武断乡曲，春间奋身醵会，搭台演戏，勾引博徒游兵赌博外，近有旋骰、磨钱、斗牌、棋势之类，谜诱良民，为恶不一，相习成风，穷民陷其术中，卖妻鬻子，或流为盗贼。"[1]

一方面市镇由富转贫，另一方面风俗由俭入奢，这种矛盾的现象，揭示了市镇逐渐衰微的征兆。

---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



下　　卷

江南市镇的典型分析

第七章　苏州府典型市镇概览

一、盛　泽　镇

盛泽镇作为著名的丝绸业市镇，兴起得较晚。此地原名青草滩，直至明初，仍是一个村落，居民仅五六十家[1]。当时只有"寅亥市"[2]——每逢寅、亥日赶集的六日一市的村市，并未成为基层商业中心的"市"。弘治《吴江县志》所载吴江县市镇，仅平望、黎里、同里、震泽四镇及县市、江南、新杭三市，并无盛泽市[3]。正德《姑苏志》所载吴江县市镇，与弘治《吴江县市》相同[4]。足见迟至弘治、正德时期，盛泽市还未见建置。

光绪《盛湖志》说它"嘉靖间渐成市"[5]是可信的。人们从嘉靖《吴江县志》中已可看到盛泽市，当时吴江县已在县市、江南市、新杭市之外新增了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八斥市、庵村市及盛泽市，该志记载：

"盛泽，离县治西南六十里，居民百家。"[6]

从明初居民仅五六十家，到成化年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7]，到嘉靖年间发展成为一个市，其间经历了百来年时间。由于它充分发挥了地理的与经济的优势，"以绫绸为业"[8]，日趋繁

---

[1] 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

[2] 乾隆《盛湖志》卷下古迹。

[3]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4]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5] 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

[6]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7] 乾隆《盛湖志》卷上沿革。

[8]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荣，居民增多，商贾辏集，终于在万历、天启间由市发展为镇。

刊于天启七年的《醒世恒言》中，有一篇"施润泽滩阙遇友"，以吴江县盛泽镇为背景，具体地描绘了盛泽镇的繁华景况：

> "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①

小说中施润泽的故事或为虚构，而对盛泽镇的记叙则未必为杜撰。冯梦龙作为当时当地人对盛泽镇的耳闻目睹，应该是可信的实录，由此可知万历、天启年间盛泽已是一个丝织业大镇了。

清初，盛泽镇蓬勃发展。"户口日增，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②；"丝绸之利日扩，南北商贾咸萃"，"商贾辐辏，居民万有余家"，"蕃阜气象诸镇中推为第一"③。由嘉靖至康熙百余年间，居民由百家增至一万余家，猛增百倍，成为吴江县首屈一指的大镇。康雍乾盛世，盛泽镇持续繁荣。

乾隆《盛湖志》说：

> "今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阊门埒。"④

乾隆《吴江县志》说：

> "迄今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之第一。"⑤

由于盛泽镇经济日趋繁荣，地位日趋重要，乾隆五年，移驻县丞于此，盛泽"遂称巨镇"⑥。

---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
② 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
③ 康熙《吴江县志》卷一市镇。
④ 乾隆《盛湖志》卷上沿革。
⑤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⑥ 光绪《盛湖志》卷一沿革。

盛泽镇地处吴江县城东南六十里之西肠圩、充字圩，附近之东肠圩、大适圩、小适圩、饭圩“皆居货致积”，镇上“工贾艺术杂处者，纵横不过一二里”。镇上沿市河南北两岸有南大街(市河南岸)、北大街(市河北岸)，不仅是通衢大道，而且是商业中心，另有新街、花园街、十字街、庄前街、虹桥街、后街、葡萄街、山塘街、酱园街与南北大街相连，四通八达，店肆林立[①]。镇之四乡“绵亘数十圩，南逾麻溪至浙江界，北尽绛圩，东邻王江泾，西边烂溪乡”[②]。位于盛泽镇东南五里的新杭市，地处二十一都糟字圩，与秀水县王江泾接壤，在盛泽镇四乡村庄范围之内，其地久已有发达的丝织业，清宋景和《新杭市诗》：

绵绫织就织千丝，
花样新鲜是折技，
估客不辞千里还，
新杭桥外卸帆迟。”[③]

新杭早于盛泽成市，“居民千余家，以织丝为业”[④]。盛泽镇凭借四乡发达的蚕桑丝织业，成为丝绸集散中心。

盛泽镇与邻近市镇构成市镇网络：

东南至新杭市五里；

东至王江泾镇六里；

北至平望镇十五里，至八斥市三十八里；

西南至新城镇三十里，至濮院镇五十里；

西至震泽镇三十里，至南浔镇五十里。

这一市镇网络处于江南蚕丝业经济中心地带，发达的蚕丝业使盛

---

① 光绪《盛湖志》卷四街里。

② 乾隆《盛湖志》卷上疆域。

③ 光绪《盛湖志》卷二村庄。

④ 宣统《闻川志稿》卷三古迹—名胜。

泽镇与南浔镇、濮院镇一起日趋兴旺。

盛泽镇作为一个丝绸业中心的兴起虽在明代后期，但其四乡的丝织经营却由来已久了。乾隆《吴江县志》说，"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明俞琬纶《络丝妇诗》有'钩悬宰细细'及'丝绝巧唇添'之句。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1]。早在盛泽还未成市之时，即成化、弘治以来，四乡农家已精于机丝绫绸之业，盛泽周围四五十里间，农家都已经把绫绸作为主业，或自织、或雇人织挽，丝织业产品价格的高低，成为决定当地农家"有岁无岁"的主要依据。盛泽镇就是在这种深厚而广阔的丝绸业基础上兴起并发展的。据《醒世恒言》的描述，明末的盛泽镇真是盛况空前：

> "市河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2]

镇东南的新杭市，是丝绸交易的另一个重要市场，计楠《新杭市诗》："估船列市梢，人家夹河岸，秋灯耿不眠，鸣梭响夜半"[3]。

由于丝织业发达，盛泽镇及其四乡以雇佣劳动为特色的机坊数量众多，鼎盛时代大约有数千佣织的机工、曳花儿。乾隆《盛湖志》记其地风俗："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4]。中元夜

---

[1]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

[2]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十八《施润泽滩阙遇友》。

[3] 光绪《盛湖志》卷二村庄。

[4]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即七月十五夜)，镇上有赛观音会，参加迎神赛会的佣织、曳花竟有数千人，可见受雇于机坊的雇佣劳动者之多。雇佣劳动还大量用于加工丝绸的各种作坊之中，承担绸行所收购丝绸的加工业务的炼、染、踹、轴不同工序都有作坊。直至清末，作坊规模仍相当可观，"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1]。

这样就形成了盛泽镇的经济结构："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倘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2]。

吴江县一向以出产丝、绵、绢、罗、纻丝、绫、绸等著称[3]，故有"蚕桑盛于两浙"之谚[4]。而丝织品又以盛泽镇为集散中心，"凡邑中所产，皆聚于盛泽镇，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如一都会矣"[5]。辇万金而来的富商大贾，主要是徽州商人、宁国商人、宁波商人、济宁商人及山西商人。为了与盛泽镇保持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他们大多在此设立会馆[6]。例如康熙十六年山东济宁州商人集资在此建立"济宁会馆"；道光十二年徽州、宁国商人集资在此建立"徽宁会馆"，并立碑纪事，其中写道："吴江县治南六十里曰盛泽镇，凡江浙两省之以蚕织为业者，俱萃于是，商贾辐辏，虽弹丸之地，而繁华过他郡。皖省徽州、宁国

---

① 沈云：《盛湖杂录》(不分卷)。

②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

③ 嘉靖《吴江县志》卷九食货·物产。

④ 康熙《吴江县志》卷十六风俗。

⑤ 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按：康熙《吴江县志》卷十七物产所记略同，但将盛泽镇误写作震泽镇。

⑥ 同治《盛湖志》卷四会馆。

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泽)镇尤汇集之处也”[1]。此外还有山西会馆、宁绍会馆、济东会馆等。盛泽因而成为一个商贾会萃之地，全国丝绸市场的重要一环。

会馆之外，还有公所。最有势力的是绸业公所，是镇上数十家绸庄(绸行)的同业公会，包揽丝绸贸易，下属各绸庄，集中进行交易的市场称为庄面，位于镇东南之庄面上。此外还有丝业公所、领业公所、钱业公所、米业公所，分别为蚕丝业、领投业、钱庄业、粮食业的同业组织。绸、丝、领、钱、米五大行业成为盛泽镇的经济支柱。

上海开埠后，盛泽镇绸商在上海建立分庄，称为申庄，与洋行进行交易[2]。

盛泽镇向全国各地客商提供的绫绸品种很多，绸、罗、绫、纱、绢，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重或轻，各有定式，价格也不尽相同。

绫，花色重者曰庄院线绫，次者曰西机脚踏绫，素者曰串绸惠绫、荡北扁织绫；

罗，只有素色而无花色，有秋罗、银罗、锦罗、生罗之类；

纱，花者居多，素者亦有，如米统、罗片、官纱之类；

绢，有毛绢、长绢、巾带、手帕等。

以上这些绫、罗、纱、绢畅销各地，“京省外国悉来市易”[3]。

此外还产画绢，织之者仅四五家，称画绢局，所织画绢经售于苏州府城；又有云布，一名丝纬布，以棉纱为纬，以丝为经，织成后质轻而肥，自道光间始有；还有线，近乡务此业者居多，其名不一：曰衣线，曰头扣，曰二扣，曰三扣，曰机线(即绸机所用以挽花者)，

---

①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第356页。

② 周德华《盛泽的会馆和公所》，载《吴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③ 光绪《盛湖志》卷三物产。

曰帽纬线[1]。

随着各地对盛泽丝绸需求量日增，本地所产蚕丝供不应求。镇上向机户供应蚕丝的丝行，纷纷向外地采购蚕丝。此类丝行大小百余家，雇佣伙计四出收购蚕丝，"东则嘉善、平湖，西则新市、洲钱、石门、桐乡，南则王店、濮院、新篁、沈荡，北则溧阳、木渎，由丝行趸买，分售机户"[2]。同治、光绪年间，盛泽镇周围二十五里方园之内的农家，无不从事丝织业，共有织机八千台左右，年产丝绸约九十万匹，所需蚕丝五十多万斤，多由镇上丝行向机户供应[3]。

盛泽镇丝绸业的繁荣持续的时间很长。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人造丝织品之竞争，一落千丈"，渐趋衰落。即使在走下坡路的情势下，盛泽镇的丝织业仍保持着颇为可观的景况。四乡农家还是以织绸为业，"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所产纺绸、绉绸、中山葛、绫绸、人丝绉、光机绉、花纺、交织纺、丝巾、秋罗纱、生罗、直罗均甚有名，盛泽镇还是"丝织业集中地区"，有"吴江县除盛泽外即无所谓丝织业"的夸张说法[4]。

据 1950 年代初期的统计，盛泽镇上有绸行八十八家，丝行六十六家，练坊九家，染坊十八家，网扣店七家，簸子店二家，梭子店五家，车木作三十七家，银行七家，钱庄二十一家，茶馆四十八家(其中四家设有书场)，旅馆十家，剧院二家，饭馆及饮食店三十七家，切面店二十六家，糕团店十五家，成衣店六十二家，衣庄七家，丝线作四十四家[5]。

---

[1] 光绪《盛湖志》卷三物产。

[2] 沈云：《盛湖杂录》(不分卷)。

[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72页。

[4] 赵如珩：《江苏省鉴》(1935年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第1365页。

[5] 朱云云：《盛泽丝绸的历史和现状》，载《吴江文史资料》第五辑。

二、震　泽　镇

震泽镇地滨太湖，位于吴江县治西南九十里。宋代称震泽市[1]，元代仍是一个小市，景况萧条，居民仅数十家，元人王杰诗："村市萧条数十家"[2]，即为写照。至成化中，居民增至三四百家，市廛繁荣，逐渐成为一个镇。弘治《吴江县志》所载四江四镇，其中就有震泽镇：

"震泽镇，在十都，太湖之滨，去县治西南九十里……有巡司、寺观，居民亦千百家，自成市井。"[3]

按弘治《吴江县志》修于弘治元年，足见成化年间震泽已成镇无疑。成化初居民才三四百家，成化末居民增至近千家，正德、嘉靖间震泽已成为"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的中型市镇，清初时发展为"货物并聚，居民且二三千家"的大镇[4]。

震泽镇四乡，"居民以蚕桑为业，故耕田养蚕之事纤悉不遗"[5]。农家"颇善治桑"，"桑凡一二十种，冬末春初远近多负而至，其大者长七八尺，谓之大种桑"，农家纷纷买种，且"视蚕事綦重，故植桑尤多，乡村间殆无旷土"[6]。农家不仅重视蚕桑，还精于缫丝，"凡折色地丁之课，及夏秋日用，皆惟蚕丝是赖"[7]。所缫之丝"较他处色更光白"，细者可为纱缎经，俗名经丝；稍粗者多用以

---

[1] 洪武《苏州府志》卷十商税。
[2]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3]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4]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镇市村。
[5]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
[6] 乾隆《震泽县志》卷四疆土·物产；卷二十五风俗·生业。
[7]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风俗·生业。

织绫，俗称绸丝①。

蚕丝是震泽镇的主要出产，四乡农家所生产的经丝、绸丝，集中于镇，然后由镇上客商向各地转运，震泽镇因而成为蚕丝的集散中心，其繁荣状况可以与邻近的南浔镇相比拟。

明中叶至清中叶，震泽一带以出产“苏经”闻名。所谓苏经，是指供应苏州府城机户织缎所用的经丝。由镇上专门做经丝生意的牙行——经行从事这一行业。此种经丝按生产方法不同而分别称为“乡经”与“料经”：农家“以己丝为之，售于牙行，谓之乡经”；农家“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谓之料经”②。农家不仅是小商品生产者，而且也成为牙行商人的雇佣劳动者。

震泽镇及四乡农家，除生产蚕丝外，还兼事丝织，不少机户所生产的绫绸，颇有名气，称为庄绫、徐绫之类。一些机工被雇于机户，获取报酬颇为丰厚，故镇志说：“有专精业此者，其受值较多于他工”③。

清末民初，由于外国资本的渗入，震泽镇的经行发生了分化，除传统的苏经行之外，又新增了以外销业务为主的洋经行，以及以广东为销售对象的广经行。据一九一九年的调查统计，全镇共有苏经行五十余家、洋经行二十余家、广经行五家④。每年销售量很大：洋经行五千至一万余担，苏经行八百至一千余担，广经行二百至六百担，共计约在六千担至一万一千六百余担⑤。震泽四乡三十里方圆之内农家，均以养蚕、摇经为业，“摇户约共有一万数千户，男女人工当在十万左右”⑥。洋经行大多采取“料经”方式，即

①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物产。
②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风俗。
③ 道光《震泽镇志》卷二物产、卷二风俗。
④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641—642页。
⑤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641—642页。
⑥ 《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641—642页。

由洋经行提供丝料，雇农家加工。洋经行一般是向本镇及乌青镇丝地收购细丝，然后"发车户成经"，转售于上海洋庄，为出口货，名"辑里经"[1]。

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震泽镇"所产之丝大多为苏经、丝经。丝经或称辑里丝，多销洋庄及南洋、印度等地。此种辑里丝系由各地购入之土丝，经过接续剔糙等工作，再用摇车摇成，与厂丝模样相似，而价格则逊一等，故外商亦多乐用。如系雇工，日计六角，膳宿由丝经户供给，其原料均庄家发给。该镇大小丝行约十余家，四周附近各地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余户，多系农家副业，由妇女任之。作息无定时，产量亦时有多少，须视外庄销路之盛衰而定。苏经者，即土丝合绞成经……年来是项销路不若辑里丝之盛。该镇计有缫丝厂二家，一震丰缫丝厂，设震泽镇东北栅，置有丝车四百十六座，工人一千三百人；一开弦弓制丝合作社，设开弦弓地方，丝车四十座，雇工八十人"[2]。

其时年产鲜茧八千担左右，有茧行五家，茧灶十八乘，丝行十余家，缫丝厂二家。全镇商店四百余家，有绸布业、南货业、米业较大，此外还有油酱业、腌腊业、茶叶业、国药业、洋广货业、面粉业、花絮业、花楼业、肥料业、鲜肉业、烟纸业、苏经业、丝吐业、丝经业、水果业、旅馆业、轮船业等[3]。

三、平　望　镇

吴江县治东南四十里莺脰湖之滨的平望镇，宋元时代已经兴

---

[1]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2]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附录：《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

[3] 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附录：《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

起，形成市集。《吴江县志》说：平望镇"宋元间，两岸邸肆间列，以便行旅"[1]。

元末明初，平望由市成镇。元末战乱，其地曾筑城。"明太祖吴元年……毁其城为镇"[2]。明朝建立伊始，平望镇已相当繁华，正如县志所说："明初，居民千百家，百货贸易如小邑"[3]。《平望志》的记载更加具体：

> "当是时（洪武初），兹地为八省通衢，冲繁最剧，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凑集，如小邑然。"[4]

弘治《吴江县志》所记则反映了明初平望镇的规模与地位——设有巡检司与水驿的交通要道：

> "平望镇，在二十四都，莺脰湖之滨，去县治东南四十里，有巡司、水驿，冲要之所也。湖滨有殊胜寺、清真道院。居民千百家，自成市井。"[5]

明代中叶，平望镇有进一步的发展。嘉靖《吴江县志》说，平望镇"水驿之冲也，地方三里，居民千家，百货贸易如小邑然，大明弘治以来尤盛"[6]。

嘉靖年间，平望镇屡遭水灾、倭寇之患，一度急剧中衰，"庐舍人烟荡焉欲尽"。经过数十年磨难，至万历中，再度复兴，"耕桑食货熙攘益繁，屹为吴江巨镇"[7]。万历中曾在此设置榷关，虽未几而罢，然已从侧面显示出平望镇在万历年间已进入了鼎盛时代。

自万历至乾隆，伴随着江南经济的大踏步前进，平望镇的面貌

---

[1]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2] 道光《平望志》卷一沿革。
[3]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4] 道光《平望志》卷一沿革。
[5]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6]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7] 道光《平望志》卷一沿革。

也日新月异："居民日增，货物益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俗以小枫桥称之"[1]。此时的平望镇，已成为长江三角洲著名的米业市镇，与苏州府的枫桥市、杭州府的长安镇鼎足而三，故时人谓："平望有小枫桥、小长安之称"[2]。

米业是平望镇主要经济部门。镇上米行、米栈、砻坊、碓坊林立，是粮食的集散中心，湖广、江西出产的稻米，由商贩运至镇上，再由米行转手贩卖至邻近各城镇。不仅如此，平望镇地处水乡，四乡村落水田多旱地少，以盛产稻米著名，"饲蚕者少，服田者多"，"以米业为大宗"[3]。这是它不同于附近许多丝绸业市镇的一大特色。

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农村商品经济作物大量种植，日益成为缺粮地区，农家吃商品粮的趋势日盛一日。在这种经济格局中，市镇上的米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因而平望镇的经济地位也日显重要。从平望镇志中可以依稀窥见其米业繁荣的盛况：

> "里中多以贩米为业，其籴粜之所曰米行，其市集于后溪，其各坊储米之所曰栈，栈之中有砻坊，有碓坊……"[4]。

冬舂米为平望镇特产，远近闻名，镇上以加工冬舂米为专业的铺户为数不少。镇志说：

> "冬舂，吾邑所产米也。有贩自湖广、江西等处之籼米，蒸如冬舂。入囤数日而出者曰黄籼蒸，而不入囤者曰蒸籼，不蒸者曰白籼……"[5]

此种冬舂米的加工方法颇为独特：把米放入甑钵之中，在锅灶上蒸热，然后把蒸米与其他米按比例混杂（比例为六比一），或贮仓，或

---

[1]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2]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
[3]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
[4] 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5] 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贮囤，百日后热透，米色发黄，即成著名的冬春米。此种米"虽他处亦有，而平望为独盛"[①]。

咸丰、同治间，平望镇米业受到外来力量冲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原先客商纷至本镇贩买转运出境，一变而为客商不至、本镇商人前往各地兜售，平望镇作为一个米业市镇的重要性因而大大减退。正如《平望续志》所指出的那样：

> "庚申（咸丰十年）前，商贩多至吾里籴买，以彼来则利权操之我，而其利厚。庚申后，米市散布各处，往往载米至各处粜卖，以我往则利权操之人，而其利薄。"[②]

明中叶至清中叶，平望镇米业兴旺，商贾往来频繁，由米业而带动了其他行业，镇民及四乡农家大多从事织布、织绸、刺绣等业。"女工以木棉花织布者，十家有八九，虽殷实者亦习之。沿乡妇女兼有耕种者，以蚕丝织绸及刺绣者间有之"[③]。

四、同　里　镇

同里，一名同川，旧名富土，后以其名太侈，改名同里[④]，位于吴江县治东十余里。宋末元初已成镇。宋时设巡检司一员，元时设税课局大使、副使各一员以及务提领、务大使、务副使、巡检司各一员。可见其时同里镇已非同小可。县志与镇志都指出，同里镇"宋元间民物丰阜，商贩骈集，百工之事咸具，园池亭榭、声伎歌舞冠绝一时"[⑤]。

元明之际，同里镇由二十六都九里村逐渐南移至二十七都。

①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物产。
② 光绪《平望续志》卷一风俗。
③ 道光《平望志》卷十二生业。
④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⑤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　沿革。

明初，同里镇已颇具规模，“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室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可方州郡，故局务税额逾于县市”[1]。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规模并不算大，但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税课局事务的繁忙及税额之多，都超过了吴江县城，足见明初的同里也是吴江县的巨镇了。全镇有东西南北四栅，方圆五里，设有巡检司、税课局，镇上有洞真观、仁济、翊灵二道院，又有东岳行宫，店铺行庄鳞次栉比，正如弘治《吴江县志》所说，“贸易尤盛，亦一方之巨镇也”[2]。税课局有大使一员、副使一员，负责全镇商业税的征收事宜，“凡商贾侈屠杂市，皆有常征，以时榷而输其值于县”[3]。

发达的商品经济刺激同里镇不断发展扩大。正德、嘉靖间，居民已增至二千余家，较前增加一倍[4]。入清以后，“居民日增，市镇日扩”[5]。镇东西长二里许，周围五里余，“居民稠密，树木阴翳，桥梁、寺观、牌坊、棋杆近联遥接”[6]。主要街巷有：三元桥弄、南濠弄、尤家弄、白场弄、臭弄、石皮弄、仓场弄、穿心弄、西弄、磨坊弄、史家弄、圣堂弄、盐店弄等，互相交叉连接，构成商业区。

同里镇四面皆湖，东为同里湖，南为叶泽湖，西为庞山湖，北为九里湖，西北为吴淞江，东北为摇城湖，又东北为陈湖。同里镇在诸湖之中，镇中有三条市河，汇流于东栅，潴为新湖。镇中原有放生池，占地数亩，茭芦丛生，称为荷花荡，清中叶日渐淤塞，填土架屋，亦成闹市，俗称新填地。

同里镇物产丰富，“商货骈臻，肆为贾区”[7]。镇上诸市荟萃：

---

[1]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地理志 · 疆域。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 · 沿革。

[2]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3] 嘉庆《同里志》卷七官政志 · 官制。

[4]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5] 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 · 沿革

[6] 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 · 形胜。

[7] 嘉庆《同里志》卷二十三艺文志 · 集文、史鉴：《同里社学记》。

米市——在冲字圩、洪字圩、东稔圩、卿圩、稠穲圩，米市上"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是著名的米粮集散中心[1]。

棉布市——在镇居民，在乡农家，皆勤于纺织，"纺纱换花，积少成多，织成棉布细密者，不减东乡诸处"[2]。

船厂——在辽浜，居民多于此设厂造船；

饭箩洗帚作——在姚家湾、宋家浜，居民男女多制竹器为业，"四处变卖，近在市镇，远则入城，并有贩卖取利者"[3]。

可见同里镇是米业、棉布业、造船厂、竹器业中心，成为长江三角洲市镇网络的一个环节，发达的商品经济滋润了这块富庶之地，使它不仅形成经济中心，也形成文化中心，"自古遵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比他镇为蔚，自宋迄今，故科第不绝，儒风不衰"[4]。宋代有进士五人，元代有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明代有进士十八人、举人四十六人，清代(嘉庆以前)有进士十一人，举人三十一人[5]。镇上有宋建状元坊，明建步蟾坊、进士坊、登科坊、毓贤坊、登云坊、侍御坊、旌义坊，清建孝子坊、节孝坊[6]。镇上还建有义学——设于慧忏院，社学——弘治五年以同里税课局原址改建；同川书院——乾隆十二年建于稛字圩[7]。

区区同里镇，科第如此兴旺，人文如此荟萃，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无怪乎明人称同里镇"宋元以来尤多名家盛族"[8]，清人称同里镇"自有明迄今，擢科第登仕版卓有声称者，指不胜屈"[9]。显然

---

① 嘉庆《同里志》卷八赋役志·物产。

② 嘉庆《同里志》卷八赋役志·物产。

③ 嘉庆《同里志》卷八赋役志·物产。

④ 嘉庆《同里志》卷六典制志·风俗。

⑤ 嘉庆《同里志》卷九选举志·科第。

⑥ 嘉庆《同里志》卷四建置志·坊表。

⑦ 嘉庆《同里志》卷三建置志·学校。

⑧ 嘉庆《同里志》卷首、吴骐：《〈同里先哲志〉后序》。

⑨ 嘉庆《同里志》卷首，阎登云：《〈嘉庆同里志〉序》。

这是市镇经济鼎盛时代的产物。

五、黄　溪　市

黄溪市旧称黄家溪，位于吴江县治东南六十里。明代是一个村落，居民数百家。嘉靖《吴江县志》所载市镇，有震泽镇、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及县市、江南市、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盛泽市、新杭市、庵村市[1]，并无黄溪市。康熙《吴江县志》始见黄家溪市[2]。乾隆《吴江县志》称为黄溪市：

> "黄溪市，去县治东南六十里，明以前以村名，居民止数百家。国朝康熙中至二千余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云。"[3]

可见黄溪市成于康熙年间，居民多达二千余家，规模不下于吴江县的一些著名大镇，其工商业发展的水平更是其他小市无法望其项背的。

黄溪市虽成于康熙中，然而它作为一个丝织业中心，作为丝绸业市镇网络中的一个环节，早在明代前期就开始崭露头角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所织绫绸日趋精致，成为远近闻名的丝绸专业市场。明代洪熙、宣德年间，吴江县各地农家"渐事机丝"，黄溪村"户口日增，渐逐机丝线纬之利"[4]。成化、弘治以来，精其业者日渐增多，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5]。

黄溪市一带农家不仅从事机丝，而且精于织绸，凡织绸者名曰

---

[1]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2] 康熙《吴江县志》卷三疆域。按康熙志误作王家溪。

[3]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4]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5]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

机户。机户大多为家庭手工业者，自有织机，家庭成员络经、织绸；富裕机户，备有较多织机，自家经营外，常雇佣机工织挽，产量质量都较个体机户胜过一筹。明嘉靖中，丝每两值银二三分，绫绸价每两值银八九分，机户的经济收益相当丰厚，"业此者渐致饶富"，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绫绸业日见兴旺，"于是相沿成俗"，黄溪市便成了仅次于盛泽镇的丝绸业中心[1]。进入清朝以后，伴随着丝绸业的发达，"机户益多"，"雇人织挽"形成风气，"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日趋普遍。受机户雇佣的机工，有定期雇佣，也有临时雇佣，于是形成了专业机工的雇佣劳动市场。等待雇佣的机工，每天清晨聚集于市场，"立长春、泰安二桥，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2]。这种待雇的机工，都有一技之长，又一贫如洗，在丝绸生意兴旺年代，机户为招徕、笼络机工，往往百般迁就，"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佣工"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一到生意清淡季节，机户辞退雇工，这些机工因"无人雇织"，往往沦为乞丐，"沿途求乞以为常"[3]。这种机工显然已经是早期的无产者，作为雇主的机户则具有早期资产者的雏形了。

黄溪市机户所织绫绸为大宗出产，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重或轻，各有定式，其中称为西机、真西、徐绫、惠绫、四串诸品种，驰名远近，因其"经纬必皆精选，故厚而且重"，深受客商青睐。其他如南浜、荡北、长绢、秋罗、小花等品种，质量较次，份量也较轻，大多系个体机户所织，"虽妇女亦有称能手者"[4]。

黄溪市所产绫绸几乎全部外销。由于本地无牙行，所产绫绸必由"绸领头"收购，转运至盛泽镇、王江泾镇，出售于牙行，再由牙

---

[1]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2]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3]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4]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土产。

行出售给各地客商。盛泽、王江泾牙行对花样、轻重都有严格要求，“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1]。

黄溪市也盛产丝线，明代已有务此业者，其属不一，曰衣线，曰头扣线，曰二扣线，曰机线（即绸机所用以挽花者），入清以后又有帽纬线。此种丝线，供本地机户外，还远销外地[2]。

黄溪市四乡农家在明代时“多不习蚕桑”，清乾隆初年，凋字圩、梧字圩一带农家开始从事蚕桑。所产蚕丝数量有限，供不应求，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外地大量运入。黄溪市称为“丝领头”的商人专门经营买丝业务。“其开设牙行代客售丝者，谓之大主人，牵机户来买者，谓之小主人”。此种大主人、小主人统称丝领头，成为客商与机户的中介人，交易由他们从中斡旋而成，“凡丝纬粗细，任机户自择，然后议价，一切交易”[3]。这种经营方式的弱点在于，机户所需原料丝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客商、牙行，一旦丝贵绸贱，势必影响机户的经济收益，进而影响绸业生产的进退。

事实确实如此。吴江县绸价由嘉靖间每两值银八九分，至康熙时涨至每两值银一钱，乾隆时涨至每两值银一钱三分；丝价由嘉靖间每两值银二三分，至康熙时涨至每两值银三四分，乾隆时涨至每两值银七八分[4]。两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丝价上涨幅度大于绸价，机户织绸所获利润，正在大幅度下降。嘉靖间每一两绸价中原料丝所占比例仅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到乾隆间每一两绸价中原料丝所占比例上升为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无怪乎《吴江县志》指出，“此业织绸者之所以生计日微也”[5]。嘉庆、道光以后，机户的黄金时代逐渐消失。

---

①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②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土产。

③ 道光《黄溪志》卷一疆土·风俗。

④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

⑤ 乾隆《吴江县志》卷三十八风俗·生业。

六、黎　里　镇

黎里在宋代是一个村落，元代形成一个具有商业活动的市[1]。到了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发展成为吴江县一个大镇。弘治《吴江县志》记载：

“黎里镇，在二十三都，西去县治东南二十里。居民千百家，舟楫辐辏，货物腾涌，喧盛不减城市，盖一邑之巨镇也。有罗汉寺、东岳行宫。”[2]

这个“舟楫辐辏、货物腾涌”的喧盛大镇，弘治以来继续以长足的步伐向前迈进，到嘉靖年间，一跃而成为“地方四里，居民二千余家，货物贸易不减城市”的重要商业中心[3]。万历至乾隆，黎里镇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货物贸易如明初”，“居民更二三倍焉”[4]，成为一个居民五六千家的大型市镇。

黎里镇南北相距四里，东西相距三里半。镇中以浜名者十五，以弄名者十三，以汇、扇名者二，以港、街、池名者各一[5]。全镇街道密布，瓦屋鳞次，沿街有廊。镇东有中立阁（俗呼八角亭），西有玛瑙巷，南有禊湖书院（即黎川学舍），北有罗汉讲寺。镇中为商业区，称为中市，有上岸、下岸之分，“上岸多士夫之家，崇尚学术，入夜诵读声不绝”[6]。镇有东西南北四栅，东栅为商业繁忙要地，“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易米及油饼为尤多。舟楫塞港，街道

---

① 嘉庆《黎里志》卷十二杂录。

② 弘治《吴江县志》卷二市镇。

③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

④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⑤ 嘉庆《黎里志》卷二里巷。

⑥ 嘉庆《黎里志》卷二形胜。

肩摩，其繁阜喧盛为一镇之冠"[1]。道光初年，在东栅上下两岸新增官塘上桥、后底、九成汇之处市场，"米饼各货咸集于此贸易"[2]。

黎里镇米业、豆饼业生意兴隆，成为全镇商业经济的支柱。镇东栅最繁华热闹的商业区，就以经营米业、豆饼业为主，每日清晨贸易高峰时间，常常"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直至清末，米业与豆饼业生意仍持续不衰，米粮由轮船直运上海[3]。

纺纱织布业的发达，也是黎里镇不同于邻近丝绸业市镇的一大特色，"小家妇女多以纺纱为业，衣食皆赖之，故纺绩之勤较他处为独盛"[4]。

此外还有水产业。黎里地处水乡，杨家荡牛门湖、陆家荡、鸭拦泾、揽桥荡、后场荡等"洪流细派，千支百港"，四时都有鱼鲜应时，每逢"夏秋之交，沿街摊卖，盈千累万，他处无其盛也"[5]。

养蜂业也是黎里一大特色。四乡农家以其水土得宜，多养蜂贩蜜，"有割蜂蜜于春间，舟楫络绎，往各处价买割取，分别地界，世以为业"[6]。

黎里镇在它的全盛时代是十分繁荣的。这只消从每年八月中的神会排场之奢就可窥其一斑。八月十一日，奉城隍及随粮王土地游巡诸神至村庙中，称为"宿仙"。十二日，排列执事由水道绕市河至罗汉寺、东岳庙，称为"接佛"。十三日设筵演剧。十四、十五、十六三日昼夜出会，"里中各设香案，张彩灯，富家大室更陈设古董，互相炫耀"。十六日，诸神会，是一系列活动的高潮。诸神会至

---

① 嘉庆《黎里志》卷二形胜。

② 光绪《黎里续志》卷二里巷。

③ 民国《吴江县乡土志》第十二黎里市。

④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

⑤ 光绪《黎里续志》卷一物产。

⑥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

东栅，司会者备船只，由市河归庙，称为“游河上殿”。入夜，出诸神夫人，称为“夫人会”，妇女沿街执香摩肩接踵，笙歌载道，灯月交辉，通晓达旦。“各处卖买营生者，充塞街道，无所不有，往来杂沓”①。

著名诗人袁枚路过黎里镇，盛赞其“风俗醇美”，“家无司阍，以路无乞丐也；夜户不闭，以邻无盗贼也；行者不乘车、不着屐，以左右皆长廊也；士大夫互结婚姻，丝箩不断；家制小舟荡摇自便，有古桃源风”②。袁枚的描绘难免有过誉之处，但从中也可看出黎里镇经济繁荣、居民富庶的实况。

黎里镇不仅是商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由于其地“城远地偏，不当孔道，无兵燹之虞”③，使它成为乡绅聚集之所，“硕儒名辅接踵而起”④，明代有进士十人，举人十七人，清代有进士五人、举人三十六人⑤。镇上名门大族比比皆是，颇具规模的园林别墅多达五十三处⑥。充分显示了明清时代黎里镇盛极一时的地位。

七、章 练 塘 镇

吴江县章练塘镇(亦作庄练塘镇)兴起于明末清初。嘉靖《吴江县志》所载十市四镇，其中并无章练塘镇⑦。康熙《吴江县志》所载市镇中已有章练塘镇，系吴江县“与松之青浦县及长洲县共

---

① 嘉庆《黎里志》卷四风俗。

② 袁枚：《随园诗话》。

③ 嘉庆《黎里志》卷二形胜。

④ 嘉庆《黎里志》卷首凡例。

⑤ 嘉庆《黎里志》卷六科第表。光绪《黎里续志》卷五科第表。

⑥ 嘉庆《黎里志》卷四园亭。光绪《黎里续志》卷三园第。

⑦ 嘉靖《吴江县志》卷一疆域。十市四镇为：县市、江南市、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盛泽市、新杭市、庉村市及震泽镇、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

壤"[1]。至乾隆时,已成巨镇。乾隆《吴江县志》载:

> "庄练塘镇,去县治东九十里,与长洲、青浦合辖,民居稠密,百货具备,其居吴江者今几千家。"[2]

章练塘镇东西长九里,南北宽六里,分东市、西市,以上塘界桥、下塘界弄为限[3]。东市是闹市区,街道密布,上塘有太平桥、北栅口、惠世庵场、小白场、新街、大白场、旗杆场、单家浜、轿子湾、典当场、圣堂场、油车场、界桥头;下塘有李岸、丁王浜、校场头、衙门场、李夏港、南栅、混堂浜。西市较次地东市,但街道也不少,上塘有高廊栅、酱园场、淳塘里、观音阁、急水路、西衙门场、西栅口;下塘有小独圩、潭址里、毛家岸、冯家栅、西栅口。东市、西市均有一些小巷,如萧家弄、许家弄、北庄弄、典当弄、猪行弄、界弄、徐家弄、王家弄、祠堂弄等[4]。大街小巷上店铺林立,形成市镇商业网。

章练塘镇四面皆水,镇的东西北三面各有水栅一处,南面有水栅二处。镇东太平桥附近为米市所在地,生意十分兴隆,"上海米舶,及杭、湖、常熟之来购米谷者多泊焉"。镇东新街至轿子湾、西界桥至湾塘是主要商业中心地段,"每早市,乡人咸集,舟楫塞港,街道摩肩,繁盛为一镇之冠"[5]。

米市所出售的稻米,是本地特产的香粳稻、芦籼之类,系本镇大宗出产之一[6]。

章练塘一带农家不事丝绸,故养蚕者甚少。农家多从事纺纱、织布,"乡妇抱布入市,易棉归,旦复抱布出。纺法用两指捻纱,名

---

[1] 康熙《吴江县志》卷二疆域。
[2] 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
[3] 民国《章练小志》卷一镇市。
[4] 民国《青浦县志》卷二疆域·街巷。
[5] 民国《章练小志》卷一形胜。
[6] 民国《章练小志》卷三物产。

手车。织者率日成一端。入市易钱,佐薪水"[1]。农家所织棉布精致,"紧细若绸",有丝布、绉布、柳条布、蚂蚁布、芦席纹布、一颗印布等,为章练塘镇"出产物之大宗"[2]。每逢秋季,镇上布庄大量收购各色棉布,故"秋庄最盛",庄布由客商远销各地,甚至远销外洋,"颇为西商所争购"[3]。

章练塘镇民及四乡农家还以制造灌溉工具——镶车为业。所制镶车,或以人力,或以牛力,形式不一,"制作灵便,迥非他处所及"。镇民及四乡农家"大半以制车为业","环练塘数十村庄,车船约三百多艘,其营业发达,西至常州以西,东至浦东间"[4]。

此外还有专门修理纺棉花车,"业之利不亚于力耕,颇有倚为终岁之生涯焉"[5]。

八、周　庄　镇

周庄镇属苏州府长洲县,雍正三年析长洲县置元和县后,改属元和县,"去县东南七十里,有千总驻防,其西南属吴江县,东属松江青浦县"[6]。其地属贞丰里,镇中有贞丰桥,故又名贞丰。本为荒村,南宋时北人南下侨居,人烟渐密。元末沈万三秀之父沈祐,由南浔镇徙居于此,在东垞置庄田,周庄之名始著。陶煦说,"元季沈万三秀之父祐,由湖州南浔镇徙居东垞,始辟为镇"[7];又说:"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沈万三父子之功,当时镇西半皆墓地,人烟

---

[1] 民国《章练小志》卷三风俗。
[2] 民国《章练小志》卷二物产。
[3] 民国《章练小志》卷二物产。
[4] 民国《章练小志》卷三风俗。
[5] 民国《章练小志》卷三风俗。
[6]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
[7]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界域。

所萃，惟严字一圩，其东南隅曰东垞，万三住宅在焉，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1]。由此看来，周庄镇始建于元末。

明初，朱元璋下令籍没江南首富沈万三，政治扫荡与经济剥夺双管齐下，镇上仓库、园亭、住宅顷刻顿成颓垣断壁，市肆迁至后港。周庄镇遭此浩劫，迅速衰落，再度成为荒村，在明代编纂的地方志中已经不复见其踪影。正德《姑苏志》载各县市镇甚详，独无周庄镇，其时长洲县仅甫里（六直）、陈墓、许市、陆墓诸镇及大市、黄埭、相成、王墓、尹山诸市[2]。嘉靖《南畿志》亦不载周庄镇[3]。

正如《周庄镇志》所说："前明，迁肆于后港，镇西多坟墓，鲜民居"[4]。这时的周庄显然不具备一个商业市镇的规模。到清初，周庄逐渐复兴，"康熙间，东西二栅俱成阛阓"，重新成为长洲县市镇系列中的一环。康熙《长洲县志》所载四市十镇中，就有周庄镇：

> "周庄，在二十六都，去县东南四十里，为吴江县、松江府交接之所。"[5]

周庄镇有东西南北四栅，市街长三里、宽二里[6]。清代中叶周庄镇极盛时，镇上居民将近五千，人称"其户口赋役之数足当西北一小县"[7]。地处长洲（元和）、吴江、青浦之间，"东走沪渎，南通浙境，距吴江所辖之同里、黎里、莘塔，元和所辖之车坊、六直、陈墓诸镇，均不过二三十里"[8]。与邻近的市镇构成细密的网络：

---

① 光绪《周庄镇志》卷二第宅。

②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③ 嘉靖《南畿志》卷十二苏州府·城社。

④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界域。

⑤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⑥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界域。

⑦ 嘉庆《贞丰拟乘》卷首，喻荣曜《贞丰拟乘序》。

⑧ 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卷上。

东至青浦之朱家角镇三十六里;

东南至青浦之金泽镇二十里,至章练塘镇四十里;

南至吴江之莘塔镇十二里,至芦墟镇二十里;

西南至吴江之北厍镇十八里,至黎里镇三十六里;

西至吴江之庞村镇十八里,至同里镇二十七里;

北至元和之陈墓镇十八里,至六直镇三十六里;

东北至昆山之杨抢泾镇四十里。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一个手工业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

周庄镇四乡是棉作地区,从事植棉、纺纱、织布的农家甚多,所生产的纱、布闻名于各地。

棉纱——"妇女以木棉花去其核,弹作絮,卷为棉条而纺之,复束成绞,以易于市,遂捆载至浙江硖石镇以售"①。

棉布——"以棉纱着浆理作经,卷于机轴,复以棉纱为纬,织成布,与陈墓庄同"。有綵布(以棉纱为经以白綵为纬织成)、綦子布(白棉纱间以青棉纱织作小方块成棋盘纹,可为手巾)、雪里青布(以青白棉纱逐一间织而成)。农家织成棉布,多运至镇上售与布庄,再由布庄转售于外地客商,号称"周庄布"②。

镇民与四乡农家还从事竹木业。所生产的竹器很有特色,如吞——"坚利灵便,数年不敝,南栅、港东、隆兴桥南多业此者";又如竹器农具——泥篅、臂笼、秧篰、土簣之类;再如竹器渔具——退笼、鱼罩、鳗篰、蟹篰之类;其他如筛、匾、栈条、鸡笼之类。此类作坊、店铺集中于镇上篾竹埭,篾竹埭位于"北栅、港东、全功桥至永安桥",这一带"比户以此为业,故名篾竹埭"③。此类竹器行销于

①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②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③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邻近的同里镇、六直镇、陈墓镇、金泽镇一带，“为农者为渔者赖竹器供用尤急”[1]。

镇上一些居民还从事铜器生产，“冯费二姓之脚炉与嘉禾之张炉媲美，坚实厚重，卅年不敝”[2]。

关衫业也是周庄一大特色。关衫以灯草皮织成，比一般蓑衣少两袖，坚密耐久，较胜他处，“下塘普庆桥以东比户为之”[3]。

镇上还有从事粮食贸易的粮食牙行。陶秉信就是著名的米行商人，他由家道中衰的儒生改业经商，“架屋为粮食牙行，渐拓其基，建丰玉堂宅百余椽”[4]，显然由粮食牙行而发财致富，可见镇上粮食贸易之兴隆。

由于周庄镇靠近阳澄湖、淀山湖，水产丰富，四乡农家“以渔为业者多”，所捕鱼鲜“四时不绝”，大量集中于镇上出售，因此“东西二港俱成列肆”，水产生意十分繁忙[5]。

这样就形成了周庄镇以棉纺织业、竹器业、粮食业、水产业为基本行业的经济结构。由于商品经济发达，不仅镇民以商工为业，四乡农家也多以手工业为主、农业为副。正如陶煦所说：“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在乡者鲜不务农”、“妇女则皆以木棉为纺织，间作刺绣”[6]。清末同治年间，全镇居民五千余人，其中为各种工商业作坊、店铺充当雇工伙计的约占一千余人[7]，几乎可以说全镇每家每户都与工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

---

① 嘉庆《贞丰拟乘》卷上土产。

② 嘉庆《贞丰拟乘》卷上土产。

③ 光绪《周庄镇志》卷一物产。

④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人物。

⑤ 嘉庆《贞丰拟乘》卷上水道、卷上物产。

⑥ 光绪《周庄镇志》卷四风俗。

⑦ 陶煦：《贞丰里庚申见闻录》卷下。

九、唯　亭　镇

唯亭又称彝亭、怡亭，明代中叶以前尚未成镇，"民贫俗朴，人皆散处村庄"①。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由村庄上升为市镇，"聚庐而居，人烟稠密"。镇中上塘西市仁寿桥（俗名王店桥）建于成化元年、重修于嘉靖七年，上塘状元桥（俗名章家桥）重修于万历元年②，由此可以推定，嘉靖、万历年间唯亭镇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市镇了。到清朝初年发展成"比屋万家"③的大镇。康熙《长洲县志》中唯亭镇称彝亭镇，与甫里、相城、陆墓、陈墓、黄埭、尹山、周庄、王墓、金市并列为长洲十镇之一④。析置元和县后，唯亭镇划归元和县，位于元和县治东三十五里，有把总驻防⑤。

唯亭镇在娄江上，为太仓、松江、昆山必经要道。娄江为东南诸水入海之尾闾，经昆山至太仓刘家河入海。镇西南有沙湖（一名金沙湖），离镇三里，上通金泾滱，下通吴淞江。全镇商业区分布于上塘与下塘之东市、中市、西市。上塘东市驷马泾桥至中市季泾桥，为中十九都四十七图，季泾桥起至西市王店桥，为中十九都九图，下塘东市至德庙桥，至西市归家港，及上塘王店桥西至护门泾桥，为中十九都五十七图。

唯亭镇以盛产夏布、毛毯而著称，夏布业、毛毯业成为该镇的特色，也是该镇的经济支柱⑥。夏布作坊、毛毯作坊集中于镇东市

---

①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四津梁。

③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④ 康熙《长洲县志》卷八市镇。

⑤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九乡都·市镇。

⑥ 乾隆《元和县志》卷二村镇。

横跨至和塘的阜民霖雨桥(俗名大桥)两侧。此类作坊当地人俗称“庄家”,将四乡农家生产之夏布、毛毯进行加工:漂染、彩画,然后由客商运销外地。《元和唯亭志》说:

“里中夏布、毛毯名称四方,习是业者霖雨桥头上下塘俱多,谓之庄家,漂染、彩画俱极精巧。”①

唯亭镇手工业作坊遍布,主要有布庄、毯庄、油坊、织作、染坊、切作。布庄,“在唯亭东市,各处客贩及阊门字号店,皆坐庄买收,漂染俱精”、毯庄,“在唯亭戴墟,彩画人物山水花卉禽兽,并极精巧”;油坊,“在外跨塘阴城淀泾”;织作,“在唯亭蔡顾巷,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我”;染作,在霖雨桥头上下塘;切作,“在悬珠荡上,比户切纸为业”②。

不仅镇民从事此业,四乡农家也多织夏布、毛毯,“东隅业织夏布,东南隅业毛毯”③。夏布“绩苎为之,漂熟者名洗白,生者为生苎,名闻四方,出唯亭东南村庄”;毛毯“唯亭后戴墟施家浜,家家织造”④。

手工业在唯亭四乡农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其地低洼,易遭水淹,《唯亭志》说:“近镇田亩在郡城之东南,塘北者虽高于塘南,然皆属洼下之区,一遭水灾,多至淹没,至于滨阳城湖、金沙湖之水区,尤易淹没”⑤。农业收成不高,是农家经营手工业的一大动因。因此,手工业门类很多,除夏布业、毛毯业外,还有各种行业。“四隅之民,工商佃农之外,各习手艺。东隅业织夏布,东南隅业毛毯,南隅业织蒲萎,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纱,间有

①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③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④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⑤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业毛毯、编帘、切纸者。其女红则绩苎緣、织蓑衣、纺纱、缫丝,惟东北隅则绩苎緣为多"[①]。因此,唯亭镇物产丰富,属于布帛之属的有四种,除夏布外还有三种:

生纱——有花有素,夏月可代絺綌,出产于蔡顾巷;

浜布——长洲、元和所产浜布以唯亭为佳;

罗布——由苎、棉合织而成。

杂造之属八种,除毛毯外还有七种:

芦席——出斜塘,大者名敢船,小者名讨仓;

篾帘——以出下雉渎之北为佳;

蒲包——出唯亭南乡村,包棉花者名花包,装粮食者名阔口米包;

黄金草刷帚——唯亭陆氏独造,各处所无,织布者藉以刷布;

蓑衣——出唯亭东乡村;

纸阡——悬珠荡上村,家家切纸阡[②]。

唯亭镇民亦善于经商,"崇祯癸末,唯亭钱裕鞠合伙入海贸易,共一百二十余人";"崇祯末,唯亭袁某,航海贸易,同伴八十余人"[③]。在同一时期内,一个镇上出海贸易者已达二百余人,足见唯亭镇经商风气之盛。

工商业的发达弥补了农业的不足,造就了唯亭镇经济的富庶。这充分反映在节庆习俗上。"社会,村庄处处有之",春社举贤圣会,秋社举猛将会,清明日祭坛会,八月朔城隍解饷会,十月朔让王解饷会。"近镇村庄自新春至初夏,各有台戏,好事者间演妙剧,俗所称上三班者,看戏之费类于社会,或循例而无岁不演,或特创数十年一举"。故明人王稚登云:"迎神赛会则乐趋,醵钱演戏财

①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物产。

③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二十杂记。

不吝"[①]。

富庶的经济造就唯亭镇"人材辈出","明初高季迪启为一代开国诗宗,张子宜适诗学与高启、杨基齐名"。入清以后,"尤西堂父子、顾侠君昆季,相继主持风雅,海内艳称"。明清两代,"先后词坛宗匠蔚然代兴"[②]。明代有进士六人、举人二十四人,清代(道光以前)有进士二十三人、举人三十九人[③],堪称地杰人灵。

十、璜 泾 镇

璜泾,宋末元初已是常熟县的大镇。元末,遭兵火洗劫,全镇化为废墟。明代成化年间,本地人赵璧在废墟上盖屋数百间,招徕商旅,此处重新振兴,称为赵市。弘治十年,将常熟县双凤乡割归太仓州,坐落于双凤乡的璜泾赵市也随之改隶太仓州。

李杰《璜泾赵市碑记》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璜泾故大镇,元季兵燹,民始荡析离居,而昔时繁华之地鞠为草莽之区矣。国朝(按:指明朝)混一以来百有余年,无有能兴复之者。承事郎赵君仲辉世居其地,慨然以为己任,乃捐家资,鸠工僦材……于是商贾骈集,货财辐辏,若土地所产,与夫他方水陆之物,靡不悉具。凡近市二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盖不俟赢粮负橐操舟驰驱远赴都邑,而不日之间,已遂其所求矣。阅三十余年聚居益盛,远近之人皆以赵市名之。"[④]

璜泾镇成化时复兴,改称赵市,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一直称

①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②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三风俗。
③ 道光《元和唯亭志》卷十一科日。
④ 弘治《太仓州志》卷十文,李杰:《璜泾赵市碑记》。

市，不再称镇。弘治《太仓州志》将它列入太仓十一市之中，与诸泾市、涂松市、直塘市、吴公市、新市、隆市、半泾市、甘草市、新安市、陆河市并列，而不与双凤镇、沙头镇、茜泾镇并列[①]。正德《姑苏志》则称璜泾市，不称赵市，列为太仓十市之一：诸泾市、半泾市、新市、璜泾市、隆市、甘草市、直塘市、吴公市、涂嵩市、陆河市（其时新安市已上升为新安镇，与双凤镇、沙头镇、茜泾镇并列为太仓四镇）[②]。嘉靖《南畿志》也称璜泾市，为太仓十市四镇之一[③]。

随着璜泾经济的逐步繁荣，由市升为镇，再度以璜泾镇闻名于太仓、常熟一带。乾隆《江南通志》所载太仓州市镇中，璜泾镇已与双凤镇、沙头镇并列为太仓三大镇[④]。

璜泾镇南峙鳜山，北滨长江，东通大海，西绕钱泾，唐茜泾横其中，蒋泾、姚荡纵如廿字。镇中商业区，即所谓"市心"，就在由河道构成的两个十字港附近。河南、河北两条街道，东西二里，与此相交的其他街道，南北一里，全镇居民数千户，分布于东西二里、南北一里的街巷之中，故镇志说："镇民烟火数千家，攒集廿字之……"[⑤]。

南北陈大港，由璜泾至太仓，西出唐茜，南绕新泾至常熟。璜泾镇处于常熟、太仓间，与邻近市镇构成一个网络体系。这种网络体系可以模式化为两层同心圆，其内一层基本上是璜泾镇的商业网络的延伸，也就是超越璜泾镇市街的大璜泾镇的范围，镇志把这个范围称为璜泾镇的"分巷"，其态势如下：

刘家市——在镇西南三里漕头塘上，明刘智创，道光年间衰落；

---

① 弘治《太仓州志》卷一市镇。

②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③ 嘉靖《南畿志》卷十二苏州·城社。

④ 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六舆地志·关津。

⑤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乡域志·形势。

穿山市——在镇南六里；

冯家桥市——在穿山市北一里，穿山市衰，渐移于此；

归家庄市——在镇南七里，乾隆五十年起渐成市；

时思庵镇——在镇东南九里，向称庵弄，乾隆中兴起，道光时有居民数百家，市日盛；

陆河镇——在镇西北十里；

横塘市——在镇西北十二里；

张家市——在陆河西五公里，旧称白茆市①。

这就是东西二里、南北一里的璜泾镇的延伸范围，这些小市镇与璜泾镇构成一体，互相依存。

市镇网络的外一层，是由璜泾镇与邻近市镇构成的。以璜泾为中心，向四面幅射：

东至甘草镇九里；

西至何市十八里；

南至沙头镇十八里，至毛家市三十里；

东南至陆公市十八里，至茜泾镇三十二里②。

璜泾镇四乡是著名的棉花产地。"棉花，元至正间始传此种，太仓东乡土高最宜，今常熟东乡高田皆种之"③。璜泾四乡"其田中中，其种宜木棉"④，"镇地高仰，多种木棉"⑤。往来于璜泾的商贾，多从事棉、米生意，璜泾镇成为棉、米集散地，本镇并无地方特色手工业。

清中叶以来，由于棉、米生意的不景气，璜泾镇的消费性、寄生性日趋明显，镇上地主士绅聚居，习俗侈靡，"自嘉庆以来，酒肆有

①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营建志·分巷。

②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乡域志·里至。

③ 乾隆《苏州府志》卷十二物产。

④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风俗志·流习。

⑤ 道光《璜泾志稿》卷七琐缀志·逸事。

四五十家，茶肆倍之，乡人入市肆饮酒之外，无不饮茶者。而地棍游食之徒，一日率二时踞其中，故浮浪不根之说，及图财利探事情，率由于此"[1]。镇上赌风很盛，压宝的"宝场遍布于大街小巷。宝场"旁列茶肆，延江湖男女唱淫词，谓之唱滩黄。甚者搭台于附近僻处，演唱男女私情之事，谓之花鼓戏"[2]。

十一、唐　　市

唐市，旧名尤泾市。"自明中叶唐氏聚居语濂泾，渐成市集，始称唐市"[3]。唐氏家族聚居语廉泾是成化初年的事，唐市渐成市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4]。唐市商业区的主要桥梁均建于成化年间，如万安桥，"架木为梁，跨市河，在周孝侯庙北，明成化初建"；语廉泾东桥，"跨语廉泾，明成化初建"；三塘桥，"明成化间建"[5]。

据正德《姑苏志》，"唐市，去（常熟）县东三十里，旧名尤泾市"[6]。嘉靖年间，唐市已成为"聚居可三四百家，有商舶"[7]的商业中心了。嘉靖、万历以来，唐市商业兴隆，富商大贾鳞次栉比，"拥资廿余万者有数十家，故谚有金唐市之名"[8]。"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世"，万历、天启间柏小坡号称唐市首富，有占地四十亩的园林"柏园"，建于天启年间，豪华无比，"凡关中骚人、墨士、琴师、棋客、咸集于中，园之主人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

①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风俗志·流习。

② 道光《璜泾志稿》卷一风俗志·流习。

③ 龚文洵：《唐市志补遗·杂记》。

④ 弘治《常熟县志》卷一乡都。

⑤ 乾隆《唐市志》卷上桥梁。

⑥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⑦ 乾隆《唐市志》卷上本志。

⑧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

⑨ 乾隆《唐市志》卷下杂记，卷上园亭。

剧"[1]。建于明代的此类园亭别墅，还有古木掩映的水东丘园、以兰菊闻名的晚香小筑等[2]，显示了唐市在万历、天启间经济富庶、人文荟萃的盛况。

晚明至清初，"百数十年来，商贾辏集，才彦蔚兴，唐市之名闻于列郡"[3]。住户也由先前的三四百家增加数倍。乾隆时代，唐市虽仍名为市，实际已成大镇，当时人习惯地称唐市为常熟、昭文四大镇之一。乾隆五十七年倪赐所撰《唐市志跋》指出，"常昭有四大镇，唐市其一也，隶常邑，在东南三十里，为四方水陆孔道"[4]。同时代人许嘉佑《上蒋御史莘田书》也说："通邑虽称十七水区，计人烟市集，灾民望走鱼米之路，独唐市为镇，余皆村落耳"；又说，"故唐市虽仅一镇，然饥民就食之数约与城相半"[5]。可见乾隆时代唐市不仅是一大镇，而且其经济之发达、地位之重要，可与县城比美。

清末，唐市改称为东唐墅，以与西唐市相区别。西唐市，"邻江阴界，市约里许，西半属江阴，街中有石牌，居民五六百户"[6]。此西唐市，位于常熟县西北，与位于常熟县东南的唐市毫不相干。东唐墅才是先前的唐市，"东唐墅，跨尤泾，东临金庄泾，西临语廉泾，距城三十余里，河东西街各一道，居民各三百五六十户(人丁各一千七八百)，又北廊下街一道(临金庄泾)，居民约百六十户(人丁约七八百)"[7]。其地理位置与街巷格局都与先前的唐市基本相符。

唐市主要水道为尤泾，南通阳城湖，北通西山泾，其次为语廉泾、黄泾、金庄泾。尤泾横贯市中部分又称市河，市河东西两岸为

---

② 乾隆《唐市志》卷上园亭。

③ 乾隆《唐市志》卷首，张邦镇《校订唐市志求撰序文小引》。

④ 乾隆《唐市志》卷下杂记。

⑤ 乾隆《唐市志》卷下集文。

⑥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⑦ 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五市镇志。

大街。与河西大街相连的有:南街、西街、新廊、施家弄、孙家弄、栈房弄、典当弄、大桥弄、萧家弄(北通新廊)、桑家弄、祖师堂弄(南通新廊)、军界弄、红桥弄。与河东大街相连的有:南街、北廊、金庄南北廊、十家廊、小石桥南北弄、万汇桥弄、关帝庙弄(通十家廊)、喻家弄、钮家弄、杨家弄、大桥弄、小石桥弄(通北廊)、柏家弄、柏家墙门弄、栈房弄。另有河北街(实廊)一条。[1]。河西大街、河东大街及河北街、北廊下街为主要商业区,"乡民为市,黎明而集,日中而散,不过贸易食货",外地客商还在此开设典当、布庄,"其典商、布贾多非土著"[2]。

唐市四乡农家,"谋生之方不专仰于田亩","田事稍暇,男则捕鱼灌园,女则擗绩纺织","百工居肆,无雕文刻缕之技,唯治田器、制渔具、作舍编篱、捆屦织席为能事"[3]。

唐市主要物产有:

香花莲稻——芒长粒大,色红而香,甫里(六直)亦有,而市产为最佳;

苎布——以苎织成,漂而熟者曰洗白,生者曰生苎;

罗纹布——以苎、縩、棉纱间三梭或四梭织成;

秧荐——乡农为之,温软如褥;

灯——以纱制成者曰戳纱灯,以麦杆劈如丝发,织花草人物制成者曰麦杆灯;

摺绢——以五色绢摺成花鸟人物,意态如生[4]。

唐市乃人文荟萃之地,自晚明迄于清前期,"文章道德之彦,掇巍科高第者,后先挥映,皆尚气节而重声闻"[5]。明代天启年间有

---

① 乾隆《唐市志》卷上街弄。
②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
③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
④ 乾隆《唐市志》卷上物产。
⑤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

进士许士柔，清代顺治年间有进士苏祖荫、许瑶，康熙年间有进士苏凤翔、唐孙华、陶元淳、许谷[1]。不仅科第兴旺，而且其地藏龙卧虎，人才辈出。杨彝，字子常，号谷园，与太仓名士顾梦麟合称"杨顾"，"天下翕然从风"，"又曰唐市派，弟子著录者数百人"，为吴中复社首领之一[2]。天启五年定应社故会于唐市之凤基园，以杨彝为盟主[3]。凤基园系唐市著名园亭，因"杨彝集应社诸公会文之所"而闻名于江南[4]。杨彝与老名士许重熙（字子洽）在凤基园集江南名士数百人，堪称一大盛会。清初，以文章雄伟著称的有苏凤翔（字苞九）、陶元淳（字子师），以书画擅长著称的有邱园（字屿雪）、黄尊古[5]。

雍乾以后，唐市风俗陡变，"尽力于栋宇服饰之华瞻，吉凶宾嘉之侈靡，转相夸耀，浸淫不返"[6]。唐市不复成为文人雅士聚会中心，科第日衰，名士渐稀，地位日趋低落。

十二、南　翔　镇

南翔镇位于嘉定县治南二十四里，宋元时已成巨镇。因萧梁时代曾建白鹤南翔寺于此，以寺名镇，故称南翔。白鹤南翔寺，后名云翔寺。相传梁天监中土人掘地得石经丈，常有二鹤飞集其上，僧德齐即其地建刹，并题诗石上曰："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绝薰修享二时"，因名寺曰南翔。元至正间重建，明正统间修缮，清康熙三十九年御书"云翔寺"额，遂改称

---

① 乾隆《唐市志》卷中人物·选举。
② 乾隆《唐市志》卷中人物·文苑。
③ 乾隆《唐市志》卷下集文，明张采《杨子常唐市十景诗序》。
④ 乾隆《唐市志》卷上园亭。
⑤ 乾隆《唐市志》卷首，方燧深序。
⑥ 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

云翔寺[1]。"宋元时惟西南为镇，万安寺前至王家桥俱列肆"[2]。后以吴淞江多盗，西南受侵，民居渐东徙。

明代正德以前，南翔已成为嘉定七镇(罗店、南翔、安亭、黄渡、大场、江湾、清浦)中之佼佼者[3]。嘉靖间倭寇迭至，乡村多遭焚掠，万安寺以南民居屋宇被毁殆尽。隆庆、万历年间逐渐复兴，成为棉布业交易中心。镇上徽商从集，从事棉布贩卖，经济日趋繁荣。万历《嘉定县志》说：

> "南翔镇，在县治南二十四里，因寺而名。其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4]

万历中，徽商受"无赖蚕食"，"稍稍徙避"，南翔镇的盛况一度受到影响，颇不景气[5]。清初，南翔镇再度出现繁荣的市面，"生齿日繁，廛舍日扩，镇东新街南、黄花场北、金黄桥外，渐次成市"[6]。当时人描述其盛况："四方商贾辐辏，廛市蝉联，村落丛聚，花、豆、米、麦、百货之所骈集"[7]。

全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镇中为十字港，四条水道——横沥、上槎浦、走马塘；封家浜相交于镇中心。横沥，横贯镇之南北，南受吴淞江之水，合上槎浦北流，由马陆村进嘉定县城中，抵娄塘入刘家河。上槎浦，南通孙基港，北达南横沥。走马塘，吉利桥下东去至孟家桥，东南流由江湾出黄浦，为南走马塘；从马家桥直东流达陈家行，为北走马塘。封家浜，隆兴桥下西去由林亭桥折而南贯月河入吴淞江。

---

①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杂志·寺观。
②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域·沿革。
③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④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⑤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⑥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沿革。
⑦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书院，石嵩：《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

镇中十字港，有太平、泰康、吉利、隆兴四桥相连。太平桥，跨横沥南口，明弘治十八年甃石，清乾隆三十二年重修，与隆兴桥、吉利桥纵横相连，总名八字桥。泰康桥，跨上槎浦，旧名感梦桥，明洪武二十年建，清乾隆间重修。吉利桥，太平桥东偏走马塘口。隆兴桥，太平桥西偏封家浜东口。横跨封家浜的杨柳桥，与吴淞江渡口相近，为南北往来孔道[1]。

以十字港为中心，镇中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延伸的街道密布。东有走马塘南岸街、北岸街、新街；西有封家浜南岸街、北岸街；南有白鹤寺南街、太平桥南街（西岸米巷街，东岸混堂街）、横街、黄花场街；北有横沥西岸街、东岸街、约浦街（明时为大街，直达镇北冈身路）[2]。全镇与大街相贯通的小弄共有四十一条，布成密如蛛网的街巷体系。

河道、街巷向四外延伸，使南翔镇与邻近市镇构成交通方便、四通八达的市镇网络：

东至陈家行十二里，

西至黄渡镇十八里，

北至马陆镇十二里，

东南至大场镇二十四里，

东北至广福镇十八里，

西南至纪王庙镇十二里，

西北至方泰镇二十四里[3]。

南翔镇在这些市镇中以发达的工商业著称，自然成为这一市镇网络的经济中心。支撑南翔镇持续繁荣的经济支柱是棉布业。

---

①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桥梁。

②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街巷。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里至。

嘉定县境内的棉纺织素负盛名，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1]，所织棉布有紫花布、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诸暨布、胜花纹布等。尤以药斑布、棋花布为畅销品。药斑布，"以布抹灰药染青，俟其干去之，则青白相间，有楼台、人物、花鸟之形，为帐幕衾帨颇佳"；棋花布，"以青白缕间，织如棋枰"[2]。农家经济"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3]。

南翔东张泾一带乡村所产棉花，"其短花繁，每斤可收花衣六七两"[4]，是优质纺织原料。用此种棉花纺纱，织布俱成精品。当地所产浆纱布、刷线布远近闻名。南翔镇所出刷线布，又名扣布，此种扣布，"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远方珍之，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故里中所织甲一邑"[5]。南翔镇以扣布质地精良跃居嘉定一县之首位，吸引各地客商来此收购。

镇上的布商字号，大多由徽州商人经营。布商各字号在镇收购各色棉布，贩运于江淮、临清间[6]。棉布营业额在嘉定一县中遥遥领先[7]，故当时人有所谓"布商莫盛于南翔，娄塘、纪王镇次之"[8]、"布商南翔镇较娄塘、纪王镇为盛"[9]之谚。

棉布加工业随着棉纺织业的兴旺而兴旺。乾隆中，为棉布字号服务的踹坊就有十家之多，由坊总长、包头人与踹匠组成，形成

---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②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物产。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④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物产。

⑤ 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里·物产。

⑥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八，《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墓志铭》。

⑦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

⑧ 光绪《嘉定县志》卷八风土志·风俗。

⑨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五风土志·风俗。

一种雇佣关系，踹匠的雇佣工价按照布匹长短、大小、阔狭而定[①]。

除了棉布业外，其他行业也十分发达。"四方商贾辐辏，廛市蝉联，村落丛聚，为花、豆、米、麦、百货之所骈集"[②]，棉花业、粮食业、百货业都资金雄厚、生意兴隆。本地虽产棉花，但不敷纺织所需，镇上外来棉花聚集，故从事棉花交易的牙行、客商为数不少。南翔"地不产米"、"仰食外郡"[③]，米、麦、豆均从外地运入，故镇上米牙，米店及米客甚多。一旦"商运不通，米价骤增"，例如嘉庆九年有灾荒，米价猛涨至每升四五十文，"南翔各米铺以食户计，存粮可支三日，民心惶惶"[④]。由此可见南翔镇及其四乡成为棉纺织专业地区之后，粮食的商品化程度日益增大，对商品粮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大。由于商品粮交易额巨大，不断有外地粮食运至镇上，由脚夫卸运，"肩挑背负任彼定价，横索惟恐弗得其欢心，以致货物壅塞河干，市口遂酿成彼等骄横之习，日盛一日，而米客受其笼络，米店受其凌虐，米牙受其挟制"[⑤]。米客、米店、米牙与脚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正反映了南翔镇仅次于棉布业、棉花业的粮食业经营特色。

南翔镇地当江海之交，民物隐辚，交通方便，物产汇聚，商品周转频率很快，成群的脚夫成为商品流通的重要一环，在镇上颇有势力，任意索价、要挟。康熙间商民苦于脚夫之横行，历经官厅告示禁止，巡抚赵麟禁之尤力，商民感其惠政，建惠民书院。"自禁革后，听民雇募，每石四厘，民甚便之，更无脚米科派，客争云集，米铺牙

① 乾隆四十年《嘉定县为禁南翔镇踹匠恃众告增规定踹匠工价钱串告示碑》，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00页。

②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书院、石嵩：《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

③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纪事。

④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纪事。

⑤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书院，石嵩：《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

行拊心加额”[①]。

脚夫、乐人聚伙结党、私画地界，搬运索重值，婚丧勒厚犒之外，还有市林恶少无赖“打降”、“白拉”陋习。打降逞其拳勇，凡抢亲、打蠕、抬神、扎诈诸不法事，多起于此辈。白拉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民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资不止。虽经康熙四十九年知县勒石永禁，立碑于云翔寺，但其后仍依然如故[②]。

各行各业的客商、店铺、牙行，以及脚夫、乐人、市林恶少无赖，构成了一幅南翔镇光怪陆离的经济生活图卷，显示了它鼎盛时代繁荣昌盛的各个侧面。

南翔镇东西五里，南北三里，规模是巨大的，它名为镇，实具县城规模。康熙时人说：南翔镇“盖东南一都会也，市井鳞比，舟车纷繁，民殷物庶，甲于诸镇”[③]。镇中建置颇多：有分防县丞署，乃嘉定县丞分防于南翔的机构；有大中丞赵公书院(又称惠民书院)及邑侯马公讲院、槎溪小学及义塾；另有文昌阁、关帝庙、东岳庙、州城隍庙、城隍庙、火神庙、龙王庙、土地祠、育婴堂等[④]。

南翔镇自明代以来就以文化昌盛誉满江南，其地人材辈出。明代成化间在太平桥北建科第坊，天恩桥西、太平桥北建进士坊，万历间在云翔寺南建两世方伯坊，在方伯坊南建司马中丞坊，足见当时科第之兴旺。明清两代这个镇涌现了大批贡生、举人、进士。

贡生，明代有陆愉等十四人，清代有项思尹等二十人；

举人明代有陈瑜等十六人，清代有陆其贤等十九人；

进士明代有陆奎、杨锦、张任、张懋、王圻、李汝节、张恒、李先

---

①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书院、石嵩：《公建抚宪赵公长生书院碑记》。

②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杂志·记事。

③ 彭定：《留婴堂序》，载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庙坛。

④ 嘉庆《南翔镇志》卷二营建。

芳、李名芳、张其廉等十人，清代有董宏、叶昱、李梦璁、王处厚、陈时叙、朱抡英、李赓芸等七人[①]。

其中不少人知名度甚高：

王圻，字元翰，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清江知县、万安知县、湖广提学佥事、陕西布政使司参议。退休归乡后，著书立说，撰著达三十余种，以《续文献通考》、《三才图会》、《稗史汇编》为最著名[②]。

李先芳，字茂初，嘉定县诸生。刻意为诗，尤工七言长句，与其弟李名芳、李流芳并噪词坛。

李名芳，字茂村，驰骋文坛，时人赞为王子安、李长吉再生。年二十八登万历二十年进士。

李流芳，字茂宰，一字长蘅，万历三十四年举人，绝意科举进取。其书法效东坡，画出入元人，尤近吴仲圭，诗则信笔抒写，天真烂漫。嘉定知县谢三宾，合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及李流芳诗合编一集，号嘉定四先生集。其子李杭子，字僧筏，诗文画俱俱以父为师；其孙李圣芝，字秋森，一字衡霞，诗文玮丽雄健，有倚马万言之誉；其曾孙李禔，字雪岑，从周道生、陈其年讨论古学，四方名士争相结纳[③]。

流寓南翔的文人学士亦颇引人注目，如程嘉燧，字孟阳，歙县人，侨居南翔，与李流芳引为诗文交；又如归庄，字元功，诗文豪迈，善大书、画竹[④]。

文人雅士荟萃之所，无不兴建园林。如李流芳在北市所建檀园，"短筑墙垣仅及肩，多穿涧壑注流泉"，为南翔胜景之一。又如

---

① 嘉庆《南翔镇志》卷五选举・科贡。

② 嘉庆《南翔镇志》卷六人物。《明史》卷二三六王圻传。

③ 嘉庆《南翔镇志》卷六人物、卷七人物。《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四李长蘅墓志铭。

④ 嘉庆《南翔镇志》卷六人物、卷七人物。

通判闵士籍建于东里的猗园，后归贡生李宜之，乾隆间叶锦重葺，更拓其地，改称古猗园，至今仍为南翔名胜古迹。此外如计氏园（后改名为来鹤园）、怡园、巢寄园、桐园等亦堪称江南名园[①]。

南翔镇宋元时兴起，持续兴盛到晚清。清末民初，渐趋衰落。在洋布倾销的竞争中，南翔的传统产品——土布，销路大不如前。南翔由先前商贾云集的棉布业中心，沦落为一个农副产品集散市场，镇上"大宗贸易为棉花、蚕豆、米、麦、土布、鲜茧、竹木、油饼、洋纱，鱼腥、虾蟹、蔬菜之属亦饶"[②]。南翔镇昔日那种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显赫地位，一去不复返了。

十三、罗　店　镇

罗店镇位于苏松二府交通要道，其地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商贾辏集，渐成市镇"[③]。

元至元年间，本地人罗升在此构筑店铺、市街，称为罗店，也称罗溪，逐渐由市成镇[④]。明代前期罗店已成大镇，位居嘉定县七镇五市之首（罗店镇、南翔镇、安亭镇、黄渡镇、江湾镇、清浦镇、娄塘桥市、钱门塘市、广福市、瓦浦市、真如市）[⑤]。至万历年间，发展成著名的商品经济中心。万历《嘉定县志》载：

"罗店镇，在县治东十八里，元至元间里人罗升所创，故名。其地东西三里，南北二里。近海多鱼鲜，比闾殷富。今徽

---

① 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一杂志・园亭。

②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一市镇。

③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建置。

④ 万历《嘉定县志》、康熙《嘉定县志》均称，罗店镇为"元至元间里人罗升所创"，光绪《罗店镇志》则称，"元至正间罗升居此，因名罗溪"。似以前说为是。

⑤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①

康熙《嘉定县志》所言略同，稍异的是，在指出它“比闾殷富，徽亦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矣”之后，标明了罗店镇的经济特色："出棉纱布”②。

从万历至康熙年间，罗店镇作为一个棉布贸易中心，吸引了大批徽州商人，生意兴隆，堪与邻近的南翔镇相比美。因此当地人常说："罗店素称饶富，有金罗店、银南翔之名”③。罗店镇的兴起晚于南翔镇，但后来居上，逐渐在经济水平上超过了南翔镇。

入清后，由于嘉定县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于雍正三年析嘉定县东境为宝山县，罗店镇改隶宝山县。钱大昕《罗溪志序》说：

> “自析县而后，罗店户口滋繁，士夫益砥砺于学，往往掇取科名，遂为宝山巨镇。”④

罗店成为商业发达的巨镇，与它发达而方便的水陆交通条件不无关系。东至砖桥计九里，接月浦镇界，至月浦镇十八里，至宝山县治三十里；西至界泾，市梢三元桥为界，桥西接嘉定界，至嘉定县治十八里；南至张茜泾计十七里，接刘行镇界，至刘行镇十二里；北至马家弄计九里；东北至施家村计八里；东南至马渡堰计十二里，接杨行镇界，至杨行镇二十四里；西南至介山墩计七里，路为界，路南广福镇，路西杨泾；西北至牛角尖计十八里，西接嘉定界，北接镇洋界⑤。

镇中“阛阓喧嚣，日踏贾舶商车之盛，街衢综错，宛成棋枰脩脉之形”⑥。全镇主要街道有：

---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②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③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域志·风俗。

④ 光绪《罗店镇志》卷八附《罗溪文徵》。

⑤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里至。

⑥ 光绪《罗店镇志》卷二营建志·街巷。

亭前街——西至市梢三元桥，东至升平桥，桥东南街系冬号六十图，桥西系黄号二十图；

南街——西至升平桥，东至市场街口，再东为集贤街，系冬号六十图；

集贤街——西接南街，东至东南弄，系冬号六十图；

东南弄——南至巷栅，北至磨盘街，系冬号六十图；

塘西街——南至亭前街，北至篮巷，系黄号二十图；

塘东街——南至庙弄，北至支家桥，系冬号六十图；

北街——东至城隍庙，西至巷栅，转南拾琼湾，系黄号二十图；

西巷街——东至巷栅，再东篮巷，西至薛家桥，系黄号二十图；

西西巷街——东至薛家桥，西至界泾，系黄号二十图；

布场街——北至南街，南至丰德桥，桥南系洪号五十七图，桥北系冬号六十图；

横家——东至邓家弄，西接篮巷，系黄号二十图。

此外还有南弄、唐家弄、邱家弄、邓家弄、花园弄、水果弄、韩家弄、篮巷、赵家巷、韩家巷、蒋家巷、拾琼湾、钓船厂、淮船厂等，与各条大街相连通。

镇中河道交错，练祁为贯穿全镇大干河，西杨泾、界泾为镇西境干河，马路塘、获泾、潘泾、顾泾为镇东南境干河，大川沙、小川沙、大理港为镇东北境干河，界河口、墅沟、潮塘为镇北境干河。这些河道使罗店镇与四乡村庄及邻近市镇连成一体。跨越这些河道的桥梁与镇中大街小巷连接，成为闹市所在。处于闹市的主要大桥有：

大通桥——位于镇中亭前街，跨练祁，明成化八年建，清雍正八年重建，俗名大石桥；

丰德桥——位于镇中，俗名张家桥，跨练祁，康熙四十九年改木桥为石桥；

来龙桥——位于镇东市梢，旧名蒋家巷桥，跨练祁；

新安桥——位于镇西市梢,俗名新桥,跨练祁;

坍石桥——位于镇东里许,跨练祁,至月浦,为县城要道;

永福桥——位于镇东南一里,俗名马桥,跨马路塘,至杨行要道。

全镇共有大小桥梁八十六座[1]。

密如蛛网的街巷、河道、桥梁,构成网络,形成市场,使市镇充满了经济活力。

嘉定县"棉花通邑栽之,以资纺织","民以棉布为业"[2];"躬耕之家,织布以易银,易银以输赋"[3]。罗店四乡也是如此,盛产棉花,"有金底者,每斤收衣六七两"(当地人呼棉花为花,呼皮棉为花衣或衣),另产紫棉,俗呼紫花,结实大如桃,中有白棉[4]。棉花是四乡农家主要作物,也是主要经济来源,当地人说,"罗店四乡土产稻三棉七,农民生计惟赖木棉"[5]。农家勤于纺织,"种田之暇惟以纱为布"[6],"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7]。所产之布品种不一:

棉布——有套布、泗泾布之名,每匹一丈三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精粗不一,价亦不同;

紫花布——以所出紫花纺纱织布,纱必细匀,工必精良,成机待市,价倍寻常;

斜纹布——间织以水浪胜子,匀细坚洁,望之如线;

---

① 光绪《罗店镇志》卷二营建志·桥梁。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③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风俗。
④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物产。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⑤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⑥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⑦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棋花布——以青白缕间织如棋枰[1]。

全镇物产以棉花、棉布为大宗，经营花、布交易的牙行——花行、布行，遍布全镇，成为左右经济发展的枢纽。罗店镇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清末。光绪《宝山县志》说：罗店镇"出棉花、纱布，徽商丛集，贸易甚盛"[2]。民国《宝山县续志》说："罗店市镇最钜，为全邑冠……清季……全区人口在五万以上……其地东贯练祁，输运灵便，百货骈集，故虽处腹里，而贸易繁盛。综计大小商铺六七百家，有典当花行、米行、衣庄、酱园等业，尤以锡箔庄两家为巨擘。市街凡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以亭前街、塘西街最为热闹，次则塘东街、横街等，乡民上市，每日三次。物产以棉花、布匹为大宗"[3]。这里所透露的信息表明，清末的罗店镇，有人口五万、店铺六七百家、每日三市(即早市、午市、夜市)，充分显示了它繁华已极的盛况。

由于生意兴隆，镇上把持各种行业的牙行林立，如花行(即棉花行)、布行、柴行、米行、猪行等。其中有财有势者称霸一方，谓之"行霸"，不仅擅自抬高或压低物价，而且"擅取用钱，卖者买者各有抑勒，曰内外用"。行霸之下还有光棍，"甚有不肖之徒，至市梢拦接，乡民莫知所适。其狡者更以赝银小钱予之"[4]。此种行霸，嘉定县各市镇都有，成为"市镇之为民害"，"私立牙行，高低物价，擅取用钱，买者卖者各有除勒，名内用、外用。结连光棍，邀人货物，卖布者，夺其布；贸花者，夺其花，乡人不得自由"[5]。

镇的东西南北四栅，是乡人与商贾入市孔道，遍布脚夫。此种脚夫颇有势力，各有一块地盘，把持勒索。"一切货物出入铺户，不得自行挑运"，一定得由脚夫挑运，从中索要高额脚费。"甚至婚嫁

---

[1]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物产。

[2] 光绪《宝山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3]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舆地·市镇。

[4]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5]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风俗。

丧葬,鼓手、炮手、轿夫、脚夫私分地界,把持勒索"[1]。清初以来官厅一再刊布告示申严禁令,但无济于事,直到道光十一年宝山知县毛正坦还在发布此类告示:

"照得民间婚娶丧葬及铺户挑运一切货物,所用轿夫、脚夫,例应听民自便,雇人扛抬,毋许地棍私分地界,把持勒索,扰害闾阎。……前于康熙二十年经商民戴贞等呈请勒碑谕禁,维时罗店尚隶嘉邑,所以在城在乡一体勒碑,永远禁革在案。迄今日久,棍徒纠党藐法,重复设立轿夫、脚夫、盘头、丐头、柴担各项名色,更有乐人、鼓手从而效尤,滋弊蜂起,日甚一日……稍不遂意,什百成群,逞凶肆横……"

因此,这个知县再次重申禁令,不许脚夫勒索,应听商人"随便雇佣,遵照宪定章程,每日每人给钱七十文,又加酒钱五十文"[2]。

在繁荣的市镇经济刺激下,闹市区茶楼酒肆林立,且成为市镇的社交与信息中心,也成为娱乐与赌博场所。

吃讲茶——牙侩、商贾们在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中遇到纠纷,常至茶肆评理。"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吃讲茶";

赌博——"聚众博赌曰头家,道兴、咸丰间此风最盛,……近日乡村开设茶馆,渐起赌博,大则荡废家产";

花鼓戏——"乡村搭台改扮女妆,歌唱淫词小曲,名曰花鼓戏"[3]。

每年棉花、稻谷登场之际,罗店镇及其四乡"好事者以敬神为名,搭台演戏,甚有两台对峙,两班同演,名曰鸳鸯台。家家邀亲请戚,有力者宰杀猪羊,无力者亦必典质衣物,以供酒肴。甲图演罢,

---

①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②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③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乙图接踵而起"[①]。这种景象从侧面反映了罗店镇经济繁荣、棉布购销两旺的盛况,同时也反映出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奢侈挥霍陋习,当时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此种敬神演戏,导致"男荒耕作,女废纺织,浪费银钱,动以千计"[②]。陋习还不止此,另有斗蟋蟀、斗鹌鹑,"每岁深秋,里中无赖辈开设棚场斗蟋蟀,谓之秋兴。与斗者论定花数之多寡,然后赌胜负,主人则按数取头钱。至冬,开设圈场,斗鹌鹑,谓之冬兴。所赌亦如之。自他处来斗者,谓之客党,本人嫌花数过多,旁人接认者,谓之帮花,于花数外另以钱洋分胜负,谓之放彩,动以千计"[③]。

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市镇的兴旺,市镇的兴旺又促成一系列与市镇经济相联系的节序习俗,衬托出市镇及四乡文化生活的时代色彩。正月十五上元节,各庙宴堂,庙前设立塔灯两座,游人往来不绝。田家檐前高插竹竿,竿头悬灯,谓之"照田财"。花炮齐鸣,龙灯盘绕,锣鼓通宵不绝。又有男扮女妆,游行街市,称为马灯。二十日,为棉花生日,宜晴,谚云:"雨打正月廿,棉花弗上担"。四月立夏,晴则锄棉,雨则插秧,旱则戽灌。五月初五日,竞渡龙舟,镇中有龙舟五六艘,旗仗鲜明,锦彩夺目,在嘉定、宝山一带首屈一指。龙舟上有铁条安插船头,将十三四岁少年装扮成戏曲人物,扎缚其上,谓之出彩。四时节序都有此类活动[④]。

这一切,都给罗店镇涂抹上一层眩目的色彩,使它迥然区别于乡村、县城,带有商业市镇特有的生机。镇上大批公共性建筑设施,又使得这类市镇具有县城、府城的规模。

怡善堂——道光元年绅士施学澍等禀请设立,位于镇东市东

---

①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②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③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风俗。

④ 光绪《罗店镇志》卷一疆里志·节序。

岳庙旁，专恤沿途路毙，收埋荒坟野厕等尸。怡善堂也从事经商，"雇舟装载棉花、布匹、豆麦，路由昆新至苏销售后，停泊阊门，置办木料、砖灰、药材、堂中应用等物"①。

同仁堂——乾隆十七年金集等创设施棺局，即于东山禅院作贮棺所。道光元年创立怡善堂后，朱氏集资另于黄号二十图花园古里之西偏建屋一所，募购棺木，施济鳏寡孤独。

栖流所——设于怡善堂头门之南偏，专门收留典坊、店铺无属佣工，骤病延医调治等项。

保婴局——嘉庆十八年嘉定绅士秦溯萱捐建，在东岳庙东首，收婴送嘉定城婴堂抚养。

恤茕局——专为抚恤本镇四乡残废茕独之人，创于光绪九年。

敬节局——凡三十岁内丧夫守寡妇女，每人每季送资八百文；三十岁外丧夫守寡，年已满五十者，每人每季送资六百文②。

镇中有罗阳小学一所，明嘉靖间嘉定知县李资坤建，清乾隆间里人重建。另有义塾一所，同治年间本镇花米布经等牙行出资，建于怡善堂中③。

镇上名流巨宅，自明代以来屡见不鲜，其中较豪华的有：春阳堂——明处士黄通理读书处；玉兰堂——明职方郎中应景尧致仕，与弟景南读书处；简堂——明马元调旧宅；江楼——清初范光启筑，乾隆五十四年曾孙朝佐重建；百城楼——范洪铸筑，太仓毕沅、长洲沈德潜诸名士时相过从；默雷堂——进士施灏旧宅，后圃为毕沅读书处④。

---

① 光绪《罗店镇志》卷三营建志·善堂。
② 光绪《罗店镇志》卷三营建志·善堂。
③ 光绪《罗店镇志》卷三营建志·小学。
④ 光绪《罗店镇志》卷三营建志·第宅。

罗店镇名流荟萃，与它作为嘉定、宝山的文化中心的地位是分不开的。进士及第者，明代有范纯(天顺元年进士)、顾其国(天启二年进士)、申芝芳(崇祯四年进士)、施风仪(崇祯十年进士)；清代有黄与坚(顺治十六年进士)、殷元袷(顺治十八年进士)、施灏(乾隆三十七年进士)[1]。举人明代十人、清代二十人；贡生明代六人、清代二十七人；庠生清代二百七十二人[2]。

明清两代科第兴盛，人文蔚起，不愧金罗店之誉。

罗店镇历经沧桑，自明中叶至清中叶是其鼎盛时代，咸丰以后，渐趋衰落。衰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的洗劫。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克南京，三月中罗店镇四乡接连发生抢劫大户的暴动，七月青浦发生周立春之乱，各乡乡民附和响应，连续劫掠嘉定县城富室及县署。不久，太平军攻克嘉定县城、上海县城，又过罗店攻克宝山县城。咸丰十年太平军再度进攻昆山、太仓、嘉定，罗店镇"迁徙一空"，"扰四乡，恣意淫掠，遂踞镇之东北，乡土匪朱茂昌等勾连贼众又复东掠"；其后太平军"由嘉定东掠罗店、杨行、月浦等镇"，"海滨数十里竟无完土，男妇死者枕藉于道"。自咸丰十年四月至同治二年，"三年之中，屋宇半毁，杀掠无算，亘古罕有"。由于罗店镇离嘉定县城不远，攻打嘉定时，往往首当其冲，"故受祸尤烈亦尤惨"。"及事平渐次回里，败壁颓垣鞠为茂草，昔之绮罗食珍羞者，今则什无一二焉"[3] 罗店镇遭此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光绪年间虽稍稍恢复，但盛况已大不如前，颇有今非昔比之慨。

清末民初，邻近嘉定界的王家桥有东西街道，仅三四家小店，一二十年后，"全属居户"，街上店铺全部倒闭。来龙桥西岸，原为

---

① 光绪《罗店镇志》卷四选举志・进士。

② 光绪《罗店镇志》卷四选举志・举人；卷四选举志・贡生；卷四选举志・庠生。

③ 光绪《罗店镇志》卷三武备志・纪兵。

闹市，民国时代仅有榨油轧米厂一家；蔡家桥西境，也仅地货行二三家，北首仅面粉兼轧米厂、肉庄一二家[①]。昔日罗店镇商贾云集、棉布大量出口的情况，竟毫无踪影可寻了。

十四、安　亭　镇

安亭镇界于嘉定、昆山二县之间，其地半属嘉定半属昆山。正德《姑苏志》所载昆山县五镇之一的安亭镇，"去县东南四十五里，与嘉定接境，有税课子局"[②]。正德《练川图记》所载嘉定县七镇之一的安亭镇，"在县西南二十四里十六都"[③]。可见这是一个分别隶属于两个县的市镇。万历《嘉定县志》载：

> "安亭镇，在县治西南二十四里，因亭而名，其地西与昆山接界，南与青浦接界，南北可二里。"[④]

康熙《嘉定县志》称，安亭镇以"镇河为隔，东属嘉定，西北属昆山，南属青浦"[⑤]。其说不确。所谓"南属青浦"云云并无根据，安亭镇，"南与青浦接界"是事实，并无镇南部属青浦县管辖之事。按康熙《青浦县志》所载二十余市镇，其中根本没有安亭镇[⑥]。正确的说法是，安亭镇东半部属嘉定县，西半部属昆山县，正如万历五年巡江御史林应训所说，安亭以西十二、十三等都属于昆山，安亭以东十六、十七等都属于嘉定[⑦]。

安亭镇处于嘉定、昆山、青浦、太仓间的交通要道上，地位十分

① 民国《嘉定疁东志》卷一市集。

②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③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④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⑤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⑥ 康熙《青浦县志》卷二市镇。

⑦ 嘉庆《安亭志》卷三田赋，林应训：《议处荒田疏》。

重要。吴淞江环其前，娄江绕其后，而瓦浦、徐公浦、吴塘、顾浦等小河港，沟通其间，舟楫便利①。

安亭镇四乡，“土田高仰，物产瘠薄，不宜五谷，多种木棉”②。其地所产以棉花与棉布为主。万历十七年巡抚周继、知府石昆详定《经赋册》，开列官布金花银派法条例，其中指出，“嘉定地高土瘠，止宜种木棉，而太仓、昆山接壤嘉定去处，亦复如是，则皆产布之地也”③。安亭镇正处在这一地带，以出产药斑布、棋花布著称④。所谓药斑布，即以药（染料）涂布，染成青色，干即拂去，青白成文，有楼台、花鸟、山水、人物之像；所谓棋花布，以青白缕间，织如棋枰⑤。此外还出产浆布——以面浆棉纱，于时织；黄布——拣至底棉花（俗称落脚花）织成；线毯——用棉纱合线，染红绿青黄色，缕间面成；被囊——有黄白、单料、双料之别⑥。安亭镇横漕一带，出产染布用的染料——蓝（亦称蓝靛），当地居民都以“艺蓝为业”⑦。

安亭镇上交易棉花、棉布、蓝靛的牙行甚多，分布于南北二市，北市比南市更繁华。当地人“以北市为大安亭，南市为小安亭，皆以桥为市，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⑧。四乡农家把各种产品携至镇中出售，“居民以南北二桥为市，自早至日中，遝沓相竞，声沸水面，虽壤地偏小，亦可以觇物产

---

① 嘉庆《安亭志》卷二水道。
②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③ 嘉庆《安亭志》卷三田赋。
④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⑤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物产。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⑥ 嘉庆《安亭志》卷二土产。
⑦ 嘉庆《安亭志》卷二土产。
⑧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之殷繁矣"[1]。交易大抵"黎明而集,日中而散"[2]。南北二桥是牙行集中的地方,有势力的牙侩,在此把持行市,垄断生意,而且"其所用秤、斗不与常同,故称名亦异其称,曰桥秤,曰桥斗"[3]。反映了牙行在安亭镇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十五、黄　渡　镇

嘉定县治西南三十六里的黄渡镇,吴淞江横穿而过,把镇分为南北二部分,镇北部属于嘉定县,镇南部属于青浦县。宋元之际,北镇已成为聚落,亦名卜家湾,俗呼老黄渡。相传卜姓始居此,后有庞氏、金氏居此,营第宅、建桥梁。北镇之东有罗汉寺,西有崇真道院,皆南宋初年所建[4]。元初曾在此设市舶提举司,辖番夷及闽粤海舶。元代大德年间,黄渡镇"民物日盛,商贾日集"[5]。明初以番夷不宜导入内地,改市舶提举司于定海;元代设于此地的吴塘巡检司,也于万历三年裁归江湾巡检司兼辖;明初设于此地的河泊所大使(管嘉定、昆山、华亭、上海四县渔户),也于弘治三年裁革,其渔课归秋粮下带征;明洪武四年设于此地的税课子局,嘉靖四十二年裁革[6]。正德《练川图记》、正德《姑苏志》所载"黄渡镇,去县西南三十六里二十都"[7],指的是黄渡北镇,即老黄渡。

明代嘉靖,万历间,南镇兴起。万历《青浦县志》载:

---

[1] 嘉庆《安亭志》卷一缘起。
[2]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3] 嘉庆《安亭志》卷二风俗。
[4] 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
[5] 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
[6] 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职官。
[7]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黄渡镇，吴淞江南，俗呼为新街，近来商贩颇盛[1]。”

所谓新街，即南镇，也就是相对于老黄渡而言的新黄渡，隔江相对，一在吴淞江北，一在吴淞江南。地处吴淞江南岸的南镇，到万历时代才“商贩颇盛”。查正德《松江府志》所载市镇，其中并无黄渡镇[2]，可见其时黄渡新街（南镇）并未形成。黄渡新街始见于万历《青浦县志》，崇祯《松江府志》所载青浦县市镇中，关于黄渡镇的情况，与万历《青浦县志》相同：

“黄渡镇，去县四十五里，临吴淞江之上，北岸即属嘉定。俗呼新街，近来商贩颇盛[3]。”

综观黄渡镇的兴起与发展，大致是“先北而后南”，先有北街（北镇），后有南街（南镇），此其一；其二，“后渐由东而西”：“舟楫辐辏，皆在泊船湾以东，龙王渡、杨村市二处都成市集”[4]。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黄渡更趋兴盛。康熙三十八年张诗说：“江之两岸居民稠迭，屹为巨镇，……民物日阜，行其途往来不绝者，肩相摩焉，观于其市陆离璀灿眩目焉”。乾隆四十年徐映芳说：“吴淞江袤三百里，跨江成市者惟黄渡镇，镇为嘉、青接壤，商贩最盛”[5]。镇中迎恩桥（即东江桥）、西江桥是跨吴淞江、连接南北二街的通途要津，桥头为闹市所在。与东西两座江桥相连的街道沟通全镇。

北镇有：大街、后街、司前街、柴家弄、佛阁弄、砖桥弄、姚家弄、北街、更楼弄、东泾岸；

南镇有：东街、西街、横街、轿子湾、旱桥弄、马家弄、仓房弄、西

---

①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②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

③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④ 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

⑤ 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桥梁。

弄、华家场、钱家场[①]。

黄渡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与附近市镇连成一片、结成网络：

东至南翔十八里，
东南至纪王庙十二里，
南至观音堂十二里，
西南至章堰十二里，
西至白鹤江十二里，
北至安亭十二里，
北至方泰十二里，
东北至马陆十八里[②]。

黄渡镇四乡以出产棉布著名，"有刷纱而无浆纱，长短阔狭分纪王庄、泗泾庄两种(俗呼买布店曰庄)。北乡布似纪王庙，南乡间有做泗泾者"[③]。此外还有套布、顶成布二种[④]。"道光之季，里中所产土布，衣被七闽者，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未尝自行运送，价之高下听客所为"。北镇商人孙时杰，有鉴于此，创议"自收自运"，由海道运至福建，"嗣是土布自运福建之路以通"，对镇上棉布业是一大促进因素[⑤]。

黄渡还盛产染料——蓝靛，"用以供染，于丝绸为宜，乡民多赖其利，而泥冈村左右为最"。所产布机以徐家布机最负盛名，"坚致而利于用，价亦稍昂，机之横木必书某年月某房造"[⑥]。此外还出

---

① 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街巷。
②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疆域・里至。
③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疆域・物产。
④ 宣统《黄渡续志》卷二疆域・物产。
⑤ 宣统《黄渡续志》卷五人物・商业。
⑥ 咸丰《黄渡镇志》卷二疆域・物产。

产犁耙、棕扣、水车、纺车、棉纱、竹器、木器、弹花弓等[1]。

黄渡镇经太平军之役，遭到巨大破坏，日趋衰落。咸丰十一年，镇中房屋被焚，"寸椽片瓦不留"，镇上已无店肆，仅存一些货摊，不久连货摊也四处星散，全镇"一片荒凉，不复成市"，乡民为了以有易无，"趁墟于小兴熟庙，以资交易"。显然，此时的黄渡镇已毫无商业中心的迹象，而沦为趁墟于荒野的村市[2]。

自此以后，黄渡镇虽稍有恢复，但经济一直走下坡路，昔日的大宗商品棉布、蓝靛等，"已有江河日下之势"，"至徐家布机，则阒然无闻矣"[3]。随着市镇经济的萧条，街巷也陆续衰微，后街仅存柴家弄西至砖桥下一段，北街仅存蓬阆庙北至施家桥一段，西街仅存宝石桥西堍一段，司前街、更楼街、东泾岸、仓房弄、西弄、华家场都相继消失，不复有街巷可寻[4]。

十六、江　湾　镇

江湾镇位于嘉定县治东南六十里，以虬江在此呈湾形，遂以江湾名镇。"其水自吴淞江屈曲入虬江，故名"[5]。宋时海潮由镇东南虬江内贯，屈曲入走马塘，因此江湾又名小曲江。

宋时已有江湾市。《江湾里志》谓："市始于宋"，市街分布于胡陆湾桥沿河向东至走马塘北岸一带[6]。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军事要地，"宋尝于此置忠义节水军寨，绍兴间韩世忠以中军驻江湾"[7]。

---

① 宣统《黄渡续志》卷二疆域·物产。
② 宣统《黄渡续志》卷七兵事·纪粤匪事。
③ 宣统《黄渡续志》卷二疆域·物产。
④ 宣统《黄渡续志》卷一建置·街巷。
⑤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⑥ 民国《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建置。
⑦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明初，江湾已由市升格为镇。正德《练川图记》所载嘉定县七镇，其中有“江湾镇，在县东南六十里九都”[①]。正德《姑苏志》也在嘉定县市镇中载有江湾镇，“去县东南六十里，有巡检司”[②]。

嘉靖年间，江湾镇遭倭寇骚扰，镇上建筑“荡然尽毁”。万历以来，“日久生聚，就保宁寺东西营造肆屋，恢廓成镇”[③]。万历《嘉定县志》所说，江湾镇“其地东西三里，南北一里”[④]，就是恢复后的规模。其后又陆续发展、扩大，东起景德观，西迄西庙，“东西长六里、南北广一里，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坐落袁长河、走马塘北岸”[⑤]。

雍正三年析置宝山县，江湾镇由嘉定县划归宝山县，位于宝山县治南三十里，其全境区域包括严家角、印家弄、北杨河宅、骆家宅及殷家行[⑥]。清末宣统二年调查户口时，共有 5692 户、28562 口；民国五年调查户口时，共有 9721 户、65549 口，其后“南境毗连沪埠，商市日繁”，增至 22748 户、100468 口[⑦]。

显然，清末民初江湾较前更趋发达，区内村廛兼有市集者不下四处。

天通庵——在江湾镇南十里，地跨芦泾浦，商铺二十余家，本一小村集，近以毗连商埠，设有丝厂、染织厂等，市面日繁，几与上海商场无异；

侯家木桥——在江湾镇直北六里许，有村店两三家，居民颇多殷实者；

屈家桥——在江湾镇南五里沙泾之旁，为江湾至上海必经之

---

①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②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③ 民国《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建置。
④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⑤ 民国《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建置。
⑥ 光绪《宝山县志》卷一舆地志·市镇。
⑦ 民国《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户口。

路。有茶、酒、杂货等店七八家；

谈家桥——在江湾镇西南九里，与彭浦镇接壤。自民国五年开设同茂丝厂，并建市房三四十幢，铺户、居民渐见繁盛[1]。

江湾镇是棉布业中心。康熙《嘉定县志》就载明，江湾镇"出棉布"[2]。四乡耕地"禾居十之三，棉居十之七"，农家大多从事纺织[3]。农家所织刷线布，精工细致，价格昂贵；所织紫布极佳，流传甚久，殷行一带也盛产紫布。康熙末年，镇中商人凌无声、戴允如，"以布为业"，开设大批布庄，时称"凌戴庄"，收购四乡所产刷线布、紫布，转销外地客商[4]。"雍正间销路浸广，皆以殷行布为标"。其后不久，江湾布名声大振，与殷行布并驾齐驱。来江湾镇购布客商，大多为广东人，"粤商争购，务求细密，不计阔长，需棉少而布价昂"[5]，江湾的刷线布正具备这种特色而受到粤商欢迎。

清末民初，机器织布业兴盛，农家手工生产的土布逐渐失去销路，导致江湾镇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农民家庭手工业破产，纷纷进工厂谋生；而机器纺织厂不断涌现。

光绪三十二年，章达生经办"大成"，有织机一百五十台，生产爱国布及各个胶布；

民国元年沈九成创办"三友实业社"，有织机一百八十台，生产毛巾、洋烛芯；

民国三年姚福康创办"信通"，有织机六十台，生产爱国布、丝光布；

民国四年梁镭古创办"康庆"，有织机一百六十台，生产爱国布、深花布；

---

① 民国《江湾里志》卷一舆地志·村墟。

②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③ 民国《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农业。

④ 民国《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

⑤ 民国《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

民国初年郭素珍创办"康爱",生产各种胶布;

民国初年唐文华创办"华纯",有织机五十台,生产纱线袜;

民国初年卓汪业创办"先声",有织机八十台,生产花呢[1]。

江湾镇的商业也发生了变化,以花行(棉花行)、米行为最兴旺,洋纱、洋布次之,盐商、典商又次之[2]。由于它地入宝山与上海"往来孔道"之上,受十里洋场上海影响极大,因而由传统市镇逐渐向近代化市镇转化,工商业繁荣,厂家林立,市面豪奢,"保宁寺前后左右各街,茶寮、酒肆、浴室、寓楼,密如鳞次,浮靡积习日甚一日"[3]。

十七、娄　塘　镇

嘉定县城北十二里,有一条河道名曰娄塘,两岸有村落若干。其地盛产斜纹布及其他棉纺织品,逐渐形成一个交易棉布的集市。至洪武二年正式建置了以河道命名的娄塘市[4]。几十年间,棉布交易日益兴旺,商业活动频繁,娄塘市的街巷、店铺规模不断扩大,到永乐年间,娄塘市一跃而成为娄塘镇。乾隆《娄塘志》载:

> "永乐间,里中富民王士昌偕子璇创置(娄塘镇),其地四面方广各二里……按:娄塘之易市为镇,殆始于此。"[5]

然而正德《练川图记》及正德《姑苏志》都将娄塘镇误作娄塘桥市,前者云:"娄塘桥市,去县北一十二里二十二都"[6];后者云:"娄

---

[1] 民国《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工业。

[2] 民国《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

[3] 民国《江湾里志》卷四礼俗志・风俗。

[4] 乾隆《娄塘志》卷一疆隅志。

[5] 乾隆《娄塘志》卷一疆隅志。

[6]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塘(市)去县北十二里"[1]。其实当时娄塘已由市升格为镇,不应再称娄塘市(或娄塘桥市)。万历《嘉定县志》关于娄塘镇的记载与乾隆《娄塘志》相吻合:

"娄塘镇,在县治北十二里,因水而名。里人王璇所创。其地四面方广各三里"。[2]

此处所说"里人王璇所创"云云,即《娄塘志》所说"永乐间,里中富民王士昌偕子璇创置"之意,可见娄塘镇成于永乐年间是不成问题的。这两条资料唯一不同之处是,永乐年间"其地四面方广各二里",万历年间则有所扩大,"其地四面方广各三里"。

娄塘镇有娄塘、北横沥两条河道。娄塘,西连小娄塘,东北通横沥,西北达公塘。北横沥,南入嘉定县城接南横沥,西北抵娄塘、公塘入刘河,东北折而为中心横沥,入刘河对岸接镇洋横沥。地势高仰,宜种棉花,不宜种稻,耕地"悉以栽花为本业"[3]。水稻只是一种轮种作物,大体三年种棉后,为恢复地力,才改种水稻一年。因此娄塘四乡的农产物主要是棉花,农家几乎家家都从纺纱织布,"习花布以营生,车轧而吐云臬臬,弓弹而霏雪腾腾,比户绰纺缫之具,连村轧机之声,浆纱行于本境,刷线达于京师"[4]。浆纱布、刷线布之外,尤以斜纹布著名,"斜纹布,经直纬错,织成水纹胜子,望之如绒"[5]。此类斜纹布,"匀细坚洁","精者每匹值银一两"[6]。以"棉三斤织布一匹,利率三倍"[7]的标准折算,一匹斜纹布卖价银一两,扣除成本,可获利银六七钱左右。每家都能日织一匹,其

①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③ 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④ 乾隆《娄塘志》卷八杂类志。

⑤ 乾隆《娄塘志》卷八杂类志。

⑥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

⑦ 陆世仪:《陆桴亭文集》卷六,《青浦魏令君德化记》。

经济收益是很可观的。

明王价《斜纹布赋并序》说,"所谓斜纹者,乃女红之巧制,而梭布之名珍,絮縰以密绒纂,而绒毛无此氍毹之茸毛,纹如罽锦之组紃,或为水波之轻蹙,或为胜子之精匀,或攗紫花以标素,或染茜色以浮春,土人筐而饷客,莫不诧以绝伦","斜织花纹,则又机女巧思","为功省而利倍之"。可见斜纹布以做工精细、纹饰美观而著称,颇受客商欢迎。

娄塘镇上坐贾行商熙熙攘攘,十分热闹。明陈述《娄塘晓市诗》写道:

"晓星残月入娄东,
坐贾行商处处通,
灯影乱明河影外,
市声遥隔水声中[①]。"

四乡农家所织斜纹布等棉纺织品,经过坐贾行商之手,行销各地。"嘉邑布缕行于京省"[②],娄塘镇也不例外。

十八、月浦镇

光绪《月浦志》载:"月浦因水而名,今隶太仓州宝山县,不知始于何时"[③]。按明代洪武年间曾在此设顾泾巡检司,但其时月浦并未成镇。正德《练川图记》所载嘉定县五市七镇,其中并无月浦[④];正德《姑苏志》所载九市六镇,其中亦无月浦[⑤]。万历《嘉定县志》中始见月浦镇:

---

① 乾隆《娄塘志》卷二水利志。
② 乾隆《娄塘志》卷八杂类志。
③ 光绪《月浦志》卷一舆地志·沿革。
④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⑤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月浦镇，在县治东三十六里，因水而名，国朝设顾泾巡检司于此。其地东西仅一里。近颇荒落。”[①]

由此可以推知，月浦镇大约成于正德以后、万历以前。“近颇荒落”云云，即民国《月浦里志》所说“及遭倭变，衰败甚矣”[②]，约在嘉靖中叶，其后又渐趋兴旺。康熙《嘉定县志》所载月浦镇，文字与万历《嘉定县志》大体相同，但并无“近颇荒落”字样，可以想见，万历至康熙间，月浦镇日益繁荣，乃知《月浦里志》所言“本乡商业相传在明时最为发达”[③] 云云，并非夸张之辞。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月浦镇市面十分兴旺，“有当铺以便民缓急，并有陕西巨商来镇设庄收买布匹，百货充斥，贸易发达，此为商业最旺时期”[④]。《月浦志》所说：“忆昔盛时，此户弦歌，万商云集”[⑤]，正是指这一时期。

全镇市街，东西一里半，南北一里半。东镇自东木桥起，由桥而东约百余步，为兴圣寺；由桥而西为东岳庙，即大街；又西而南，至玉麟桥，为塘南街[⑥]。河东西一条大街，即市街，长约一里半，分东大街、中大街、西大街，而以中大街最为繁盛。南北一条小街，俗称北弄，有“商铺六十余家，每日只早市一次，颇为热闹”，此外还有塘南街、中弄、东南弄、东北弄、南湾[⑦]。

月浦镇四乡东西广十六里，南北袤十二里，农田占全境十之七八，农产物尤以棉花为大宗，“乡民赡身家，纳赋税悉赖于是”[⑧]。

---

①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 · 市镇。
②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 · 商业。
③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 · 商业。
④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 · 商业。
⑤ 光绪《月浦志》卷一舆地志 · 市镇。
⑥ 光绪《月浦志》卷一舆地志 · 市镇。
⑦ 民国《月浦里志》卷一舆地志 · 沿革、卷七交通志 · 市街。
⑧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 · 农业。

所产棉花有紫白二种，大量运销境外，"千家村里人喧闹，八月棉花满客航"[1]即为写照。农家勤于纺织，所产棉布有斜纹布、蚂蚁布、棋花布、紫花布等[2]。陈钧《月溪棹歌》曰：

"傍岸人家半是楼，

机声轧轧五更头，

年来布价高于帛，

肯令金梭休更休。"[3]

镇上小型手工业作坊颇多，涉及各种行业：

铁工——制工器农具，有大铁匠、小铁匠（制零星物件）之分；

饰工——俗称银匠；

铜锡工——俗称铜匠、锡匠；

大木工——即建造房屋之工；

小木工——即制造桌椅家具之工，俗亦称小木作。此外制滑车及弹棉、木杆者，曰车木匠；木器上缕刻花纹者，曰雕花匠；制农具者曰春作；制桶件者曰圆作；

以及粗竹工、细竹工、泥水匠、石匠、织工、纸工、革工等[4]。

镇上商业由牙行控制，不得越过牙行私自交易。牙行有行霸，"贫民持物入市，不许私自交易，横主价值，肆意勒索，名曰佣钱"。举凡"花、布、柴、米、纱、縩，下及粪田之属，皆有牙行，类皆领贴开张"[5]。

同治以后，月浦镇商业日趋衰落。正如《月浦里志》所说："迨经洪杨之役，元气大伤，当铺迄未恢复，又乏大资本之经营。商铺以酒米、南货为最，并有兼营小熟豆饼、洋纱业者，花行、布庄不过

---

① 光绪《月浦志》卷一舆地志·市镇。

② 光绪《月浦志》卷九风俗志·物产。

③ 光绪《月浦志》卷一舆地志·市镇。

④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工业。

⑤ 光绪《月浦志》卷九风俗志·风俗。

一二,率皆客民开设,土人鲜有投资者"[1]。

隶属于月浦镇的盛桥市,道光以后渐趋兴盛,"居民聚货贸易,街衢湫隘"[2]。有店铺二十家,分布于东紫来街、西永兴街、庙前街、塘南街、塘北街,中市贸易较旺,有小石桥跨顾泾,南市梢仅有六七店铺,北市梢有城隍行宫大殿。盛桥地处吴淞江之北,浏河之南,"地势广平,车声络绎不绝"[3],水路"由顾泾行至罗店转运货物"[4]。物产以棉花为大宗,轧花用小车,每日可轧花七八斤至十余斤。棉纱有白纱、紫纱,棉布有斜纹布、棋花布、丝布、稀布,也是盛桥主要产品[5]。

此外,月浦境内村落之兼有市集者,有新兴镇、潘家桥、狮子林。新兴镇在月浦镇西南六里许,与罗店镇接壤,光绪初年只茅屋三四家,跨马路河有木桥一座。其后建庙造桥,居户渐多,有木行一家,布庄、药铺、南货、茶酒等店家十余处,每天日落之前赶集颇盛。潘家桥,在月浦镇东南四里,与城区交界,有花(棉花)行、杂货店、茶肆等六七家。狮子林,在月浦镇东北四里许,原为军事重镇,驻兵极多,附近居民聚集经商,开设肉庄、茶楼酒肆、杂货店,逐渐形成一个村集,俗称小街[6]。

十九、外冈镇

嘉定县外冈镇,位于县治西十二里,地处长江三角洲冈身地带西部,东南为黄泥冈、青冈,南为沙冈,以它独处西北一隅,故谓之

[1] 民国《月浦里志》卷五实业志·商业。
[2] 民国《盛桥里志》卷一舆地志·市镇。
[3] 民国《盛桥里志》卷四交通志·道路。
[4] 民国《盛桥里志》卷四交通志·航路。
[5] 民国《盛桥里志》卷三实业志·商业,卷三实业志·物产。
[6]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舆地志·市镇。民国《月浦里志》卷一舆地志·村庄。

外冈，又名西冈身。《练川图记》说："冈身，其地有四：盖在县东二里曰东冈，西十五里曰外冈，西南十八里曰沙冈，又二里曰浅冈"①。

宋嘉定十年置嘉定县时，外冈还是一个袤延不逾一里的村落。元代时，居民仍很稀少。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居民日渐增多。由于它地理位置重要，"层冈缭绕，澄练萦洄，水陆要冲，据邑上流"②，逐渐由村落向市镇发展。

成化、弘治年间的外冈，虽然"生齿日繁众"，商业已开始发达，但仍未成为市镇。正德《练川图记》、正德《姑苏志》均不载外冈市或外冈镇③。嘉靖年间，受倭寇骚扰，外冈居民逃亡，景况萧条。到万历初年，受商品经济刺激而渐趋繁荣，成为棉花、棉布贸易中心——外冈镇。崇祯《外冈志》记载：

"元时居民尚鲜，至国朝成、弘间，而生齿日繁众。世庙（按：即嘉靖年间）时岛夷入寇，逃亡几尽，后复渐归乡里。神宗初年，民渐稠密，俗称繁庶。四方之巨贾富驵贸花、布者，皆集于此，遂称雄镇焉"。④

可见外冈镇成于嘉靖、万历之际。它最早见于万历《嘉定县志》：

"外冈镇，在县治西一十二里，其地东西仅一里，为水陆要冲。"⑤

外冈镇处于市镇网络之中：西南至安亭镇十五里；南至方泰镇十里，至黄渡镇十五里；东南至南翔镇二十六里，北至葛隆镇六里；东北至娄塘镇二十里。其地南通吴淞江，北抵浏河，西达吴塘顾浦，地势旷野，河港委曲，因而成为"邑之咽喉，商贾辏集，舟楫停

---

①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冈墩。

② 崇祯《外冈志》卷一沿革。

③ 参看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以及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④ 崇祯《外冈志》卷一沿革。

⑤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泊"之地[①]。

外冈镇是嘉定、太仓、昆山间重要的棉花、棉布交易中心。镇上有十字相交的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四条街道，以及中街弄、南弄、南商家弄等支弄，构成商业区。"居市者即操什一，或挟资而贾于四方"，镇上商业发达，经商致富者"纵酒博赛，挟娼以嬉"[②]，比比皆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造成农村经济萧条，外冈镇也很不景气："公私交迫，诈伪萌生，挟资者相戒不前，而民生日促，殆不可为镇矣"[③]。镇上"人烟寥落，庐舍萧条"，成为"盐艘、盗船往来出没之地"[④]。顺治、康熙间，农村经济复苏，外冈镇再度兴旺发达，成为居民近千户的中型市镇，全镇有：东街、西街、南街（俗称南弄）、北街、大街（介乎东西两街之中，俗称大弄）、寺前街、商家弄、新弄、寺后弄、大横沥、小横沥、戴家弄、中街弄（俗称西街）、姚家弄[⑤]。商业繁荣的程度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外冈四乡地处冈身，地势高仰，耕地大多种植棉花，"男勤于耕，女勤于织"[⑥]。清中叶以后，由于米价日趋昂贵，农家逐渐改变吃商品粮的积习，"始多种稻"，于是由先前专种棉花的格局改为"花稻参半"的格局[⑦]。由此可以得知，自明中叶至清中叶，外冈四乡农家是以棉作为经营主体的，"躬耕之家，无论丰稔，必资纺织以供衣食，即我镇所称大户，亦不废焉。每夜静，机杼之声达于户外"[⑧]。七月七日七夕之后，纺织尤勤，"七夕之后夜凉，农家

① 崇祯《外冈志》卷一兵防。
② 崇祯《外冈志》卷一风俗。
③ 崇祯《外冈志》卷一沿革。
④ 崇祯《外冈志》卷一兵防。
⑤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街道。
⑥ 崇祯《外冈志》卷一风俗。
⑦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风俗。
⑧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风俗。

纺织彻夜，谚云：河斜角，做夜作"[1]。这种状况，与嘉定县其他地区是大体相似的："首藉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妇女昼夜纺织，公私诸费皆赖之"[2]。

万历以来，外冈布闻名远近，成为徽商踊跃争购的名品。外冈布的一个重要集散地是邻近的钱门塘市，"因徽商僦居钱鸣塘(即钱门塘)收买，遂名钱鸣塘布"[3]。

钱门塘，在嘉定设县后即为大镇，跨春申、安亭二乡，人烟稠密，街巷纷岐。元明两代规模渐小，改称钱门塘市。其地"居民向以花布为生"，所产丁娘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名镇多仿为之，遂俱称钱门塘布"[4]。外冈布之所以称为钱门塘布，一是由于外冈布仿照纱细工良的钱门塘布织成；二是由于外冈布多运至徽商僦居的钱门塘市出售，因此钱门塘布或曰丁娘布，实际上成了外冈一带所产棉布的名牌产品。

清代前期，外冈布名声大噪。其浆纱布尤佳，据布商评价："外冈之布，名曰冈尖，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镇上布庄生意十分兴隆。其中，飞花布最为有名，当地人称为小布，"纱必匀细，工必精良，价逾常布"[5]。张鹏翀有诗云：

"江店酒香蝴蝶飞，
东村荡桨西村归，
村中织尽飞花布，
日未下舂先下机。"[6]

---

① 崇祯《外冈志》卷一时序。
② 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田赋・物产。康熙《嘉定县志》卷四物产。
③ 崇祯《外冈志》卷二物产。
④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风俗；卷一乡域志・土产。
⑤ 乾隆《续外冈志》卷四物产。
⑥ 乾隆《续外冈志》卷四物产。

据乾隆时上海县人褚华说："凡布密而狭短者，为小布，松江谓之扣布；疏而阔者为稀布，产邑中；极细者为飞花布，即丁娘子布，产邑之三林塘"[1]。据《松江府志》云："又有丁娘子布，组织尤精细"；"东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弹木棉极纯熟，花皆飞起，收以织布，尤为精软，号丁娘子布，一名飞花布"[2]。看来，丁娘子布即飞花布，钱门塘、外冈一带丁娘子布的纺织技术显然受松江影响，不过各地都有丁娘子布、飞花布、紫花布、小布、大布、扣布、稀布之类，虽然名称相同，但质地往往不尽相同，多少都带有一些地方特色。故外冈布与松江布同为丁娘子布或飞花布，但特色不一，外冈布就号称"冈尖"。

外冈镇上早市十分热闹，四乡农家赴镇"卖纱卖布者必以黎明"，父老谓"早市早回"，"既充一日之用，又不妨一日之功"。至于棉花、豆类成熟时，"牙侩持灯而往，悬于荒郊要略，乘晦交易"，则可称为早早市[3]。镇上花布贸易在秋季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大胜景，吸引着游人前往观赏，谓之"秋日观晓市"：

"至秋而花、布辏集，每夜半各肆开列，悬灯张火，踵接肩摩，人语杂沓，道路拥挤，至晓而散。"[4]

这种早早市的盛况——"悬灯张火，踵接肩摩，人语杂沓，道路拥挤"，一方面显示了外冈所产棉花、棉布数量极多，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外冈花、布声誉极佳，吸引了众多的客商，故而生意兴旺。

花、布生意的兴旺，促成了外冈镇及四乡的富庶。"近镇村居颇有富厚者，良田广宅，贯朽粟陈，而勤于耕稼，不闻外事，镇居者往往羡之。近日亦事华侈，服饰趋时制、宴集效商款，乡里效尤，颇多

①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② 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康熙《松江府志》卷四土产。
③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风俗
④ 崇祯《外冈志》卷二游赏

耗费”，“至于佃户，家无担石，入市必沽酒肉，未冬先披羊裘”，“甚至搭台演戏，迎社酬神”①。

迎社酬神之事颇多。正月初一夜，有元夜迎灯会，乡人以此新年鸣钲击鼓凡三夜。正月初五日，祀五路财神，谓之烧利市，以祈一年之生财有道。正月十二日为棉花生日，因棉花为经济命所系，故十分重视。十二日晴则有收，其后又取决于二月十二、三月十二日，谚云：“有利无利，只看三个十二”。正月十三日，爆糯谷于釜，名曰爆孛娄，以卜一岁休咎，又名卜流（卜一岁之流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采柏叶折竹枝，结棚门外放灯，谓之灯棚。灯之名目数以百计，争奇斗巧，竟相夸耀。自十五日试灯至十八夜止，“士女嬉游，街巷填塞，歌影衣香，昼夜不绝”②。“乡人编竹为龙，联千百灯笼为身，锣鼓喧闹以迎社神”，“亘街穿巷，竟夜不绝，或三日或四日而止”③。其盛况正如张锡爵《春灯行诗》所吟咏的那样：

“中春既望月正圆，
城南城北声喧阗，
灼烁灯火红无边，
山市海市幻影遍④。”

二月十二日为百花生日，有“花朝赏红”的习俗，剪五色彩条系于果树，名曰尝红。

三月二十八日有香市，结棚演戏。妇女入庙拈香，填塞街巷，“是日买卖赶趁，开场聚赌，遍地皆然”⑤。

五月初五日龙舟竞渡，龙舟青黄不一，黄者为镇上脚夫所划，青者为从事船运的篙师所划。

---

①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风俗。
② 崇祯《外冈志》卷一时序。
③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时序。
④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时序。
⑤ 乾隆《续外冈志》卷一时序。

入秋以后，外冈的习俗更为丰富多采。秋日观晓市、三桥月夜听歌声，都是经济繁荣所形成的文化生活。

秋日观晓市——"镇产惟花、布，春夏间市人掉臂，至秋而花、布辏集，每夜半各肆开列，悬灯张火，踵接肩摩，人语杂沓，道路拥挤，至晓而散"，游人及镇民常乘兴结伴，观赏晓市盛况[①]；

三桥月夜听歌声——"镇上石梁最著者三，惟三元桥居中近市，月夜游人如蚁，列坐石栏，箫管嘹亮，倚歌而和之，夜声秋笛，声振林木，听者环集，每至达旦"[②]。

市镇经济繁荣与习俗侈靡，必然伴之以赌博。先是宵聚晓散，后则沿街设局，名曰宝场。"乡民负担入市，百计诱骗，一经入局，宝具藏机，照珠揭面，移红变黑，公然肆夺"。宝场更有大局，"先期具东约至宝所，供以盛馔，侑以歌妪，一宝则捐全成笏，抽头亦积币如山。开赌者丰衣足食，受赌者荡产倾家"[③]。此外还有小赌花样，如吁子戏、骨牌、天九、四虎、么夹小之类[④]。

二十、钱 门 塘 市

钱门塘市位于嘉定县治西北二十里。南宋嘉定十年设嘉定县后，此地即成为市镇。钱门塘镇跨春申、安亭二乡，其全盛时代，曾设置税务，全境"东达盐铁塘，西过姚家宅，人烟稠密，街巷纷岐"[⑤]。元代，渐趋衰微，改称钱门塘市，明代仍称钱门塘市。正德《练川图记》载：

---

① 崇祯《外冈志》卷二游赏。
② 崇祯《外冈志》卷二游赏。
③ 乾隆《续外冈志》卷二俗蠹。
④ 乾隆《续外冈志》卷二俗蠹。
⑤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

"钱门塘市，在县西北二十里二十二都。"[1]

万历《嘉定县志》、康熙《嘉定县志》均称钱门塘市，指出"旧有税课子局一所，今革"[2]，并指出其地"出布"[3]。

钱门塘系水道名，钱门塘镇、钱门塘市均以水道命名。宋代，钱门塘水深港阔，"居民鳞比，商贾辏集"[4]，故称为镇；元明时代水道淤浅，商贾渐稀，钱门塘由镇变为市，至清代中叶郭泽塘北之市，仅为先前钱门塘镇西北一隅之地[5]。康熙十年，因嘉定县屡遭旱灾，知县赵昕在此分设粥厂赈济，因而民间又称钱门塘市为钱门塘厂。清末，改称为钱门塘乡。

钱门塘市，南临郭泽塘，东跨顾浦，西接徐公浦，居民多集聚于郭泽塘北岸，塘南及顾公浦东岸仅二三十户。钱门塘市商业繁荣，虽称为市，却可与小镇比美。清人王鸣盛有诗曰：

"夜火钱门市，

春潮郭泽塘。"[6]

姚承绪有诗曰：

"争说钱王下驾初，

宋元漕运浚通渠，

人烟辐辏看成市，

田宅飘零又析居。"[7]

钱门塘市的主要经济部门是棉布业。顾浦东岸地势稍高，大多种棉；地势低洼处，虽种稻者十之七八，但农家比户纺织。钱门

---

1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2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3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4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建置。

5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建置。

6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市集。

7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市集。

塘所产棉布号称丁娘子布，是淞南一带特产。嘉道间人杨光辅说："丁娘子布，光洁细软。朱竹垞(彝尊)所谓'晒却浑如飞瀑悬，看来只讶神之活'者也。造法秘不示人，女嫁他族，流传始广"[①]。钱门塘四乡所产丁娘子布，"纱细工良，明时有徽商僦居里中，收买出贩。自是，外冈各镇多仿之，遂俱称钱门塘布"[②]。可见钱门塘布在明清两代是颇有影响的名牌产品，外冈各镇所产棉布多如法炮制，统称钱门塘布，运往钱门塘布，由徽州商人贩运出境。钱门塘市在相当长时期中成为外冈各镇所产棉布的集散中心。

嘉定境内向不栽桑育蚕。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郭泽塘南岸农家开始栽桑育蚕，"每岁育蚕缫丝，获利颇厚"，此后"里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湖州"[③]。

钱门塘市市面繁荣，习俗亦颇侈靡。"乡镇茶坊，大半赌场"[④]，赌博花样不一，有摇宝，有斗蟋蟀，有斗鹌鹑，输赢动辄千百。市街上寄生者成群，此类地方棍徒，"俗称獭皮，倡醮、构讼、杀牛、开赌不法等事，皆出若辈"[⑤]。

清末民初，钱门塘不再称市，而称为乡，"益形衰落"[⑥]。

二十一、方　泰　镇

嘉定县治西南十八里的方泰镇，宋元时代是一个小村落，因位于方泰寺旁，称为方泰墟。明永乐年间，逐渐饶裕。正德年间，员

① 杨光辅：《淞南乐府》(《上海掌故丛书》)。
②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土产。
③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土产。
④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风俗。
⑤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风俗。
⑥ 民国《钱门塘乡志》卷一乡域志·市集。

外陈荣"富甲里中,营第宅,构园亭,建牌坊,极一时之盛"①。其后不久,渐趋萧索,"第宅园亭尽为平地";到明代末年,"居民鲜少,寥落几家,大抵皆经纪小贩卖"②。可知其时方泰仅为村落集市,正德《练川图记》、万历《嘉定县志》所载嘉定市镇,均无方泰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初。康熙间,方泰富商陈氏兴起,罗店镇富商严氏也从罗店镇迁来此地,陈严两家"气象兴隆,树叶蕃衍",依靠经商起家致富,成为方泰一带的领袖人物,在他们的影响下,方泰商业日益繁荣,于康熙中形成方泰镇。《方泰志》说:

"自(陈严)两家以猗顿之术起家,为一镇领袖,一镇化之,习于勤俭,各铺户皆日长炎炎,由是房屋陆续增添,街衢渐次改观,布庄开张,典商望风而至,百货骈集,遂成闹市。而镇中始有殷实巨户矣……方泰镇之称实始于此。"④

康熙中方泰街衢改观,布庄开张,典商望风而至,终于成为百货骈集的市镇。故光绪《嘉定县志》也说:方泰镇"康熙间陈严两姓创市"⑤。

方泰镇街市南北一里、东西一里。中街为通衢大道,南通黄渡镇,北通外冈镇;东街在画锦坊,背后转东谓之朱雀西街,在清风桥北堍;转西谓之玄武街;又有庙弄,在中街东;荒场弄,在中街西⑥。方泰镇与邻近各市镇交通方便,东南至马陆十八里,南至南翔二十四里,西南至黄渡十二里,西至安亭十二里,北至外冈十二里⑦。

---

① 嘉庆《方泰志》卷一发凡。
② 嘉庆《方泰志》卷一发凡。
③ 正德《练川图记》卷七市镇。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④ 嘉庆《方泰志》卷一发凡。
⑤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乡都·市镇。
⑥ 嘉庆《方泰志》卷一街市。
⑦ 嘉庆《方泰志》卷一街市。

方泰地处冈身(即冈墩),沙冈墩在方泰北三里,盐铁塘之西,沙冈自常熟福山、梅里、支塘、直塘、双凤,经太仓过娄塘,而南隐于平畴,诘屈高下,越葛隆镇南,分为二股,左股由外冈镇过练祁,益隆起蜿蜒。浅冈墩,一名黄土墩,在方泰南二里,盐铁塘之西,高泾之东北。方泰地势高仰,以产棉花为主,农家勤于纺织。镇中市庄林立,经营四乡所产棉布。

二十二、真　如　镇

真如镇位于嘉定县治东南五十里,因其地有真如寺而得名。真如寺,一名万寿寺,俗名大寺,旧在官场,宋嘉定年间僧永安以真如院改建,元延祐年间僧妙心移建桃树浦,改称真如寺①。

真如寺历史悠久,真如镇的建立却比较晚。明代正德年间它还是一个市。正德《练川图记》载:"真如市,在县东南五十里十一都"②。至嘉靖、万历年间,由于商业的繁荣,真如市升格为真如镇。万历《嘉定县志》载:

"真如镇,在县治东南五十里,以寺名,其地东西二里,南北一里③。"

真如镇东西长二里、南北宽一里。东抵彭越镇(即彭浦镇)十二里,西抵栅桥镇十二里,东北抵大场镇十二里,西北抵南翔镇二十四里。为嘉定县东南之大镇,地处吴淞江近傍,镇中有桃树浦(别名桃溪),为嘉定、上海两县孔道,因此"客商辏集,渐成巨镇"④。雍正三年析嘉定县东境置宝山县,真如镇改属宝

①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寺观。
②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③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④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沿革。

山县。

真如镇四乡系棉作区，所产棉花量多质优，“色有洁白，种有早晚，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水稻因“土燥工繁，里鲜播种”[1]。农家勤于纺织，所产标布十分精良。清初，其地就以“出棉布”而著称[2]。真如镇的标布有紫白二色，农家“比户织作，昼夜不辍，暮成匹布，晨易钱米，以资日用”[3]。镇上布庄生意兴隆，客商云集，收买标布贩运出境。农家还纺纱出售，“一手捻三纱，以足运输，人劳工敏，无顷刻闲”[4]。真如镇市面颇为景气，“士习诗书，农勤耕织，百工商贾各务本业”[5]。清中叶“商业以寺前街为最，大小商铺二百余家”，清末以后，随着“沪埠西辟”，真如镇逐渐衰落，寺前街阛市不复存在，“只存东西两场遗址”[6]。

二十三、马　陆　镇

马陆镇位于嘉定县治南十二里。宋末丞相陆秀夫长子南大，自盐城避难至此，与马氏共处其地。日后子孙繁衍，遂名其村为马陆村。

《马陆里志》谓：“自宋陆南大与马氏共居于此后，市廛渐以稠密，元明以来，由村成镇。”[7]“元明以来，由村成镇”云云，颇为含糊其辞，极易误解为明代已由村成镇。其实不然。查正德《练川图

---

[1]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物产。

[2]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 · 市镇。

[3]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物产。

[4]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物产。

[5] 乾隆《真如里志》卷一风俗。

[6] 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一舆地志 · 市镇。

[7] 嘉庆《马陆里志》卷一疆域志 · 沿革。

记》所载嘉定五市七镇，其中并无马陆市或马陆镇[1]。万历《嘉定县志》在市镇栏内提及马陆，但既不称市，也不称镇，仅称村：

"马陆村，在县治南一十二里。"[2]

康熙《嘉定县治》依然称为马陆村[3]。可见直至康熙年间马陆仍未成镇。

马陆由村成为镇大约在乾隆、嘉庆间。光绪《嘉定县志》所载县属各市镇，其中有马陆镇：

"马陆镇，县治南二十里，东西不及一里。"[4]

其按语指出："程志（乾隆时修）所载镇凡十三：南翔、纪庙、娄塘、外冈、葛隆、方泰、安亭、黄渡、新泾、徐家行、罗店、广福。历年既久，村易为镇者二：诸翟、马陆。今增者三：石冈门、戬浜桥、江桥"[5]。嘉庆《马陆里志》也说："赵侯邑志，始改称镇"[6]。据此可知，马陆镇成于乾隆、嘉庆间似无疑问。

马陆镇规模不大，街市东西不及一里，但乾隆、嘉庆间已热闹得很，《马陆竹枝词》如此描绘道：

"征志原称马陆村，
迄今市巷闹纷纷，
东西攘攘熙熙众，
南北街头十字分。"[7]

镇中街市有南北大街、真圣堂市、典弄市、石冈门市、孙家弄

---

[1]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2]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
[3]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4]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建置
[5]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建置。
[6] 嘉庆《马陆里志》卷一疆域志・沿革
[7] 嘉庆《马陆里志》卷七杂类志・刻序

市、陆家巷[1]。镇中主要干河有横沥——北通练祁，南入槎溪，马陆塘——东通杨泾，西至王家村。横跨横沥的长庆桥，横跨马陆塘的永安桥，是镇中闹市所在。

马陆镇虽小，但所辖村庄却有三十七座，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二里，南至广福镇，西至方泰镇，南至南翔镇均为十二里。马陆四乡盛产棉花，有白花、紫花、羊毛白。农家以纺织为主业，所产棉布有刷线布、泗泾布、标布、长套等[2]。镇上收套棉布并转售给客商的布行，是经济支柱，仅次于布行的是花行（棉花行）、米行以及其他店铺。《马陆竹枝词》曰：

“贸易财源赖布商，
铺街老圃业成行，
朱家茶食陈家酒，
沈氏花行韩氏粮。”[3]

---

① 嘉庆《马陆里志》卷二建置志·街市。
② 嘉庆《马陆里志》卷七杂类志·物产。
③ 嘉庆《马陆里志》卷七杂类志·岁序。

第八章　松江府典型市镇概览

二十四、七　宝　镇

七宝镇原属松江府华亭县，万历元年析置青浦县后，全镇一分为二：以蒲汇塘(自西而东横贯全镇的水道)为界，其北划归青浦县；其南仍归华亭县，顺治十三年析置娄县后，南镇划归娄县。故七宝镇有北七宝、南七宝之分。

七宝镇原有南北二寺，均称七宝寺。北七宝寺又名七宝教寺，在七宝北镇，宋初张泽舍宅拓寺，其后又增修重建，明成化十九年建大寺殿，万历十三年重修。南七宝寺在七宝南镇，宋大中祥符元年建(一说元至正中建)①。

北七宝镇经济发达，故万历以前镇未分治，统称北七宝镇。正德《松江府志》在华亭县市镇栏内载：

"北七宝镇，商贾必由之地，今税课局在焉"②。

万历元年析置青浦县后，北七宝镇划归青浦县，万历《青浦县志》载，

"北七宝镇……旧有南北二寺，皆称七宝，此居其北，故名。旧属华亭，今以蒲汇塘为界，塘北皆青浦分地，商贾猬集，文儒辈出，盖邑之巨镇云。镇有税课局，今废。"③

---

① 道光《蒲溪小志》卷二寺庙。

②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

③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而蒲汇塘以南属华亭县(后改属娄县)部分,则称七宝镇。嘉庆《松江府志》所载娄县市镇中,有七宝镇(而不称南七宝镇),并指出"其北隶青浦"[1]。乾隆《娄县志》称:

"七宝镇,故庵也,初在陆宝山,以吴越王赐以金字藏经,曰此一宝也,因改名七宝。后徙于镇,遂以取目。蒲汇塘贯镇而东,以桥为界,其北隶青浦县"。[2]

七宝镇居蒲汇塘、横沥间,左有横沥,前临蒲汇塘,水运方便,为"商贾必经之地"[3],"凡舟楫往来,商贾贸易,田间灌溉,皆于水是赖。惟水利修则商贾集,而田事举"[4]。蒲汇塘自西至东横贯镇中,跨蒲汇塘有三座大桥:蒲汇塘桥——在七宝镇中市,明正德中建;安平桥——在东市梢;康乐桥——在西市梢。沟通镇中街弄与河道的桥梁还有:新沟桥——在北镇西街市梢;东黄泥泾桥——在西市梢营房西首;中香花桥——在七宝寺前对北大街,元大德间建;东香花桥——在七宝寺东,元大德间建;西香花桥——在七宝寺西,元大德间建。此外,蒲汇塘北岸还有西黄泥泾桥、徐家庄桥、和尚浜桥、朱真桥、朱家浜桥、马婆浜桥、新漕泾桥等[5]。

蒲汇塘与跨蒲汇塘的桥梁,成为全镇交通枢纽。南镇自蒲汇塘桥南堍栅楼起,至南尽处,为南大街,长约二百步,"商贾贸易,悉开店肆"[6],是南镇主要商业区。此外还有:

东街——沿蒲汇塘桥南堍,向东至安平桥止;

西街——沿塘桥南堍,向西至康乐桥止;东西两街长约七百步;

---

1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疆域·镇市。

2 乾隆《娄县志》卷一疆域·村镇。

3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名义。

4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水利。

5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桥梁。

6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街巷

东栅口、西栅口——东栅至西栅,长约三百步;

纺车街——自东栅外过小石桥向东至东圣堂,即南七宝寺,又东至安平桥止,又名东街,长约三百余步,“以此街中人多制纺车售卖”①,故名纺车街;

南街——自西街由路向南至西栅口,再南行过土地祠出市梢,长约一里;

竹行街——自东街永安桥堍向南由路至东栅小石桥止,长约二百步;

南横沥街——东栅小石桥西堍,沿横沥河西岸向南行,过丁家店,至南城隍庙、岳庙止,长约一里;

横沥河东——过万安桥,沿横沥河东岸向南行,直出市梢,长约四百余步;

博古弄——俗称北沟弄,在南大街中市,通南街。

北镇自蒲汇塘桥北堍栅楼起,至北栅镇安桥止,有北大街,“悉开店铺,生意贸易之处约长三百步”②,是北镇主要商业区。此外还有:

东街——沿塘桥北堍向东至云台殿北;

西街——沿塘桥北堍向西至康乐桥止;东西两街长约七百余步;

横沥河西——自东街兴圣桥西堍,向北沿横沥西岸至市梢寺池桥,长约二里;

大寺前——自大寺西首西香花桥起,向东行过城隍庙前东香花桥,长约三百步;

周家弄——在北大街南栅口,通横沥;

徐家弄——在北大街中市,通横沥;

---

①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街弄。

②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街弄。

姜家弄——在西大街，通白场；

宜佳弄——在北大街近北栅，通横沥；

沈家弄——在北镇西街，通白场。

四通八达的河道与街弄，显示出七宝镇成为松江府著名的商业中心的格局，舟楫往来，商贾云集。

七宝镇是标布、扣布、稀布的集散地。四乡旱地多而水田少，"大熟所种，花（棉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①]。物产以棉花为大宗，有早棉、晚棉，"以供纺织，且资远贩"[②]。四乡农家"自耕织外，生计鲜少"[③]。纺纱织布成为七宝农家的主业，所纺之纱，"较西乡为独异"，纺纱之后，"比户织作，昼夜不辍，乡镇皆为之，暮成匹布，易钱米以资日用"[④]。所产之布，有标布、扣布、稀布三种。标布又称标寸布，所谓"上阔尖细"，阔仅七寸、九寸[⑤]；扣布又称小布，密而狭；稀布则疏而阔[⑥]。七宝所产棉布以稀布最为著名，阔一尺二寸，长二丈三尺，松江地区"龙华稀、七宝稀最驰名"[⑦]。龙华稀、七宝稀又称龙华尖、七宝尖，张春华说："布之精者为尖，有龙华尖、七宝尖名目"；又说：

"晓市评量信手拈，
廿三尺外问谁添，
关山路沓风声远，
多少龙华七宝尖。"[⑧]

---

①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风俗。
②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物产。
③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风俗。
④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物产。
⑤ 崇祯《松江府志》卷六物产；卷七风俗。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⑥ 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
⑦ 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
⑧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

七宝布在明清之际是畅销各地的精品。而纺织此种棉布的绝大多数是个体农家，他们在家中置布机一架，昼夜织作，“率日成一匹，其精敏者日可二匹”，“清晨抱布入市，易花、米以归，来旦复抱布出”，“其衣食全赖此以出”①。

七宝镇由于棉纺织业的发达，而成为居民繁庶，商贾骈集，文儒辈出的大镇，呈现一片繁忙景象。“其地东亘上海，北达练川（嘉定），西走郡治（松江），不第藉分三邑，而且界割两郡”②。它西至泗泾镇十八里，南至莘庄镇九里，北至诸翟镇十四里，东南至龙华镇三十四里，东北至南翔镇三十六里，西北至盘龙镇十八里。人流频繁，商业兴旺的市镇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官府为维持市镇秩序伤透脑筋。

七宝镇南城隍庙所立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奉宪严禁牙役混派滋扰碑》就反映了这一社会背景。该碑声称：“七宝界连三邑，凡属官府过往，雇募夫马迎接，更夫守宿，百计需索，……擅自混派水夫、马草，开浚河渠”③。足见其时七宝镇上官府过往十分频繁，已与县城的地位不相上下。商业的繁忙，需要成群的脚夫为商品集散服务，而脚夫成群之后，又形成一股社会势力，往往要挟勒索，“逼勒新开店铺贺喜抽半，抢夺乡民米稻采宝”。官府不得不申严禁令，“其脚价工钱，本府计程远近定价例给，货物十里以内，短雇者每里给钱五文，五十里外长雇扛挑者，准给钱二百文，交卸后空回，每百里另给酒钱十文，不得再勒。冠婚丧嫁给工钱一百文，迎娶花轿赁钱，华者不得过四百文，朴者不得过二百文。其有随地雇夫承值，不许脚夫分地霸占，或贫穷无力雇募，有亲丁帮助

① 道光《蒲溪小志》卷一风俗。

② 道光《蒲溪小志》卷四碑记。

③ 道光《蒲溪小志》卷四碑记。

者，毋许揽阻，庶商民俱安"[1]。透过官府的禁令，可以看到市镇上雇佣劳动者脚夫之多，以及雇佣搬运扛抬现象之普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七宝镇当时的经济繁荣状况。

二十五、朱　泾　镇

朱泾镇，明代属松江府华亭县。顺治十三年分华亭县置娄县，朱泾改归娄县；雍正二年分置金山县，朱泾改归金山县；乾隆二十五年朱泾成为金山县县治。明清两代，朱泾镇一直以松江府的大镇而著称于世。

元代曾在朱泾置大盈务，但当时朱泾并未成为市镇。至元《嘉禾志》仅载松江府的青龙镇，而不载朱泾[2]。足见在元代至元年间，朱泾仍未成镇。

元末明初，随着经济的繁荣，朱泾迅速发展成镇。洪武六年徙税课局于此，是这个转折的显著标志[3]。至成化、弘治年间，朱泾已俨然巨镇气象，号称"居民数千家，商贾辐辏，置邮，走两浙达两京者不少辍，实为要津"[4]。万历年间松江商品经济日趋发达，朱泾镇进入了鼎盛时代。清初，朱泾镇已经"人烟万井"[5]。到乾隆年间，朱泾镇"烟火稠密，商贾辐凑，有城市气象"[6]。乾隆二十五年移金山县治于此，并非偶然，乃是朱泾镇逐步发展、繁荣的结果。它"有城市气象"在先，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县城，足以表明朱泾镇已具备充当县城所必备的各种功能了。由朱泾镇的兴起、发展、

---

[1] 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奉宪严禁脚夫霸橫扰民碑》，载《蒲溪小志》卷四碑记。

[2] 至元《嘉禾志》卷三镇市。

[3] 乾隆《金山县志》卷一疆域·镇市。

[4] 明顾纯：《重建万安桥记》，载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桥梁。

[5] 叶梦珠：《阅世编》卷三建设。

[6] 乾隆《金山县志》卷一疆域·镇市。

演变，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农村的城市化趋势，显示了市镇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朱泾镇的城市化趋势，其实在明中叶已初具规模，无名氏《修复朱泾卖柴湾水道碑记》指出：朱泾镇"有明时，户口殷繁，闾阎充实，虽都会之盛，无以加兹"[1]，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朱泾镇地当黄浦与泖水交会处，系两浙交通要津。交通地位的重要是促使它日趋繁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理条件。

泖水出华亭谷，朱泾以西为长泖，受浙西诸水，其北为大泖，受淀山湖诸水。长泖自西北流经斜塘，与西来之秀州塘会合，东入横潦泾，过詹家汇，北折入黄浦。

朱泾镇中河道纵横交错，主要的一条是朱泾，一名市泾（市河），自秀州塘分支东流入市，市西北有万安桥，即秀州塘转折处，南流从永福桥东折，经归源桥南折过法忍寺侧，出西亭桥达市泾。泾水起自前市口，南流过三官桥，为西汇，有市肆聚落；泾水自西市东行，经新桥，其南为广福西里，其北为龙渊里，皆多市肆。又东往西亭桥、东亭桥，其南为广福里，其北为惠民里，民居、市肆、寺观、园亭遍布于此。

市河（即朱泾）横贯镇中，把全镇分割为东西两半。市河两旁街巷密布。街道当地称为里、巷、阁、汇。镇东有：

瀚中里——冯家库；

凤翔里——佛寺桥至惠民桥；

惠民里——惠民桥至东亭桥；

龙渊里——东亭桥至戚家弄；

济众里——戚家弄至万安桥；

程家阁——东亭桥北；

归源里——归源桥内；

---

[1] 嘉庆《朱泾志》卷三水利志·镇中诸水。

永昌巷——惠民桥北。

镇西有：

三元里——新桥至翁家弄；

广福西里——新桥至广福桥；

广福东里——广福桥至杨家弄；

环照里——杨家弄至众安桥；

文明里——杨家弄至文庙；

青龙里——东汇；

南汇——翁家弄至南三官桥；

西汇——环照桥至苏家桥；

剥岸——长寿桥之西；

蟠荫里——王家村东北；

文殊浜——翁家弄之南；

顾家湾——顾家桥之南[1]。

朱泾镇街市长三里，东至周家埭，西至秀州塘，南至漩子泾，北至小泖港[2]隶属于它的四乡村庄大小共有三十个，都在朱泾经济区域内，谓之乡脚或四乡。朱泾东南的吕巷市、杨巷市，与朱泾镇构成一体，成为一个发达的棉纺织业中心。正德《松江府志》在述及朱泾镇时，特别强调："东南有溪市二，曰吕巷、杨巷"[3]；崇祯《松江府志》在述及吕巷市、杨巷市时指出："与朱泾鳞次鼎分"[4]。朱泾镇与吕巷市、杨巷市三足鼎立，融为一体，时人称："朱泾锭子吕巷车"[5]，显示了这个棉纺织业中心的内在结构。朱泾镇四乡的纺纱、织布业与朱泾镇的铁锭业及吕巷市的纺车业，是互相配套、互

①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街巷。

②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界至。

③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

④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⑤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物产。

相促进的。

朱泾一带农村，盛产棉花，又精于纺织，时人有诗曰：

“鳞比人家纺织勤，
木棉花熟白于银，
邻家买得尤家锭，
缫出丝丝胜绮纹。”①

所产棉布最有名的是质地精细的标布，优于远近闻名的尤墩布。清初上海县人叶梦珠说：“棉花布……上阔尖细者曰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最精不过一钱七八分至二钱而止”；“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②。

朱泾镇就是著名的标布贸易中心，镇上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布商多得不可计数，交易额动辄以白银万两计。清人赵慎徽有诗云：

“万家烟火似都城，
元室曾经置大盈，
估客往来多满载，
至今人号小临清。”③

其自注云：“明季多标行，有小临清之目”④。

所谓标行，即从事标布贸易的牙行；所谓估客，即各地前来朱泾镇做标布生意的布商，也称客商，他们挟带巨额资金，来此买布，白银动以数万计，常常满载而归，促使朱泾镇生意兴隆，故人称小

---

①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 · 物产。
② 《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③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 · 因革。
④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 · 因革。

临清。

据顾公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①]。这种布号，坐庄收买，垄断镇上棉布交易，是极有财有势的商业组织，其下还设有染坊、踹坊，雇佣工匠加工棉布，带有亦商亦工的性质。

清代初年，"标客巨商罕至"，"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而中机之行转盛，而昔日之作标客者，今俱改为中机，故松人谓之新改布，更有最狭短者曰小布"[②]。小布密而狭短，又称扣布，与疏而阔长的大布（又称阔布、稀布）相区别。乾隆《金山县志》称，"东北刷经居多，西南拍浆为最，若近城妇女每织麻为网，所织棉布俗呼卫稀"[③]。所谓刷经、拍浆即小布，所谓卫稀即稀布、阔布。《金山县志》说："小布有刷经、拍浆二种，刷经尤精；阔布名稀布，有单穿、双扣之别，另有紫花布、斜纹布、刮绒布、丝布，间或为之，不如小布、阔布之比户操作也"[④]。直至清末，朱泾镇四乡仍盛产大布、小布。

与纺织业配套的铁锭业十分发达。《朱泾志》说："铁锭，朱泾最良，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近数尤御亭及骆姓家，远近争购"[⑤]。

此外还有铜器、铁器业，亦甚著名。"沈纯锡作铜器小件，精巧无比，远近驰名。""抬阁铁柱，独数朱泾，……他处胜会，必邀朱泾工匠为之"[⑥]。

---

① 《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③ 乾隆《金山县志》卷十七风俗。
④ 乾隆《金山县志》卷十七物产。
⑤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物产。
⑥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物产。

朱泾镇为“江浙孔道，商舶鳞集，群倡杂处其间”[1]。富庶的经济生活，给市镇风俗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每年正月元夕，接灶，作灯市。三月清明，上下塘看赛神会，以抬阁铁柱扎小儿于其上，高出楼檐，装扮戏曲故事，“悉用珠玉珍宝，穷极工巧”，民间谚语说：“忙做忙，莫忘朱泾赛神隍”，足见朱泾镇赛神会排场豪华，吸引了远近的居民前往观光。此种神会，不仅清明节有，中元节、十月朔日祭坛之期均有。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多至六七艘，五色旗帐飘扬，龙舟上亦装抬阁，扮演戏曲故事，经费动辄以白银万两计。七月中元节，往东西两寺作盂兰盆会，扎白莲船，并施放水灯。八月初一日，东林寺开香市，“寺中货卖杂物，列肆而居。此种香市延续至中秋节前后，四方游人“填街塞巷，杂沓而来，佛殿几无容足之区”，直至九月底才停息[2]。

这种民间风俗，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市镇经济为后盾，是难以长期延续的。在不大的朱泾镇上，寺观鳞次栉比，多达二十九处，惊人的寺观分布密度，也从侧面显示了朱泾镇盛极一时的繁华景况。

二十六、枫　泾　镇

枫泾镇旧名白牛市。位于嘉兴县东北六十里，宋代陈舜俞居此，自号白牛居士，故称其地为白牛荡，并以此名市，称白牛市。元代至元十三年立为镇，称白牛镇，设白牛务与巡检司[3]。因其地属枫泾乡，“因乡名镇”，改称枫泾镇[4]。

---

[1] 康熙三十六年《粪郡尊嵘祠堂碑记》，载《朱泾志》卷二建置志·节孝祠。

[2] 嘉庆《朱泾志》卷一疆域志·风俗。

[3] 至元《嘉禾志》卷三镇市。

[4] 乾隆《娄县志》卷三疆域·村镇。

枫泾旧名风泾。宋杨潜《云间志》载：风泾乡在华亭县西南六十里，白牛市即在其地。宋代在此置风泾驿，以通秀州①。

明宣德年间，析嘉兴县置嘉善县，枫泾镇南部隶属于嘉善县，镇北部仍隶属于松江府华亭县。明初在枫泾镇设税课局，即元代之白牛务②。清顺治中，析华亭县为娄县，枫泾镇北部改隶娄县。嘉善县主簿、娄县巡检及两县分布防外委并驻扎于此。"东望云间为泖口要隘，西望张泾汇九里铺递之所由"③。

枫泾镇地处松江、嘉兴两府交通要道的咽喉部，又是江浙界首，在沟通两地经济交往中的地位颇为重要。因为这个缘故，"至元明而户口日繁，市廛日盛"④。由明入清，更是日趋兴旺。康熙时人说，枫泾镇"商贾骈集，增厦数千间"⑤；"本镇物阜民殷，巨贾辐辏，称邑都会"⑥。乾隆时人说："镇人科第相继，商贩旅集，至今称蕃庶焉"⑦。光绪时人说："逮至我朝，人文蔚起，崇工硕士颉颃后先，如谢侍郎墉，陈光禄孝咏，蔡殿撰以台……虽区宇只此一隅，而灵秀钟聚，不逊通都大邑，又地为水陆所凑，商贾骈集，田野沃饶，民务俭勤，户号殷富，数百年来未之变也"⑧。当地人金景西有诗咏枫泾镇之盛况：

"白牛塘上酒旗中，
南北长桥卧彩虹，
烟寺晓钟蕉叶雨，

①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乾隆《娄县志》卷三疆域·村镇。
② 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四建置志。
③ 光绪《枫泾小志》卷首，顾福仁：《重辑枫泾小志序》。
④ 光绪《枫泾小志》卷首，沈祥龙：《重辑枫泾小志序》。
⑤ 康熙《松江府志》卷十七市镇。
⑥ 康熙《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⑦ 乾隆《娄县志》卷三疆域·村镇。
⑧ 光绪《枫泾小志》卷首，沈祥龙：《重辑枫泾小志序》。

水楼晴槛落花风。
衣冠文物声名蔼，
舟楫鱼盐利泽通，
东望云间酬二陆，
举头南向酹宣公。”①

枫泾镇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著名的棉纺织业。四乡农家精于纺织，生产大布、小布，“农妇藉以为业”②。镇上收购棉布的布号数以百计。“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③。枫泾所产小布阔一尺、长二丈二尺，大布阔二尺、长四丈，大抵是嘉善一带的通例：“用一尺筘者为小布，用二尺筘者为大布；小布以二丈二尺为匹，大布则以四丈为匹”④。乡农入镇除出售棉布外，还出售棉花、棉纱，沈蓉城《枫泾竹枝词》描绘镇上花、布生意之兴隆道。

“贸易隆昌百货全，
包家桥口集人烟，
男携白布来中市，
女挈黄花向务前。”

“隆昌桥，本名务前桥，在包家桥北，元设白牛务于此”⑤，隆昌桥、包家桥一带是枫泾镇的中市，是商业繁华之区，农家与布号、纱庄的交易大多在此进行。

由于布号遍布，棉布交易额巨大，镇中设有布局，从事棉布整理加工业务。吴遇坤《天咫录》说：“康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多

---

① 光绪《嘉善县志》卷二乡镇。
② 光绪《枫泾小志》卷一区域志·食货。
③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④ 光绪《嘉善县志》卷十二物产。
⑤ 沈蓉城：《枫泾竹枝词》。

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1]。染匠受雇于染坊，染坊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之分。嘉庆《松江府志》谓："染工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其以灰粉渗胶矾涂作花样，随意染何色，而后刮去灰粉，则白章烂然，名刮印花。或以木版刻作花卉、人物、禽兽，以布蒙版而砑之，用五色刷其砑处，华采如绘"[2]。砑匠是踹坊雇佣的工匠。踹坊是对已染色之布匹进行踹砑加工的作坊，又称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为承，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踹其两端，往来旋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3]。

枫泾四乡产米，尤以冬春米著名；加以枫泾地处嘉、松要道，故米市颇为发达。米市上集散的冬春米，"以草为囤，置米其中，色变为红可至数年"[4]，其制作法与苏州一带略有不同，但都香味可口，成为畅销品。沈蓉城《枫泾竹枝词》曰：

"俊生桥下暮潮冲，
估客停舟米市逢，
不道声传海慧寺，
梦回已打五更钟。"

枫泾镇历史悠久，繁荣的时间持续得很长，直至清末光绪年间，还是"市廛辐辏，烟户繁盛，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俗尚华饰而不伤于靡，人务机智而弗荒于嬉"[5]。每年四月四日盛饰龙舟，"昼则笙旗耀日，夜则火炬通宵，斗巧争奇，胜于他处"[6]。秋收后迎神赛

---

①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志 · 拾遗。
② 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 · 物产。
③ 褚华：《木棉谱》。
④ 光绪《枫泾小志》卷一区域志 · 食货。
⑤ 光绪《枫泾小志》卷首。江峰：《枫泾小志序》。
⑥ 光绪《枫泾小志》卷一区域志 · 风俗。

会，“以金鼓置船中，数桨并举，谓之哨船”[1]。人称“赛神之举莫盛于枫泾”，以乾隆年间最为隆盛。每当迎神赛会时，选十岁以下童子扮演故事，“衣皆奇丽，珠以万计，金玉以千计”，“互相夸耀，举国若狂，费几累万”。“士女倾室往观，百里内闻风而来者舟楫云集，河塞不通，一时传为胜举”[2]。

二十七、法　华　镇

法华镇位于上海县治西十二里，以镇中有法华寺而得名。初称法华巷，系农村集市所在地，因近上海县城，交通、商业都得天独厚，“为冠盖之冲”[3]，渐次成镇。

法华镇始于何时？据法华镇《王氏家谱》称，“有三边总制王国宝，父大化，隆庆间迁法华镇西之上澳塘”。《法华乡志》的编者据此断定法华镇“始于有明中叶”，“称名之始当在嘉靖间”[4]。然而此说在府志、县志中找不到旁证。正德《松江府志》所载市镇中没有法华镇或法华市，固不待言；崇祯《松江府志》有关镇市部分，亦不载法华镇法华市[5]。嘉靖《上海县志》所载十一镇、十一市中，均无法华[6]。直至嘉庆《松江府志》，法华镇始见诸记载[7]。

《法华乡志》说：“法华自有镇以来，前清乾（隆）嘉（庆）时为鼎盛”；又说：“镇在邑西，鳞壤毗接，声教景从，故嘉庆邑志列为镇市

① 光绪《枫泾小志》卷一区域志·风俗。
② 光绪《枫泾小志》卷十拾遗志·拾遗。
③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④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⑤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⑥ 嘉靖《上海县志》卷一建置。
⑦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疆域志·镇市。

之首"[①]。其实,所谓乾嘉时鼎盛,不如说乾嘉时成镇,庶几接近实际情况。

法华镇"陆路可通,为往来孔道,桑麻接壤,烟户万家"[②],在乾嘉时代堪称上海县的大镇。全镇以法华寺为中心,寺东为东镇,寺西为西镇,全镇绵亘三里。"居民皆面李纵泾而居,故又号纵溪"[③]。它不愧为"往来孔道",东至陈泾庙三里,南至小闸六里,西至北新泾九里,北至曹家渡三里,东南至龙华六里,西南至虹桥七里,西北至陈家渡五里,东北至静安寺四里,东抵上海县城十二里。

法华镇四乡,"田多高壤,宜植木棉"[④]。农家普遍纺纱织布,农暇之时,家家户户机声轧轧,一片繁忙景象。乡妇以脚车纺纱,"能者日得一斤"[⑤]。纱纺成后,须经过浆纱的工序,浆必须细白好面调成,不可太熟,熟则纱色黑;不可太生,生则纱不紧。在糊盆浸过一夜,乘晓露未晞时阴干,然后以竹帚扫刷,称为刷纱,上布机织成布匹,称为刷布,质地精良[⑥]。法华镇四乡多产刷布,《法华乡志》载:"聚纱曰经布,浆纱而复理之曰刷布,布有长短两种,长曰东稀,短曰西稀,女子最勤者,寅起亥息,有日成二三匹者"[⑦]。

道光时上海县人张春华说:"织布者皆女工,日可得布一匹,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功,得布二三匹者,然亦仅见"[⑧]。可见法华镇四乡农家"日成二三匹",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技术是高度熟练的。

---

①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②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③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④ 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
⑤ 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
⑥ 嘉庆《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
⑦ 民国《法华乡志》卷二风俗。
⑧ 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上海掌故丛书》)。

上海县人褚华说："凡布密而狭短者为小布，松江谓之扣布；疏而阔者为稀布，产邑中"[①]。法华镇四乡所产稀布，无论东稀、西稀，都属于疏而阔的一种，并非狭而短的小布。上海县的稀布以"龙华稀、七宝稀最驰名"，法华稀仅次于龙华稀、七宝稀，阔一尺二寸、长二丈许[②]。

上海县的棉布，"以百里所产常供数省之用"[③]。法华镇也不例外，所产棉布，"万商捆载"。彭汉英《木棉谣》描述的就是法华镇棉布贸易的盛况：

"当窗萦拂丝万千，
织成布匹可易钱，
销售直与茧同然，
万商捆载不计船。"[④]

法华镇四乡农家在同治、光绪年间，大兴蚕桑，"法华以南、徐家汇至龙华一带，已蔚然成林"[⑤]。由于镇上丝厂林立，农家"养蚕绝不缫丝，而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随着洋纱、洋布的倾销，棉布之利日趋微薄，农家"兴蚕桑之利，以济棉布之穷"[⑥]。

咸丰年间，法华镇迭遭战火，典商停歇，市面萧条，兼之东南徐家汇、北面曹家渡等地相继成市，商业重心转移，法华镇日趋衰落。

徐家汇成市——徐家汇在法华镇东南二里许，向为上海县西部荒僻之地。道光二十七年，法国教士在此建造天主教堂，堂西即徐光启故居，其裔孙聚族而居，初名徐家库。咸丰间徐景星在东生

---

①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② 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
③ 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
④ 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
⑤ 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
⑥ 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

桥东堍建茅屋三间，开一米铺，左右仍是一片荒郊。太平军上海之役，避难者蜂涌而至，建民房、开店肆，形成市集。光绪三十四年钜商张士希购地造房百余幢，商人程氏、顾氏各建店铺数十家，市面大兴，徐家汇终于形成闹市[①]。

曹家渡成市——曹家渡在法华镇北三里许。光绪十八年有商人购地建筑油车，为成市之始。继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聚居者不下数千人，造房开店，百工居肆，形成阛市。由于曹家渡地处吴淞江(苏州河)畔，帆樯云集，富商巨贾莫不视为宝地，挟带巨额资金在此设厂、经商，市面愈加发达，东西长约二里的市街，厂商鳞次栉比，烟户万家[②]。

此外，法华镇东北四里的静安寺、西北四里的周家桥也先后成市，杨家库小市、七山湾小市也相继形成[③]。

与上述那些具有近代化色彩的商业区比较，法华镇相形见绌，清末民初改称法华乡，更无法与徐家汇市、静安寺市、曹家渡市相抗衡了。

二十八、诸　翟　镇

诸翟镇，本名白鹤村，相传肇居是村者多诸、翟二姓，故名诸翟。又以村西多紫薇花，亦名紫堤。其地跨盘龙塘，东属上海县，北属嘉定县。

诸翟在明代前期成市，称诸翟巷市。正德《松江府志》所载上海县市镇中，就有诸翟巷市[①]；崇祯《松江府志》所载上海县市镇

---

①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②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③ 民国《法华乡志》卷一沿革。

①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

中，也有诸翟巷市[1]。嘉靖《上海县志》则称为诸翟市，"俗呼为诸地"[2]。

诸翟市成于明代正德以前，然而正德《练川图记》所载嘉定县五市中，并无诸翟市或诸翟巷市[3]。正德《姑苏志》所载嘉定九市中，也无诸翟市或诸翟巷市[4]。万历《嘉定县志》、康熙《嘉定县志》虽记载了诸翟，但都是作为村落而不是作为市镇，二志都称："诸狄巷村，在县治西南五十里"[5]。据此可以推知，明代前期形成的诸翟市，位于上海县境内；而位于嘉定县境内部分，当时仍是村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初。

康熙二十三、四年间，民户约三百余，三十年后，增至七百余户[6]。大约在雍正、乾隆间，诸翟市逐渐发展为镇。光绪《嘉定县志》称："程志所载镇凡十三：南翔、纪庙、栅桥、娄塘、外冈、葛隆、方泰、安亭、黄渡、新泾、徐家行、罗店、广福。历年既久，村易为镇者二：诸翟、马陆。今增者三：石冈门、戬浜桥、江桥"[7]。

诸翟一带，盛产棉花、蓝靛。棉花"遍地种之，种有早晚之异（早者隔年白田，晚者春熟田），色有紫白之分，然惟白者尚，紫者间或种之"[8]。蓝靛又称靛青，用以供染，"向年种者犹少，故其利厚，今则种渐广而利浸薄"，但由于靛青用途推广，"向惟丝绸坊用之，近则布坊亦用，故利薄而无甚大绌"，"五六月间，嘉、湖、苏、松客商骈集"，贩买靛青，生意颇为兴隆，"民资以给"[9]。

---

①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② 嘉靖《上海县志》卷三建置。
③ 正德《练川图记》卷上市镇。
④ 正德《姑苏志》卷十八乡都。
⑤ 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康熙《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市镇。
⑥ 康熙《紫堤村小志》卷前。
⑦ 光绪《嘉定县志》卷一疆域志·市镇。
⑧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土产。
⑨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土产、卷二风俗。

除棉花、蓝靛外，“乡民多恃布为生”。康熙时，诸翟还未成镇，仍处于村市阶段，但棉布交易在诸翟市上已经颇为繁忙。“买卖市集，晓刻辐辏，东西亭桥之间，渐同茂镇，自朝至暮，抱布者不绝”①。诸翟成镇后，棉布生意有大幅度增长，已不再停留于农家抱布、买卖市集的水平之上，而是“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镇上布庄(牙行)专门揽接外省布商的生意，坐庄收布，然后转运出境。因而棉布价格昂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到咸丰年间，“布有余积，而商无现银，价因日落，民生计日蹙”②。

二十九、朱 家 角 镇

朱家角镇位于青浦县治西十二里，一名珠溪，又名珠街阁，西南通泖湖，东北接三分荡，而漕港亘其东北，北连昆山县境。其地以盛产棉布而于明中叶日渐崭露头角，至万历年间，一跃而为“商贾辏聚，贸易花、布”的巨镇③ 青浦县所产棉布，号称“衣被天下”④，朱家角镇就是棉布的集散地。

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松江府以它的特产——标布而誉满海内。清初松江府上海县人叶梦珠说：“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⑤。朱家角镇是松江府中与朱泾镇、枫泾镇并驾齐驱的标布贸易中心。朱泾镇、枫泾镇号

---

① 康熙《紫堤村小志》(不分卷)风俗。

② 咸丰《紫堤村志》卷二风俗。

③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④ 万历《青浦县志》卷一土产。

⑤ 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

称"多标行"、有"数百家布号"[1]。朱家角镇则以"京省标客往来不绝"著称一时。崇祯《松江府志》记载：

"朱家角镇，商贾凑聚，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2]

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朱家角镇作为标布贸易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前来购买标布的客商——即所谓"标客"，镇上商贾云集，往来不绝。"东市明纪场，茶楼酒肆，为京洛标客居停之所"[3]。当时人甚至认为朱泾、枫泾这两大棉布业市镇还不及朱家角镇繁华，陈金浩《衢歌》道：

"鱼米庄行闹六时，
南桥人避小巡司，
两泾不及珠街阁，
看尽图经总未知。"[4]

此处所谓"两泾"，即朱泾镇与枫泾镇，"两泾不及珠街阁"，看来并非夸张之词。朱家角镇上贸易棉花、棉布的庄行众多，还有大批从事鱼业、米业的庄行，构成以棉布业为主、其他行业为辅的市镇经济，终日生意兴旺，故曰"鱼米庄行闹六时"。嘉庆《松江府志》称它"商贾贸易甲于他镇"[5]，是与事实相符的。

朱家角镇四乡是水网地带，田地低洼，盛产优质稻米，土性不宜种植棉花。但四乡农家都从镇上牙行处以纱、布交易棉花，在家从事纺织。农家"工纺织者十之九"，一部分不纺纱单织布，一部分单纺纱不织布，"不纺而织者为兑纱，不织而纺者为卖纱"[6]。纺织

---

① 嘉庆《朱泾志》卷一因革。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芙蓉塘。
②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③ 嘉庆《珠里小志》卷五里巷。
④ 嘉庆《珠里小志》卷一界域。
⑤ 嘉庆《松江府志》卷二疆域志·镇市。
⑥ 嘉庆《珠里小志》卷三风俗。

农家多将所纺之纱出卖于镇上牙行，当地称为“卖纱”；织布农家则从牙行处以布兑纱，当地称为“兑纱”，带有来料加工性质。这种来料加工性质的家庭手工业，还表现为农家“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纱易”[1]。促成这种棉花、棉纱、棉花互兑互易的牙行称为花布纱庄，它的业务经营范围，一方面是与农家发生关系，“收布拆花”，另一方面是与客商发生关系，包揽京省标客的生意。

朱家角镇上除了花纱布庄外，还有鱼米庄行及其他各色店铺。“市中居货曰榻，置货鬻物曰店，以有易无曰赎卖，随地贸易曰摊头，肩挑行贩曰脚担”；“药材曰堂，估衣大曰庄，小曰店，质库曰典当”；“屠割曰庄，沽酒食曰馆，茶肆亦曰馆”[2]。

镇上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各种小作坊几乎应有尽有。

金工有银匠作、铜匠作、铁匠作、锡匠作；

木工有大木作——造屋宇；小木作——雕刻杂物，作铺——制棺椁；

竹工有结篾作、箍桶作；

此外还有水作(泥水匠)、漆作、成衣作、皮匠作、裱背(装潢书画)作[3]。

这样就构成了朱家角镇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其他商业、手工业配套的经济格局，使它成为方圆数十里的经济中心。这种格局，使朱家角镇持续兴旺，历数百年而不衰。万历《青浦县志》、康熙《青浦县志》都称它“商贾辏聚，贸易花、布，为今巨镇”[4]。到乾隆时代，它仍是“贸易甲于他镇”。乾隆《青浦县志》称朱家角镇为珠街镇：

---

① 乾隆《金泽小志》卷一风俗。

② 嘉庆《珠里小志》卷三风俗。

③ 嘉庆《珠里小志》卷三风俗。

④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康熙《青浦县志》卷二市镇。

"珠街镇,一名珠溪,俗名朱家角。在五十保,县治西十二里,西南通泖湖,东北接三分荡,而漕港亘其北,北连昆山县境。水木清华,文儒辈出,自明陆树声后,士族之盛为一邑望。而商贩交通,贸易亦甲于他镇,故移安庄巡司于此。镇北慈门寺规模宏壮,而圆津禅院尤为文士会友之所。"[①]

圆津禅院,元至正年间建造,明万历年间重修,清顺治十五年僧通证照初构亦峰居、清溪草堂、墨花禅、清华阁、息躬之室、那伽定处、舫斋等,成为文人雅士"游眺之所","一时推为胜地"。其中清华阁尤为著名。王原《清华阁记》不仅记述了清华阁之秀美,而且描绘了当时朱家角镇之盛况:"去邑而西未半舍(按:意为不到十五里),有聚居人数千家,廛肆市易之盛埒于邑,左带分湖,右通薛淀,淀山秀郁在其南数百步内,村墟竹树落布置,远近桑幢网户出没平畴浅渚间"[②]。

到光绪年间,朱家角镇"商贾贸易甲于他镇"[③]的地位还没有改变。镇中大街小巷密布、庄行林立。主要街巷有:

福星里——瑚阶港下塘,

人和里——汪家地,

平安里——戚家桥,

泰安里——北市上塘,

敦仁里——瑚阶港上塘,

十妹街、蓝坊场——东市下塘,

横街——低塌桥,

棋竿场——东市上塘,

新街、慈门寺石街、骆家桥石街、陆九房石街——平安桥上塘,

① 乾隆《青浦县志》卷十三市镇。

② 乾隆《青浦县志》卷十六寺观。

③ 光绪《青浦县志》卷二疆域·镇市。

漕港滩——泰安桥北，

满洲城、牛溇滩、轿子湾——平安里北，

月澄湾、油车汇、老鼠窠——中市祥宁浜上塘，

雪葭浜(薛家浜)——东市南。

此外还有教化弄、潘家弄、高家弄、水沟弄、司弄、馒头弄、中和巷等[1]。

清末民初，又新增了一些街巷：

庙前街——中市下塘，

牌楼街——东市圣堂浜东，

磨坊弄——即高家弄，

满洲弄——即馒头弄，四景园弄[2]。

如此星罗棋布的街巷，在青浦县各市镇中堪称名列前茅，称为一邑巨镇是名不虚传的。

三十、金　泽　镇

金泽镇原属松江府华亭县，析置青浦县后，划归青浦，位于青浦县治西南三十五里。其地古曰白苎里，四面皆湖，土厚而肥，农家获泽如金，因名金泽。

宋景定初，在此建颐浩禅寺经堂，元至元年间建大雄宝殿，构山房，翼两庑。与颐浩禅寺修筑的同时，陆续兴建百婆桥、万安亭桥、迎祥桥、里仁亭桥、吉庆桥、如意桥[3]。

明代正德年间，金泽已成为华亭县的大镇。正德《松江府志》载华亭县十六镇，金泽镇列于风泾镇、朱泾镇之后："金泽镇，地接

---

① 光绪《青浦县志》卷二疆域·街巷。

② 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二疆域·街巷。

③ 道光《金泽小志》卷二祠庙，卷一桥梁。

泖湖，田于是者获其泽如金焉，故名"[1]。万历年间，金泽镇已划归青浦，其盛况与朱家角镇不相上下。万历《青浦县志》载：

"金泽镇，……接泖浦，穑人获泽如金，因名。境有巡司防盐盗出没，以镇当浙直之交也。市盛，佛庐穷壮极丽，为邑伟观，曰颐浩。溪上舆梁飞亭，列肆又他镇所无。"[2]

金泽镇规模宏大，东西广四里，南北袤五里，周二十八里，界于青浦、嘉善、吴江三县之间，东北至青浦县治三十五里，南至嘉善县治三十六里，西至吴江县治五十四里[3]，故称"镇当浙直之交"[4]。在东西四里、南北五里的镇上，分布着许多街巷：

南大街——在百步桥，

上街——在青秧地，

下街——在竹行埭，

内中街——在百步桥西，

邑庙大街——在大弄南，

中街——在放生桥北，

大街——在颐浩寺，

钟家汇——在天王桥南，

神道浜、摇车埭——在安寿桥，

棋竿场（亦名蔡家场）、轿子湾——在寺西桥，

长街——在万安桥西堍折南。

此外还有官弄、赵家弄、大弄、禅寮弄等[5]。

金泽地处淀山湖畔，四面皆湖，地势低洼，土质肥沃，适宜种植水稻。所产粳稻五种：徐家稻、晚百哥、荔子红、屋上青、三朝齐；糯

---

① 正德《松江府志》卷五土产。

② 万历《青浦县志》卷二镇市。

③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疆域。

④ 崇祯《松江府志》卷三镇市。

⑤ 光绪《青浦县志》卷二疆域·街巷。民国《青浦县续志》卷二疆域·街巷。

稻四种：观音糯、乌衔糯、鳗鲤梢、百日糯，均为名贵品种[1]。农家“皆重耕作，务蓄积，置良田，为本业”。其地虽不产棉，但农家与松江农家别无二致，都以纺织为业，“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2]。农家“自耕织外，生计鲜少，俗尚俭啬”[3]。农家纺纱织布，或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或抱布入市，易木棉以归，此种经营方式，带有与棉作区农家不同的方式，是来料加工的小商品生产。镇上收购棉纱、棉布的花布纱庄，生意十分兴隆。《金泽小志》载：

> “金泽无论贫富妇女，无不纺织，肆中收布之所曰花布纱庄，布成持以易花，或即以棉纱易，辗转相乘，储其余为一家御寒具，兼佐盐米。”[4]

纺织业的发达，促使制作纺车、锭子的手工业兴起。金泽镇所制纺车、锭子，远近闻名。“锭子以铁为之，车以绳竹为轮，夹两柱，中枢底横三木，偏左而昂其首，以著锭子，轮旋而纱成焉。到处同式，而金泽为工。东松郡，西吴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来购买。故‘金泽锭子谢家车’，方百里间习成谚语”[5]。

---

①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土产。
②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风俗。
③ 万历《青浦县志》卷一风俗。
④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风俗。
⑤ 道光《金泽小志》卷一土产。

第九章　杭州府典型市镇概览

三十一、塘　栖　镇

塘栖(一名唐栖)镇,位于杭州府治北五十五里,属仁和县(杭州府附郭县),与湖州府德清县接界[1]。乾隆《杭州府志》说,"此镇宋时所无,而今为市镇之甲,亦以运道改移日益繁盛"[2]。道出了塘栖镇兴起与发展的地理、经济原因。

塘栖,宋时称为下塘。咸淳《临安志》载,其地有永泰里、葛墅里、仲墅里、瓦杭里、博陆里、前庄里(均为明清时代塘栖镇所辖乡村),而独无塘栖。元代以前,南来北往取道于临平镇,塘栖僻处下塘,地位极不重要,仍是荒村一片。

塘栖有栖溪,明嘉兴人岳元声《图书编》说,浙西诸水俱发源于天目,万山泄泻,一由德清而入太湖,一由余杭而入于栖溪,至塘栖又分为二:一由濑溪而落震泽,一由嘉兴而东入于海[3]。说明它的水路交通条件是优越的,但在元以前并未充分发挥作用。到了元末,张士诚为便于军队往来,由伍临港开运河至杭州武林门外北新桥北,连通塘栖与杭州,称为新开河,沟通苏、湖、常,镇诸府,"凡舟

---

①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

②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市镇。

③ 光绪《唐栖志》卷二山水。

不入上塘河者皆行于此"[1]。所谓不入上塘，即不经过临平镇南来北往之意，表明元末明初塘栖开始成为与临平镇并驾齐驱的交通要道。

明正统七年易輓，巡抚周忱又开辟陆道，自北新桥起至崇德县界，修筑塘岸(官道)，建造桥梁。至此，水陆通行，便于漕运，塘栖开始成为杭嘉湖间南来北往的主要干道，漕运、驰驿渐由临平移至塘栖，"唐栖之人烟以聚，风气以开"，"而唐栖以官道所由，风帆梭织，其自杭而往者，至此得少休，自嘉(兴)、秀(水)而来者，亦至此而泊宿，水陆辐辏，商贾鳞集，临河两岸市肆萃焉"[2]。

塘栖镇就是这样兴起的，由荒村一跃而成为商贾鳞集的大镇。宋元时代它是穷乡僻壤，居民稀少，仅有一座唐栖寺。元末明初，开运河、修官道、筑桥梁，人烟兴旺，市廛繁荣，"遂以寺名其镇"[3]，于是才有塘栖镇。

塘栖镇大约成于正统年间，至弘治年间已颇为可观。镇上横跨运河的道济桥(俗称长桥)建于弘治二年。弘治十一年华亭钱福撰《重建长桥记》说："有镇曰唐栖，其水自天目来，奔流震泽，疏为三江。……裔是而往交横闽越之珍商巨贾，凡以充中国之要需，秦晋鲁吴之铁冶、毛罽，凡以济南土之不及"[4]。可见弘治年间的塘栖镇，已经成为南北商贾荟萃、货物交流之地。到了嘉靖年间，塘栖镇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其地联带江湖，接引瓯越，萦洛吴会，使传之经行，商贾之走集，徒旅之往来，既以会道之冲而凑津途之要，又其大溪中横，旷岸并睨，市区氓椽鳞次栉比。北乡左右越墟，出贩者

① 光绪《唐栖志》卷二山水。

② 光绪《唐栖志》卷一图说。

③ 光绪《唐栖志》卷一图说。

④ 光绪《唐栖志》卷三桥梁。

晨驰夕骛，肩摩迹累……”[1]

塘栖镇从兴起到繁荣是十分迅速的。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临平镇由宋元时代的大镇，急转直下，其地位被塘栖镇所取代。可见交通的变迁对市镇的兴衰是至关重要的。

终明一代，塘栖镇俨然以浙江巨镇的面貌屹立于杭嘉湖平原之上。当时人对它有许多赞美之词。

隆庆六年周诗：《唐栖镇添设水利通判厅记》指出：“唐栖去会城五十里，而遥当水陆孔道，控带三郡，盖浙藩北一大门户也……泉货丰衍”[2]。

万历《杭州府志》说，“唐栖为仁和名镇，当水陆孔道，泉货凑集”[3]。

万历《湖州府志》也指出，德清县有二镇，一为新市镇，一为塘栖镇（按：塘栖镇仍属仁和县、德清县），都十分繁华，塘栖镇“在县治东三十五里，官道舟车之冲要，丝缕粟米皆聚贸于此”[4]。

天启七年许会典《募修唐栖长桥略》说，“唐栖，巨镇也，省直舟楫挽输所必由孔道也”[5]。

清代前期，塘栖镇继续发展，号称“市镇之甲”[6]。杭世骏在乾隆三十五年为《唐栖志略》所写序文指出：“栖水去北关五十里，以一桥为之锁钥，夹岸筑塘，市廛隐赈……声沸水面，百货充斥，工匠斤削之具靡不具。……夫百步之内，有芳草十室之邑……虽壤地偏小，高贤栖托，风雅隶兴，卓、吕、丁、吴诸大姓矫尾厉角，峥嵘于

---

① 嘉靖十四年德清陈霆撰《唐栖镇通济桥碑记》，载《唐栖志》卷三桥梁。

②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事纪。

③ 万历《杭州府志》卷七国朝纪事。

④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乡镇。

⑤ 光绪《唐栖志》卷三桥梁。

⑥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市镇。

胜国之季,声妓园林号称极盛"[1]。

塘栖镇四乡有数十里方圆,本镇四至:东至语溪,北抵德清,西至奉口,南向仁和,与乔司、临平、小林连壤相错。镇北有运河横贯而过,其南有支河,两岸为阛市,故支河称市河,又有北小河、西小河、东小河与市河相交,河边为街道、店肆、民居。东小河在镇东北,"居人面山临水,长廊曲槛,荷柳映之,宛如画境,骚人词客常放舟觞咏于此"[2]。

镇中主要街道有:

水北大街——运河北岸,自广济桥(长桥)以东至市河一段,系杭州至嘉兴的官道(亦称官塘,即运河塘岸纤道),为塘栖镇与外界联系主要陆上通道,"行旅征程昼夜如织,居民临河列肆"[3];

北圣堂街——运河北岸,自广济桥以西,与水北大街连接,非纤道官塘,"车商殷户市廛环列"[4],其西王家弄,为农人往来便道;

桥西大街——位于运河南岸阛市区,在广济桥西,上下两塴,上为宅第市肆,下为纤道,"此街商农交集,贸易繁多,倍于他市"[5];

大塘街——位于运河南岸阛市区,在广济桥东,一名西石塘,又称大塘,面临运河,"局面恢宏,铺肆饶裕",内为吉家兜街,"其间医室、画铺、茶室、酒店居多"[6]。桥西大街与大塘街是主要商业街,不仅店肆林立,而且建筑颇具特色,屋跨大街,街道在骑楼之下,可蔽风雨,故"商农泉货云集咫尺,雨旸风雪屏隔户外,虽肩贩

---

[1] 乾隆《唐栖志略》卷首杭世骏序。
[2] 乾隆《唐栖志略》卷上山水。
[3]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4]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5]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6]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力夫亦不知有风霜暴露之苦,他处市廛无佳于此者"[1]。运河南岸其他街道的构筑也是如此:

西市街——自西市角至喻家湾一带,亦为闹市街;

西小河北街——自喻家湾至圣堂角,"市廛自昔称盛,缙绅巨室亦多居此"[2];

南市街——自玉龙桥至马家桥,为马家桥南头街,俗称南横头,为棉花市集所在;

市南街——自八字桥至赵家兜口,有市集;

东市集——自马家桥落北至东市角长街,与东小河街相接,"多酒楼、茶室、书画装潢、医卜店肆,一时名流小饮、清谈半多集此。且地多米栈仓房,为巨室积储之地,街尽处为木行"[3];

北小河街——茶寮、酒肆,大厦云连,第宅居多。

塘栖镇的这种繁荣格局,使它名符其实地成为浙江巨镇,这与它处于交通枢纽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正如《唐栖志》作者王同在论及塘栖镇的兴起与发展的原因时所说,"推原其故,皆由漕河开后僻村顿成市面,河南岸尺寸之土尽作市廛"[4]。确实,运河的开通,使塘栖镇获得杭嘉湖平原交通枢纽的特殊地位,奇迹般地日趋繁荣,成为交通转运重地,也成为商品集散地。明末胡元敬在《栖溪风土记》中说:

> "(塘栖)镇去武林关四十五里,长河之水环汇焉,东至崇德五十四里,俱一水直达,而镇居其中。官舫运艘、商旅之船日夜联络不绝,矻然一巨镇也。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渊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臻辐凑,望之莫不称为财赋

---

①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②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③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④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之地。"[1]

显然，塘栖镇由于官船商舶络绎不绝，逐渐成为聚集财货之地，吸引了成群的富商大贾来此经营，或开典，或顿米，或贸米，或开车，充分利用这一交通枢纽市镇的经济价值。于是乎，昔日穷乡僻壤，曾几何时一跃而成为财富渊薮。

塘栖镇还凭借它那富饶的自然条件，成为远近闻名的丝业与果业市镇。塘栖四乡方园百里之内，是著名的蚕桑产地。"唐栖田少，遍地宜桑，春夏间一片绿云，几无隙地，剪声梯影，无村不然。出丝之多，甲于一邑，为生植大宗"[2]。农家除经营蚕丝业外，还经营果业，盛产枇杷、密桔、桃、梅、甘蔗，"培植极工，旁无杂树，一亩之地值可百金"[3]。

塘栖枇杷向负盛名，有红白二种，白为上，红次之。四五月时果实累累，各村忙于采摘，"筠筐千百，远贩苏沪，岭南荔枝无以过之"[4]。距塘栖镇南四五里的盘杨村所产枇杷尤为著名[5]。

塘栖梅，有青红二种，青者蜜饯，红者入药，"苏商收买，每就地大开圆场"[6]。镇之独山以北有横里村，农家以种梅为业，梅畦为田，梅花开时，弥复十余里，一望如雪[7]。

塘栖桔，有金钱、佛肚脐等名种，皮粗而小，无核味甜，杨汝榧《颂唐栖蜜桔诗》曰："衢州红熟皮嫌厚，闽县黄柑味欠鲜，何似唐栖霜后桔，佛脐藏蜜剖金钱"[8]。

---

①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②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物产。
③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物产。
④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物产。
⑤ 光绪《唐栖志》卷二十杂记。
⑥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物产。
⑦ 光绪《唐栖志》卷二十杂记。
⑧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物产。

交通运输业、蚕丝业、水果业造就了塘栖镇的经济繁荣，万历至乾隆间可谓盛极一时。康熙十六年，清圣祖玄烨南游杭州，乘船泊于唐栖镇，镇上建行宫于运河南岸，长六十丈、深六十丈，修堤岸六十丈。清高宗弘历南游时，在塘栖镇西茶亭之西建造御营，占地百余亩[①]。行宫、御营的兴建为塘栖镇的繁荣平添了几分富丽堂皇的色彩。

塘栖镇名流荟萃，赵孟頫、文嘉、王稚登等文人雅士都在此当过寓公。与本镇巨姓交往甚密的王稚登曾有诗云："十年频客越，四度宿塘栖"[②]。镇中古迹、名刹、园亭遍布，张超微《感赋诗》云："池荒桥断佃民居，大河既开风气殊，人文蔚起翰苑出，甲第连云难具述。佛庐僧舍如蚁封，宾客去往随鸣钟……攘攘闹市成肩摩，富贵更翻景物换。"[③] 唐栖寺历史久远，遗址已不可寻，清流寺犹存，时人如此描绘它："古寺当栖口，登桥一片霞，连樯知水市，俯岸见人家"[④]；"清流寺外估船开，市上行人首屡回，何处女郎年正少，杨花一曲抱筝来"[⑤]。大姓富室所筑园圃，充斥于大街小巷，著名的有：

吕园——在镇北，吕北野、吕山水兄弟别墅，积石累山，规模宏敞，其藏书之所曰樾馆，"当时宾客之盛，第宅之侈甲于杭郡"[⑥]；

丁氏别业——丁养浩筑，有漳溪、景薇堂，"前后树石，位置皆文衡山、仇十洲两家经营"，"吴中谢时臣、沈青门、周东村皆往来倡和于此，盖名流聚会之所也"[⑦]；

---

①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事纪。
② 乾隆《唐栖志略》卷下寓公。
③ 乾隆《唐栖志略》卷上古迹。
④ 乾隆《唐栖志略》卷上梵刹。
⑤ 乾隆《唐栖志略》卷下风俗。
⑥ 乾隆《唐栖志略》卷下园圃。
⑦ 乾隆《唐栖志略》卷下园圃。

卓园——卓明卿别墅；

水一方——卓人高筑，藏书之富仅次于吕北野之樾馆；

吴园——新安学使吴犹子宏文购入卓明卿东园，"增茸地馆，与狎客征歌选妓其中"[1]；

此外还有竹里馆、柳堂、西园等。

作为财富渊薮，塘栖镇每逢年节，景况热闹非凡。元宵节、清明节及迎神赛会时节，排场之豪华、人群之熙攘令人叹为观止。沈士铲《和徐野君元宵蹈灯西里诗》记元宵节盛况曰：

"兹会元宵夕，群游不夜天。
画灯娇步影，春烛粲流烟。
竹马更新主，星桥忆旧年。
太平终日望，惭愧鼓钟前。"[2]

《唐栖志》作者对此颇为感慨："可见国初承平熙攘气象"[3]。

清明节的龙舟（俗名方船）竞渡，以祈蚕业兴旺，故各乡不惜耗费巨资，竞巧争胜，直至清末不衰。"水际龙舟，岸滨采会"，民间俗称"水南会"。道光时钱塘人张仲甫《唐栖观水嬉曲》对"水嬉"作如下描绘：

"画船彩帜风中扬，
两两相继成巨舰，
百室庄严贯月槎，
万花绚烂移春槛。
一时箫鼓闹如雷，
齐向长桥河下来，
后舞前歌花世界，

---

[1] 乾隆《唐栖志略》卷下园圃。
[2]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3]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东船西舫蜃楼台。"[1]

迎神赛会早在明代就非常可观，吕园主人吕水山作《五显神赛会诗》吟咏其事曰："年年逢赛会，不惜挥金钱。沿塘舞鱼龙，并舫行秋千。百戏续续来，歌鼓声连延……喧逐夜达旦，灯火巷陌联"[2]。

塘栖镇的繁荣局面，到咸丰年间遭清军与太平军战争的破坏，而一落千丈，"梵宫琳宇尽付劫灰，巨室旧家半成瓦砾，风景百不及一矣"[3]。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清军为抵御太平军的攻势，拆塘栖运河堤岸巨石，筑垒于伍林头，使"舟行牵纤陆行便舆"的塘堤遭到破坏，其后虽经修复，但已"远不如前"[4]。塘栖水陆交通条件从此受到巨大影响。当地人说，清初元宵灯会之盛反映了当时塘栖镇的富庶繁华，"经咸丰辛酉(1681年)兵燹之后，无此盛举矣"[5]。由此可见塘栖这样盛极一时的巨镇，一旦遭到破坏，便日趋衰落，今昔非比了。

三十二、硖　石　镇

唐开元十一年，在盐官县治西南二百五十步置县市，并置乡市二，一曰长安市，一曰硖石市[6]。这是硖石成市的开始。

天宝中，吴郡太守赵居贞以盐官近海多盗，置海宁镇加以约束。会昌中，出于同样的考虑，增置硖石镇，设镇遏使[7]。这是硖

①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② 乾隆《唐栖志略》卷下风俗。
③ 光绪《唐栖志》卷四街巷。
④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事纪。
⑤ 光绪《唐栖志》卷十八风俗。
⑥ 嘉庆《硖川续志》卷一沿革。
⑦ 嘉庆《硖川续志》卷一沿革。

石由市成镇的开始。然而这是军事性质的镇，与后世经济性质的镇有所不同。邻近的澉浦镇、乍浦镇和它同属于一种类型。

南宋建都于临安，盐官县之长安镇扼其要冲，硖石则为盐官门户，故在此建硖石寨，设巡检司，置寨军百人，并设硖石酒库正，每月收掠人户息钱三十贯文[①]。这时候的硖石镇，军事意义仍大于经济意义。元至正间设硖石税务，隶巡检司。明洪武二年，改海宁州为县，置巡检于硖石镇；洪武十六年改税课局，兼置硖石河泊所；并改筑硖石寨于石墩与赭山，两寨东西相望，扼守险要。这时候的硖石镇的经济意义已大于军事意义。由于附近多盗，海宁县知县在此建关厢水陆栅四十二处，市人以资捍蔽[②]。从万历《杭州府志》可知，其时硖石镇已成为海宁县东北五十里的大镇，与长安镇并驾齐驱[③]。

综上所述，硖石称镇虽早在唐代，但那是军事性质的镇，直至明中叶，才逐渐转化为经济性质的镇。天启《海盐县图经》述及市镇演变时曾有这样的议论："远于城而民居聚焉者，古曰聚，名镇自唐始。今兼名市、村、墟，百物于焉往求之，曰市镇矣"[④]。它指出，本县"镇大者曰澉浦，有城，与乍浦镇南北峙，并置戍。其次硖石镇，镇地邻辖也……又其次沈荡镇，为大镇，去县二十六里，水四通如硖石，县西北境民皆赴之，列廛五六百家，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质店、大贾往往有"[⑤]。据此可知，沈荡镇规模与地位均次于硖石镇，但也有五六百家店铺，商贾辐辏，是海盐西北境的商品经济中心，硖石镇的规模及繁荣景况当不下于此。

硖石为一河两街型市镇。市河南分硖石湖之水，入市北注入

---

① 嘉庆《硖川续志》卷一沿革。

②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三舆地志·市镇引《嘉兴府图记》。

③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

④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一方域篇之一县坊乡镇图。

⑤ 天启《海盐县图经》卷一方域篇之一县坊乡镇图。

长水，穿越镇市，系南北舟航孔道。市河两旁为市街，全镇南北共四里[①]。市河与市街向外延伸，使硖石成为交通要道。明朱一是《硖石镇关厢水栅记》说："硖石通四道，盗出没，又盐贩千艘，帆夜扬如不键之户……西遏钱塘，东连武水，北经御儿，走吴淞、震泽各水"，"其港三十有六"，"日中为市，道遗不拾，眠不户扃"[②]。

明末周宗彝《修备纪略》说："海昌（按：海宁别称）素称大邑，邑中雄镇有四，而硖川为最要。盖襟带湖，不惟洞庭沧渤渚险，绾毂其道，五色纷错交壤其间"[③]。据周宗彝说，当时硖石镇已号称"烟火万户"，可见说海宁县"雄镇有四，而硖川为最要"，决非虚饰。《海昌外志》说得更为明确："海昌诸市，硖石为最饶，庶袁花次之，长安又次之，郭店为下，转塘、黄冈特村墟数廛也"[④]。

海宁境内，"西乡耐旱，多旱禾木棉，东乡土泽多晚稻，西乡鱼池利重，赋与田等，东乡潴水而赋轻。西乡兼丝绵绢席，东乡则专于绸、布"[⑤]。这种产业结构显示，当地是以丝、丝绵、棉花、布匹为主要特产的，农家大多从事纺织业，盛产棉布、苎布、麻布、兼丝布、黄草布、绢、罗、纱、纻、绵绸、纱带等[⑥]。硖石镇的情况与此相仿，除产香粳稻、羊眼豆、梅、茭、茶以外，四乡农家从事丝织业，所产紫微绸远近闻名，"僧房所造，以丹井水缫茧，色微碧，"故称紫微绸。《紫桃轩杂缀》云："硖石人积梅水，以二蚕茧缫丝织绸，有自然碧色，名松阴色，享上价。此法本宋宁宗宫禁中有为之者，号为天水碧"[⑦]。

---

① 嘉庆《硖川续志》卷一形势、卷一山川。
② 嘉庆《硖川续志》卷十一艺文。
③ 嘉庆《硖川续志》卷十一艺文。
④ 乾隆《杭州府志》卷五市镇引《海昌外志》。
⑤ 康熙《海宁县志》卷二方域志·土产。
⑥ 康熙《海宁县志》卷二方域志·土产。
⑦ 嘉庆《硖川续杰》卷五物产、卷十九丛谭。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海宁州市衰落，贸易重心转往硖石镇，硖石成为海宁的经济中心。民国《海宁州志稿》说："咸同以前，城外有丝市等行，乡货骈集，市廛称盛。自遭寇乱，蹂躏无遗。土产各货散售于乡镇，尤于硖石居多……厘局所收丝货等捐，在硖镇者十之七八，科名仕宦、富商巨贾，亦乡多而城少"[1]。

三十三、长　安　镇

长安，旧名修川。北宋时成市，为南北往来运道所经[2]。熙宁元年，提举河渠胡淮请修长安堰。绍圣中，转运使毛渐请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海[3]。南宋建都临安，修川市扼其要津，地位显要，改名为长安市。陆游《入蜀记》称，"乾道五年六月二日至长河堰，亦小市也，鱼虾甚富"。足见南宋初年长安市还是一个"鱼虾甚富"的"小市"。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到南宋中叶由市升为镇，在咸淳《临安志》中，长安镇已是临安府的大镇之一，属盐官县，位于县治西北二十五里[4]。长安镇的繁荣显示了地理位置的决定性作用：其一为运河所经，《宋史·河渠志》说，"长安闸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商旅络绎"；其二为首都所在，临安相距仅二十里，长安镇扼临安东北门户，为官、商必经通途。长安镇地理位置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日趋繁荣。

元代在此设税课务及驿站。方回《过长安市诗》云：

"算桔租菱小市哗，

堰头桥尾约千家，

---

[1] 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三舆地志·市镇。

[2] 元丰《九域志》卷五。

[3] 顾祖舆：《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浙江二。

[4]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诸镇。

人家已尽无人处，

时见芙蓉一岸花。"[1]

明代在此设置税课局，成为附近著名的商业中心。万历《杭州府志》载：

"长安镇，县西北二十五里，与仁和接界，有坝以限，上下两河商贾往来，舟航辐辏，昼夜喧沓。"[2]

"商贾往来，舟航辐辏，昼夜喧沓"寥寥数字，其实是对万历时代长安镇商业繁荣、经济兴旺的概括性描述。

长安镇位于杭州府城东八十里，西至临平镇三十五里，北至石门县十二里，南至海宁十里。河道四通八达，上河之水直达杭州艮山水门，下河则可通江南及川楚各地，成为"通运之总区"，"杭绍诸郡商贩咸集"[3]。在商品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粮流通频繁，长安镇成为仅次于枫桥、平望的著名米市，"杭、绍、宁三府咸资接济"[4]。

米市在石塘湾，市上"江南、川、楚之米无不毕集"[5]。朱文治《海昌杂诗》云：

"年来米价判高低，

黄团尖团样不齐，

近自江南及川楚，

长安利甲浙东西。"[6]

长安镇的米市十分兴隆，成为全镇主要经济支柱。

仅次于米业的是纺织业。镇上物产属于纺织物一类的有棉

---

① 同治《修川小志》卷下物产。

②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

③ 同治《修川小志》卷首陈序。

④ 同治《修川小志》卷上河道。

⑤ 同治《修川小志》卷下物产。

⑥ 同治《修川小志》卷下物产。

布、紫花布、纱带、手巾，此外还有绵绸、绢、丝等，棉花、棉纱、绵线、丝绵也是本地主要物产[1]。

各种商品都在镇上集散，由客商运销外地，因而镇上显得十分繁忙：

"灯火长安镇，
河流上下争，
市分粟米价，
坝转轴轳声。"[2]

三十四、临 平 镇

杭州府仁和县临平镇，建于宋太宗端拱元年。乾道《临安志》云："临平镇，端拱元年置，隶仁和县"。南宋时，临安为首都，商业繁盛，市镇兴旺，临平镇与附近的浙江镇、范浦镇、汤村镇等都是"一时货物咸走集"[3] 的商业中心。《梦粱录》云：临平、汤村诸镇市，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南宋时临平镇的繁荣情景于此可见一斑。

宋时临平镇为运河所经，系杭州、嘉兴之间往来要道，所谓"运河百里尤辇运省觐之冲"[4]。元末张士诚由塘栖伍临港开运河至杭州武林门外北新桥；明正统七年巡抚周忱开辟陆道，自北新桥至崇德县界，漕运、驰驿由临平移至塘栖，临平镇的地位逐渐下降。然而它在明清两代仍不失为一个大镇，尤其在水利方面不可或缺，

① 同治《修川小志》卷下物产。康熙《杭州府志》卷六物产。
② 同治《修川小志》卷上河道。
③ 康熙《杭州府志》卷二市镇。
④ 沈谦：《临平记》卷二事记第二。

故时人说："临平水利为仁和、海宁两域要区"[1]。为调节水利设有六堰六闸：

汤家堰——在临平镇西北十里；

梅家堰——在临平镇中；

费仁堰——在临平镇东二里；

吴家堰——在临平镇东三里；

施家堰——在临平镇东四里；

水汰堰——在桐扣山下；

临平闸——在运河；

小林大闸——在仁和县十五都十七都界间；

小林闸——在小林；

临平湖四闸——临平镇南五里；

潘公闸——临平镇东龙兴桥西；

婆娑闸——在吴家堰东。

这些堰闸以及与运河相连的赤岸河、施家河、方兴河等，"农田灌溉利赖攸资，而舟楫往来，实为孔道"[2]。

虽然交通枢纽由临平转移到塘栖，但临平镇还是在发展之中。正如万历《杭州府志》比较宋明间市镇发展状况时所说："杭为水陆要冲，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所辏会也。自宋南渡来，市镇繁饶，颇闻宇内。近虽有消歇，然此衰彼盛，以实计之，倍蓰畴曩矣"[3]。从整个发展趋势看，市镇是在发展的，明代万历年间较之南宋鼎盛时代，市镇倍增，规模也在扩大。明代临平镇的税收颇为可观。

洪武十四年定临平税课局钱钞：

---

① 张大昌：《临平记补遗》卷二事记。

② 张大昌：《临平记补遗》卷二事记。

③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十四市镇。

11,596,413 文

永乐十年定临平税课局商税门摊挑贩渔课等钞:

257,102,990 文

定临平河泊所鱼户等钞:

240,603,380 文

成化十年定横塘临平税课局税办课钞:

942,901,077 文

万历六年定横塘临平税课局商税酒醋课钞:

942,901,770 文

折银　188.58 两

遇闰加钞　84,604,727 文

折银　16.92 两[1]

从税收的渐次递增中,可以窥见临平镇经济的发展速率,到万历年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万历六年的商税酒醋课钞折银188.58 两中,商税占 165.00 两,达 89%,商税是临平镇税收的主体部分。

临平镇经济主要仰赖于蚕丝贸易。成化《杭州府志》说:"海宁、仁和上塘蚕丝,于临平市贸易居多"。临平山还出产条桑、甘蔗、芡(鸡头)[2]。

明末清初人沈谦说,临平镇"地不满十里,户不满万人"[3];晚清人俞樾说,临平镇"东西不过三里,南北不过二里"[4]。规模不算大,却颇为繁荣,有清一代,人材济济,俞樾称之为"国朝二百年来史翰林之故里,孙文靖之旧居",俞樾本人从四岁即由德清旧庐迁

---

① 沈谦《临平记》卷二事记第二。

② 张大吕:《临平记补遗》卷三附记。

③ 沈谦:《临平记》卷一事记第一。

④ 《临平记补遗》卷二事记。

居此镇。咸丰三年太平军至临平镇，"纵火三日"，"大乱之后，新蹊故术，都不可辨"[1]，临平镇就此日趋衰微。

①《临平记补遗》卷首俞樾序。

第十章　嘉兴府典型市镇概览

三十五、濮　院　镇

濮院镇，南连长水，北枕运河，距秀水县西南三十六里，界于嘉兴县、秀水县、桐乡县之间，适当嘉兴县长水乡、秀水县灵宿乡、桐乡县梧桐乡三乡之会。按宣德五年分嘉兴县之西鄙八乡为秀水县，崇德县之东鄙六乡为桐乡县，是以濮院镇西南为桐乡县梧桐乡，东南为嘉兴县长水乡，东北为秀水县灵宿乡。清代因袭，濮院镇仍为嘉兴、秀水、桐乡三县属地。光绪七年又划入嘉兴县嘉会乡地。宣统初年，划分自治，以濮院镇所属嘉兴县地划入王店区，濮院镇成为秀水、桐乡两县属地；宣统三年，秀水县并入嘉兴县，濮院镇遂为嘉兴、桐乡两县属地[1]。

濮院镇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东北至嘉兴府城三十六里，西至桐乡县城十八里，东南至王店镇十八里，东南至硖石镇四十里，北至新塍镇二十六里，西南至屠甸镇十九里，西北至乌青镇三十二里。此镇形成的时间虽不长，但到明中叶已经是可以同王江泾镇相比美的"人可万余家"、"商旅辐辏"嘉兴巨镇之一了[2]。

历史时期这里"汪然悉为巨浸"，西有石门堰，北有陡门堰，悬流屈级而下，水路设闸启闭，陆路置栈通行，并不具备后世那种"环

---

[1] 民国《濮院镇志》卷一疆域附沿革。

[2]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渚曲流，阡陌交通"的有利地理条件。北宋时代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草市，叫做御儿市。宋高宗南渡，曲阜濮凤（著作郎，字云翔）扈从至浙，卜居于此，其六子俱膺显爵。庆元初年，濮氏谢政归里，诏赐其宅第为"濮院"。淳祐、景定以后，濮氏一族进入仕途者寥寥可数，转而致力于经营家业，"督课农桑、机杼之利"[1]。元大德十一年，濮氏在市中构居开街，立四大牙行，召民贸易，收购四乡各机户所产丝绸，招徕远近商贾，此地便以永乐市闻名。据传，称永乐市的原因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无羁泊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2]；或曰"宋末蚕织日盛，元时，明亡公捐金置舍，以便贾者，贾人鳞集，因以永乐称之"[3]。

永乐市兴起后，"市业日盛"，从皇庆到至顺年间（1312—1333年），永乐市已成为"寺观崇隆，园庄环绕"的大市了。它东临大街，南北俱为横街，西则义路街，绕濮氏居宅四周[4]。故至元《嘉禾志》所载市镇中有永乐市，指出它属嘉兴县，位于县城西南二十七里[5]。明陈邦献《濮川八景诗序》追述濮院镇的兴起说："槜里之西南壤曰濮川，初本荒落。元时有豪右濮氏，其富不赀，雄于一郡，居民咸聚而依之，以贸迁成市……夹川之畔，比屋鳞次，巨梁虹驾，轻烟旭日，往来憧憧者则市桥"[6]。万历十九年秀水知县李培撰《翔云观碑记》，盛赞其时濮院镇之繁荣，"迩来肆廛栉比，华厦鳞次，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锦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焉集"；还特别指出："往亦嘉禾一巨镇也"[7]。万历《秀水县志》也称，

---

①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 · 开镇源流。

②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 · 开镇源流。

③ 《濮川所闻记续编》卷一坊巷

④ 《濮川所闻记续编》卷一坊巷引《濮氏家乘》。

⑤ 至元《嘉禾志》卷三镇市。

⑥ 《濮川所闻记》卷四文。

⑦ 《濮川所闻记》卷四文。

"濮院镇,在县西南三十里","人可万余家"[1]。

从至元《嘉禾志》所记载的永乐市,到万历《秀水县志》所记载的濮院镇,其间经历了巨大的发展:由市上升为镇。元代它还是一个小市,到明代已一跃而为居民万家、商旅辐辏的大镇。

然而,这一转折究竟发生于何时,亦即濮院镇成于何时,却是一个费周折的难题。嘉兴府志、秀水县志、桐乡县志、濮院镇志均无明文记载。康熙《桐乡县志》说濮院镇"元大德间名永乐市,濮氏构居开街,召民贸易,遂因以名镇",似乎濮院镇建于大德年间。近人张文镐《濮川地理史》则说,"元至大后,机业日盛,客至益多。昔者聚落遂以成镇",似乎濮院镇建于至大年间。二说都嫌过于武断,按大德即成宗年号,在1297—1307年间,至大为武宗年号,在1308—1311年间,若大德、至大时已成镇,何以元末至元年间(1335—1340年)所编至元《嘉禾志》中不见濮院镇,仅见永乐市?从至元《嘉禾志》仅载永乐市而不载濮院镇这点,可以判定,直至元末,还未见濮院镇的建置,其地仍为永乐市。

《濮川所闻记》虽有"开镇源流"一节,但开镇究于何时,仍语焉不详。从其所云"自建炎己酉(1129年)至是,濮氏之盛二百六十余年",大体可以推定,濮院镇约建于洪武后期。这时濮院镇已成为"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资云集"的大镇了[2]。这一推论与万历《秀水县志》所说正好相合:"濮院镇,在县西南三十里,元至正间有族濮鉴一姓。迨本朝,濮氏流徙他卜,居者渐繁,人可万余家,因以濮院名镇"[3]。

濮院镇的兴起与发展,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江南水乡河道纵横交叉,市镇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必然形成于水网之

---

[1]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2] 《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

[3]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中,并且凭借水道与四乡、邻镇连成一片,而趋向繁荣,濮院镇当然也不例外。濮院镇的河道发源于天目山,由余杭至运河。大致一镇之水从东北、西北两路而来,总汇于东南而去,环抱一镇,支流萦纡,舟行盘旋,四通八达。主要河道是运河,位于镇北六里,自余杭至石门镇入桐乡县界,东流经皂林,又东经永新泾、妙智泾各口至正家泾,入秀水县界。其次为庙桥河,在镇中,上承西市河、北市河之水,东流经庙桥达新桥漾,为全镇东西往来必经之水道,亦为秀水、桐乡分界河。镇中心有东市河、南市河(即梅泾)、西市河、北市河相交,构成十字港,为闹市所在。此外有庄泾,庄泾两岸原系濮氏庄屋所在;梧桐泾,系濮院至桐乡县城之水道[1]。濮院镇凭借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而日趋繁荣,伴随繁荣而来的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使河道超负荷运输,又不加疏浚,至清中叶以后镇上市河渐趋狭隘。乾隆时人杨树本在《濮川琐志》中说:"前朝镇中河路甚阔,且多纡曲小浜,地势灵动。今为两岸民居填塞狭隘,大非古昔"。到清末民初,河道淤塞更趋严重。近人张文镐《濮川地理史》说:"旧时舟行可以四旋绕,今永乐市河久湮,而庙桥港两岸又为民屋侵占。血脉既滞,商务因以减色"[2]。

濮院镇在它的鼎盛时代,不仅河道四通八达,而且街巷密布。镇上街巷依旁河道而行,早在元代永乐市形成之时,就已有庙桥街(即大街)、南横街、北横街、义路街四大街道。据《濮氏家乘》载,"永乐市,东临大街,南北俱为横街,西则义路街也,"绕濮氏居宅之四周"[3]。其后,人们径直称大街(即庙桥街)为永乐市,也就是濮氏家族元代开设四大牙行的所在,"收买土绢,以待四方客贩,濮绸

---

[1] 《濮川所闻记》卷一水道。民国《濮院志》卷四河渠。

[2] 民国《濮院志》卷四河渠。

[3] 《濮川所闻记续编》卷一坊巷。民国《濮院志》卷五古迹。

之名遂著"[1]。

此外还有卧龙街、集庆街、鹤栖街、柳岸街、语儿街、横屋街、蜡作街等。其后又新辟了南新街、墩头上(南新街西市房梢)、花坛街、石条街、西河石路等。至清末,全镇共有街二十七条,主要有庙桥街、雷家潭街、北横街、大街、南大有街、卧龙街、义路街、南横街、集庆街等。还有花园弄、仓弄等十五条弄;严家汇、鱼行汇、船厂汇等八条汇;黄家湾等五条湾;礼门巷、太平巷等二条巷;水廊下、后河下二处;南埭、北埭二处;北廊栅、西廊栅二处;永乐里(永乐市河废为弄,甃石为里)一处[2]。由此可以看到濮院镇规模之宏大,足以使一般县城相形见绌。

镇街上牙行、店铺比比皆是。构成商业主体的是各种牙行,种类繁多,有绸行、丝行、桑叶行、烟叶行、六陈行、麻皮行等,大多资金雄厚,生意兴隆,控制了四乡农家与镇上居民的生产、经营,成为本镇经济盛衰的标志。

绸行,道光以后又称绸庄。镇上或四乡机户所产生绸由绸行收购,交付练坊练熟,然后转销于各地来镇购买的客商。绸行招接的客商,有来自附近城镇,也有来自闽、广、两湖地区,其中尤以京帮商人为多,故镇上绸行经济实力也以京行最强。乾隆时人沈廷瑞说:"其开行之名,有京行、建行、济行、湖广、周村之别,而京行为最。京行之货有琉球、蒙古、关东各路之异"[3]。可见即京行一帮,就将大批濮绸运销至琉球、蒙古、关东各地,如果加上建行、济行、湖广行,那么濮绸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行销全国了。光绪、宣统年间,濮院镇绸庄为扩大经营范围,纷纷前往苏州、上海设立分庄,

---

①《濮川所闻记》卷二地宇·坊巷。

② 民国《濮院志》卷二衢巷。

③ 沈廷瑞:《东畲杂记》。

"以便京帮客商之接洽者"[1],濮绸的生意仍十分景气。

丝行,分布于大有桥街、义路街、女儿桥街一带。农家养蚕缫丝后,抱丝售与丝行。每当新丝上市,丝行生意兴旺,"乡人抱丝诣行,交错道路。丝行中着人四路招揽,谓之接丝日,至晚始散"[2]。丝行所收购的丝,除转销给本镇机户外,大批销给苏州、杭州、绍兴、南京、镇江、盛泽各帮客商。每逢小满时,新丝开秤。此时农家最为繁忙,农谚有"小满动三车"的说法,即到了小满这一天,丝车、油车、水车一齐开动。濮院镇四乡农家丝车上所缫之丝往往供不应求,于是邻近地区也将丝拿到濮院镇来出售,甚至在它西南六十里的石门镇也是如此:"如客帮需货,而丝价提高,则远如石门湾等处乡丝亦麇集于镇"[3]。镇上丝行大多兼业绸行生意,而绸行也大多兼收新丝,交于机户加工,称为"折丝"[4]。这种兼收新丝交于机户加工的绸行,不同于一般牙行,它不限于收购转卖,而与丝户、机户关系密切,并由商业经营扩大到产业经营,插手于机户生产的全过程;而这些机户成了它来料加工的场所。这种兼收新丝的绸行资本雄厚,"独资少而合资多",且"无不与钱庄通往来","每有以钱庄之款务囤积者,丝价日上,获利固丰"[5]。

桑叶行,设于镇东西南北四栅附近,以利船只进出。立夏后三日,新桑叶上市,各桑叶行开市收购,有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共三日,三市共九日;每日又分为早市、午市、晚市,市价一日三变。蚕户买叶不付现钱,待新丝上市后付清,称为"敲丝车钱"。道光时沈涛《幽湖百咏》其中之一便是关于叶市的:

---

①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② 杨蔚轩:《濮院琐志》卷六岁时。

③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④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⑤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青叶行开四市梢，
客船衔尾恣喧闹，
叶仙诗句今年好，
毕竟丝车容易敲。"①

绸行、丝行、桑叶行，构成了濮院这个丝绸专业市镇的基本特色，也是这个大镇经济持续繁荣的三大支柱。仅次于以上三大行业的是烟叶行、麻皮行、六陈行。

烟叶行，濮院镇西南乡盛产烟叶，人称桐濮烟。"乡人种此者利较桑麻尤厚"，乾隆以后种者渐多，成为大宗出产②。镇上西南市开设烟叶行，由江淮客商运销至江北各处。每当烟叶上市，各行于栅外揽收，在桥头、路口随地交易，喧哗如市，称为"出庄"③。

麻皮行，以收购麻皮为业务，多设于东市。

六陈行，经营米、麦、蚕豆、黄豆、杂粮，兼业米铺，有输出，也有输入。濮院镇四乡农家以蚕桑为主业，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耒"④；加之地狭人稠，"本地所出之米恒不足供本地之食，故必赖客米接济"⑤，六陈行所开米铺，起到了贩卖客米的作用。

濮院镇是以丝绸专业市镇闻名于明清两代的。早在宋代这里已是蚕桑之乡，南宋淳熙以后，经濮氏家族提倡，"树桑蚕织，轻纨素锦，日工月盛"⑥。元大德间濮氏设四大牙行，"收买土绢，以待四方客贩"，客商称濮氏牙行所卖之绸为濮绸。

---

①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② 民国《濮院志》卷十五物产。
③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④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⑤ 民国《濮院志》卷十五物产。
⑥ 《濮川所闻记》卷六杂识。

明代万历年间，丝织技术有所革新，使濮绸制造业有了很大的进展，无论在数量、质量上都较前更胜一筹，正如张文韩《濮川纪略》所说："明万历间，改土机为纱绸，制造绝工，濮绸之名遂著远近，自后织作尤盛"。入清以后，濮院镇的丝织业持续地兴旺发达，"以丝绸为大宗出产，阖镇生计系焉，业机工者以千计"[1]。对此种盛况，史籍记载屡见不鲜：

康熙《桐乡县志》说："（濮院镇）万家烟火，民多织作绸绢为生，为都省商贾往来之会"[2]；

雍正《浙江通志》说："嘉锦之名颇著，而实不称，惟濮院所产纺绸，练丝熟净，组织亦工，是以一镇之内坐贾持衡，行商麇至，终岁贸易不下数十万金，居民藉此为利"[3]；

乾隆《濮镇纪闻》说："吾里机业十室而九，终岁生计，于五月新丝时为尤亟，富者居积，仰京省骠至陆续发卖。而收买机产，向传设市翔云观，后则俱集大街，所谓永乐市也。日中为市，接领踵门"[4]。

嘉庆以来，机户沈氏家族（沈周望后裔）驰名各地，所织之绸质地精良，"凡贾客买绸者必以沈氏为贵，故不曰濮绸，而必曰沈濮"，道光时，"不曰沈濮，而径名曰沈绸"[5]。道光以后，濮院镇参仿湖绉制作工艺，生产濮绉。至清末，参用铁机纺织，生产铁机绉[6]。

濮院所产纺绸，练丝熟净，质细而滑，且柔韧耐洗濯，故名重远近。著名文人万斯同有《竹枝词》一首吟咏道："独喜村村

---

① 民国《濮院志》卷九任恤。

② 康熙《桐乡县志》卷一市镇。

③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物产。

④ 《濮院纪闻》卷首总叙·风俗。

⑤ 沈涛：《幽湖百咏诗注》。

⑥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张文镐：《补庐随笔》。

蚕事修，一村妇女儿家休，织成广幅生丝绢，不数嘉禾濮院绸"[1]。卢存心《嘉禾杂咏》也对濮绸赞颂备至："宋锦人传出秀州，清歌无复用缠头，如今花样新翻出，海内争夸濮院绸"[2]。

濮院全镇就是一个丝绸机户聚集之地，镇民大多操此为业，这是它不同于其他丝绸专业市镇的一大特点。乾隆时人杨树本说："他邑之织多散居，濮院之织聚一镇，比户操作"[3]。镇民大多是身怀专业技艺的丝织工匠，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焉"[4]。镇上街巷，"接屋连檐，机声盈耳"[5]。机户从事丝织，分工极细，从丝到绸，经过络丝、摇纬、牵经、运经、刷边、织手、拽花几道工序。所用木机长二丈许，织者两手持梭左右掷，两脚相继踏竹轴，轧轧有声，轻绸每日可织一匹，重绸每三四日可织一匹。织成后，出售于镇上绸行，必须由称为"接手"者居间介绍，每出售绸一匹，接手收取"用钱"银一分或一分几厘不等。绸行大多于中午时分赴市收绸，称为"出庄"。绸行中有善看绸之优劣者，称为"看庄"。归行后再行复按，称为"复庄"。绸行雇人修剪丝头未净者，称为"修绸"。绸行处理完毕后，交付练坊，练坊对生绸煮、沤、曝、灸，使之由生变熟，然后"各以其地所宜之货售于客"[6]。

濮院镇的丝绸业深深扎根于四乡农家的蚕桑丝织经营的土壤之中。四乡农家经营的重心集中于蚕丝业，而以稻作为

① 《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

②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③ 《濮院琐志》卷一机杼。

④ 《濮院琐志》卷一机杼。

⑤ 《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

⑥ 《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

副业，蚕事繁忙时，田事常雇佣石门、桐乡农民相帮，这种新型的经营方式，是其他地方所罕见的。它是农业经济中商品化成分不断增长的结果，也是农家经营依赖市镇经济的产物。沈廷瑞《东畲杂记》说：

> "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

近镇人家多把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作为经营中心，经济收益大于以稻作为主的农田经营。明清之际桐乡人张履祥《补农书》对"蚕桑利厚"作过估算，他说："田极熟，米每亩三石，春花一石有半，然间有之，大约共三石为常耳。地得叶盛者一亩可养蚕十数筐，少亦四五筐，最下二三筐，若二三筐即有豆二熟"；"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①]。由此可见，养蚕栽桑的收入可达种粮收入的四五倍乃至十几倍，最低也在二三倍左右。经济收益之悬殊，是濮院镇四乡农家"多业机杼"的重要原因。濮院镇号称"日出万绸"，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那些以机杼为业的农家生产的。在农家经营商品化日甚一日的农村，这种经营方式所标志的农业经济的新变化，是维持市镇商品经济繁荣的重要前提。

高度商品化的丝织业日趋发达，各地对濮绸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杨树本《重浚龙潭碑记》说，濮院镇"日出万绸，甲于他镇"[②]；沈廷瑞《东畲杂记》说："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港，皆务于织，货物益多，利亦益旺，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③]。如此巨大的产量不

---

① 《杨园先生文集》卷五十，《补农书》。

② 民国《濮院志》卷四河渠。

③ 民国《濮院志》卷十四农工商。

可能单纯依靠个体劳动的家庭手工业方式来达到，以雇佣劳动和细密分工为特征的手工作坊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优越性。

从个体经营的机户中，分化出一些富裕机户，多购织机，雇佣机工，组成了手工作坊。康熙时，"织业最盛，由此致富者甚众"[1]。他们拥有较多的织机和较雄厚的资本，采取作坊形式经营，雇佣各种工匠。镇上每天都有大批待雇者——出卖劳动力的工匠，太平巷就是雇工集结地点。《濮川所闻记》说："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出正道。阖镇织工、拽工，每晨集此以待雇"[2]；《濮院琐志》说：镇上工匠"或遇无主，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女工多工络丝，每一两给钱三文，近则倍之，一日所获可以自给"[3]。由于雇佣劳动盛行，丝织工匠分工越来越细，有络丝、织工、挽工（拽工）、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接收、修绸、看庄，各种工种都有待雇者，"或人兼数事，或专习一业"[4]。分工如此细密的雇佣工匠的精湛技艺，使各手工作坊所生产的濮绸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地精良。

以练绸为业的练坊，完全是手工作坊形式，"每坊佣者数十人，名曰练手"[5]。这些练手都是雇佣劳动者，如同被雇佣的织工、拽工一样。

由此可见，市镇作为一个商品经济中心，不仅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而且还为雇佣劳动这种新型生产关系的孳生提供了温床。这从濮院镇的丝绸行业中充分显示了出来。

濮院这个丝绸专业市镇的特色还体现在丰富多采的民间

---

[1] 《濮院琐志》卷一机杼。

[2] 《濮川所闻记》卷二地宇·坊巷。

[3] 《濮院琐志》卷一机杼、卷七杂流。

[4] 《濮院琐志》卷一机杼。

[5] 《濮川所闻记》卷三织作。

风俗之中,一些流传甚久的习俗几乎都与蚕桑相关。

正月间,里巷醵钱举办"田柴之会",祭祀田祖、蚕花诸神,巫者唱神歌侑神,入夜放爆竹、花筒,夜阑送神,焚烧田柴。

三月初三日,晴主蚕熟,育蚕家贴门神,闭门不炊,亲戚朋友不相往来,揉草头和粉,作青白色茧圆,以祀蚕花诸神。当地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描述万历三十八年三月三日"濮院镇醵酒为神会"事,热闹异常:

> "结缀罗绮,攒簇珠翠,为抬阁数十座,阁上率用民间娟秀幼稚装扮故事人物,备极巧丽,迎于市中。远近士女走集,一国若狂。"[1]

另一当地人谢天瑞《鹤林玉露补》记载康熙十七、十八年濮院镇佑圣会之盛,有言道:

> "碎翦锦绮,饰以金玉,穷极人间之巧,糜费各数千金,舾舟万计,男女咸集,费且无算。"[2]

清明日,乡人每圩各装一船为划船会,用松毛作棚,船中鸣锣鼓,一人,椎髻行簪花,作蚕妇妆,先翻叶仙诗,卜叶价高下;次为把蚕称茧缫丝等事,以卜蚕丝丰歉;又一人作田头装,以卜田岁之丰歉。划船数十,往来如织,士女棹舟往观甚众,谓之闹清明。

小满日,动三车:丝车、油车、水车。家家闭户,谓之"蚕关门",至采茧时亲戚问遗,谓之"蚕开门"。待"新麦新丝同出场,做丝做麦一齐忙"时,已届五月初五日的端午节,店肆并揭账单,赴乡收账,谓之"蚕罢账"。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有盂兰会、水陆道场、翻经会,乡人以为此种神会有"利于蚕花"之功效。

---

[1]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2] 民国《濮院志》卷六风俗。

十二月十二日为蚕生日，养蚕家腌蚕种，屑秫为茧圆，以祀灶。

每逢节日，全镇与蚕桑、农事、商事相关的庆贺活动之热闹豪华，体现了濮院镇的经济活力与勃勃生机。繁荣的经济滋润了这块土地，使它成为一个经济中心，也成为一个文化中心。人文蔚起，使这个市镇不仅具有经济方面的功能，而且具备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功能。有明一代，濮院镇出了九个进士，仅万历一朝就有五个进士。万历十一年进士岳元声为其中佼佼者，为官清正强项，罢归后聚徒讲学于天心书院，以毋自欺为主，著有《潜初子集》、《淡漠集》[1]。入清以后，士风仍盛，顺治至乾隆间，进士及第者七人。镇中有乡约所、梅泾义学、濮镇义塾，翔云书院。嘉道以后，"文风渐衰，然士之列庠序者尚有百人，自遭逆扰死亡居半，克复后益以新进，尚有六十人，而士风不振，文义支离"[2]，大不如昔。

濮院镇繁荣昌盛的经济命脉是丝绸业，明清二代濮绸的畅销全国市场，使它成为富甲江南的名镇。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濮院镇的丝绸业日趋衰落。当时，"农产品价格低落，丝茧尤甚，农村经济不振，尤以米茧两业为多"[3]。由此引起链锁反应，桑叶价格惨跌，叶行见无利可图，相率停业。蚕户以高利借贷作为育蚕资本，莫不亏折，纷纷弃蚕种稻，视蚕桑为畏途。鲜茧产量因而一落千丈，三十年代初已不及二十年代初的三分之二乃至二分

---

[1] 《携李往哲续编》、《濮川所闻记》卷三人物。

[2] 民国《濮院志》卷八教育。

[3]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63—64页。

之一[1]。濮绸向为嘉兴特产，颇负时誉，销路亦佳，"近年营业凋落"[2]。

二十年代末的调查表明，濮院镇织绸机户已减少至八十五家，有织机一百余架，固定织工仅三十七人，闲散织工三百余人[3]。这闲散织工，实际上就是因经济萧条而失业的雇工。由于机户的大量减少，造成濮绸产量的锐减，濮院镇不再具有鼎盛时代那种丝绸专业特色了，这从镇上商业分布情况中可以显示得一清二楚[4]：

商业种类	商店数	资本额(元)
洋广杂货	2	100,000
水果行	2	?
米行	2	4,000
黄麻号	2	6,000
酱园	1	20,000
茧厂	1	4,000
小米店	7	1,400
茶馆	15	450
酒店	6	240
川酱店	3	240
饭店	8	320
羊行	1	?
铁店	3	150

---

[1]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40—43页。

[2]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57页。

[3] 《嘉兴新志》(上海，1929年)上编，第87页。

[4] 《嘉兴新志》上编，第81—82页。

棺材店	1	?
糖果店	3	90
染坊	4	320
旅馆	1	?
腌腊店	1	100
船厂	1	8,000

这时的濮院镇，丝绸专业市镇的特色大为消褪，消费性逐渐大于生产性。不过作为一个商业中心的功能仍然明显地保持着，镇上大小店铺还有六十余家，织绸机户也还有几十家，此外还有碾米厂二家、造纸作五家、养蜂场二家；另一方面，与东北的新塍镇、南面的王店镇、西北的乌镇、西面的桐乡县，每日均有轮船航班来往[1]。但是，在随后的一二十年间，农村商品经济遭受到各种打击、破坏以及人为的阻挠，才使濮院镇一蹶不振。

三十六、王　店　镇

王店镇位于嘉兴县南三十六里，有梅溪自西向东沿围三里，故其地称梅会里或梅里。它兴盛于明中叶。《乐郊私语》说：

"王店镇，有工部尚书王逵者世居大彭都官滩里。自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尚书公子曰令安、孙曰延福，皆成进士，簪缨相继，而王店日渐殷庶，遂成巨镇。"[2]

《梅里志》在述及王店镇的沿革时指出："梅里在嘉兴县南

[1] 《嘉兴新志》上编，第81～82页。

[2] 康熙《嘉兴府志》卷十六外纪引《乐郊私语》。

三十六里，大彭、嘉会二都之间，市曰王店……物阜民康，为县南一巨镇焉。……植梅百株，聚货市易，今称梅溪，亦曰王店"[1]。《梅里志》引用了至元《嘉禾志》，似乎认为王店在元代已成为嘉兴县的大镇。其实这是一个谬误。细查至元《嘉禾志》，元代嘉兴路所属嘉兴县有二镇三市：

魏塘镇——在县东三十六里；

白牛镇——在县东北六十里；

陶庄市——在县北；

新城市——在县西二十七里；

永乐市——在县西南二十七里[2]。

嘉兴县南当时并无王店镇（或王店市）。《梅里志》给人以王店建镇于元的印象，不能不说是作者们的疏忽所造成的谬误[3]。至元《嘉禾志》并不称大彭都、嘉会都，而称大彭乡、嘉会乡，乡下辖里，梅会里属大彭乡、嘉会乡兼辖。《嘉禾志》载，大彭乡在县南一十里，管里曰：朱塔、刁村、陈浦、梅会；嘉会乡，在县南一十二里，管里四：鲁奥、梅会、朱巷、张满[4]。此处的梅会里，即后世的王店镇。由此可以获得较明确的结论：直至元末，王店镇还未形成，其地仍属乡村，称为梅会里。它的兴盛是在明代中叶。

对此，《嘉兴新志》说得很清楚："王店镇……其地始于明代开辟"；"王店镇一名梅会里……明中叶渐盛，民物殷阜，俗尚淳朴，已成一巨镇"[5]。由于这个缘故，王店镇的建置最早见

---

[1] 《梅里志》卷一沿革。

[2] 至元《嘉禾志》卷三镇市。

[3] 《梅里志》系乾隆时杨谦纂，嘉庆时李富孙补辑，光绪间余懋续补。卷一沿革部分系杨谦原纂。

[4] 至元《嘉禾志》卷三乡里。

[5] 《嘉兴新志》上编，第58—59页。

于万历《嘉兴府志》,该镇与新丰镇、新行镇、钟带镇同为嘉兴县四镇之一①。

王店镇位于嘉兴县南三十六里,东至曹王庙十四里,东北至石佛寺二十里,西南至屠甸镇二十里,西北至濮院镇二十里,南至硖石镇二十里②。

镇中市河(即梅溪),绵亘三里,为长水之支流。长水自东南来,由硖石北流二十里至王店镇,至庆丰桥支流折向东,为市河,又称梅花溪。明初,"人烟未聚,两岸皆梅花";入清以后,市廛兴盛,"民居稠密,夹岸无隙地"③,不再具有梅花溪的景观了。

明代万历以前,西镇居民寥落。至万历间,李继泉占地十一亩,建造市屋(店铺等商业用房)六十间。其后建造市屋之风益盛,除六十间外,还有四十二间、三十二间等,至此,"里西渐成市镇"④。南为猪行街,北为菜蔬街,过东大街为人烟辏集之所。全镇有庆丰坊、卖鱼坊、梅溪坊等三十六坊,系居民聚住区。构通大街的还有二十三条巷、十一条弄⑤。

王店地处水乡,河道交错。镇中长水与市河丁字相交,镇为丁字港格局。纵横皆有桥梁,以通津渡。横跨市河沟通南北的桥梁有十一座,横跨长水沟通东西的桥梁也有十一座,故有"横十一,竖十一"的谚语。主要桥梁往往就是闹市所在,例如:

塘桥——即庆丰桥,明成化年间建。横跨长水,位于西塘口,与镇西嘉会乡各村相联,为西路入市之门户。桥堍即为闹

① 万历《嘉兴府志》卷二城池。

② 《梅里志》卷一疆域。

③ 《梅里志》卷一山水。

④ 李遇孙:《天香录》,见《梅里志》卷二坊巷。

⑤ 《梅里志》卷二坊巷。

市，"人烟栉比，皆纷至贸易，远近商贾往来于是桥者，日数千人"[1]；

东环桥——一名众安桥，元至正年间建，康熙十二年重修。横跨市河，为南北往来要津；

丫髻桥——横跨长水，在镇之正中，桥东西两岸皆妓馆。明代"隆万间为极盛，珠廉对卷，翠幕低垂，琼树流芳，渌波照影"；"烟柳夭桃，朱阑水鸟，景极清媚，妓楼歌馆，影照半溪"[2]。

明代万历至清代乾隆间，王店镇盛极一时，号称"万宅烟火"[3]。镇上经济极为发达，"物产之利首推纱布，而蚕丝之广不下吴兴，户勤纺织，人多巧制"[4]。

纱布有冻绿布、水纺布、黄纱布。冻绿布用椤椤煎水染成，镇中所产最佳。水纱布，即白棉花布，光如冰雪，有莲机、凤机、东机、雪香、紫香、轻云、银花、唾线、霜线等品种。黄纱布即黄纱梭布，系王店特产，他处无能织者。王店纱布行销于苏、松、衢、婺诸府，远及关东，镇上"商贾辐辏，收买无虚日"[5]。余懋《梅里杂诗》云：

"木棉生计抵桑麻，
小店黄纱布独夸，
红出芦帘茅屋里，
一星灯火夜弹花。"

王店的褚绸与画绢远近闻名，号称"王店褚绸为最，画绢

---

① 《梅里志》卷二桥梁，道光二十二年李富孙：《重建梅里庆丰桥碑记》。
② 《梅里志》卷四桥梁引《春风录》、《天香录》。
③ 《梅里志》卷十六碑刻，《嘉邑林侯德政生祠碑记》。
④ 《梅里志》卷七物产。
⑤ 《梅里志》卷七物产引《春风录》。

亦甲于天下"[1]。褚绸为明万历间褚叔铭的创制，名重当时，清代仍传其业。薛机绸、诗笺也堪称精品。

清末王店物产仍很驰名，四乡所产小布、蓝格布、五色丝线、绿丝、花绉、绵绸、布袜等，均负盛名，行销各地[2]。郭维垣《梅里诗》云：

> "黄纱小布最驰名，
> 捆载商船处处行，
> 夜火织成千百匹，
> 一齐入市待平明。"[3]

仅次于黄纱小布的是花绉，出产于镇西北泰石桥及门堂村一带，多系乡民农闲时操机织成，运往濮院镇销售[4]。

王店烟户极盛，号称大镇，农商饶裕，士习诗书。时人常把嘉兴王店与湖州南浔相提并论，其共同点就在于经济繁荣、人材荟萃，"几与名都会相埒，辟左之行省莫逮焉"[5]。仅三里许的镇上，明清两代士大夫构筑的园亭栉比鳞次，有四十二间廊后的"在我园"（明李曙岩筑），徽州场后的"蕉园"（明李应征筑），镇东的"秋亭"（明郑公延筑）；清初所筑"梅墅"（又名南园）、"寻壑"、"苹园"、"浣花居"等都是士大夫宴息之所；尤其著名的是康熙年间朱彝尊所筑"竹垞"及"曝书亭"[6]。市街上茶楼酒肆备极豪华，期堂寺后的庆丰酒馆、寺西的绀峰酒馆、石桥港西南的酒肆，都生意兴隆，顾客满堂。

咸丰年间以后，王店镇大不如前，到光绪末年衰落尤甚，

---

①《梅里志》卷七物产。
②《梅里备志》卷二物产。
③《梅里备志》卷二物产。
④《梅里备志》卷二物产。
⑤《梅里志》卷七旧闻，李详：《浮溪诗征序》。
⑥《梅里志》卷六园亭。

但还维持着昔日大镇的格局。镇上还有商店七百五十余家，其中茶楼酒肆居其小半。此时王店镇已从先前的生产性市镇蜕变为消费性市镇，“徒长消耗，容游惰，以视他处之百货骈殖，绝少茶庵者相越远矣”，故时人常有如此之感叹：“今王店已为著名最贫之镇”[1]。民国初年的王店镇，凭借着它那沪杭铁路一小站的特殊地位，而仍得以维持。市街长约四里，有朱合兴碾米厂、潘雅化碾米厂、兴记碾米粉厂、大有第三蚕种制造场、电灯厂等；另有南货店十一家、洋广货店三家、小杂货店二百七十家、茶馆六十五家、烟纸店五十家、酒店三十五家、点心店三十一家、糖色店二十二家、腌腊店十五家、豆腐店八家、棺材店八家、旅馆六家、面馆六家、其他各色小店二十六家，仍然是附近农村的商业中心[2]。

三十七、王 江 泾 镇

王江泾，一名闻川，界于秀水、吴江两县之间，原在运河之东，后徙于运河之西。近傍有雁荡（又称雁湖），号称“控引漕河，吐纳雁荡”，“地当孔道，自来兵事必争”[3]。

五代时，有闻人氏居此。宋代，“簪缨弗绝，而闻川之名以著”[4]。由于商贾往来方便，形成闻川市。后有“巨姓王氏、江氏建房贸易于此”，遂改名为王江泾市[5]。故《闻川志稿》说：

---

[1] 《梅里备志》卷七风俗。

[2] 《嘉兴新志》上编，第59—60页。

[3] 宣统《闻川志稿》卷首，沈云桂：《闻川志稿序》，唐映孙：《闻川志稿自序》。

[4] 沈云桂：《闻川志稿序》

[5] 《闻川志稿》卷二古迹 名胜。

"宋始有闻川市，元称王江泾(市)，皆以姓氏得名"①。

闻川市旧址，在王江泾镇东南近运河塘岸接战港一带，亦称闻店坊②。后人有怀古诗曰：

"接战港口春草萋，
莫家村树有鸟啼，
岂知前代肩摩处，
此日繁华让水西。"③

闻川市旧址清代已不可寻，闻店坊则仍在长虹桥以北运河塘岸闻店桥两侧，后人说此即"古闻人氏设设肆处"④，也就是闻川市所在地。

明代初年，王江泾商业日趋兴盛，居民骤增，由市升为镇，称王江泾镇。宣德初，析置秀水县，镇由嘉兴县划归秀水县，其地属永乐乡北境及思贤乡，"旧为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镇"⑤。由于"镇当要冲，闤闠殷阗"⑥，而日益繁荣。嘉靖年间总督江浙闽军务张经遣部将俞大猷在此大破倭寇，王江泾镇之名赫然震动海内。万历年间，王江泾镇已经成为居民七千余家的丝绸业大镇：

> "王江泾，在县北三十里。永乐乡旧有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镇。居者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多儒，登贤者数有之。市设巡检司，司有乡兵数十辈，名为巡盐，实则剽掠小船经运河中者……"⑦

---

① 唐映孙：《闻川志稿自序》。
② 《闻川志稿》卷三古迹·名胜。
③ 《闻川志稿》卷三古迹·名胜。
④ 《闻川志稿》卷二建置志·桥梁。
⑤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沿革。
⑥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沿革。
⑦ 万历《秀水县志》卷一舆地·市镇。

清初，王江泾镇进一步发展，到乾嘉时代已成"烟户万家"的巨镇[1]。镇民"多织绸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2]。嘉庆、道光间，丝绸业鼎盛，由"日出千匹"一跃而为"日出万绸"，当地人称："绸业极盛之时，有'日出万绸'之谚"[3]。

王江泾镇交通要道为运河，运河一称漕渠，长虹桥运河至镇南流，宽十七丈、深一丈余，稍北二十八丈，左为闻店桥，与市河交会。运河西滩筑堤为纤路，成为陆上通衢大道。此堤系永乐初年尚书夏原专所修，自苏州至嘉兴土塘七十余里，弘治八年改土塘为石塘。万历中疏浚陡门至王江泾段运河，堤岸甃石。镇中有市河，东经龙桥会夹河，折南出射襄桥，一支由太平桥东南流经百岁街，有会源、定中、万福、浔阳四桥，东经汛署前贯夹河，左会射襄桥北来之水，东出闻店桥，与运河会合[4]。镇中市河两岸有三条大街：

一里街——自射襄桥西至济阳桥；

丝行街——自浔阳桥北至定中桥；

百岁街——在会源桥西北[5]。

这三条大街是丝行、绸行及茶楼酒肆密集之处，商业繁华，人居稠密。与街相通的弄共有二十六条：李家弄、陶家弄、计家弄、万家弄、面店弄、箬店弄、堂楼弄、淘沙弄、金家弄、混堂弄、屈家弄、四店弄、桐油弄、当弄、横弄、财神弄、张家弄、钱家弄、牛窝弄、臭弄、钮家弄、大弄、小弄、鱼行弄、仓场弄、轿子弄[6]。这些小弄虽然短而狭，但因毗邻大街，也不乏商店铺肆，

---

①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沿革。

② 唐佩金：《闻川缀旧诗》。

③ 《闻川志稿》卷五食货志·农桑。

④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水道。

⑤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街坊。

⑥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街坊。

如鱼行、仓场、当铺、面店、混堂(澡堂)、桐油店、箔店等,从弄的名称上一望便知。

镇中居民集聚处谓之坊,共有十坊:闻店坊、射襄坊、济阳坊、浔阳坊、欢乐坊、万福坊、定中坊、会源坊、太平坊、郁家坊。另有高家埭(会源桥西比)、河西埭(浔阳桥西北)、南埭(即南木巷,浔阳桥东南)、三官埭(郁家桥西南)、河北埭(太平桥之北),也是民居、店铺集中之处[1]。

王江泾镇外围有村市若干,如南汇市,亦称长溪市,与嘉善县接壤,位于镇东十二里东露圩,市上除少量店铺外,还有文武阁、菜根庵、胜果禅院;又如盛家廊下,位于镇东北十三里中李圩,盛氏聚族而居,有雪窦庵、文昌阁,也有小店铺若干[2]。这些村市与王江泽泾镇连成一体,使王江泾镇的经济功能延伸到四乡一二十里之外。

王江泾镇全盛时,镇中祠庙寺观林立,有关圣庙(一名万寿庵)、莲花庵、云深庵、北社庙、东社庙、西社庙、金龙四大王庙、刘王庙、正阳庙、蚕花殿、医仙祠、施王庙、趺隐寺、流福寺、寿生寺、梵音阁、东禅寺、栖真寺、保安讲寺、观音阁等。此种格局,反映了王江泾镇当时丝绸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人丁的兴旺所带来的蓬勃生气。蚕花殿后来成为丝业公所,殿中祭祀蚕神,"遇小满日,业丝者刲牲奏曲以飨神"[3],显示出寺观与经济生活的密切关系。

这个丝绸业大镇的繁华局面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到咸丰年间,因太平军之役,使全镇"尽付一炬"、"闾里全毁",从此走向下坡路。"同治初,故老殚力招徕",收效甚微,至宣统时居

---

[1]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街坊。

[2]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村市。

[3] 《闻川志稿》卷二建置志·祠庙。

民才三百家，与昔日“烟户万家”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1]。镇志说，乱后居民“不及盛时二十分之一”，实在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估计，准确地说应该是不及盛时三十分之一。作为商业区的街巷大多未能恢复旧观，“仅一里街及丝行街之少半”略有市面，“余仍瓦砾”[2]。

同治末、光绪初，王江泾镇元气稍复，又成为丝绸业贸易中心，“洋商及镇江等处客帮来泾购买”者络绎不绝[3]。但终因破坏过甚，无力维持贸易中心的地位，清末的王江泾镇上的丝绸贸易逐渐移往邻近的盛泽镇。民国初年，王江泾镇“仅存一里街有市集，余均荒落”[4]。王江泾四乡农家“所产绸缎，多由盛泽转销”。因此王江泾镇虽然衰落了，但四乡农家的蚕桑丝织业仍继续得以维持。四乡约有机户千余家，绝大多数是每户拥有织机一台的个体机户，从事家庭手工业生产，“每机时开时停，平均每台每月约十三四匹，总计产量约十四万余匹”，与昔时“日出万绸”相比，产量大幅度下跌。这些机户所生产的丝绸，不再运往王江泾镇，而运往盛泽、上海，“由机户直销盛泽者约80%，经绸庄转销上海者约20%”[5]。

---

①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沿革。

② 《闻川志稿》卷一地理志·街坊。

③ 《闻川志稿》卷五食货志·农桑。

④ 《嘉兴新志》上编，第60页。

⑤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57页。

第十一章　湖州府典型市镇概览

三十八、南　浔　镇

位于太湖东南，运河穿越而过的南浔镇，明清两代隶属于湖州府乌程县，与苏州府、嘉兴府毗邻。由于其地盛产蚕丝，又具有蚕丝贸易中心的经济优势，使它持续兴盛数百年而不衰。全镇自东栅至西栅三里，自北栅至南栅七里，“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郁为巨镇”[①]。其规模之宏大、经济的发达及地位的重要，大大凌驾于县城之上，可谓盛极一时。

南浔镇历史悠久，兴起于南宋理宗淳祐年间。

镌刻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的祇园寺碑，即《浔溪祇园寺庄田记》指出：“城(按：指吴兴城)东有塘曰荻，不及三舍，有溪曰浔，在浔之北，有寺曰祇园”[②]。当时并无南浔镇，也无南浔这一地名，而叫做浔溪，故清道光年间范来庚修镇志时说：“在南宋时止称浔溪”[③]。南宋嘉泰年间编纂的《吴兴志》记载，其时吴兴管镇有六：乌墩镇、施渚镇、梅溪镇、四安镇、新市镇、和平镇，并无南浔镇[④]。当时浔溪设坊，称为浔溪坊，与石渚坊、谢村坊、旧馆坊、石桥坊并列，“系民户买扑，每月半纳坊名课钱”，而乌墩等四坊“系户

---

①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② 成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③ 道光《南浔镇志》卷一方舆志。

④ 嘉泰《吴兴志》卷十管镇。

部差官监造”，东迁坊“系州郡自开卖”，浔溪坊的规模比它们小得多[①]。

立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的《接待忏院公据碑》，已改称浔溪为南林，其碑文中说：“泽乡南林……一境系平江、嘉兴诸州，商旅所聚，水陆要冲之地”[②]。可见那时的南林已成为“商旅所聚”的繁华之地，其经济地位已开始引人注目。但当时仍未设镇。据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所立《安吉州乌程县南林报国寺记》所载，那时的南林仍是一个“聚落”，而不是镇；不过当时景况已相当繁富了：

> “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土润而物丰，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贾之所萃。”[③]

“行商坐贾之所萃”——实际上南林已初具市镇规模了。然而从这个碑记看来，其时仍未设镇，碑记中说：“官未尝讥征”，即官府还未在南林派出吏员在此征税。可见南林是成为富甲浙右的商业中心在先，而设镇在后。

南宋咸淳六年(1270)所立《嘉应庙敕牒碑》的碑记引述了“承节郎监安吉州南浔镇事陈荣状，”首次出现“南浔镇”的字样，据它的描绘，当时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商贾辐辏”[④]，显然初具巨镇规模了。值得注意的是，该碑记说，“今创镇几二十载”一句，明确提供了南浔镇设立的时间，按度宗咸淳六年为1270年，上溯二十年，即1251年，当为理宗淳祐十一年。由此可知，南浔镇建于南宋淳祐年间，是大致可以断定的。

上述碑记中所说的安吉州，即湖州(宝庆二年改湖州为安吉

---

① 嘉泰《吴兴志》卷八公廨·乌程县。

②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③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④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五碑刻一。

州)；承节郎，是武官官阶，秩从九品；监镇事，即《守史》中的监当官，其职掌是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随事置官，文武皆可差充。监镇官是主管一个镇的小官，主烟火兼征商税，陈荣则是南浔建镇后最早的一个监镇官。

南浔镇兴起后，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它很快成为乌镇并驾齐驱的乌程大镇。当时市街在运河南岸，元末张士诚起兵反元，至正十六年修建城墙，至元二十七年重修，城墙周长一千六十六丈五尺，高三丈，宽一丈[1]。明洪武三年拆南浔城，以其砖石修筑苏州城，"基址尚存，约周三里"[2]。拆城后，代之以栅，建东西南北四栅，东栅、西栅皆有吊桥，又有城隍。南浔建城的目的在于"扼运河孔道"，拆城以后，"市井渐移而北，遂以通津桥为中市"[3]。通津桥是南浔镇的中心，横跨运河，周围是商业区。这样就形成了明清两代南浔镇的基本格局：自西而东的运河与自南而北的市河相交，构成一个十字港，十字港四周有通津桥、清风桥、明月桥相连，运河及南北市河两岸是通衢大街。主要街道有：

大街——即东栅上塘，东至新桥闻涛阁前，西至清风桥；

寿星街——即西栅上塘，东至清风桥西至务前（务前，在西栅上塘寿星街西首，元明税务署所在地）；

爆场街——即北市河东岸，南至清风桥北至天带桥；

丝行埭——位于十字港南首，南市河东岸，北至明月桥南至东交界坝桥一段，是全镇丝行集中地；

米廊下——位于十字港西，务前对岸，即西栅下塘，东至丰年桥西至垂虹桥一段，乡人俗称米棚下，是全镇粮食贸易中心。张镇《浔溪渔唱》曰："才听三春布谷鸣，又过八月获香粳，年来杵臼村村

---

[1]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七碑刻二，无名氏：《南浔重修城记》。

[2] 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3] 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闹，赢得冬春入米棚”，所描绘的就是米廊下的情景：“乾隆以前此地米市最盛，故得此名”，道光以来，“米市移于西木行”，米廊下“但有瓷器列肆”，“吴中卖花者至辄聚此”[1]；

树行埭——即西栅下塘，东至沐凰桥西尽西栅；

西木行——东至北栅椿桥西至西栅永安桥，道光以后为全镇米市所在。

由于这些街道分布在运河、北市河、南市河沿岸，位于十字港正中的通津桥就成为全镇的水陆码头、商业中心。此桥建于宋代，原名浔溪桥，俗名大桥。曹仁虎《浔溪竹枝词》吟咏此桥：

“红蚕上簇四眠过，
金茧成来欲化蛾，
听道今年丝价好，
通津桥口贩船多。”[2]

邢典《南林杂咏·通津桥》吟道：

“万户周遭见，
千艘日夜通，
至今碑是口，
重建有时公。”[3]

据潘尔夔《浔溪文献》记载，嘉靖、隆庆以来，南浔镇日趋兴盛，“阛阓鳞次，烟火万家，苕水流碧，舟航辐辏”，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正如万历时当地名人朱国祯所说：“浔虽镇，一都会也”[4]。清人范颖通也说：南浔镇“前明中叶科第极盛”，“当蚕丝入市，客商云集，四民各司其业，彬彬然一大镇会矣”[5]。

---

[1] 咸丰《南浔镇志》卷四衢巷。
[2] 咸丰《南浔镇志》卷五桥梁。
[3] 咸丰《南浔镇志》卷五桥梁。
[4] 朱国祯：《修东塘记》，见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5] 范颖通：《研北居琐录》，见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万历十六年至十七年，乌程知县修筑了从湖州府城沿运河东至平望镇的荻塘（后来改名为东塘），全长一百二十里，“即运河堤岸，为西来诸水之障，且通往来”，成为南浔镇与湖州、苏州交往的陆路要道。万历三十六年湖州知府以青石加固堤岸，尤其是南浔至平望一段，起到了驰道的作用。荻塘的修筑反映了当时南浔镇经济地位的显要。荻塘在镇中一段，正处于商业繁华的闹市，“市廛丛簇，夹岸骈阗”[①]。

南浔镇从明代万历年间进入繁荣时期以后长时期地维持着鼎盛的局面。乾隆年间，它依然是“市廛云屯栉比”的江南巨镇，“周遭四讫自东栅至西栅三里，水则运河，陆则荻塘也。距运河而南至栅五里，自荻塘而北至栅二里”[②]，“其市各货繁盛”[③]。道咸以后，一些著名市镇渐趋衰微，南浔镇却久盛不衰，仍保持着“阛阓云屯，烟火万家”的盛况，“非他邑所可仿佛”[④]。时人吟咏南浔繁荣的诗作很多：

“水市千家聚，商鱼舟结邻”；

“东西水栅市声喧，小镇千家抱水圆”；

“闾阎填噎驵侩忙”，“毕集南粤金陵商”[⑤]。

直至清末，南浔镇还盛极一时，杜俞《吴船日记》说：“南浔市井最盛……两省交界，太湖毗连，而浙省巨富多在此镇，故地方尤为繁剧”[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浔镇赖以繁荣的经济命脉受到沉重打击，急剧衰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②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
③ 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五村镇。
④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范来庚叙。
⑤ 咸丰《南浔镇志》卷一疆域，卷十一农桑二。
⑥ 民国《南浔志》卷一疆域。

拥有丝庄三家、丝厂二家、商店八百三十家、钱庄三家、典当五家[1]。

南浔镇作为湖丝集散中心的功能，通过它与邻近市镇构造的网络体系而显示出来。它的四周，除北临太湖外，其他三面都密集地分布着市镇群落。东与东北面，有震泽镇、盛泽镇、王江泾镇、平望镇、黎里镇、同里镇等；南与东南面，有乌镇、青镇、新塍镇、濮院镇、王店镇等；西与西南面，有双林镇、菱湖镇、善琏镇、新市镇、塘栖镇等。南浔镇与这些市镇都有河网沟通，并由此向外辐射，联系更广阔的市场。

南浔镇西来之水，由湖州府城安定门合迎春门，沿东塘(即荻塘)而至；南来之水由乌镇而下，其源皆发自天目山。苕水东过南浔，入吴江县之莺脰湖，东南入嘉兴府秀水、桐乡诸县境内。南浔诸水，西南皆以苕为源，向东流入莺脰湖，向北流入太湖。运河自湖州府城安定门沿东塘经南浔镇，直达苏州府吴江县，是漕粮运船必经之途。因此，南浔镇的水路交通网四通八达。

东沿运河至震泽镇九里，自震泽镇至平望镇四十一里；

西溯运河至东迁村十二里，自东迁经旧馆、晟舍至湖州府城六十里；

南至丁家桥五里，自丁家桥至乌镇二十五里，隔市河与青镇相接；

北至太湖口十八里，由太湖口至东洞庭山三十六里；

东南至陶墩村三里，由陶墩村经严墓市至新塍镇五十里，自新塍镇由九里汇至嘉兴府城二十七里；

东北由平望镇、八斥市至吴江县城一百里，自吴江县城至苏州府城四十五里；

西南至辑里村七里，自辑里至马要镇十一里，自马要至双林镇

---

[1] 《中国经济志》浙江吴兴长兴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40—78页。

十八里，自马要至新市镇五十四里，自新市至塘栖镇五十四里，自塘栖至杭州府城五十四里[1]。

由于长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达，也由于南浔镇蚕丝贸易的特殊地位，形成了定期的航线。例如，湖州府城至苏州府城的航船，经南浔至震泽、平望、八斥、吴江；湖州府城至上海的航船，经南浔至芦墟、闵行；自嘉兴至新市的航船，由王江泾、平望、震泽经南浔至马要、双林、善琏。在这些航线中，南浔镇具有中转的交通枢纽的功能，因而由南浔镇始发的航船就有四路：一路经上林、轧村、织里至湖州，一路经震泽、平望、八斥、吴江至苏州，一路经震泽、王江泾至嘉兴，一路经乌镇、石湾至长安[2]。

南浔镇与四乡农村交往密切，除定期航班外，还有民船往返。此种木制航船，由一二人摇橹，可坐十余人，每日开一二班不等。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下午由镇返乡。茧丝、新米上市时，乡人即以茶馆为探听市价的场所，常在清晨乘船至镇，进入茶馆，由牙侩从事撮合，另客商达成交易。

这样，南浔镇就把四乡农家的蚕桑经营，通过市镇网络，与外地客商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范围相当广阔的市场圈，把太湖沿边的农家经营纳入到市场系统之中。

首先是叶市。南浔四乡农家以蚕桑为主业，重视程度超过稻作。虽然大部分土地用于栽桑，仍满足不了蚕户之需，每逢蚕时，蚕户纷纷向邻近市镇购买桑叶，成为一种风俗，当地人称为“做叶”、“顿叶”。《遣间琐记》说：“蚕时往乌镇做叶，是南浔一敝俗，名为贸易，实同赌赙”。南浔人董蠡舟《稍叶》记载了南浔蚕户通过乌镇牙侩购买石门、桐乡桑叶的情况：

---

[1] 以上参看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道光《南浔镇志》卷一疆域；咸丰《南浔镇志》卷一疆域。

[2] 《中国经济志》浙江吴兴长兴分册，第20—23页。

“……吾乡则栽桑地狭，所产仅足饲小蚕，曰小叶。叶莫多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三眠后买叶者以舟往，谓之开叶船，买卖皆曰稍。吾镇之饶裕者亦稍以射利，谓之作叶，又曰顿叶。”[1]

乌镇四栅设叶行，专有南浔等处蚕户来此采购。一般方法是，先于上年冬由乌镇叶行赴下乡（南浔、震泽）抛卖，预先订明成叶几担，收取定银，至次年到行发叶交清[2]。

其次是茧市。南浔一带蚕户大多精于缫丝，所产茧不足，常外出买茧，缫丝后出售。董恂《南浔志稿》说："近时多有往嘉兴一带买茧归，缫丝售之者。亦有载茧来鬻者"[3]。

再次是丝市。"湖丝甲天下"，南浔镇则以湖丝贸易中心吸引了各地客商，"每当新丝告成，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4]。镇上丝行林立，各地客商纷至沓来，会馆、公所之类商人组织的设置就是这种贸易活动的产物。

宁绍会馆——在北栅外下坝，嘉庆中建，咸丰时毁，同治五年重建，光绪十六年复建；

新安会馆——在南栅寓园旁，道光十一年建，咸丰时毁，同治四年重建；

金陵会馆——在南栅广胜桥东北，光绪十一年建；

闽公所——即福建会馆，在南栅陈家墩；

丝业公所——同治四年丝商庄祖绶等禀请藩司批准设立，以收解捐税、维护丝商为职志[5]。

---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一。

②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桑叶业。

③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二。

④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⑤ 民国《南浔志》卷二公署。

除了叶市、茧市、丝市之外，还有棉布市。南浔四乡并不产棉，但农家在经营蚕桑之余，多兼营织布。棉花由东百里外商人运来，由镇上牙行收购，转卖于四乡农家，农家织成布匹后，运至镇上卖与牙行，再由牙行转卖给安吉、孝丰等地客商，当地人施国祁《吉贝暇唱自序》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去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地沿海，田之高仰者宜木棉，其乡民大半植此，夏种秋收，采积既多，即捆载而易钱于西贾。浔之西百里而近，地多冈阜，为茶栗竹木山场，俗少女工，时因其地所出，亦捆而易布于东贾。浔市居其中，四乡之人自农桑外，女工尚焉，椎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之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且篝灯相从，夜亦作，一月得四十五日工，计日成匹，旋以易棉，蚩蚩续来不已。市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随有西之人赍钱来计布值，合则书剂与之去，而钱存焉。"①

这种家庭手工业，与自产原料、自纱自织的家庭手工业很不相同，它纯粹是一种来料加工的小商品生产。这种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的农家经营方式，只有在市镇网络中才能实现，而南浔镇具备了这一条件，把四乡农家纳入了以蚕丝业为主、棉布业为辅的崭新商品生产模式之中。

由于蚕桑收入成为农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农家对此极为重视："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蚕桑压稻作，引起了一些囿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保守人士的杞忧："吾闻荒本逐末圣人忧，蚕桑太盛妨田畴，纵使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②。在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② 温丰：《南浔丝市行》，见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二。

商品粮大量涌现的情况下，这种担忧是多余的也是悖时的，因为农业经济的这种新变化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温鼎《见闻杂录》所描述晚清南浔四乡的农业状况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前志所载田中起棱，播种菜麦，今皆无有，惟陇畔桑下莳种蚕豆。吾镇所辖十二庄大率如此。春郊闲眺，绝无麦秀花黄之象。近市之黠农，专务时鲜蔬瓜，逢时售食，利市三倍。"①

这种农业经济结构是处于市镇网络中的商品经济中心所特有的现象。农家"无复有心种菽栗"，是经济效益的悬殊促成的，粮食可以从市场上买到。南浔镇"本地所出之米，纳粮外不足供本地之食，必赖客米接济"②。长江中上游的商品粮大量运销至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各市镇的米市，然后通过市镇网络疏散，南浔镇上的米市正是这种米市环节中的一环。镇上的米廊下，俗呼米棚下，是著名的米市——商品粮贸易中心，"乾隆以前此地米市最盛"③；以后"米市移于西木行"④。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区域性分工，以及农产品的商品化部分的日渐增多、流通日渐加速，是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正是这种新变化才使市镇经济的持续繁荣有了坚实的基础。

丝业是南浔镇的经济命脉，它关系着南浔镇的盛衰。

湖州向为蚕丝之乡，嘉靖时人徐献忠说："蚕桑之利莫盛于湖"，"蚕丝物业饶于薄海，他郡邑咸籍以毕用，而技巧之精，独出苏杭之下"，"田中所入与桑蚕各具半年之资"⑤。当时已有"湖丝遍

---

①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一。

②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③ 咸丰《南浔镇志》卷四衢巷。

④ 咸丰《南浔镇志》卷四衢巷。

⑤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资、卷十二风土。

天下"之誉[1]。

湖丝中辑里丝(七里丝)尤为著名,集中出产于南浔镇西南七里的辑里村。万历时南浔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说:"湖丝惟七里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2]。由辑里丝织成的丝织品可谓美不胜收,有水绸、纺绸、绵绸、花绵绸、斜纹绸、兼丝绸、绵经丝纬绸、光丝绸、花丝绸,有官绢、小绢、生绢、包头绢、五色绢,有直纱、银条纱、葵纱、软纱、绉纱、夹织纱、漆纱、包头纱,有素罗、帽罗、绮罗等[3]。晚明以来,湖丝成为各地客商采购运销的紧俏商品。"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此业,巧拙百出……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4]。

入清以后,南浔蚕丝业更趋繁荣,董蠡舟《南浔蚕桑乐府自序》说:"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5]。南浔四乡农家多以蚕桑为急务,凡可栽桑之地,包括河边、屋前无不栽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也","尺寸之堤,必树之桑","穷乡僻壤无地不桑"[6]。南浔四乡农家养蚕收茧后,多在家中缫丝,技术精妙,故民间有"缫丝莫精于南浔人"之谚。

清中叶,南浔镇上丝市繁荣,盛况空前。每当新丝上市时,镇上"商贾辐辏,而苏杭两织造皆至此收焉"[7]。其丝原以辑里村一带为佳,其后处处皆佳,都号称辑里丝。董蠡舟《卖丝诗》描述南浔丝市之盛,其序曰:

---

[1] 董斯张《吴兴备志》卷二十六方物征。

[2]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农蚕。

[3]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三物产,引崇祯《乌程县志》。

[4]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

[5]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蚕事总论。

[6] 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七蚕桑。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舆地略·蚕桑。

[7]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二。

"镇南栅有地名丝行埭，列肆购丝，谓之丝行。商贾骈毗，贸丝者群趋焉，谓之新丝市。行有京庄、广庄、经庄、划庄、乡庄之分。"[1]

其诗曰：

"阛阓填喧驵侩忙，
一榜大书丝经行，
就中分列京广庄，
毕集南粤金陵商。"[2]

丝市上不仅客商云集，而且乡农卖丝赴市，十分热闹。"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3]。镇上牙侩所开设的丝行(庄)，一面收购乡农所卖之丝，一面接待来自各地的客商，"列肆喧阗，衢路拥塞"。董恂《卖丝诗》写道：

"初过小满梅正黄，
市头丝肆咸开张，
临衢高揭纸一幅，
大书京广丝经行。
区区浔地虽偏小，
客船大贾来行商，
乡人卖丝别粗细，
广庄不合还京庄。"[4]

所谓京庄，是专门招接苏州织造局、杭州织造局这两个官办机

---

①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②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③ 温丰：《南浔丝市行》，见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二。
④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一农桑二。

构来南浔收丝的行庄。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设织造局,从事官手工业性质的丝织生产,规模很大,所需原料丝都从太湖近旁市镇收购得来,南浔镇是其最大的原料市场。

所谓广庄,是专门"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也称"客行"。

所谓乡庄,也称乡丝行,是专门买乡丝的行庄。

所谓经庄,是专门买经造经的行庄。经,专供织缎用,种类甚多,农家自纺其丝售与经庄(行),称为乡经;农家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称为料经;由经庄(行)专售于苏州机户,又称苏经;专售与广东商人,又称广经。经营乡经、料经、苏经、广经的行庄,就是经庄(行)。

所谓划庄,又称小行,是专门收买乡农之丝转售于大行的丝行(庄)[①]。

五口通商后,洋商集聚上海,湖丝成了出口的大宗物品。湖丝销售洋庄,南浔镇实开风气之先。当时湖州各地丝行几乎全为南浔人所包办,湖丝之出口,也以南浔镇为集散地。温丰《南浔丝市行》描述当时南浔丝出口的盛况说:

"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薰心,
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
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
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
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
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②]

南浔镇上的巨富,几乎全是由丝业起家的。时人有所谓"湖州

① 潘尔夔:《浔溪文献》,见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四物产。

② 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二。

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1]的夸张比喻，足见南浔镇经济实力之雄厚。湖丝集中由南浔镇输往上海，不少南浔商人到上海经营，成为洋商的通事、买办。咸丰十年在上海设立了以南浔商人为主的丝业会馆。当时，南浔丝商与震泽丝商合作，创建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又名丝业会馆。该会宗旨为："专管江浙两省土丝之内外事务，集合众力以维护同业之相互利益，排除各种障碍"[2]。丝业会馆致力于土丝（即辑里丝）之销售与出口业务。

咸丰十年六月到次年十二月，太平军五次进攻南浔镇，并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下旬占领该镇，到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撤退，占领达2年半。太平军占领后采取比较灵活的商业政策，忠王李秀成在苏州接见了英国外交当局派出的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商谈了湖丝贸易照常进行的事宜[3]。太平军维持了湖丝集散地南浔与贸易港上海之间的商业往来，"丝市大开"，"浔商之往来无阻"[4]。太平军占领南浔时期（1861—1863年）生丝贸易额是有所增长的，这从上海生丝输出额的变动中可以窥其一斑：

1859—1860年	69,137包
1860—1861年	88,754包
1861—1862年	73,322包
1862—1863年	83,264包
1863—1864年	46,863包
1864—1865年	41,123包[5]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的几年里，生丝贸易受到影响，输出额大幅度下降。五、六年之后又开始回升。海外市场对中国丝货需求量

①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文瑞印书馆，1938年），第122页。

② 《国际贸易导报》二卷八号。

③ 艾约瑟：《访问苏州太平军》，见王崇武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33页。

④ 民国《南浔志》卷二公署。

⑤ Lindley, The History of Taiping Revolution, Vol. Ⅱ. pp.838—839

激增,刺激了湖丝生产,南浔镇四乡"无不桑之地,无不桑之家",桑叶虽较前有所增加,"而饲蚕仍虞不足",须仰赖外地桑叶。为了增加丝产量,甚至还从外地购进大量鲜茧。蚕丝业日趋兴旺,"乡人费一月之劲,苟得丰收,一年取给于此"[1]。

从 1870 年到 1920 年为时五十年,丝业贸易发达,农家蚕桑经营繁忙,形成南浔镇发展史上最后一段黄金时代。南浔镇以丝商起家致富的多得不可胜数,号称"四象、八牯牛、七十二只狗",其资产最少的也在三十万元,多的竟达二千万元,"四象"的资产多在百万以上:刘氏二千万,张氏一千二百万,邢氏四百万,庞氏一百六十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丝绸业相继衰退,价格惨跌,养蚕户、养蚕数都大幅度下降,农家因无利可图,纷纷掘去桑树,改种其他作物[2]。农家经营方式迅速发生了倒退性质的变化,由先前蚕桑收入占十分之七、稻作收入占十分之三的比例,一变而为稻作收入占十分之七、蚕桑收入占十分之三的比例[3],反映了农业经营中商品化程度的急剧衰退,自然经济的浓度重新加深。南浔镇持续数百年繁荣局面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南浔镇在它的鼎盛时代,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文化发达,号称"人文蔚起"之地。范来庚在《南浔镇志》凡例中指出:"数百年来,人文蔚起,阛阓纷屯,东西南北之通衢,周约十里,郁为巨镇矣"[4]。南浔之成为江南名镇,固然在于它是一个经济中心,但它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略的。

---

① 温鼎:《见闻偶录》,见民国《南浔志》卷三十一农桑二蚕事总论。
② 《中国经济志》浙江吴兴长兴分册,第35—36页。
③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29页。
④ 道光《南浔镇志》卷首凡例。

明一代，南浔镇出了董份、范应期、董嗣成、董道醇、董嗣昭、朱国祯、华士嶟等七名进士，以及张祐等二十七名举人。范颖通《研北居琐录》说："前明中叶，科第极盛，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1]。

所谓三阁老，即南浔镇东栅马家港朱国祯、镇西南七里之辑里村温体仁、镇西南十一里马要村的沈㴶。当地人常引以为荣，夸耀地说"九里三阁老"，也有人称之为"七里三相国"：

"有夸其先者，马溪世家沈氏有相国焉，浔溪世家朱氏有相国焉，吾里之显亦家相也。三相国相距凡七里，至今以为谣。"[2]

朱国祯，一作国桢，字文宁。万历十七年进士，天启初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魏忠贤窃国柄，国祯佐叶向高多所调护。及向高、韩炉相继罢去，国祯为内阁首辅，累加太子太保，为逆党李蕃弹劾，引疾辞归。里居时，曾上均田议，倡行均田均役法，在苏松嘉湖一带颇有影响[3]。

沈㴶，字铭缜，沈节甫之子。万历二十年进士，累官至南京礼部侍郎，倡言排击天主教。光宗立，召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初密结宦官，请募兵隶锦衣卫，遭弹劾，辞归[4]。

温体仁，字长卿，号圆峤。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崇祯初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排去周延儒，代为首辅。居位八年，专务刻核，迎合帝意。后失帝宠，佯引疾辞归[5]。

所谓二尚书，即南浔董份、马要沈演。

董份，字用均，一字体化，号浔阳山人。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

---

1 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引《研北居琐录》。

2 温荣忱《七里村志》，见民国《南浔志》卷六村庄。

3 《深柳堂文集》卷一《朱文肃公传》。道光《南浔镇志》卷六选举志·仕宦。

4 《明史》卷二百十八《沈㴶传》。

5 《五十辅臣考》卷二，《明史》卷三百八《温体仁传》。

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后被夺职为民。里居时与唐一庵、蒋石庵为逸老堂三会,时人比之为宋时耆英洛社[①]。

沈演,字叔敷,号何山,沈节甫之子。万历二十年与兄潅同举进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②]。

南浔不愧为诗书之邦,文人学士成群涌现,名人辈出。

上文提及的朱国祯,撰《涌幢小品》(三十二卷)、《大政记》(三十六卷)、《明史概》(一百四十二卷)、《皇明纪传》(三十卷)。

沈节甫,字以安,号镜宇,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喜藏书,有《玩易楼藏书目录》,利用藏书辑《纪录汇编》二百十六卷[③]。

董斯张,字然明,号遐周,又号借庵,独行孤啸,著述丰富,有《吴兴备志》(三十二卷)、《广博物志》(五十卷)、《增定唐诗品汇》(三十卷)、《吴兴诗文补》(七十卷)[④]。

董说,字若雨,号西庵,自称鹧鸪生。工古文词,江左名士争相倾倒。精研五经,尤邃于《易》、方言、地志、里经、律法、释老诸书。撰《七国考》(十四卷)、《易发》(八卷)、《未草庵杂著》(十二卷)[⑤]。

陈忱,字遐心,号雁荡山樵。究心经史稗编野乘,无不贯穿,好作诗文,撰《雁荡杂著》、《雁荡诗集》。惜以贫老终,诗文杂著大多散失[⑥]。

入清以后,科第仍相当可观,进士及第者有殷维藩等十六人,

---

① 《赐闲堂集》卷二十九,《董公合葬墓志铭》。道光《南浔镇志》卷六选举志·仕宦。

② 《启祯野乘》卷六。光绪《乌程县志》卷十五人物。

③ 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四人物、卷三十一著述。

④ 咸丰《南浔镇志》卷十二人物。

⑤ 咸丰《南浔镇志》卷十二人物。

⑥ 咸丰《南浔镇志》卷十二人物。

乡试中举者有董衡等五十人[①]。文化名人有"南浔三先生":施国祁、邢典、杨凤苞。施国祁撰有《金史详校》、《金源扎记》、《元遗山集笺注》。邢典撰有《书城杂著》、《南林杂咏》、《六壬占验》。杨凤苞撰有《十八家晋史纂》、《补正湖州诗录》。虽然"显达不多",然而"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②]。

与高度发达的区域经济相适应,南浔镇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区域文化。人文蔚起是区域文化的一个侧面,民间习俗则是区域文化的另一个侧面。万历时本地人王道隆《菰城文献》说,"成化以前,谋饔飧者以兴贩为能,养子弟者以读书为讳,哗者好勇而争讼,细民重释而信巫。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宴席以华侈相尚,拥赀则富屋宅,买爵则盛舆服,钲鼓鸣箫用为常乐,盖有僭逾之风焉"[③]。到了清代,此风更甚。这并非士大夫所慨叹为"世风日下",而是繁华的市镇经济必然产生的丰富多采的市镇文化的一个缩影。在持续兴盛的南浔镇,人们可以看到那种盛极一时的文化习俗传承。

正月立春,有"宜田蚕"仪式,有放风筝、抛球、踢毽诸戏。初五日,五路财神生日,五更时祀以牲醴,曰接五路,亦曰接路头。元宵节前后钲鼓声不绝,谓之元宵鼓。街市张灯,或为藏头诗句,任人商揣,曰灯谜。又扎造龙、象、狮、马等灯,游行街市。每出夜会,必有灯数十对点缀其间,望之宛若纱縠,谓之引线灯。迎神出现,谓之出灯会,旬余始罢。张镇《浔溪渔唱》记元宵灯会之盛曰:

"元宵风景尽堪夸,
画鼓冬冬灯市哗,
卐字栏干珠箔卷,

① 道光《南浔镇志》卷六选举志·科第。

② 范颖通:《研北居琐录》,见咸丰《南浔镇志》卷六古迹。

③ 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八风俗引《菰城文献》。

争看水面放莲花。”[1]

三月初三日，男女皆戴荠菜花。寒食节，乡村以农船驾四橹，上设彩亭、旗帜，列各种器械，互较技勇诸艺，谓之哨船。棹小舟于溪上为竞渡，谓宜田蚕，始于寒食至清明日而止。清明日，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祛蚕祟。二十八日，东岳生日，烧香作会，或诵经上寿，或枷锁伏罪，扮搭台阁故事，迎演数日。遇丰年则出灯会，每在二三日间制引线灯，作绣球凉伞等形，争新斗艳，击钲鼓游行市上，迎神出观。

七月七日，金元总管诞辰，演剧竟日。十五日为中元节，地官赦罪之辰，僧至录亡者姓名，遍送檀越，谓之节关，建盂兰盆会，夜则放焰口、施食、沿河放灯，谓之照冥。市井醵资，各延僧设瑜伽焰口，街头巷尾夜夜都有。三十日，地藏诞辰，士女往东藏寺烧香最盛，夕则人家门前设供香烛，曰点地灯。

九月初五日，南浔镇土神崔李二承事生日，贺者先期而至，手技杂戏毕集，报赛演剧连日不停。有小艇架以红栏幢以青幔，仿六柱吴船之式，以供游客观戏游赏。茶楼酒肆之中，歌管纷喧，煞是热闹。骚人、逸士、估客、寓公无不流连光景，甫一月始罢。

立冬至岁底数月，乡村皆演戏酬神，谓之社戏。除夕，或有灶前致祷，请方向出门，听市人无意之言，以卜来年休咎，谓之听响卜[2]。

此种文化习俗不仅与本地区的农工商各业关系密切，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且渗透了市井气息。它是繁荣的市镇经济的产物，当然有奢靡的一面，这就是当时人所说的“迩来风会日趋，稍不

---

[1]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

[2] 以上参看道光《南浔镇志》卷一舆地志·风俗；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光绪《乌程县志》卷二十八风俗。

如昔，奢靡渐启"[1]。因为这个关系，市镇上寄生人群比比皆是，"市镇乡村每多魁猾奸黠，武断乡曲，春间奋身醵金，搭台演戏，勾引博徒，逃兵赌博之外，近有施骰磨钱、斗牌、棋势之类，谜诱良民，为恶不一，相习成风，穷民堕其术中，卖妻鬻子，或流为盗贼"[2]。

这是一种多么矛盾的现象：崭新的经济与陈旧的文化相交织，预示着未来的新关系与承袭着传统的旧关系相重迭。究竟是旧的拖住新的，还是新的冲破旧的，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三十九、乌 青 镇

乌镇与青镇相隔一水，画河为界，虽然分属湖州府乌程县与嘉兴府桐乡县，然而隔河相望，近在咫尺，实为一镇，当地人习惯于合称为乌青镇。乾隆《乌程县志》说：湖州府乌程县之乌镇与嘉兴府桐乡县之青镇，东西相望，万历至乾隆间十分兴盛，"户口日繁，十里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二镇联而为一，中以市河、道为界，因合呼乌青镇。河东则仍属桐乡县，为青镇；河西则仍属乌程，为乌镇。二镇之四栅八隅，则为江浙二省湖嘉苏三府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七县错壤地，百货骈集"[3]。

追溯其历史，唐时乌青两镇并未分立，统称乌镇，懿宗咸通十三年朱洪《乌镇索靖明王庙碑》的碑文中，乌镇始见于记载。宋元丰间王存编修的《九域志》中，乌程县有乌墩镇、崇德县有青墩镇。可见至迟在熙宁年间乌镇、青镇已分立为二了。南宋嘉定年间莫光朝《徒役碑》云："乌青镇分湖秀之间"；同时代张偘《重修土地庙记》也说："湖秀之间有镇，画河为界，西曰乌镇，东曰青镇"。淳熙

[1]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
[2] 咸丰《南浔镇志》卷二十三风俗。
[3]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一乡镇。

三年万圭《青镇索度明王碑》碑文中则说:"秀之青墩与湖之乌墩二市,相抵为一镇"[1],可见其时乌青镇已颇为著名了。乌镇在乌程县东南九十里,镇上设有监镇衙、酒务、税务[2]。乌镇始终隶属于乌程县,青镇则由崇德县改属桐乡县。明代宣德四年,以嘉兴府所领地广赋繁,析嘉兴县地为秀水县、嘉善县,析海盐县地为平湖县,析崇德县地为桐乡县,青镇改隶桐乡县,在县治西北十五里[3]。

乌青镇历尽沧桑,由兴转衰,又由衰复兴,几经周折。嘉靖三年本镇人陈观对此有一个极好的追述:乌青镇兴盛于南宋淳熙(1174—1189年)、嘉定(1208—1224年)间,至德祐二年(即景炎元年,1276年),遽然衰落,"公署、酒楼、官店悉入为民庐"[4]。入元后,稍稍复兴,元末又遭兵燹,阖镇洗劫一空,荡然无存,"仅存者唯两浮屠之遗迹焉"。明初洪武年间,"民庐寺观虽云重兴,亦不尽复"[5]。至成化、弘治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居民殷富,锐于兴作","荆棘荒芜素无人居者,亦剿刈而结构之",镇上店铺、民屋"鳞次栉比,延接于四栅"[6]。至此,不但恢复了南宋时的旧观,而且犹有过之,大大超过旧时规模。正德、嘉靖间,开启了乌青镇历史上繁荣的时代:"负贩之广,封桑之勤,又日盛一日。且士知向学,科贡有人,民知尚义,输赈多室,缙绅士夫摩接街市,民风土俗一变而为富庶礼义矣",无怪乎陈观要如此赞叹:"宋元二百载而下不又盛于今日哉!"[7]

嘉靖十七年,地方官鉴于乌青镇的繁华与地位的重要性,请求

① 乾隆《乌青镇志》卷一沿革。

② 嘉泰《吴兴志》卷十管镇、卷八公廨。《乌青文献》卷一廨署。

③ 嘉靖《嘉兴府图记》卷二邦制。

④ 《乌青文献》卷首·旧序,陈观:《校正乌青志序》。

⑤ 《乌青文献》卷首·旧序,陈观:《校正乌青志序》。

⑥ 《乌青文献》卷首·旧序,陈观:《校正乌青志序》。

⑦ 《乌青文献》卷首·旧序,陈观:《校正乌青志序》。

上司批准在此分立县治。从这份《请分立县治疏》中，不难看出当时乌青镇的盛况：

"地僻人稠，商贾四集，财赋所出甲于一郡。……乌程、归安、桐乡、秀水、崇德、吴江等六县辐辏，四通八达之地。……本镇地厚土沃，风气凝结，居民不下四五千家，丛塔宫观周布森列，桥梁阛阓，不烦垓改拓，宛然府城气象。"[1]

"宛然府城气象"一语，道尽了当时乌青镇规模之宏大、经济之繁荣。其后不久，地方官知道分立县治已无可能，便提出添设馆府佐员的建议，从巡抚谢鹏举、巡按萧廪所写《复添设馆府佐员疏》，同样可以看到当时乌青镇的兴旺景象："本镇……居民殆万家，又为乌程之巨镇。……乃若乌镇一区实为浙西垄断之所，商贾走集四方，市井数盈于万户"[2]。

嘉靖、万历时代，乌青镇充分发挥了农桑发达、交通便利、商贾云集的有利因素，成为居民万家的大镇，其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乌程县治和桐乡县治。万历时推官张应雷指出："窃照乌青地方乃浙(江)、直(隶)之交，湖州之乌程，嘉兴之桐乡，苏州之吴江三邑相连，本镇居民近万(户)"。当地的粮塘里老也指出："乡聚居民殆万家"，号称隔府、隔省，"河港纵横，隔属错杂"[3]。

入清后，乌青镇基于蚕桑业的蓬勃发展而日趋兴旺，市镇规模也日趋宏大。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二里，共有四个门坊：

南昌门——青镇之南门，通杭州；
澄江门——乌镇之北门，通苏州；
朝宗门——青镇之东门，通嘉兴；

---

[1] 《乌青文献》卷一建置。
[2] 《乌青文献》卷一建置。
[3]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乡镇。

通霅门——乌镇之西门，通湖州。

显然，由于其地"民物繁缛，甲于他镇"，虽无城垣，却有坊门，实际上是"以郡城规模名之"[1]。确实，乌青镇名为镇而其规模、格局大有府城架势。它"巨丽甲他镇，市达广袤十八里"[2]。湖州府城、嘉兴府城周围都只十二里[3]，而乌青镇广袤十八里，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二里。乌镇从南门到北门大街沿线共有十六巷（其中波斯巷于万历三年辟为大街），青镇从南门至北门（大街沿线）共十三巷，乌镇西街从安利桥至西门十三巷，青镇东街共五巷，真可谓街巷交错。故当时人说乌青"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4]。

到清末民初，市街的规模有进一步的发展。乌镇有：

常春里大街——嵇家汇到安利桥，"南段均系民居，间有商店，际盛坊有耶稣教堂，众安桥以北为旅社集中之地，夜市甚盛"；

澄江里大街——南到安利桥，北到飞盖桥，"南段旷地甚多，到利济桥始有市集"；

通霅里大街——东到安利桥，西到通济桥，西段自利济桥有市集，治房桥一带最为热闹；

青镇有：

南大街——南至茶亭，北至常丰桥，"南北市廛相接，浮栏桥以南俗称桥外头，为乡民市易之区，丝庄、稻行均设于此；济远桥至常丰桥为中市，繁盛之地，江源典及阮恒德药号、宜昌绸庄各大商店皆在此"；

中大街——自常丰桥至席行桥，"此街为两镇上紧之地，其大

---

[1] 《乌青文献》卷二门坊；卷一疆域。

[2]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3] 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四建置志。

[4]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商店如云锦绸庄、久大参行、著名菜馆九江楼在兴德桥南”；

北大街——自席行桥至油车汇，普济桥一带有市集；

观前街——常丰桥北堍至望佛桥，位于修真观前故名。“观西街市繁盛，和中大街相接”；

东大街——东西系民居，间有商店，财神湾市集较盛，徐恒裕、襄饼行在朝宗坊[1]。

此外还有一较小的集市贸易区：

嵇家汇——东至常春里街，西达吴桥，为南栅繁盛地，有渡船以达东西南岸；

西长明巷——在仁济桥西堍，北通丁家巷、施家巷，巷内沿河，每岁清明后有香船停泊息夜，届时有竹器摊、烧香糕饼等肆，喧哗成市，俗称烧茅场；

寺后巷——在普静寺后，沿河出安利桥，中各转船湾，有八鲜行，每日早晨成市[2]。

镇上开办了邮政局、浙西长途电话分局，新设了照相、钟表、西药、旅馆等行业[3]。

情况表明，民国初年乌青镇仍在蓬勃发展，不仅工商业繁荣，而且规模日益扩大。乌镇析为四镇：澄江镇、通霅镇、通津镇、常春镇；青镇析为三镇：青南镇、青北镇、青东镇[4]。由此可见这个江南巨镇昔日的雄姿。

乌青镇当水陆交通之会，河道自西南向东北流去，镇中市河自南而北穿越而过，分割乌青二镇，东入之水七道，通西之水十一道，北流之水五道。粮艘贾舶无间道可他适，显然以间道之咽喉、南浙

---

[1] 民国《乌青镇志》卷十二坊巷。

[2] 民国《乌青镇志》卷十二坊巷。

[3]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4] 民国《乌青镇志》卷四疆域、卷十二坊巷。

之门户而四通八达，处于苏、嘉湖市镇网络的中心地带。由镇南栅出发。

东十五里至炉头镇（属桐乡县）；

东十八里至皂林镇（属桐乡县）；

东三十六里至陡门镇（属秀水县），自陡门折南四十六里至濮院镇（东属秀水县、西属桐乡县）；

西十八里至琏市镇（属归安县）；

西五十四里至新市镇（南属德清县、北属归安县）；

由镇北栅外分水墩出发：

东六里至六里坝（属吴江县）；

东九里至九里桥（属吴江县）；

自东折而北十里至严墓市（属吴江县）；

东四十九里至檀邱市（属吴江县）；

东七十二里至平望镇（属吴江县）；

东三十里至新城镇（属秀水县）；

东九十二里至王江泾镇（属秀水县）；

西三十六里至南浔镇（属乌程县）；

西五十四里至震泽镇（属吴江县）[1]。

乌青镇的水道可通南浔、平望、陈庄、双林、练市、石门、屠甸、濮院诸镇及吴江、嘉兴、湖州、桐乡各地。这一点从民国时期的航班、航线即可窥其一斑。乌青镇的轮船航线有九条：

一、招商局的煤轮，一天一班，码头在西栅高桥下，由菱湖镇、双林镇经乌镇、盛泽镇、平望镇至上海；

二、通源局的煤轮，一天一班，码头在西栅高桥下，由上海、平望镇、盛泽镇经乌镇、双林镇至菱湖镇；

三、通源局的煤轮、汽轮，每天来往两班，码头在南栅浮栏桥，

---

① 《乌青文献》卷一疆域。乾隆《乌青镇志》卷一疆域。

由嘉兴、陶览镇、濮院镇、桐乡、炉头镇经乌镇、双林镇、袁家汇镇至湖州；

四、通源局的汽轮，每天来往两班，码头在南栅浮栏桥，由双林镇经乌镇、炉头镇、桐乡、濮院镇、陶览镇至嘉兴；

五、王清记局的汽轮，每天来往两班，码头在嵇家汇，由乌镇、宗杨庙、石湾镇、石门至长安镇；

六、公大局的汽轮，每天来往两班，码头在嵇家汇，由乌镇、练市镇、善练镇、石冢镇、袁家汇镇至湖州；

七、鸿大局的汽轮，每天来往两班，码头在嵇家汇，由南浔镇经乌镇、炉头镇、桐乡、屠甸镇至硖石镇；

八、翔安局的汽轮，每天来往两班，码头在嵇家汇，由德清、新市镇、练市镇经乌镇至嘉兴；

九、宁新局的汽轮，每天来往两班，码头在夏家桥，由菱湖镇、双林镇、南浔镇、震泽镇、严墓镇至乌镇[①]。

传统的以橹、桨为动力的木制快船仍是轻捷的交通工具，一般是每天一班，也是隔日一班或每天来往两班的，有王店船、湖州船、震泽船等，由于轻便快速，深受乡人喜爱。有十四条航线：

一、王店船，由乌镇至濮院镇，码头在印家桥堍，每天一班；

二、湖州船，由乌镇至马腰镇，码头在印家桥堍，每天一班；

三、震泽船，由乌镇至严墓镇，码头在二井桥，每天一班；

四、湖州船，由乌镇经双林镇至练市镇；

五、嘉兴船，由乌镇经新塍镇至练市镇；

六、塘栖船，由乌镇经新市镇至练市镇；以上三线码头均在二井桥，每天一班；

七、南浔船，由乌镇经炉头镇、桐乡、屠甸镇至硖石镇，码头在宫桥北，每天来往两班；

---

①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二工商。

八、长安船,由南浔镇经乌镇、炉头镇、石湾镇至崇德,每天来往两班;

九、桐乡船,由乌镇至炉头镇;

十、崇德船,由乌镇至石湾镇;以上两线码头均在浮栏桥堍,每天来往两班;

十一、硖石船,由乌镇至炉头镇、桐乡、屠甸镇;

十二、善练船,由乌镇至练市镇;以上两线码头均在二井桥,前者隔天一班,后者每天一班;

十三、濮院船,由乌镇至石谷庙,码头在印家桥堍,每天一班;

十四、湖州船,由乌镇至马腰镇,码头在二井桥,每天一班[1]。

轮船、汽船、快船之外,还有来往于各镇的货运航船,乌青镇上百船会聚、万商云集始终维持着商业中心的地位。

乌青镇是蚕桑专业市镇,四乡农家以蚕桑为急务,经营方式的商品化程度甚高。谢肇浙《西吴枝乘》说:“其生计所资视田几过之,且为时促,而用力倍劳”,农家治蚕、收茧,“其所赖者,专在于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檐隙以暨田之畔、池之上,虽惰农无弃地者”[2]。桑秧大多在冬末春初由附近农家贩来,大者长八尺,每株值银二厘。嘉靖时归安人茅坤说,地一亩用于栽桑,产量高的可达二千斤,卖价在银五两至六两间;次者可收一千斤,卖价在银二三两左右;最下者一亩所收也不下银一二两。而用于种稻,亩产高者不过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3]。而同期米价大抵每石约为银三五两左右,万历十六年奇荒,米价腾贵,每石高至银一两六钱[4]。在

---

①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二工商。

② 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七蚕桑。

③ 茅坤:《与甥顾儆韦侍御书》,见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一艺文。

④ 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二旧闻。

平常年景，栽桑比种稻的经济收益要高三至六倍左右。这种比较，与嘉靖时人徐献忠是一致的，“蚕桑之利莫盛于湖，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八十个(每二十斤为一个)，计其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大约不过二两，而其利倍之”[1]。

农家桑叶不足，多向市场购买，因而对桑叶价格之贵贱十分关注，常预先占卜：“其占桑叶之贵贱也，以正月之上旬，木在一日也，则为蚕食一，叶为甚贵；木在九日也，则为蚕食九，叶为甚贱。又以三月之三日有雨则贵，四日尤贵，谚云：‘三日犹可，四日杀我’”[2]。桑叶成了市场上价格变动最敏感的农产品，其买卖方式也很独特。农家预定别家桑叶，俗称梢叶，分现梢与赊梢两种，预先付讫价银谓之现梢，收茧后偿付价银谓之赊销。养蚕一斤约用叶八个(即一百六十斤)，现梢约用银四钱，赊梢约用银五钱(再加杂费五分)。养蚕一斤可收丝价银一两，农家所获盈利达五钱左右。故徐献忠说：“湖俗务本，诸利俱集春时，春蚕一月之劳，而得厚利。其他菜、麦、麻、芋、木棉、菜、藕、萝、蘗、姜、苧，各随土宜，以济缺乏。……或荒歉之年不过减其分数，不至大困”[3]。

桑叶业是乌青镇的重要行业，镇四栅均设有青桑叶行。每当新叶上市，镇上“叶市甚盛”。“立夏之日，无少长采桑贸叶，名曰叶市，舟人辐辏”[4]。乌青镇叶市远近闻名，董蠡舟《乐府小序》说：“叶莫盛于石门、桐乡，其牙侩则集于乌镇，买叶者以舟往，谓之开叶船。饶裕者亦稍以射利，谓之作叶，又曰顿叶”[5]。乌青镇因此成为本镇四乡及桐乡、石门桑叶的集散中心，南浔镇、震泽镇等丝绸业市镇，都有“蚕户来此采购”，销售额常达十万担上下。一般交

---

[1] 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产·农桑。

[2]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

[3] 《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产·农桑。

[4] 王道隆：《菰城文献》，见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九风俗。

[5] 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舆地略·蚕桑。

易方式大抵是，叶行于上年赴下乡（南浔、震泽等处）抛卖，订明成叶几担，收取定银，至次年到行发叶交清。一面向本乡叶户预备春叶，叶价付足。每年立夏时分，叶行设柜营业，见采叶船三朝（按：即三天）开秤，开秤前发叶，每担只发七十斤或八十斤、九十斤。开市有头市、中市、末市，每市三日。叶价有早市、晚市、夜市之分，价格相差悬殊，波动幅度颇大。"叶行上市通宵达旦，采叶船封满河港，叶行营业顺利，骤可利市三倍"，故俗语有："四月黄金随地滚"之谚[①]。

乌青镇出产的大宗商品是丝。丝有头蚕、二蚕两时，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乡所出，以西乡为上，即所谓七里丝（辑里丝），北乡次之。小满新丝上市时，镇上丝行十分繁忙，"各处大郡商客投行收买"。"平时则有震泽、盛泽、双林等镇各处机户零买经纬自织"；又有"贸丝诣各镇，卖于机户"的贩子[②]。清末时丝行仍遍布全镇，有镇南栅丁同和号、胡同顺号、荣盛号、姚德泰号、仁记，东栅有周恒源号、杨义丰号、钱天元号、德泰兴记，西栅有邱恒茂号，北栅有徐兴道号各丝行[③]。

本镇四乡产丝不少，但无机户自织丝绸，所产之丝均外销至其他市镇，这是乌青镇不同于双林镇、濮院镇的一大特点。镇上向无经行，至清末，"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为出口货，名辑里经，同治、光绪间，年产约七八千包（每包八十斤）左右[④]。

乌青四乡虽不产棉花，但农家多从事棉纺织业。棉花从镇上商牙处购入，纺纱织布后送往镇上出售给布庄，然后转销外地。此

---

①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②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

③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④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种经营方式的商品化程度较蚕桑经营更高。明代乌青镇棉布已闻名远近，"闽广人独喜本镇之布，以其轻软而暖也。布有大小轻重，价亦有多寡不同"[1]。清中叶，乌青镇的棉纺织业仍颇具规模，"商人设庄收买，行销于外埠，布庄有沈永利、沈义和、顾周昌、胡允和四家，营业甚为发达"[2]。

伴随着四乡农家经营的商品化趋势，乌青镇作为商业中心的功能强烈地显示出来，把蚕桑、缫丝、纺织各业都深深地卷入了市场经济之中，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渗入到生产领域与生活领域。作为高利贷资本具体化的典当业在镇上十分活跃，万历时人王道隆在《菰城文献》中说，"成化以前谋飧者以兴贩为能"，"今则市廛以质当相先"，"收获之际，公私偿债而场逋空者十恒七八"[3]。农家经营与典当业关系至为密切，形成仰赖于高利贷资本的经营方式：

其一，"凡畜蚕者，或自家蚕桑不足，则预定别姓之桑，谓之梢叶"，其中赊梢者，在收茧后偿付叶价，比现梢价格高25%，这实际就是赊梢时期叶价的利息[4]。这种高利率，与当地典息习惯基本相符："湖郡典息，向例十两以上者每月一分五厘起息，一两以上者每月二分起息，一两以下每月三分起息"[5]；

其二，田中稻谷收获后，农家"投典贱质"，换取银钱，"希贸易博利"[6]；

其三，春夏之交青黄不接时，农家"告贷富室，谓之生米（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以名之，还之最早）。……或有他方商客投牙放

---

① 《乌青文献》卷三土产。

②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③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三风俗引《菰城文献》。

④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

⑤ 郑元庆：《小谷口荟蕞》，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

⑥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

米，谓之牙账”[1]；

其四，“乌镇殷富之家例于蚕毕收账”，农家“收获之际，公私偿债”[2]。

高利贷资本渗入了农家经营的各个环节，“贷米以延须臾之死，质衆以作不急之务”，“其后贸易折阅，息利倍加，自此逋负益积，逃亡随之”，故当地有谚语曰：“汗出赖赖（意即淋漓），强如做债”[3]。但是，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市镇及其四乡，这又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乌青镇上典当业的兴旺似乎不亚于桑叶行、丝行，“两镇典业在商业极盛之时，相传有十三家之多”[4]。其源盖出于此。

雇佣关系也渗入农家经营，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市镇四乡经济发展的另一必然趋势。万历时本地人王道隆《菰城文献》说：乌程农村，“无产者雇倩受直，谓之长工，夏秋农忙短假应事，谓之忙工”[5]。《乌青文献》也说：“七月谓之忙月，富农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6]。《嘉兴府志》所说相似：“四月望至七月，望月谓之忙月，富农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7]。这种“雇倩受直”的长工、短工或忙工，显然不同于以往的雇工人，而是一种劳动力商品化的雇佣劳动。这与濮院镇农家忙于蚕事，田事多雇佣石门、桐乡农夫种“跨脚田”的现象，属于同一性质的农村新型雇佣关系。这时于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对于市镇经济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乌青镇不仅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经济中心，而且是一个人文繁

---

[1]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

[2] 乾隆《乌青镇志》卷十二旧闻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三风俗。

[3]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

[4] 民国《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

[5] 乾隆《乌程县志》卷十三风俗。

[6]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

[7] 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二风俗。

荣的文化中心。

宋室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于此"，构筑园林宅第，聚族而居，繁衍至后世，形成了当地的望族著姓。如华林村之茅氏，由山阴徙居于此，至明代日趋显赫，成为湖州大姓；陋巷村之颜氏，康熙时远近闻名，村名遂改为颜家村[1]。茅氏、颜氏家族明清两代文人辈出，成为乡里的文化渊薮。关于乌青镇文化繁荣的状况，当地人几乎众口一辞：

> "青镇与湖郡所辖之乌镇夹溪相对，民物蕃阜，第宅园池盛于他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多卜居其地……幅员四达，文人日起，甲于一邑"[2]；
>
> "宋南迁，簪履盛，冠裳之会如朝聘，凤仙陈迹已湮名，龙种渊源乃著姓"[3]。

乌青镇的望族著姓有：

陋巷村（颜家村）颜氏，建炎初扈驾南渡，始居于石门镇，明末徙居于此；

华林村茅氏，嘉靖中有茅坤进士及第。茅坤，字顺甫，号鹿门，善古文，又好谈兵，累官广西兵备佥事，迁大名副使。著《白华楼藏稿》、《玉芝山房稿》等。其少子茅维，字孝若，能诗，与同郡臧懋循、吴稼澄、吴梦暘并称四子，有《茅洁溪集》等。

杨园村张氏，有张履祥，号称杨园先生，著《杨园先生文集》。

外河村沈氏，沈振龙，万历间进士；其曾孙沈适文，康熙间状元及第；

镇中夏氏，夏熏，万历间进士；夏炜，万历间进士；夏煜，著述丰

---

[1] 《乌青文献》卷二村落。

[2] 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形势。

[3] 《乌青文献》卷首夏煜序。

富，有集行世[1]。

柞溪（炉头）沈氏，炉头是距青镇十四里一小镇，湖州沈氏徙居此地，开设冶炼作坊，柞溪遂改名炉头。沈氏子孙科第兴旺，自乾隆至同治，先后有进士二人、举人五人、贡生四人，民国以后，毕业于国内外各大学的有十四人之多[2]，从沈氏家族可以窥知乌青镇一带文化教育事业之发达程度。

这些大家族都颇注重私家教育，许多宅第都有私家藏书楼。如唐申之的宁俭堂，"后有楼，课二子廷楷、廷栻读书处"[3]。明代正德二年桐乡知县陆节建青镇社学，正德十二年湖州知府刘天和建乌镇社学，把教育事业扩大到社会。乾隆年间又有分水书院、立志书院的创建；清末又创办义学；清末民初先后兴办了植村小学、立志完全女学、分水小学、通霄小学、常丰小学、青南小学、私立敦本小学、肉业私立小学等。乌青镇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决不是偶然的。

四十、菱　湖　镇

菱湖镇，位于归安县治南四十里。唐宝历（825—827）中，刺史崔元亮开浚波塘，因其地产菱，故名菱湖，居民开始在塘东筑庐居住。明庞太元《菱湖志》曰："菱湖非舟车孔道，汪洋浩渺，古未成聚。自筑浚波塘以后，民始聚庐于塘之东，兴菱桑业，塘以西皆桑墟"[4]。宋南渡后，菱湖一带"兴市廛，治桥梁，渐即稠密"[5]。可知菱湖在南宋时已经成市。

---

① 《乌青文献》卷二村落、卷四进士、卷五文苑。

② 民国《乌青镇志》卷十四乡村。

③ 《乌青文献》卷二第宅。

④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引庞太元《菱湖志》。

⑤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

元末，菱湖市廛毁于兵火。明初洪武年间，在此"始设务司"，即设置专管税务的机构，并且"建社坛市軲，盛于东湖"。其时菱湖已由市发展成镇。这一转变还可以从孙宗承《菱湖纪事诗》中得到佐证：

"东溪成聚倍其余，
北与西南遂徙居，
扑地人烟舟络绎，
的应改镇在明初。"①

孙宗承明确指出菱湖由市改镇是在明朝初年。成化、弘治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原先居民集中于东湖，现渐移向西湖，"第宅连云，湖东西无隙地"②。

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菱湖镇迅速趋于繁荣，"第宅连云，闤阓列螺，舟航集鳞，桑麻环野，西湖之上无隙地，无剩水矣，遂为归安雄镇"③。

菱湖镇置四栅，长二里，阔四里。镇上商业繁华，嘉靖时当地人孙铨（字撰乡，号屏石，在菱湖镇作长春园别业）说："沿湖岸铺及湖内舟船，商贾凑集，总之各行，不下百余户"④。可知其时经营各业的牙行已有一百余家之多。

衣裳巷和棉绸巷是镇上最热闹的商业区，开设各种衣铺和棉绸铺；油车潭街开设着油车作坊，染店浜街开设着染坊、练坊，凌木行口开设着木行。

万历四十一年王继祀所撰《重修永宁禅院碑记》描述了当时菱湖镇的盛况：

---

①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疆域。

② 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

③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疆域引庞太元《菱湖志》。

④ 光绪《菱湖镇志》卷四十二前事略·事纪引孙铨《又与任邑侯书》。

“菱湖为东南巨都，数百年来文章冠冕鼎隆踵继，其骚人墨士握管生花、染翰成雾，即一切游闲豪侠、击筑弹丝、斗鸡走狗……靡不各极其工。而又四方舟航所凑，水陆奇深，异赀百物所环，廛市之徒摩肩轇轕……盖他境繁华所罕与俪。”[1]

时人吟咏菱湖镇的诗很多，对其兴旺发达莫不一唱三叹。万历《归安县志》载其中一首曰：“鱼廛丝市闹通衢，僻壤今成贡赋区，南院钟声传北院，西湖水势入东湖”，还说“夜市灯光匹练拖”[2]。清初以来，菱湖镇更趋繁荣，“科第更盛于前明，商贾蕃凑，丝业尤甲一邑”，设有主簿驻扎，居民约五千余户[3]。

菱湖镇号称泽国水乡，四面环水，中多市河，舟楫往来十分方便，水中交易的水市也很发达。《苕纪》说：“菱湖水居舟中，列诸货市之，谓之水市”。康熙《归安县志》说：“菱湖为百货所集，作水市”。这构成了菱湖镇的独特色彩。明赵金《过菱湖诗》曰：

“去去余不路，遨游一问津，
村墟船作市，地绝水为邻。
菱藕官租足，鱼虾野馔新，
众山遥映带，相对碧嶙峋。”[4]

舟船与商业关系密切，市户收租之船曰账船，载运货物之船曰装船，载运蚕丝之船曰丝船，载客往来各处之船曰航船[5]。

菱湖四乡的主要经济支柱是蚕桑。费南晖《西吴蚕略》说：“自头蚕始生至二蚕成丝，首尾六十余日，妇女劳苦特甚。其饲之也，篝灯彻曙，夜必六七起。叶带露则宜蚕，故采必凌晨”；“富室无论

---

①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舆地略·风俗引下继祀《重修永宁禅院碑记》。

② 光绪《菱湖镇志》卷一舆地略·疆域。

③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

④ 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五村镇。

⑤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舆地略·物产。

已、贫家所养无多，而公家赋税、吉凶礼节、亲党酬酢、老幼衣著，唯蚕是赖，即唯健妇是赖。顾利殊有限，丰收三五载，讫可小康”。归安县“诸乡统力农修蚕绩”，“菱湖业蚕捻绵为绸尤工”[1]。

湖州以产丝、绸著名，而菱湖所产丝、绸又名列湖州府各地之前茅。万历《湖州府志》说：“丝有合罗丝、串伍丝、经纬丝，属县俱有，惟出于菱湖、洛舍者第一”；“绸有水绸，有纺丝绸，出菱湖者最佳”[2]。

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苕纪》云：“菱湖多出蚕丝，贸易者倍他处，盖由来久矣”。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许的乡村所产之蚕丝，都集中于菱湖镇。农家用丝船——“其船制狭而长，首尾均用楫弃橹”——把丝运至镇上，“投主交易而退”。牙行则临河收丝，“四五月间，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生意非常繁忙[3]。其小行买之以饷大行及买丝客人者，曰钞庄；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肥利，曰小领头，俗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4]。本镇所集散之丝数量相当可观，“每八十斤为一包，每岁约近万包，为一郡冠”[5]。

叶市仅次于丝市。立夏三日，四乡采桑贸叶，名曰叶市。叶行设于安澜桥一带。其后叶市发展，叶行遍布于东西南北四栅[6]。

发达的市镇经济带来了发达的市镇文化。清人常说，菱湖镇“国朝科第更盛于前明”，并非虚言。且以进士及第人数为例以见一斑：

宋进士　　　　1

---

[1] 乾隆《湖州府志》卷三十九风俗。
[2]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
[3] 天启《吴兴备志》卷二十九琐征。
[4]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舆地略·物产。
[5]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一舆地略·物产。
[6]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舆地略·风俗。

明进士	弘治	2
	嘉靖	2
	万历	4
清进士	康熙	3
	雍正	4
	乾隆	17
	嘉庆	5
	道光	2
	同治	1
	光绪	2①

乾隆、嘉庆数十年间，户不及万的菱湖镇，进士及第者竟多达二十二人，科第达于极盛。卞斌《募建龙湖书院启》述及一门二及第、一门三同科的盛况时指出，“一门上第榜花有大小之称。康熙时孙在丰殿试一甲第二，从子孙见龙会试第一；乾隆时编修孙辰东起而兼之，人目侍郎为老榜眼，编修为小榜眼”；“其乡试同科者，康熙五十三年吴氏延熙、兆麟、应棻三人；雍正十年吴氏涞、讷、锦三人；十三年吴氏龙光、熊光二人，朱氏栋、更二人；乾隆元年孙氏汝馨、鄂荐、岐三人；二十五年孙氏凌云、辰东、级三人；五十七年孙氏倬、宪绪二人；六十年孙氏树楷、征槐二人”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菱湖镇渐趋衰微。其时虽有茧行一家（西栅外蔚丰），丝行庄七家，钱庄一家（恒孚庄），典当五家（昌泰、乾大、万泰、万泰分号、安泰），其他商店三百三十家（雇佣店员一千六百五十人）③，但当时菱湖镇已由昔日丝业市镇变为鱼行最多的

---

① 光绪《菱湖镇志》卷十九选举志·进士。

② 光绪《菱湖镇志》卷二舆地略·公廨。

③《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37—40页、40—41页、55—59页。

"鱼类鱼秧交易中心"[1]。

四十一、双　林　镇

双林镇位于归安县治东南六十里。北宋时称为东林镇，南宋时为商贾聚集之地，又称为商林。元时镇上有绢庄十所，在普光桥东一带收购四乡农家所产丝、绢。明初，东林衰落，西林渐盛，永乐三年改西林村为双林镇，"津梁环亘，里閈骈填"[2]。东林则由镇改为市，东林虽衰犹有旧时规模，"街逵宽衍，不异城郊"[3]。

明初时双林镇"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洪武十四年颁黄册于州县，"一时里中家有户帖者寥寥"，"户犹未广也"。到成化年间，户口增长，"倍于前"；"至崇祯朝，岁征烟户册，实得户三千有奇，口万六千有奇"；至清初，"里居日集，侨民日增，实得户三千四百有奇，口二万一千有奇"[4] 释道元《双林镇舆地图说》所描述的正是明清之际的状况："亭台相望，殿宇嵯峨，津梁几百十带，居人三四千户，高门鳞次，甲第云连。"[5] 嘉庆至咸丰间，"尤称富庶，科甲振兴，名宦名儒辈出"，乃双林镇的鼎盛时期，全镇居民增至近万户。咸丰十年、十一年两遭太平军之役，"遭毁过半"，"集存户不及四千"[6]。虽然一时受到破坏，景况大不如前，但到同治、光绪时代，双林镇的繁荣仍不减当年。

双林镇距杭州一百八十二里，距湖州五十四里，东至乌镇三十

---

[1] 《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吴兴长兴分册(杭州正则印书局，1935年)，第55—59页。

[2]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

[3] 嘉庆《东林山志》卷四。民国《双林镇志》卷一方域。

[4]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八户口。

[5] 民国《双林镇志》卷首，释道元.《双林镇舆地图说》。

[6] 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

六里，东北至南浔镇三十六里，南至新市镇四十五里，东南至练市镇二十里，西至菱湖镇三十六里，北至大钱镇三十六里。双溪穿越镇中，一由西南向北，一由西南向东，在镇中呈丁字形相交，为嘉、湖间往来捷径。

全镇东西长四里，南北宽三里，主要街巷有：

上横街——在市心，东接便民桥，西至薛家汇，横亘一镇之中，系商贾汇集之地，仅衣庄就有几十家（清初七十余家，乾隆时四十余家）；

下横街——在上横街对岸，街上多酒馆，游客骈会，日夕喧阗，有小苏州之名。新公馆前每日午前各绢庄在此收购乡民绢匹。街下市河通东西漾；

新开巷——一名新绢巷，崇祯间东迁，沈孝廉构筑市廛为收绢所；

旧绢巷——为估客收绢所，明末清初绢市东移，故称旧绢巷；

老绢巷——为乡民卖绢所[1]。

全镇有大街七条、巷十五条、弄四十三条。镇中心跨越市河的化成桥，为苏杭通津，船只昼夜络绎不绝，桥上有灯杆，夜间灿然如同白昼，四方商贾望杆云集。另一通津是清风桥，来往交驰，视艘相印。

双林镇四乡遍地栽桑，《双林镇志》说："吾镇之乡村无不栽桑，惟园庭墟墓间始有杂木"[2]。小满之后农家忙于采桑饲蚕，进入繁忙的"蚕月"。由于附近水质清冽，"乡人取以缫丝，洁润异常"，有诗曰："汲得凤凰泉畔水，一堆白雪晃新丝"[3]

---

[1] 民国《双林镇志》卷四街市。

[2]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3] 民国《双林镇志》卷二水道。

双林镇是著名的包头纱(绢)的产地[1]。包头绢可制作妇女头饰,盛销全国各地,当时号称"通行天下","闽俗有男亦用裹首,惟北地秋冬风高沙起,行者纱罩面护目"[2]。明代成化年间,双溪两岸农家都精于织绢,前往采购的商贩络绎不绝。明成化十一年正月张廉撰《重建化成桥碑铭》记载,"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于是四方之商贾咸集以贸易焉。溪实为嘉湖往来捷径"[3]。

正德、嘉靖以前,双林仅织纱帕包头绢之类,隆庆、万历以来丝织业有大踏步发展。《双林志》曰:

> "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绸之缎,有花有素;有重至十五六两,有轻至二三两,有连为数丈,有开为十方,每方有三尺、四尺、五尺,长至七八尺;其花样有四季花、西湖景致、百子图、八宝龙凤,大小疏密不等。"[4]

这种精致的绢绸成为湖州丝绸的精品,吸引着外地客商,形成"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的繁忙景象,由万历一直持续到乾隆,久盛不衰[5]。

因此之故,双林镇四乡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甚高。其地向为蚕桑区,时人谓"吴兴蚕桑甲天下,东林又甲于吴兴"[6]。农家无不栽桑养蚕,"好稼穑,尤精治桑,桑之利倍收于田,以故家益

---

① 万历《湖州府志》卷三物产。

②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二碑碣。

④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引《双林志》。亦见茅应奎《东西林汇考》卷四土产志。

⑤ 乾隆《湖州府志》卷四十一物产引《双林志》。亦见茅应奎《东西林汇考》卷四土产志。

⑥ 嘉庆《东林山志》卷十三土风。

⑦ 光绪《归安县志》卷二十艺文。

绕”[1]。四乡水质清洌，利于缫丝，“乡人取以缫丝，洁润异常”[2]。双溪左右延袤数十里农家皆习织绢，织旋漾、纱机埇等村机户尤为集中，织旋漾“纺织家环聚其中”，纱机埇“明初织纱机者聚此”[3]。“近镇数村以织绢为业，男子或从事绞线，必常出市买丝卖绢，田功半荒，而衣帛食鲜醉饱市肆，其逸乐远胜常农”[4]。农家普遍“以织绢为上”，作为主业，“而出息亦巨”，经济收入颇高，故“机声鸦轧晓夜不休”[5]。从而促使农业经济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视田地为累赘一端。当地人如此说：

> “近村织绢，乡人赚钱甚易。……而田地荒芜，入不敷出，needs称贷，渐至冻馁者有之。此等村落田地不足贵。若田属镇人，由佃纳租，每得不偿失……所谓‘田为累字头’也。”[6]

可见在农村商品生产日益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的纯农业经营由于收益甚微，越来越丧失吸引力，农家莫不以蚕桑业、丝织业当作财富的源泉，而孜孜以求。

农家除蚕桑丝织外，还从事纺织缝纫业。《双林镇志》说：“吾乡农家育蚕外，工纺织，为衣履，比户皆然。居镇者无蚕桑事，于炊爨缝纫外勤纺织，精刺绣，工裁剪，成衣服”。有的从事织布，所织黄纱布、白纱布颇佳；有的从事打线（绞线），有花本线、旗脚线、横线、直线、滚头线，为织绉纱提供丝料原料；有的从事制蒲鞋；有的从事陶器、砖瓦制作。此种行业道光以后尤为兴盛，原因在于道光以后绢业生意清淡，织者渐少，不少机户转而从事缝纫、制作衣服鞋袜，受雇于市店，“计物得值，昼夜辛勤”[7]。

---

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二水道。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二水道。
④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⑤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⑥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⑦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双林镇始终以织绢业闻名远近，镇上大宗出产首推包头绢，轻者称“海丈”，重者称“狭贡”、“顶贡”。由“本镇及近村乡人为之”。另有包头绉，“起于明天启时”，“道光后，杭州庄家亦多自织，然总不及双林之密实也”①。

这些从事丝织业的“本镇及近村乡人”，或者自家栽桑养蚕，自家加工成丝、绢、纱，出售于镇上牙行；或者从镇上购回原料加工，“有往嘉兴曹王附近买茧缫丝者”，也有到乌青镇“零买经纬自织”者②。镇上有专业机户，或家庭经营，或雇工经营。他们大多不生产原料，原料取给于市场，与牙行商人关系密切。一些短缺资金的机户，多给商人代为加工，收取加工费，当地人称此种商人为“庄家”，“庄家有赊丝与机户，即收其绢，以侔重利者”③。这种庄家与机户的关系，实质也是一种雇佣关系。

本镇及近村乡人所织之绢，由牙行——绢庄收购。“凡收绢，黎明入市，曰上庄，辰刻散市，曰收庄”。“主其事者有司岁、司月，皆衣冠揖让，权轻重美恶以定价，无参差也无喧哗。故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小绢主则惟引远近各乡机户为牙耳”④。

绢庄所收之绢，必须进行加工，当地称之为“染皂”。大体工序是先煮、后漂，然后敷以蕨粉，捣以砧石，抹以帮布。镇上皂坊、黑坊、胶坊之类手工业作坊很多。

皂坊，专染皂色绢，有灶，有场，有架，主要分布于耕坞桥一带。。作坊工人数百，不少是由泾县来此的雇佣劳动者⑤。

黑坊，染练绫绸、包头纱，多由本镇居民操持。

胶坊，专门染练五色裱绫。先把绫绢染以五彩，拌以粉胶，然

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② 《乌青文献》卷三农桑。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四蚕事。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④ 姚典籌：《毂庵日记》，见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⑤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后用刀刮蹩，或用巨石砑平，加工成胶绫彩绢。此种胶坊也由本镇人操持[1]。

这三类染皂作坊，以皂坊规模为最大，盛时雇佣工作之人常达数百人以上。一些外地客商也在镇上设皂坊，加工绢绫，运销外地，尤以泾县商人为最多，"嘉道年间，泾县人在镇开设皂坊，专制绫绢，运销江宁、徽、宁等处，人数颇众，营业极盛"[2]。

经过加工的绫绢，量轻者曰海丈，销往福建及温州、台州等处，盛时销量达十余万匹；量重者曰狭贡、顶贡，销往江浙等处。裱绫、裱绢仅本镇一处生产，行销各省，且达日本，业此者设分庄于上海、苏州，生意兴隆[3]。

蚕丝贸易是双林镇仅次于绫绢贸易的重要行业，康熙时人唐甄说：

> "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装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是以虽赋重困穷，民未至于空虚，室庐舟楫之繁庶胜于他所，此蚕之厚利也。"[4]

双林镇成为与南浔并驾齐驱的湖丝(吴丝)集散中心，生意兴旺，获利丰厚，"精其业者，即空手入市，亦可日有所获……俗所谓'早晨没饭吃，晚上有马骑'"[5]。

双林镇上招接各地丝商的牙行——广行、客行遍布于四栅。小满闽广大贾投行收买，头蚕丝市、二蚕丝市是大市，"日出万金"。"中秋节后，客商少而夥友亦散，谓之冷丝市，陆续发卖，可与

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② 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唐甄：《教蚕》。

⑤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次年新丝相接,故曰:买不尽湖丝也"[1]。每逢客商多而货色少时,"行家雇船下乡收买,谓之出乡",又有代行家收买的"抄庄",有既买而卖与各行的"掇庄"(或曰贩子),还有代掇庄充作乡货上行出卖的"撑旱船",以及平时零卖与机户的"折丝庄",新丝初出即买进囤积以待售货的"拣先土客"。蚕丝贩卖成为镇上一大行业,"贸易之人衣食于此者十居其五"[2]。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双林镇的蚕丝贸易仍很兴旺。首先是肥丝贸易。肥丝一名粗丝,供织绉用,条分细者销于盛泽镇一带,稍粗者为线料,销于濮院镇一带。咸丰、同治年间,仅有客帮商人到镇上"坐庄抄丝",销量不大。光绪年间,有协源肥丝行开市,"四出兜销,丝业逐年而盛,乃兼并邻近市镇所出合双林,其总数可达千担"[3]。其次是白丝贸易。白丝为出口蚕丝,盛产于双林镇东北乡之丁泾、西阳、邢村、邢窑等地,"缫丝手段较优",所缫洋庄白丝,统称辑里丝。道、咸间已有商人运至香港出售,蔡兴源、陈文昌等丝行都由此起家,积资百万。以后经营白丝的丝行增多,选头号白丝运至上海,直接售于洋行,常年出口达三千余担[4]。

此外,农家还从事打线业,生产花本线、旗脚线、横线、直线、滚头线,为织绉纱提供原材料。丁泾、西阳等村农家还善于养野蚕、缫野蚕丝。镇北邢窑村还是制陶器、砖瓦的专业村。

由于商品经济发达,农地大多用于蚕桑,大致占耕地的十分之七左右,粮食无法自给,必须仰赖外地运入。"籼粳等米供本地食料者,仅十分之七,余三分必待他处接济"[5]。镇上经营商品粮的米肆设于四栅之侧,方便客船、乡船停泊。米肆有二类:代客买卖者

---

[1]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2]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3]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4]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5]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为米行，零售者为米店。镇上冬季有糙米市，五六月有冬舂米市，四月有菜籽市，六七月有裹饼市，其余粮食全归米行买卖①。

双林镇作为一个丝绸贸易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逐渐形成一系列商人的公共性组织：

新公馆——在新绢巷，雍正四年由各绢行合资兴建，各绢行(庄)每日午前在此会集，收乡人售绢，位先后有序。每年九月十二、十三日，必聚集于此，演戏为会。

旧公馆——本名泾县会馆，康熙年间宁国府泾县绢商所建。

泾县会馆——由泾县同乡人公建。嘉道年间泾县人在镇开设皂坊，专制绫绢，运销江宁、徽州、宁国等处，人数众多，营业极盛，集资造此会馆。

此外还有金陵会馆、宁绍会馆、米业公所、药业会所等。另有新安义园——"初时徽商殁于镇者随处散厝，年久无考。乾隆时孙吴汪程俞等姓十六家，祖籍休宁，共销赀购地于西坟滩，建楼三楹……凡徽州六县之商人客死者皆得入殡"②。还有崇义堂丝绢公所——"新绢巷旧有新公馆，即绢业公所也……逢五、九两日，绢业堂会集演剧酬神。粤乱时尽被毁去。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绢业董事沈肖岩善同集同业募劝公资兴复公所，因资绌，乃连粗丝、折丝两业各捐疑同建公所"③。

上述会馆、公所的建立，一方面显示了双林镇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对各地客商的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显示了各地客商(尤其是徽州商人)在双林镇的雄厚势力。双林镇上"织绸绫及缫桑蚕丝工作者不过数千人"④，而从事丝绸贸易的客行、绢庄、搂庄、折丝庄、拣

---

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六物产。

② 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

③ 民国《双林镇志》卷八公所。

④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

首等商人，“土客总之，吾镇贸易之人衣食于此者，十居五焉”[1]。占全镇总人口一半的人都卷入了丝绸贸易之中，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资本雄厚的外地客商。不独商人土客参半，手工工匠也如此，“其石工、木工、染工、薙工大半来自他乡，油坊工匠多来自长兴、江宁，其余各业则主客参半”[2]。

繁荣的经济为文化事业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双林镇不仅是商贾云集之所，也是士子文人切磋学问的理想环境。镇上教育事业发达，文化水平较高，人们以亦农亦儒、亦贾亦儒为家训。明清两代科第兴盛，从万历八年至康熙二十三年间，中举者达四十四人，可谓盛极一时。明代有进士六人、举人二十七人，清代有进士十六人、举人六十六人。人们眩耀说，双林镇“愈极繁华，甲第连云”，“四方贤大夫，选胜蹈奇者，咸至于此”[3]，成了名符其实的文化中心。

[1]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2] 民国《双林镇志》卷十五风俗。

[3] 嘉庆《东林山志》卷二十三艺文志。

[附录]　江南市镇分布表

一、明代江南市镇分布表

府	县	市	镇
应天府	上元县		淳化镇
			石步镇
			土桥镇
			靖安镇
	江宁县		金陵镇
			秣陵镇
			大成巷镇
	句容县		常宁镇
			下蜀镇
	溧阳县	高友埠	举善镇
		周城埠	杜渚镇
		上兴埠	
		黄连埠	
		上沛埠	
	溧水县	乌山市	官塘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杨塘市	蒲塘镇
		柞塘市	孔镇
		郜市	蒲干镇
	江浦县	新路街市	乌江镇
		东葛城市	
		西葛城市	
	六合县	竹镇市	
		冶浦市	
		合百市	
	高淳县	南梅市	
		漆桥市	
		银林市	
		固城市	
		芦溪市	
苏州府	吴　县	月城市	横塘镇
			新郭镇
			横金镇
			木渎镇
			光福镇
			社下镇
	长洲县	大市	甫里镇
		王墓市	陈墓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尹山市	许墅镇
		相城市	陆墓镇
		黄埭市	周庄镇
	昆山县	陆家浜市	丘墟镇
		周市	泗桥镇
		半山桥市	石浦镇
		红桥市	安亭镇
			蓬阆镇
			角直镇
	常熟县	县市	梅李镇
		杨尖市	许浦镇
		河阳市	庆安镇
		徐家市	福山镇
		李 市	常熟镇
		练塘市	
		唐 市	
		支塘市	
		奚浦市	
	吴江县	县市	同里镇
		江南市	黎里镇
		新杭市	平望镇
		八斥市	震泽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双杨市	
		严墓市	
		檀丘市	
		梅堰市	
		盛泽市	
		庉村市	
	嘉定县	县　市	罗店镇
		州桥市	南翔镇
		封家浜市	大场镇
		钱门塘市	黄渡镇
		瓦浦市	江湾镇
		殷家行	清浦镇
		陆家行	娄塘镇
		刘家行	新泾镇
		吴家行	月浦镇
			外冈镇
		蒋家行	广福镇
		赵家行	徐家行镇
			安亭镇
			纪王镇
			葛隆镇
	太仓州	诸泾市	沙头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甘草市	茜溪镇
		隆　市	新安镇
		半泾市	双凤镇
		吴公市	
		新　市	
		涂松市	
		璜泾市	
		直塘市	
		陆河市	
松江府	华亭县	兴诸市	朱泾镇
		吕巷市	亭林镇
		泗泾市	外冈镇
		北钱市	莘庄镇
		杨巷市	南桥镇
			萧塘镇
			张泾堰镇
			小官镇
			柘林镇
			青村镇
			陶宅镇
			叶谢镇
			风泾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上海县	诸翟市	吴会镇
		鹤坡市	乌泥泾镇
		东沟市	下沙镇
		北蔡市	新场镇
		闵行市	一团镇
		高家行市	周浦镇
		陈家行市	三林塘镇
			龙华镇
			八团镇
	青浦县	广富林市	唐行镇
		杨林市	小蒸镇
		王巷市	青龙镇
		崧宅市	北七宝镇
		白鹤江市	金泽镇
		杜村市	盘龙镇
		杜家角市	赵屯镇
		泰来桥市	沈巷镇
			刘夏镇
			北簳山镇
			郏店镇
			重固镇
			艾祁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古塘镇 全家桥镇 杨扇镇 黄渡镇 朱家角镇 天兴庄镇 双塔镇
常州府	武进县	县市 殷市 桐市 焦店 阚店	奔牛镇 魏村镇 横林镇 阜通镇 新桥镇
	无锡县	大市 南市 陶市 彭店 万步 徐店 曹店 唐店 何店 应店	洛社镇 甘露镇 望亭镇 竹塘镇 陆墟镇 江市镇 郭市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袁店	
		凌店	
		上店	
	江阴县	大　市	华墅镇
		江下市	青旸镇
		三叉路市	崇村镇
		虞门市	竹塘镇
		利城市	长泾镇
		石堰市	长寿镇
		月城桥市	顾山镇
		四河口市	杨舍镇
		流黄市	申港镇
		黄塘市	利城镇
		东望桥市	石桥镇
		云亭市	夏港镇
		黄村桥市	蔡泾镇
		杨墅桥市	唐墅镇
		长泾市	陈墅镇
		北角市	
		南角市	
		顾山市	
		筑塘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南新桥市 北新桥市 周庄市	
	宜兴县	县南市 长桥市 潼渚市 缶店 褚店 上店 新市 三里店	湖㳇镇 张渚镇 河桥镇 小里镇 古镇
	靖江县	县市	
镇江府	丹徒县	大市 小市 中市	江口镇 丹徒镇 大港镇 丁角镇
	丹阳县		延陵镇 吕城镇 丁桥镇 珥村镇 埤城镇
	金坛县	大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小市	
太平府	当涂县	薛店市	丹阳镇
		新丰市	大信镇
		褚桥市	石慈镇
		博望市	采石镇
		江口市	黄池镇
		十里市	
		黄山市	
		青游市	
		青山市	
		清沟市	
		三湖市	
	芜湖县	县市	河口镇
		河南市	
		板桥市	
		杨请市	
		石冈市	
		山口市	
		石硊市	
		东管市	
		橹港市	
		孤汀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繁昌县	县市	黄浒镇
		上峨市	杨家会镇
		蒋桥市	新林镇
		中会市	下峨镇
		唐灿市	荻港镇
		汕市	
		黄山市	
宁国府	宣城县	双桥市	符里镇
		水东市	水阳镇
			黄池镇
			临丧镇
	南陵县	金家阁市	
		丁家埠市	
	泾　县	藤溪市	赤滩镇
		安吴市	马头镇
		下坊市	
	宁国县	河沥市	
		石口市	
		东岸市	
		港口市	
	太平县		宏潭镇
池州府	贵池县		清溪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齐山镇 池口镇 殷家合镇 灵芝镇
	青阳县		金山镇 慕善镇 管埠镇 陵阳镇
	铜陵县		顺安镇 管山口镇 焦家埠镇 郎坑镇 江口镇 大通镇 钟鸣镇
	建德县		永丰镇 葛公镇 古港镇
	东流县		石潭镇 张家滩镇 吉阳镇 雁汊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香口镇
徽州府	歙　县	东门外市	岩寺镇
		龙舌头市	
		上路市	
		驿前市	
		县前市	
	休宁县	县市	
	婺源县	县市	
	祁门县	县市	
	黟　县	县市	
	绩溪县	县市	
杭州府	仁和县	旧嘉会门市	临平镇
		沙田市	塘栖镇
		夹城巷市	
		宝庆桥市	
		德胜桥市	
		石灰坝市	
		北新桥市	
	钱塘县	浙江市	
		范村市	
		西溪市	
	海宁县	郭店市	长安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袁花市 转塘市	硖石镇
	富阳县	汤家埠 场口埠 灵桥埠 渔里山埠 洋婆场	
	余杭县		瓶窑镇 石濑镇 双溪镇 黄湖镇 长乐镇 闲林镇
	临安县		青山镇 下管镇 横板溪镇 鹤山镇 西墅镇 黄潭镇
	新城县		渌川镇 松溪镇 山溪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洞桥镇
	吕化县		河桥镇
			手窑镇
	于潜县		
嘉兴府	嘉兴县		钟带镇
			新丰镇
			新行镇
			王店镇
	秀水县		新城镇
			濮院镇
			陡门镇
			王江泾镇
	嘉善县	张泾汇市	王带镇
			斜塘镇
			陶庄镇
			风泾镇
			魏塘镇
			千家窑镇
	海盐县	欤城市	茶院镇
		砂腰市	半逻镇
		梅围市	鲍郎镇
		通玄街市	澉浦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角里堰市	沈荡镇
	平湖县	徐家带市	广陈镇
			新仓镇
			新带镇
			旧带镇
			灵溪镇
			乍浦镇
			当湖镇
	石门县	洲钱市	石门镇
		义和市	
		语儿市	
	桐乡县	凤鸣市	青镇
			石门镇
			濮院镇
			皂林镇
湖州府	乌程县	菁山市	乌镇
		妙喜市	南浔镇
	归安县		菱湖镇
			埭溪镇
			琏市镇
			双林镇
			乌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安吉县		马家渎镇
			递铺镇
			梅溪镇
	长兴县		四安镇
			和平镇
			皋塘镇
			合溪镇
			水口镇
	德清县		塘栖镇
			新市镇
	武康县	三桥埠	
		上陌埠	
	孝丰县		沿干镇
绍兴府	山阴县	漓渚市	钱清镇
		柯家市	
		安昌市	
		陡门市	
	会稽县	马山市	三界镇
		樊江市	
		道墟市	
		伧塘市	
		白米堰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曹娥市	
	萧山县	临浦市 长山市	西兴镇 渔浦镇 钱清镇
	诸暨县	枫桥市 黄润街市	
	余姚县	江桥市 临山市 浒山市 姚家店市 李家闸市 新坝市 梁同市 马渚市 周巷市 天华市 店桥市 黄清堰市 埋马市 匡堰市 石人山市	
	上虞县	梁湖市	纂风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五夫市	
		小越市	
	嵊　县	华堂市	蛟井镇
		上冈市	
		长乐市	
		三界市	
		崇仁市	
	新昌县	王泽市	
		胡卜市	
		长潭市	
		棠墅市	
		坑西市	
		蔡岙市	
宁波府	鄞　县	角东市	小溪镇
		宝幢市	
		小白市	
		东吴市	
		下水市	
		韩岭市	
		横溪市	
		栎社市	
		林村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凤岙市	
		石塘市	
	慈溪县	文溪市	
		大隐市	
		黄基市	
		车厩市	
		渔溪市	
		蓝溪市	
		鸣鹤市	
	奉化县	奉化市	
		江口市	
		蔡桥市	
		尚田市	
		溪口市	
		南渡市	
		泉口市	
		白社市	
		公棠市	
	定海县	城西市	
		江南市	
		石湫市	
		澥浦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象山县	白石市	
		坟头市	
		南堡市	
		泗洲市	
		三角市	
		弦歌市	
金华府	金华县	溪下街市	孝顺镇
		北关市	
		含香市	
		曹村市	
		孝顺市	
		里浦市	
		何楼市	
		梅溪市	
		阳波市	
		竹马馆市	
		马海市	
	蓝溪县	河西市	香溪镇
		杨塘市	平渡镇
		厚仁市	
		都心市	
		皂同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板桥市	
		马涧市	
		大塘市	
		横木市	
		石渠市	
		永昌市	
		赤溪市	
	东阳县	良渡市	
		茶场市	
		大化市	
		长衢市	
	义乌县	念三里市	
		倍磊市	
		酥溪市	
		青口市	
		光明市	
		洋滩市	
		赤岸市	
		野墅市	
		楂林市	
		芦塞市	
		江湾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永康县	高堰市	
		李溪市	
		前仓市	
		净心市	
		可投市	
		四路口市	
		岩下市	
		芝英市	
		胡堰市	
		龙山市	
		清渭市	
		杨公桥市	
		太平市	
		黄塘市	
	武义县	泉溪市	
		苦竹市	
		厚舍市	
		横路市	
		茭道市	
		端村市	
		南湖市	
	浦江县	横溪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朱村市	
		下柳市	
	汤溪县	马海市	开化镇
		酤坊市	
		花园市	

二、清代前期苏松杭嘉湖市镇分布表

府	县	市	镇
苏州府	吴　县	月城市	横塘镇
		枫桥市	木渎镇
			光福镇
			社下镇
			新郭镇
			横金镇
	长洲县	大市	唐浦镇
		黄埭市	陆墓镇
		相城市	金墅镇
			望亭镇
			蠡口镇
			浒墅镇
	元和县	王墓市	甪直镇
		尹山市	陈墓镇
			唯亭镇
			蠡口镇
			周庄镇
			章练塘镇
			韩镇
			徐庄镇
	昆山县	半山桥市	石浦镇
		吴家桥市	千墩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陆家浜市	安亭镇
			泗桥镇
			石浦镇
			蓬阆镇
			吴家桥镇
			杨及泾镇
			张浦镇
			上明殿镇
	新阳县	周市	丘墟镇
			真义镇
			巴城镇
	常熟县	县市	福山镇
		杨尖市	鹿苑镇
		河阳市	庆安镇
		奚浦市	
		西徐家市	
		唐市	
		练塘市	
		大河市	
		田庄市	
		范家市	
	昭文县	老徐市	梅李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董家浜新市	支塘镇
		李市	许浦镇
		苏家尖市	徐六泾镇
		陈家市	
		白茅新市	
		珍门庙市	
		沈家市	
		周泾口市	
		王家市	
		陆家市	
		赵市	
		彭家市	
		项市	
		文林市	
		碧溪市	
		西周家市	
		小吴家市	
		老吴家市	
		周家市	
		横塘市	
		归家市	
		张家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何家市	
	吴江县	县市	同里镇
		江南市	汾湖镇
		八斥市	盛泽镇
		新杭市	黎里镇
		黄溪市	芦墟镇
		庉村市	
	震泽县	县市	平望镇
		双杨市	震泽镇
		严墓市	
		檀邱市	
		梅堰市	
太仓州		直塘市	双凤镇
		陆河市	沙头镇
		涂松市	璜泾镇
		渚泾市	
		甘草市	
	镇洋县	鹤王市	茜泾镇
			新安镇
			刘河镇
	崇明县		杨家河镇
			新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平安镇
			新开河镇
	嘉定县	练祁市	南翔镇
		钱门塘市	外冈镇
		封家浜市	葛隆镇
		殷家行	真如镇
		陆家行	娄塘镇
		刘家行	新泾镇
		吴家行	徐家行镇
			安亭镇
			黄渡镇
			纪王庙镇
	宝山县	蒋家行	罗店镇
		赵家行	江湾镇
			高桥镇
			大场镇
			月浦镇
			杨家行镇
松江府	华亭县		亭林镇
			张泾堰镇
			张泽镇
			叶谢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莘庄镇
			漕泾镇
			沙冈镇
	奉贤县	东新市	南桥镇
			青村港镇
			陶宅镇
			庄家行镇
			泰日桥镇
			萧塘镇
	娄县		风泾镇
			北七宝镇
			小蒸镇
			泗泾镇
			六店湾镇
			石湖塘镇
			五舍镇
			横山镇
			祥泽镇
			张庄镇
			天马山镇
			昆山镇
			沈港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金山县	韩家坞市	朱泾镇
		杨巷市	吕港镇
		兴塔市	张堰镇
		北仓市	干巷镇
		西仓市	松隐镇
		旧港市	小官镇
		南陆市	
		姚家廊市	
		二龙庙市	
	上海县	东沟市	吴会镇
		高行市	乌泥泾镇
		梅源市	龙华镇
			颛桥镇
			北桥镇
			八团镇
			闵行镇
			高桥镇
			塘桥镇
			三林塘镇
			引翔港镇
			法华镇
			诸翟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南汇县	陈家行市	周浦镇
			下沙镇
			新场镇
			航头镇
			横沔镇
			北蔡镇
			张江栅镇
			一团镇
			杜家行镇
			三灶镇
			北秦日桥镇
			六灶镇
	青浦县	泰米桥市	唐行镇
		杜家角市	金泽镇
		广富林市	朱家角市
	福泉县	古塘桥市	赵屯镇
		崧宅市	盘龙镇
		白鹤江市	黄渡镇
		大兴庄市	金家桥镇
		刘夏市	王家港镇
		九团市	小蒸镇
		杜村市	凤凰山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八团市	佘山镇
		高行市	曹家路镇
			顾家路镇
杭州府	钱塘县	浙江市	留下镇
		龙山市	安溪镇
		范村市	南场镇
		北郭市	
		半道红市	
		湖州市	
		松木场市	
		赤山市	
	仁和县	旧嘉会市	范浦镇
		南上门市	德胜桥镇
		北土门市	江涨桥镇
		沙田市	北关镇
		夹城巷市	桥司镇
		北新桥市	临平镇
		横塘市	塘栖镇
		茧桥市	
	海宁州	县市	赭山镇
		郭店市	长安镇
		转塘市	袁花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黄冈市	石墩镇
		黄湾市	硖石镇
		朱家桥市	
		丁家板桥市	
		新仓市	
		旧仓市	
		东北斜桥市	
		路仲里市	
		南孟子桥市	
		翁家埠	
		春深巷市	
		丁家渡市	
		许村市	
		周王庙市	
		航头市	
		墅庙市	
		庆善桥市	
	富阳县	汤家埠	
		场口埠	
		灵桥埠	
		渔山埠	
		洋婆场	

续表

府	县	市	镇
	余杭县	县市	闲林镇
		新街市	瓶窑镇
		长乐市	石濑镇
			曹溪镇
			黄湖镇
			双溪镇
	临安县	东市	令苕镇
		西市	西墅镇
			黄潭镇
			石境镇
			鹤山镇
			王柳镇
			青山镇
			下管镇
			横板溪镇
	于潜县		
	新城县		渌川镇
			松溪镇
			山溪镇
			洞桥镇
	昌化县		河桥镇
			颊口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手窑镇 堪村镇 朱柳镇
嘉兴府	嘉兴县		王店镇 新丰镇 钟带镇 新行镇
	秀水县		王江泾镇 新城镇 濮院镇 陡门镇
	嘉善县		王带镇 斜塘镇 陶庄镇 风泾镇 干家窑镇
	海盐县		茶院镇 半逻镇 鲍郎镇 澉浦镇
	平湖县		芦沥镇 钱家带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徐家带镇
			乍浦镇
			广陈镇
	石门县	洲钱市	石门镇
	桐乡县	县市	皂林镇
			石门镇
			濮院镇
湖州府	乌程县		南浔镇
			乌镇
			大钱镇
			东迁镇
	归安县		菱湖镇
			双林镇
			琏市镇
			埭头镇
	长兴县		四安镇
			和平镇
			合溪镇
			炉头镇
			水口镇
	德清县		唐栖镇
			新市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武康县	三桥埠	上陌镇 簰头镇
	安吉县		梅溪镇 递铺镇 马家渎镇 小市镇

三、清代后期苏松市镇分布表

府	县	市	镇
苏州府	吴县		五龙桥镇
			横塘镇
			新郭镇
			蠡墅镇
			横金镇
			西跨塘镇
			蒋垛上镇
			九龙桥下镇
			木渎镇
			浦庄镇
			横泾镇
			和桥镇
			徐庄镇
			黄芦镇
			泽塘镇
			东区镇
			枫桥镇
			大塘湾镇
			西跨塘镇
			光福镇
			[illegible]图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东诸镇
			渡村镇
			前湾镇
			夏泾镇
			镇夏镇
			东蔡里镇
	长洲县		向街镇
			白马涧镇
			萧家湾镇
			浒墅镇
			金墅镇
			望亭镇
			东桥镇
			黄埭镇
			永昌泾镇
			芮埭镇
			渭泾塘镇
			石桥镇
			蠡口镇
			陆墓镇
	元和县		陆巷镇
			徐庄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毛渌泾镇
			沈垫桥镇
			甪直镇
			陈墓镇
			淀泾镇
			跨塘镇
			南斜塘镇
			周庄镇
			韩镇
			西车坊镇
			章练塘镇
			郭巷镇
			尹山镇
	吴江县	县市	八斥镇
			盛泽镇
			黎里镇
			黄溪镇
			同里镇
			平望镇
			震泽镇
			檀邱镇
			新河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芦墟镇
			溪港镇
	常熟县	西唐市	福山镇
	(含昭文县)	西张墅	田庄镇
		西徐市	西塘桥镇
		练塘市	鹿苑镇
		东唐墅	庆安镇
		任阳市	港口镇
		李市	冶塘镇
		白茆新市	石泉镇
		归家市	大和镇
		东张市	羊尖镇
		老吴市	旺儿桥镇
		何家市	平墅镇
		赵市	涧滤泾镇
		珍市	横泾镇
		沈市	强芜镇
		小吴市	石牌镇
		东周市	王渠镇
		碧溪市	支塘镇
		西周市	窑镇
		横塘市	项桥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邓市	梅李镇
		王墅	
	昆山县	半山桥市	石浦镇
		南陆家桥市	安亭镇
		红桥市	蓬阆镇
		金家庄市	角直镇
		旧泽市	千墩镇
		大覆庵市	杨及泾镇
		周巷市	吴家桥镇
			陈墓镇
			张浦镇
			上明田镇
			泗桥镇
			陆家浜镇
			大墅镇
			昆山镇
			夏驾桥镇
			谢麓镇
			度城镇
			歇马桥镇
			珠溪镇
			徐公桥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新阳县	周市	真义镇
		集街市	巴城镇
		后市	石牌镇
			丘墟镇
			北陆家桥镇
			南星渎镇
	太仓州	直塘市	沙头镇
		涂松市	璜泾镇
		三家市	浮桥镇
		陆公市	六尺镇
		九曲市	
		陆河市	
		老闸市	
		方家桥市	
		时思庵市	
		冯家桥市	
		归家庄市	
		王秀桥市	
		伍胥庙市	
		半泾市	
		甘草市	
		隆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小市 庙桥市	
	镇洋县	新塘市 牌楼市 毛家市 陆渡桥市 湖川桥市 亭子桥市 西码头市 南码头市 朱泾市	茜泾镇 刘河镇 蓬阆镇 柴行镇 葛隆镇
	崇明县		杨家河镇 新镇 平安镇 新开河镇
	嘉定县	封家浜市 陆渡桥市 朱家桥市 钱门塘市 望仙桥市 吴家行	南翔镇 纪王庙镇 江桥镇 栅桥镇 诸翟镇 马陆镇 石冈门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戬浜桥镇 娄塘镇 唐家行镇 外冈镇 葛隆镇 方泰镇 安亭镇 黄渡镇 陆家行镇 新泾镇 徐家行镇
	宝山县	殷家行 盛家桥市	月浦镇 罗店镇 杨行镇 刘行镇 广福镇 大场镇 真如镇 江湾镇 胡巷镇 高桥镇 彭浦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松江府	华亭县	寒字圩市	张泾堰镇
		后冈市	叶谢镇
		蒋庄市	山阳镇
		欢庵市	亭林镇
		漴阙市	张泽镇
		十字庙市	曹泾镇
		新桥市	车墩镇
		千步泾市	颛桥镇
		陈家行	沙冈镇
		朱家行	莘庄镇
			柘林镇
			小官镇
	上海县	洋泾市	塘桥镇
		杨师桥市	三林塘镇
		李家宅市	高桥镇
		新木桥市	陈家行镇
		永宁桥市	法华镇
		杨家弄市	诸翟镇
		东沟市	北桥镇
		陆家行市	马桥镇
		高行市	闵行镇
		塘口市	吴会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桥头市	虹安镇
		徐家汇市	龙华镇
		虹桥市	漕河泾镇
		北新泾市	
		杠栅桥市	
		华漕市	
		张家塘市	
		梅家弄市	
		朱家行市	
		长桥市	
		华泾市	
		曹家行市	
		塘湾市	
		荷巷桥市	
		语儿泾桥市	
		老闸市	
		新闸市	
		静安寺市	
		内外虹口市	
		引翔港市	
		沈家行市	
	奉贤县	阮巷市	胡家桥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曹家市	孙家桥镇
		法华桥市	戴家桥镇
		西新市	邬家桥镇
		陈行桥市	庄家行镇
		潘垫市	南桥镇
		虹桥市	萧塘镇
		游桥市	三官堂镇
		盛家厍市	钱家桥镇
		李匠桥市	高桥镇
		梁家行	陈家桥镇
		庄家行	青村港镇
		程何浜市	陶宅镇
		何家库市	泰日桥镇
		恬度里市	盛家桥镇
		韩村市	齐贤桥镇
		新塘市	蔡家桥镇
		杨王村市	四团镇
		道院地市	头桥镇
		朱店市	二桥镇
		张宅市	
		益村坝市	
		沈行前市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屠家湾市	
		庙泾市	
		南跄市	
		叶家行	
		刘家行	
		湾周市	
		唐家行	
		屠家桥市	
		金汇桥市	
		戚家行	
		东新市	
		分水墩市	
		陈家湾市	
		柴场市	
		梁店市	
		季家牌市	
	南汇县	列船桥市	周浦镇
		王家行	御界家镇
		北庄市	北七灶镇
		石家楼市	瓦屑墩镇
		鲁家汇市	横沔镇
		施家行	黄家楼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叶家行	陈家桥镇
		徐家弄市	北蔡镇
		方家村市	张江栅镇
		盛家桥市	龙王庙镇
		曹家行	新兴镇
		太平桥市	新场镇
		沧行	下沙镇
			坦石桥镇
			三灶镇
			北六灶镇
			沈庄镇
			杜家行镇
			拨赐庄镇
			航头镇
			闸港镇
			南大桥镇
			中心河镇
			一团镇
			竹桥镇
	金山县	兴塔市	朱泾镇
		韩家坞市	吕巷镇
		太平寺市	干巷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杨巷市	张堰镇
		八字桥市	
		西仓市	
		旧港市	
		角里庵市	
		北仓市	
		大石村市	
	青浦县	嵩宅市	七宝镇
		天圣庄市	簳山镇
		泰来桥市	泗泾镇
		蒋奥塘市	方家窑镇
		王巷市	徐泾镇
		西港市	凤凰山镇
		百聚桥市	佘山镇
		新桥市	辰山镇
		郏店市	广富林镇
		杜村市	陈坊桥镇
		艾祁市	沈港镇
		杨村市	章练塘镇
		和睦桥市	小蒸镇
		七汇市	朱家角镇
		香花桥市	金泽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刘夏市	商榻镇
		杨扇市	金家桥镇
			赵屯镇
			白鹤江镇
			章堰镇
			重固镇
			观音堂镇
			盘龙镇
			黄渡镇
			陆家巷镇
			诸翟镇
			种德镇
			杜家角镇
			古塘桥镇
			刘家角镇
	娄县	北钱市	枫泾镇
			泗泾镇
			七宝镇
			祥泽镇
			吾舍镇
			天马山镇
			张庄镇

续表

府	县	市	镇
			昆山镇
			横山镇
			沈港镇

后　　记

1981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的研究，其部分成果先后以论文形式问世的有：

《论明清苏松嘉湖农家经营的商品化》（《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期）；

《明清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历史教学问题》1983年第1期）；

《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

《明清时代的濮院镇》（《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

《十一至十七世纪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传统经济结构突破的区域性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明清江南丝绸业市镇的微观分析》（《史林》1986年第3期）；

《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复旦学报》1987年第2期）；

《明代浙江市镇分布与结构》（《历史地理》第五辑）；

《苏松棉布业市镇的盛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986年上半年，我写成了此书的初稿。

1986年6月初，我接受日本关西大学的邀请，作为交换教授，前往讲学。在半年间，除了为关西大学、大阪大学的东洋史研究生作明清史专题讲座外，还应邀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

九州大学、大阪大学作学术讲演。讲演的论题都是关于明清江南市镇方面的。例如：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讲演的题目是《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苏州府吴江县为中心》；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讲演题目是《明清江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讲演的题目是《明清江南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在九州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讲演的题目是《明清江南市镇的实态分析——以湖州府为中心》；在大阪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讲演的题目的《明清时代的江南市镇文化》。

为了讲演的方便，我将三篇讲演稿译成了日文，其中《明清江南市镇と乡村の都市化について》与《明清江南市镇の实态分析——苏州府吴江县を中心として》两篇，已在关西大学《史泉》杂志第65号、东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杂志第五集刊载了，另一篇《明清江南市镇の实态分析——湖州府を中心として》，也将在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发表。

关于江南市镇的一些镇志、市志、乡志、里志，在日本颇难见到。加之日本学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对江南市镇实态的了解存在一些困难。因此我的论文与讲演引起了日本学者极大的兴趣与反响。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生中山君的论文题是《棉业地区的市镇及乡镇社会》，与我在该校的讲演《明清江南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十分接近，因而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大阪大学的博士生藤田佳美小姐，原来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江南农业经济方面的，听了我的讲演后，决定改变论题，专门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在通过文部省的考试后，她已到复旦大学进修，由我指导她研究这一课题。大阪大学的滨岛敦俊教授是研究明清江南农村社会的专家，是我的老朋友，已经拟定计划、申请经费，来复旦大学与我合作研究江南市镇。名古屋大学的森正夫教授也是我的老朋友，他决定率领一个小组，从历史与地理两方面研究江南市镇，并作实地考

察。可见江南市镇已成为日本学者颇为热门的研究课题了。

近年来，日本学者关于江南市镇的论文也日渐增多，例如：川胜守的《长江三角洲镇市的发达和水利》(《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林和生的《中国近世地方都市的发达——太湖平原乌青镇的场合》(《中国近世的都市和文化》)、石原润的《华中东部明清民国时代的传统市》(《人文地理》32 卷 3 号)、上田信的《明末清初江南都市无赖的社会关系——打行和脚夫》(《史学杂志》90 编 11 号)、秦惟人的《清末湖州的蚕丝业和生系输出》(《中岛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森胜彦的《清末民国宝山农村的郊村化》(《东洋史论》第 3 集)、铃木智夫的《清末江浙的茶馆》(《历史上的民众和文化》)等等。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处理资料的方法，值得借鉴之处是不少的。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江南市镇作系统研究的，还很罕见。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此写了若干篇论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一书。但限于资料，涉及的面还较狭窄；不少镇志、市志作者无法看到，因而不可能对典型市镇作深入的剖析，其局限性是比较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这本书，还可以说是在这一领域所作的开拓性工作。但愿我的研究成果能为这一课题的深入开掘铺平道路。

1986 年 11 月修改于日本关西大学

1987 年 12 月定稿于上海复旦大学

作者附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作者=
页数=534
SS号=0
出版日期=